北镇势力与北朝政治文化

苏小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北镇势力与北朝政治文化

苏小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数据北镇势力与北朝政治文化

作者：苏小华 著

设计：姚成号

ISBN：978-7-5161-1561-9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 导言
- 第一章 北魏后期的北镇社会
    - 第一节 北镇社会的特点
    - 第二节 北镇武人与中原谋士
    - 第三节 尔朱氏集团初探
- 第二章 霸主与北魏皇权
    - 第一节 尔朱荣与孝庄政权
    - 第二节 北魏孝武帝与东西魏分裂
- 第三章 多重对立的东魏北齐政局
    - 第一节 论高欢的驾驭群豪
    - 第二节 乾明政变与北齐前期政局
    - 第三节 两都体制与东魏北齐政治
- 第四章 西魏北周的政治文化初探
    - 第一节 “内先协和”与关中本位政策
    - 第二节 西魏北周政权中的
    - 第三节 西魏北周军队的构成
- 第五章 勋贵与隋朝政局
    - 第一节 《隋书》所记杨坚史事辨析
    - 第二节 李密家族史补证

- 第三节 杨玄感·李密·李渊——勋贵

- 本书总结
- 附录一 西魏北周的财政与政治
- 附录二 试论骑兵战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发展
  -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单骑战术的发展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重装骑兵的战术
  -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轻骑战术
- 附录三 传世本《李密墓志铭》与出土《李密墓铭》的先后关系辨证
- 附录四 从政治制度到政治文化
  - 一 从政治制度到政治文化
  - 二 政治文化
  - 三 政治文化史的研究方法
- 参考文献
- 后记

导言

本书是由五组相对独立的专题构成的。最初的一篇是关于孝庄政权兴亡的思考。当时正在关注北魏宗室的演变，注意到宗室在北魏末年的分裂趋势，于是就从孝庄朝廷着手研究。在完成孝庄政权的研究之后，与之紧密相关的尔朱家族就成了下一个思考对象。之后，孝武政权与高欢的关系以及与关陇政权建立的关系的研究，又引出了对西魏北周、东魏北齐政治文化的思考。由于学界对这两个问题研究比较充分，所以转而研究了北镇社会。在初步理清了北镇社会的几个特征后，感觉对北齐、北周、隋、初唐史有了新的认识，于是就北镇人物在东西政权中的影响作了一些工作。所以本书上起北镇起义下至隋末唐初，而这一段正好是北朝从一个统一政权经过分裂再走向统一的历程，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有探讨的价值。[1]

对于这一段历史，前人的成果还是比较丰富的。在隋朝，著名的文学家卢思道写作了《周齐兴亡论》探讨北齐北周灭亡的原因。由于隋朝与北周的继承关系卢思道的分析显得敷衍，但是对于北齐的分析今天看来仍有其价值。在唐初，官方组织了对《北齐书》、《周书》、

《隋书》的编撰。这些史书不仅是史料，而且反映了编者对当时历史的认识，如果仔细推求这些书的体例以及史臣的感言，对于认识这段历史是有帮助的。在宋代，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对宋以前历史的研究性论著。对于北魏至隋朝史而言，司马光的梳理使得纷乱的历史有了头绪，当然这是司马光的思路。胡三省的注解显示了他对于制度、地理的精熟，其针对事件所发的议论往往有启发意义。宋代的学者还要提到叶适，他对此段历史的议论也独具慧眼。清代学者对于此段历史的成果主要反映在考据上。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等对于正史有所考校，对于一些历史问题有所归纳、阐发。这些研究虽然孤立、琐细，但是治学方法比较系统严密，比之前代学者的议论，更为科学。对于本书有借鉴意义的研究是沈垚的《北镇考》、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程树德《九朝律考》的相关研究。清代学者对于相关资料也做了初步整理。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王昶的《金石萃编》、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证》今天都成为研究者必备的资料书。万斯同、吴廷燮所做的史表、卢文弨的《〈魏书·礼志〉校录》、陈毅的《〈魏书·官氏志〉考证》都是有用的工作。

清末至1949年之前，是西方的史学进入中国，是现代史学建立、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一批史学大师，将中国史学推向了一个高峰。就此段史学而言，最早进行的研究可能是谷霁光关于府兵制的研究。此后周一良就北朝的民族关系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还就北朝的镇戍制度、六州都督进行了考释，这些研究都堪称经典。对于此段历史作出划时代成就的当属陈寅恪，他的隋唐制度的三源说、关陇集团说、种族与文化的关系说、南朝化说，是富有创见、富有启发性的规律总结。即使到今天，陈的学说仍然是学界讨论的重点和起点。1949年之后至1980年之间，中国大陆的史学研究受到政治的影响，就这段历史而言北镇起义史就成为了重点。现在看来作出突出成就的，还是在1949年前受到良好训练的史学家。比如说，姚薇元出版了专著《北朝胡姓考》，这部书是在陈寅恪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是对这一问题最权威的论著。唐长孺在北魏末年起义的研究方面将起义分为北镇、山胡敕勒、城民三个部分去探讨，注意起义者的身份地位就显得有创见。马长寿在1962年出版《北狄与匈奴》一书，在此书中他分析了关陇部族的构成、分布及社会特征。在同年出版的《乌桓与鲜卑》中研究了北镇鲜卑南迁与汉化的历程。这些研究与唐长孺的《魏晋杂胡考》一样成为研究北朝史的重要参考文献。在此期间，王仲荦完成了《北周地理志》和《北周六典》，这两部作品分门别类将相关资料汇集在一起，便于研究者使用，而且王仲荦在两书中对于某些问题进行了专题的研究，值得参考。此期间，张泽咸等完成了《魏晋南

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的编纂，对于本书的研究而言此书方便好用，显示了很大的工具价值。韩国磐对于北朝经济的研究，特别是均田制、三长制的研究也是本书重要的参考。此期学界还完成了由何兹全参与的《资治通鉴》和唐长孺对《魏书》、《北齐书》、《周书》以及陈仲安对《北史》的点校工作，为北朝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版本。1980年之后，历史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闹，研究成果之多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在如此众多的成果中，首先要提出田余庆的贡献。（1），他提出北朝主流论。这个观点与南朝化一起成为当今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关注点。（2），田余庆培养的学生主要在北朝史方面。比如，李凭对北魏前期政治史的研究，何德章对北朝的胡汉问题的研究，王军对北魏后期社会阶层的分析，陈爽对北朝豪族的研究，以及近年阎步克对北朝官阶的研究，阎步克还对北朝主流论进行了官阶方面的实证。（3），田余庆对北魏前史进行了挖掘，提出了有创见的观点。其次，黄永年的研究值得注意。黄永年的论文大多是与陈寅恪、缪钺等的商榷之作，他提出了文武分立在政治上的进步性，这对纠缠于胡汉问题的北朝研究来说是一个提高。再次，宿白以及张乃翥、韩玉玲对于鲜卑墓葬形式发掘器物的研究显示洛阳的鲜卑贵族仍然保留了鲜卑族的风俗习惯，这对学界普遍认可的完全汉化是一个纠正。正如张国安以及本书所论北镇也不是完全鲜卑化的区域，汉化也只是一个方面。当然不能就此认为洛阳与北镇的社会形态是一样的，北镇保留部族社会的特征多，洛阳汉化的程度高。在北魏后期实际上洛阳的宗室和八姓中的部分贵族（比如穆、陆二家）已经相当的文弱化了。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对于北镇至唐初史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时段来研究，在这方面日本学者谷川道雄是第一个，《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旨在探讨隋唐帝国的形成方式。在这部著作中谷川对武川镇的研究，对于隋朝政治模式的研究是有创见的，但是他过于强调“共同体”理论，也过于重视日本学界解释六朝史的名词，所以经常偏离主题，影响了论证。中国台湾学者毛汉光对北朝核心区域的研究，对于府兵制的研究可备一家之言。他所提出的士族的中央化说，是一个创见。郑钦仁在研究北魏官制中，注意到鲜卑统治者对汉族官僚的监视，这对重新认识北魏的胡汉问题是有启发的。韩国学者朴汉济提出了“胡汉体制”论也备一家之言。

既然研究成果已经如此丰富，那么本书的写作有何必要呢？以北镇人物为线索研究北朝后期史的有马长寿和熊德基。他们都是从北镇鲜卑的汉化方面去考虑的。这无疑是一个好的思路，但也并不是没有别的思路。本书虽然也是以北镇人物为论文线索，但是首先对北镇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北镇社会是一个鲜卑化与汉化并存的社会，北镇在军

事方面的传承与发扬有丰富具体的内容，北镇是一个移民社会，在人际关系方面有不同于中原的特点。以这些具体的内容去分析北朝后期史，必然会产生新的认识。在具体的研究方面，本书力图提出新的视角，比如在尔朱集团的研究中，注意孝文帝迁都对尔朱家族的意义，注意尔朱家族在人才上的缺陷；研究孝庄帝时谈到北魏宗室的分裂；研究孝武帝时注意其西逃的影响；研究东魏北齐史，从两都体制的弊端着手；研究西魏北周史时注意兵种的变化等。这些方面都有一些新的见解，希望引起学界的讨论。

自然作为北朝史初学者的习作，此书的不足是明显的。由于对社会学、民族学、民族史知识的缺乏，对于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知识积累的不足，理论素养、考证功力的欠缺，所以从整体看缺乏系统性，从具体的论证看有时显得乏力。因此，还是希望听到前辈或同仁的批评意见，以便于提高论文的水平和本人的研究能力。

---

[1] 本节关于学术史的回顾只是言其大概，主要言及对于本文产生重要启发或本人认为重要的研究。对于本节涉及的专著、论文一律不出注，如有需要请翻阅《参考文献》。

第一章 北魏后期的北镇社会

本章所说的北魏后期特指孝文帝迁都至六镇起义之间。本章所说的北镇指北魏与游牧民族结合地带的边境诸州镇，研究的重点放在六镇地区。[1] 本章的目的在于通过北镇社会与中原社会的比较、尔朱集团与北魏朝廷的比较，清理出北镇与尔朱集团的优势与缺陷，从而为探索北朝后期的历史线索理出头绪。

第一节 北镇社会的特点

六镇出身的人物是魏末六镇起义一直到唐建立这一段历史的主角。在读史书的过程中，总感到难以深入了解这一段历史。后来于六镇起义的研读中发现东西魏至唐初史的一些疑问，可以通过对北镇社会的研究而得到解答。六镇起义是一个大事件，很早就为学者所关注，南宋学者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四提到，“魏之亡祸，成于六镇；轻薄六镇，实自太和”。虽然是短短几句话，但是提出的问题还

是比较深刻的。之后，清代学者沈垚、钱大昕对六镇的名称相互关系进行了考辨。20世纪前半叶，周一良发表《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在上篇“统治阶级内部胡族与汉族之矛盾”中他简要分析了六镇起义的原因，认为太和改制后镇民身份的低落是起义的原因。自从周一良先生从胡汉关系，镇民身份角度研究问题之后，这两个角度就成为研究六镇问题的争论焦点。1949年之后六镇起义史成为研究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之后农民起义史的研究进入低谷，六镇史的研究成果也不丰厚。在大多雷同的研究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是唐长孺、黄惠贤、马长寿。唐长孺、黄惠贤在1964年发表《试论魏末北镇镇民暴动的性质》，此文对六镇镇民的身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魏末的六镇府户不再是一个阶级，已经分化为细民和豪强两大阶级。细民在官僚豪强的压榨下生活艰难，有起义的动力，豪强失去了复除的权利也心怀不满，于是起义就一发而不可收。此文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对六镇居民的身份进行了社会学式的分析，为研究六镇史提示了新的方法。马长寿对于民族学有深厚的修养，他在《鲜卑与乌桓》中对于六镇社会的民族学分析也是创见迭出，启发很大。此外，张国安1990年发表《试论六镇鲜卑的民族融合》一文，对六镇地区的鲜卑化问题提出新见，认为六镇地区已有相当程度的汉化。作者还认为六镇鲜卑与中原汉人的冲突是地域冲突，是经济利益的冲突。在研究北朝史的倾向上，外国学者一般注重探讨北方部族对中原文化的影响，日本学者比较早地进行了北镇社会史的研究。其代表性的学者为直江直子和谷川道雄。1983年前后，直江直子发表了《北魏的地方行政制度与镇人》、《北魏的镇人》两篇文章。在第一篇文章中作者认为在北镇居民与士兵并无内地城民与土民那样的差别。在第二篇文章中作者首先研究了镇民的经济生活，认为镇人是独立经营的均田农民和牧民，北魏中期以后镇民被官吏役使，因而不能正常生产，经济因之破产，镇人于是起来反抗。直江直子还研究了乡里关系在北镇社会中的作用。日本学者谷川道雄继续就北镇社会的地缘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还研究了婚姻、友情在武川社会中的功能。在谷川看来，北镇的豪杰通过通婚、交友加强了联系，并与民众形成了支配关系，这样就形成了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模式对北朝后期及隋唐帝国都有指导意义。日本学者所关注的具体问题，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方法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是日本学者对于北朝史的解释体系，所使用的术语、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实际，值得考虑。就北镇史而言，中国学者注重胡汉问题，北镇镇民的身份制，以及北镇起义的原因、过程、影响的考论，其研究成果是本节的基础，日本学者的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对本节启发很大。本书对北镇社会的研究与日本学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不仅探讨北镇社会与中原社会相比的优势，也探讨它的缺陷，从而说明北镇人物建立政权却融入中原文化的事实。在探讨北镇的优势方面，本节所注重的是北镇社会特征，尤其是人才特征。本节所探讨的部分问题已

经为前人所发明，但是为照顾整体，本节还是有所论述，可与相关研究参照，笔者并无掠美之意。

一 北镇的文化

对于北镇地区的文化类型，较早提出而且影响较大的观点是“鲜卑化”。[2] 1990年，张国安提出，北镇人“汉化进程慢”，“但大多数已有不同程度的汉化”的观点。[3] 在鲜卑化与汉化之间，逯耀东在《试释论汉匈间之瓯脱》一文中，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框架。所谓“瓯脱”，指两国之间的缓冲地带。逯耀东认为“瓯脱中之匈奴华化过程，前后可分两阶段，初则与汉人混居杂处，互相往来，再则因了解而仰慕农业社会之生活方式，逐渐放弃畜牧，而定居农耕，则其原有之游牧经济与社会结构解体，尽习华俗，亦变为中国人矣。”[4] 逯耀东的结论类同于“汉化”论，对此笔者尚有疑问，不过在逯耀东提供的启发性框架内，还可以继续探索。如逯耀东所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确存在着类似于“瓯脱”的中间地带，一个游牧民族和汉族农民交错杂居的地带。此地带的文化类型是否如逯耀东先生所言，经过两个阶段的融合而彻底汉化？审查自先秦到清代的历史，“瓯脱”被完全汉化尚不多见，在文化类型上与正统的中原王朝颇有距离的时期更为常见，毋宁说，在中间地带形成的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

北魏北镇地区的文化交流，尚处在逯耀东所说的第一阶段：游牧民族和汉人交错杂居，互相往来的阶段。六镇地区的游牧民族是否厌弃游牧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即使有汉化的迹象，也并未到达十六国时期前秦的水平。本节从北镇民众的信仰和汉文化程度来说明北镇地区的文化状况。

北镇民众对于佛教或者道教，或者西亚、南亚传来的其他比较成熟的宗教，到底有多大程度的信仰？由于史料缺乏，现在还难以论定，倒是有一些例子能说明部分镇民对佛教比较陌生。《北齐书·薛孤延传》：“高祖尝阅马于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前有浮图一所，高祖令延视之。延乃驰马按矟直前，未至三十步，雷光烧面，延唱杀，绕浮图走，火遂灭。延还，眉鬓及马鬃尾俱焦。高祖叹曰：‘薛孤延能与霹雳斗。’其勇决如此。”[5] 此例主要是体现薛孤延的勇猛无畏，但他见浮图不礼拜求助，而是挥矟唱杀击灭雷电，可见是不信仰佛教的。又《北齐书·韩贤传》：“昔汉明帝时，西域以白马负佛经送洛，因立白马寺，其经函传在此寺，形制淳朴，世以为古物，历代藏宝。贤无故破之，未几而死，论者或谓贤因此致祸。”[6] 白马寺的汉代经函，对于佛教徒来说无疑是圣物，韩贤却敢于损坏它。这就说明了他不崇信佛教。

韩贤是朔州广宁郡石门县人，薛孤延是代人，属于本书所论述的北镇范围。这两个人的行为，能否说明北镇民众对佛教的陌生态度？同时，大量的证据表明他们对于巫术、占卜却是普遍地崇信。《魏书·刘灵助传》：“刘灵助，燕郡人。师事刘弁，好阴阳占卜，而粗疏无赖，常去来燕恒之界，或时负贩，或复劫盗，卖术于市。后自代至秀容，因事尔朱荣。荣性信卜筮，灵助所占屡中，遂被亲待，为荣府功曹参军。”[7] 以上是尔朱荣依赖占卜的事例。其实阅读《魏书·尔朱荣传》，就会发现尔朱荣对占卜的依赖已经达到了每事必卜的程度。

《周书》卷四十七《艺术传·蒋升传》：

升性恬静，少好天文玄象之学。太祖雅信待之，常侍左右，以备顾问。大统三年，东魏将窦泰入寇，济自风陵，顿军潼关。太祖出师马牧泽。时西南有黄紫气抱日，从未至酉。太祖谓升曰：“此何祥也？”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主四季，秦之分也。今大军既出，喜气下临，必有大庆。”于是进军与窦泰战，擒之。

这是西魏丞相宇文泰在决战的现场，依靠巫术来决策战争的事例。

《北齐书》卷四十九《方伎传》：

王春，河东人。少好易占，明风角，游于赵、魏之间，飞符上天。高祖起于信都，引为馆客。

许遵，高阳人。明《易》，善筮，兼晓天文、风角、占相、逆刺，其验若神。高祖引为馆客，自言禄命不富贵，不横死，是以任性疏诞，多所犯忤，高祖常容借之。

赵辅和，清都人。少以明《易》善筮为馆客。

綦母怀文，不知何郡人。以道术事高祖。

以上几位是利用占卜、巫术为高欢服务的专家。

《北史》卷五十四《窦泰传》：

初，泰母梦风雷暴起，若有雨状，出庭观之，见电光夺目，驶雨沾洒，寤而惊汗，遂有娠。期而不产，大惧。有巫曰：“渡河湔裙，产子必易。”

《北史》卷五三《潘乐传》：

乐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贵之征，因名相贵，后始为字。

以上二例显示了巫师在民间生活中的指导作用。

总之，巫术在北镇的政治、军事以及日常生活中经常被用来决策。值得注意的是进入中原较早的鲜卑人对于巫术渐持排斥态度。《魏书·高祖纪上》记载的太和九年正月诏书云："图谶之兴，起于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又诸巫觋假称鬼神，妄说吉凶，及委巷诸卜非坟典所载者，严加禁断。"[8] 北魏初期的皇帝大多信奉图谶占卜，这为读史者所熟知，引文所显示的是随着进入中原的日久，汉化的深入，又由于统治阶层的信奉佛教，统治者对图谶占卜失去了兴趣，从而加以禁止。根据宗教学原理，巫术比宗教缺乏理论体系。北镇地区的民众普遍依赖巫术，反映了这一地区文化的相对落后。

另一个方面，这个地区定居的生活方式，不同于游牧民族的定期迁徙，所以原有的产生于游牧民族的文化在定居之后必然会发生改变。其次，汉族移民带来的汉文化也会慢慢地渗入少数民族之中。在孝文帝改革之后，可以肯定，政府机构的公文必然用汉字来书写，所以有志于入仕就必然会主动学习汉语。大量存在的北镇官员、僚佐对于汉语应该是能读能写，至少从理论上讲是这样的。

《周书》卷一一《宇文护传》中记载了宇文护母亲阎氏的书信，其中有一段是关于宇文护早年的教育情况，"于后，吾共汝在受阳住，时元宝、菩提及汝姑儿贺兰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学。博士姓成，为人严恶，汝等四人谋欲加害。吾共汝叔母等闻之，各提其儿打之。唯盛洛无母，独不被打"。同样的事还记载于《周书》卷二〇《贺兰祥传》，"祥年十一而孤，居丧合礼。长于舅氏，特为太祖所爱。虽在戎旅，常博延儒士，教以书传"。阎氏所述之事是在尔朱荣打败葛荣，将葛荣余部迁居并州之时。可见，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宇文氏家族对后代的教育仍然是重视的。从这个事实可以推断北镇叛乱之前的宇文家族是了解并向往汉文化的。《周书》卷一四《贺拔岳传》：

岳字阿斗泥。少有大志，爱施好士。初为太学生。

《周书》卷一四《念贤传》：

念贤字盖卢。美容质，颇涉书史。为儿童时，在学中读书。

《周书》卷一七《梁御传》：

梁御字善通，其先安定人也。后因官北边，遂家于武川，改姓纥豆陵氏。高祖俟力提，从魏太武征讨，位至扬武将军，定阳侯。

御少好学，进趋详雅。及长，更好弓马。

《周书》卷二七《梁台传》：

梁台字洛都，长池人也。

台性疏通，恕已待物。至于莅民处政，尤以仁爱为心。不过识千余字，口占书启辞意可观。

《周书》卷三〇《窦炽传》：

后魏南徙，子孙因家于代。

炽性严明，有谋略，美须髯，身长八尺二寸。少从范阳祁祈受《毛诗》、《左氏春秋》，略通大义。善骑射，膂力过人。

《北齐书》卷一八《孙腾传》：

腾少而质直，明解吏事。

《北齐书》卷二〇《慕容俨传》：

慕容俨，字恃德，清都成安人，慕容廆之后也。

俨容貌出群，衣冠甚伟，不好读书，颇学兵法，工骑射。

《北齐书》卷二五《徐远传》：

徐远，字彦遐，广宁石门人也。其先出自广平。曾祖定，为云中军将，平朔戍主，因家于朔。远少习吏事，郡辟功曹……高祖以远闲习书计，命为丞相骑兵参军事，常征伐克济军务，深为高祖所知。

《北齐书》卷二五《王纮传》：

王纮，字师罗，太安狄那人也，为小部酋帅。父基颇读书，有智略。

纮少好弓马，善骑射，颇爱文学。性机敏，应对便捷。年十三，见扬州刺史太原郭元贞。元贞抚其背曰："汝读何书？"对曰："诵《孝经》。"。曰："《孝经》云何？"曰："在上不骄，为下不乱。"元贞曰："吾作刺史，岂其骄乎？"纮曰："公虽不骄，君子防未萌，亦愿留

意。”元贞称善。

从以上事例，可知北镇子弟求学的原因有二：其一是长辈的意志，旨在提高子弟的文化水平；其二，是为了谋求吏职而进行的专业性学习。在第一种情形下，北镇子弟本来可以得到很好的训练，但从事例来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骑射的兴趣远大于对儒学的兴趣，所以只能是粗通文墨。第二种应用性的学习，其重点在于公文的拟定和会计事务，所学在文化含量上也不高。

也就是说北镇地区并非文化的荒漠，也非单纯的胡化，可以观察到北镇也是在缓慢地汉化的过程之中，但北镇地区缺乏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人物。这种人物的缺乏，无疑显示出了北镇地区在人才结构上的重大缺陷。由于缺乏严格的系统的知识训练，北镇地区的武人大多表现得缺乏谋略，只是靠经验或者占卜来决策。这种缺陷深刻地影响了北朝后期的历史。

二 北镇地区的社会组织 [9]

在北魏初年，道武帝在代北地区实行离散部落、分土定居、计口受田的政策。这样北镇地区的鲜卑族和其他游牧民族（除高车等几个部族外）都被打破了原有的血缘关系，同一个部落的成员分居在了不同的地域。血缘关系在社会集团的组织过程中就不再起主要作用。这种情况到北魏末年表现得更加清晰，即同一个姓氏居住在了不同的地域，互相之间没有往来。

慕容氏：

（1）居住于代郡。《北齐书》卷二〇：“慕容绍宗，慕容晃第四子太原王恪后也。曾祖腾，归魏居于代。祖都，岐州刺史。父远，恒州刺史。”

（2）居于清都郡成安县。《北齐书》卷二〇：“慕容俨，字恃德，清都成安人，慕容庵之后也。父叱头，魏南顿太守。”

（3）居于辽西郡。《周书》卷一七：“怡峰字景阜，辽西人也。本姓默台，因避难改焉。高祖宽，燕辽西郡守。魏道武时，率户归朝，拜羽真，赐爵长蛇公。曾祖父，冀州刺史。”按：怡峰本姓默台。默台疑为慕容的误字。

（4）昌黎郡。《北周书》卷一九：“豆卢宁字永安，昌黎徒何人。其先本姓慕容氏，前燕之支庶也。高祖胜，仕燕。皇始初，归魏，授长

乐郡守，赐姓豆卢氏，或云避难改焉。父长，柔玄镇将，有威重，见称于时。”

按，慕容绍宗、慕容俨与豆卢宁都出自前燕皇族，到魏末已经分处于三地。在东西魏对立之时更分事二主，为敌手。可见同一个姓氏对他们并无意义。

段氏：

（1）居于姑臧武威。《北齐书》卷一六：“段荣，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后入魏，以豪族徙北边，仍家于五原郡。父连，安北府司马。”

（2）居于高陆。《周书》卷三六：“段永，字永宾，其先辽西石城人，晋幽州刺史匹之后也。曾祖愢，仕魏，黄龙镇将，因徙高陆之河阳焉。”

（3）居于代郡。《北齐书》卷一九：“段琛字怀宝，代人也。少有武用。”

按，段永和段琛都出自鲜卑族段部，到北魏时，一居于高陆，一居于代郡，已经互不往来。在东西魏对立时又分居于敌对的两国。可见同姓关系已经十分冷漠。

赫连氏：

（1）居住于盛乐。《周书》卷二七：“赫连达字朔周，盛乐人，勃勃之后也。曾祖库多许，因避难改姓杜氏。”

（2）《北齐书》卷四〇：“赫连子悦，字士欣，勃勃之后也。魏永安初，以军功为济州别驾。”

按，赫连子悦的籍贯虽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与改姓杜氏的同宗赫连达并不相识，而且一位效忠于高欢，另一位效忠于宇文泰。血缘关系并没有使他们走到一起。

独孤氏、刘氏：

（1）居住于武川镇。《周书》卷一六：“独孤信，云中人也，本名如愿。魏氏之初，有三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为部落大人，与魏俱起。祖俟尼，和平中，以良家子自云中镇武川，因家焉。父库者，为领民酋长，少雄豪有节义，北州咸敬服之。”

（2）居住于中山。《北齐书》卷四一：“独孤永业，字世基，本姓刘，中山人。母改适独孤氏。永业幼孤，随母为独孤家所育养，遂从其姓焉。止于军士之中，有才干，便弓马。”《周书》卷一七：“刘亮中山人也。本名道德。祖祐连，魏蔚州刺史。父持真，镇远将军，领民酋长。”

（3）居于秀容郡阳曲县。《北齐书》卷二七：“刘丰，字丰生，普乐人也。有雄姿壮气，果毅绝人，有口辩，好说兵事。”

按，据《魏书·官氏志》，独孤氏有普遍改姓刘的情况。因此，可以推断，居住于北镇地区的刘姓，就是匈奴族独孤氏的后裔。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匈奴独孤氏的子孙就分住于云中（武川），中山、秀容、普乐这四个地域，而互相之间也未见联系。在北魏末年的动乱之中，他们也并没有结成一姓集团的动向。

寇氏：

（1）居于洛阳，《周书》卷三七：“寇儁字祖儁，上谷昌平人也。祖，魏南雍州刺史。父臻，安远将军、郢州刺史。儁性宽雅，幼有识量，好学强记。”

（2）居于武川镇。《周书》卷一五：“寇洛，上谷昌平人也。累世为将吏。父延寿，和平中，以良家子镇武川，因家焉。”

按，寇氏有多个得姓的渊源。据《魏书·官氏志》有胡姓古口引氏改为寇氏。《陈留风俗传》记，浚仪有寇氏。《三国志》引《魏略》记，乌桓有寇氏。寇洛与寇儁写着是上谷昌平人，根据本传，寇儁极有可能居住在洛阳，寇洛居住于武川镇。

窦氏：

（1）居住于代郡。《周书》卷三〇：“窦炽字光成，扶风平陵人也。汉大鸿胪章十一世孙。章子统，灵帝时，为雁门太守，避窦武之难，亡奔匈奴，遂为部落大人。后魏南徙，子孙因家于代，赐姓纥豆陵氏。累世仕魏，皆至大官。父略，平远将军。”

（2）居住于朔州太安郡捍殊县。《北史·窦泰传》记其家本出清河县：“祖罗，魏统万镇将，因居北边。”

按，据《魏书·官氏志》纥豆陵氏改姓窦氏。那么《周书·窦炽传》的世系就是假托。他们家本是鲜卑族人。窦泰还不好确定是否出自胡姓纥豆陵氏。

尉迟氏、尉氏：

（1）居住于善无郡。《北齐书》卷一五："尉景字士真，善无人也。秦汉置尉候官，其先有居此职者，因以氏焉。"

（2）居住于朔州太安狄那县。《北齐书》卷一九："尉长命，太安狄那人也。父显，魏镇远将军，代郡太守。"

（3）居于代郡。《周书》卷二一："尉迟迥字薄居罗，代人也。其先魏之别种，号尉迟部，因而姓焉。父俟兜，性弘裕，有鉴识，尚太祖姊昌乐大长公主，生迥及纲。"《北齐书》卷一九："尉摽，代人也。"

按，据《魏书·官氏志》，尉迟氏改为尉氏。那么这四个人应该都出自尉迟部落。但到魏末已经分居三地。在魏末的战乱之中，成了敌人。

库狄氏：

（1）居住于神武郡。《周书》卷二七："库狄昌，字恃德，神武人也。少便骑射，有膂力。及长，进止闲雅，胆气壮烈，每以将帅自许。"

（2）居住于朔方郡。《北齐书》卷一五："库狄干，善无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时以功割善无之西腊汙山地方百里以处之，后率部落北迁，因家朔方。"

居住于代郡。《北齐书》卷一九："库狄回洛，代人也。"《北齐书》卷二〇："又有代人库狄连。"

（3）居于怀朔镇。《北齐书》卷一九："库狄盛，怀朔人也。"

按，鲜卑库狄部民分散定居于四地，而且互不往来，政治立场也不相同。

侯氏：

（1）居于北地郡三水县。《周书》卷二九："侯植字仁干，上谷人也。燕散骑常侍龛之八世孙。高祖恕，魏北地郡守。子孙因家北地之三水，遂为州郡冠族。父欣，泰州刺史。奉义县公。……时帝幼冲，晋公护执政，植从兄龙恩为护所亲任。"

（2）居于怀朔镇。《南史》卷八〇："侯景字万景，魏之怀朔镇人也，少而不羁。"

按，据《魏书·官氏志》，侯奴氏、渴侯氏、古口引氏、侯伏侯氏都改为侯姓。《侯植传》所提及的从兄龙恩，即为侯伏侯龙恩，那么侯植的世系出自假托。

韩氏：

（1）居住于太安郡狄那县。《北齐书》卷一五："韩轨，太安狄郡人。"

居住于广宁郡石门县。《北齐书》卷一九："韩贤，字善贤，广宁石门人。"

（2）居住于武川，《周书》卷二七："韩果，字阿六拔，代武州人。"

按，据《魏书·官氏志》代北的韩氏都出自胡姓步大汗氏。这三位出自步大汗部落的后裔分居于两地，并且在政治斗争中分属两个派别。

侯莫陈氏：

（1）居住于代郡。《北齐书》卷一九："侯莫陈相，代人也。祖伏颓，魏第一领民酋长。父斛古提，朔州刺史，白水郡公。"

（2）居于河西。《魏书》卷八〇："侯莫陈悦，代郡人也。父婆罗门，为驼牛都尉，故悦长于河西。"

（3）居于武川镇。《周书》卷一六："侯莫陈崇字尚乐，代郡武川人。其先，魏之别部，居库斛真水。五世祖曰太骨都侯。其后，世为酋帅。祖允，以良家子镇武川，因家焉。父兴，殿中将军，羽林监。"

按，侯莫陈相、侯莫陈悦、侯莫陈崇都是出自鲜卑侯莫陈部，在离散部落之后就分居于三地，相互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冷漠，而且在战乱中分处于不同的政治集团。

根据以上引证，不难看出由于离散部落、迁徙、为官等原因，代北各族中同一部落的人分居于不同的地区。这样长期的分居状况使得血缘观念已经十分的淡漠。在建立社会关系的过程中，血缘、姓氏已经不起作用了。

与同一个部落分处各地相似的情况是，中原的汉族大多是从内地移居到北部边境，所以他们也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有待于重

新建立。

由于居住于北镇的大多数北方民族的部落组织被打破，由于汉民大多是从内地迁来，原有的社会关系也已失去。所以在北镇地区就存在一个重新建立社会关系的问题。很显然在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姓氏交错杂居的地区，乡里关系、婚姻关系、朋友关系是建立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而乡里关系、婚姻关系以及朋友关系都是一种平等关系而不是依附关系，所以北镇社会中的等级意识是不强烈的。

因乡里关系而组建政治集团、建立霸业在北朝后期政治史中的地位，已经为学界所熟知。宇文泰主要依靠武川军人集团，高欢主要依靠怀朔军人集团，已经成为历史常识，所以不再论证，只引一例，稍作说明。[10] 根据《周书》寇洛传、赵贵传、赫连达传，贺拔岳被杀之后，众将领在推举新的继承人问题上有四种意见：第一，选寇洛为继承人；第二，选贺拔胜为继承人；第三，由北魏朝廷定夺；第四，选宇文泰为继承人。我们暂不管四种意见的动机如何，仅就四个选择之中有三项选择，即寇洛、贺拔胜、宇文泰都出身于武川镇，就可以看出，这支主要由武川将领组成的军队之中，乡里意识是何等的深厚。北镇民众之所以这么重视乡里关系，应该是与血缘关系的打破及移民社会有关。

婚姻关系是仅次于血缘从而建立亲密的个人或家族关系的方式之一。下面试从宇文泰和高欢的例子作一说明。宇文泰家族可知的通婚关系为：

宇文肱的夫人王氏出自官僚家庭。其祖父王某（名字不详）在北魏担任黄门侍郎。其父王罴担任伏波将军。[11] 当时宇文氏家族并没有人为官。[12] 宇文肱的大儿子宇文颢所娶阎氏也是出自官僚家庭。其父阎提曾出任使持节、车骑大将军、敦煌镇都大将。[13] 在北魏前期这是最高品级的武职官。宇文肱父子之所以能与官僚联姻主要是因为宇文家族在武川镇属于有相当影响力的豪族。宇文肱向官僚靠拢也有利于提高家族的地位。在宇文肱袭杀卫可弧的行动中就有阎庆的参加。宇文肱的二儿子宇文连娶贺拔氏女。[14] 宇文肱的一个女儿嫁到尉迟家族。[15] 巧合的是在袭杀卫可弧的行动中就有贺拔度拔父子以及尉迟真檀的参与。现在并没有证据显示贺拔女来自贺拔度拔家，宇文女一定嫁到尉迟真檀家。但从他们在军事行动中的一致性来看，通婚加强了武川豪族之间的关系。

再看高欢家族的通婚关系。在高欢幼年时，其母韩氏去世，高欢是在其姐姐与姐夫尉景的抚养下长大。史料表明，高欢的童年、少年并没有因失去母亲而缺乏关照。史载高欢“长而深沉有大度，轻财重士，

为豪侠所宗。目有精光，长头高颧，齿白如玉，少有人杰表……镇将辽西段长常奇神武貌，谓曰：'君有康济才，终不徒然。'便以子孙为托。"[16] 惊叹于高欢仪表不凡的不仅有男性，还有女性。史载，娄昭君"少明悟，强族多聘之，并不肯行。及见神武于城上执役，惊曰：'此真吾夫也'"。[17] 由此可见，高欢青年时是何等的气度不凡。从他的气度上就可以推知他的童年与少年时代是在平和之中度过的。史书又载，其姐曾为高欢干活而手生茧，晚年提及仍让高欢为之感动不已。[18] 尉景不仅保障了高欢早年的生活，而且在高欢建立霸业的过程中始终站在高欢一方。

如果说姐夫尉景为高欢的生活提供了保障，那么与娄昭君的结合是高欢走上仕途的经济保障。史载，高欢"家贫，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马，得给镇为队主"[19]。又记其小舅子对高欢也不错，"昭亦早识人，恒曲尽礼数。数随神武猎，每致请不宜乘危历险"[20]。总之，与富豪娄氏家族的联姻扩大了高欢的社交面，并且获得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娄昭君的姐夫段荣，其父亲为安北府司马，出身官吏家庭。段荣本人少好历数，专意星象，是一个有知识的预言家。[21] 在高欢流亡的过程中段荣一直跟随高欢。

由宇文泰家族、高欢家族的通婚关系，可以看出婚姻关系不仅把同一阶层的人更紧地黏结在了一起，而且加强了不同阶层之间的联系。与乡里关系比，婚姻关系范围更小但更有稳定性、凝聚力。

朋友关系一般建立在同一职业、同一阶层、同一类型的人之间。这种关系不如乡里关系和婚姻关系那么牢固，但它可以超越地域，结合不同地域的人。比如高欢在怀朔镇当小吏时就与一批小吏如司马子如、刘贵、孙腾等人结交成朋友，其中司马子如居云中郡，刘贵居秀荣郡，都不是怀朔人。北镇起义，高欢投靠尔朱荣后，"先是，刘贵见荣，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见，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贵乃为神武更衣，复求见焉……自是每参军谋"[22]。当时高欢的情况已经十分狼狈，要不是刘贵的极力引荐，恐怕高欢就此被埋没了。

与高欢不同，宇文泰家族的朋友关系主要是在豪杰之中结成。《周书》卷一〇《莒庄公洛生传》记宇文洛生，"少任侠，尚武艺，及壮，有大度，好施爱士。北州贤俊，皆与之游，而才能多出其下"。所谓的北州贤俊应该是超出了武川镇的范围，可见宇文洛生交结的豪杰是不局限于武川镇一地。

史料表明，在宇文泰集团中其核心力量来自武川镇，与宇文泰为乡里关系。在高欢集团中其核心成员与高欢是婚姻关系、朋友关系或者是乡里关系。

可以说，乡里关系、婚姻关系和朋友关系所凝聚的人群是宇文泰和高欢权力的基础。正如前面所说，这三种关系基本上是基于一定情感的平等关系，不能形成支配与被支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所以，宇文泰和高欢在对待其乡里、亲戚、朋友的态度上，权力与利益的分配上就不能不作出妥协，形成一种等夷的关系。

三 北镇地区的社会阶层

在游牧与农耕生活交错杂居的情形下，北镇地区的社会阶层和内地略有不同。本小节大概分酋长、官员、僚吏、富豪、镇民五个阶层，来分析不同阶层的政治取向。本书的分类可能存在着交叉或者不科学的方面，尚祈批评指正。

酋长：

在北镇地区有一部分少数民族保留部落组织，在大小不同的酋长的统治下过着游牧的生活。

（1）高车族叱列部。《北齐书》卷二〇，“叱列平，字杀鬼，代郡西部人也，世为酋帅。平有容貌，美须髯，善骑射。袭第一领民酋长、临江伯。孝昌末，拔陵反叛，茹茹余众入寇马邑，平以统军属，有战功，补别将。后牧子作乱，刘胡崙，斛律可那律俱时构逆，以平为都督，讨定胡崙。”

《周书》卷二〇《叱列伏龟传》：“……嗣父业，复为领民酋长。魏正光五年，广阳王深北征，请龟为宁朔将军，委以帐内兵事。”

（2）高车斛律部。《北齐书》卷一七《斛律金传》：“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父大那瓌，光禄大夫，第一领民酋长……（金）初为军主……正光末，破六韩拔陵构逆，金拥众属焉……金兄平，便弓马，有干用。魏景明中释褐殿中将军，迁襄威将军。正光末，六镇扰乱，隶大将军尉宾北讨……”

（3）鲜卑族库狄部。《北史》卷五四：“库狄干，善无人也……魏正光初，除扫逆党，授将军，宿卫于内……孝昌元年，北边扰乱，奔云中，为刺史费穆送于尔朱荣。”

（4）匈奴破六韩部。《北齐书》卷二七：“破六韩常，字保年，附化人，匈奴单于之裔也。右谷蠡王潘六奚没于魏，其子孙以潘六奚为氏，后人讹误，以为破六韩。世领部落，其父孔雀，世袭酋长。孔雀少骁勇。时宗人拔陵为乱，以孔雀为大都督、司徒、平南王。孔雀率

部下一万人降于尔朱荣，诏加平北将军，第一领民酋长。”

（5）匈奴独孤部。《周书》卷一六《独孤信传》：“父库者，为领民酋长，少雄豪，有节义，北州咸敬服之……（信）正光末，与贺拔度等同斩卫可孤，由是知名。以北边丧乱，避地中山，为葛荣所获。”《周书》卷一七《刘亮》：“中山人……父持真，镇远将军、领民酋长。”

居于北部边境线的部族是有完整的组织的社会势力。从他们在北镇起义中的向背来看，他们反复多变，并没有明确的政治态度。

官员：

慕容俨。《北齐书》卷二〇：“父叱头，魏南顿太守。……俨容貌出群，衣冠甚伟，不好读书，颇学兵法，工骑射。正光中，魏河间王元琛率众救寿春，辟俨左厢军主。”

步大汗萨。《北齐书》卷二〇：“父居，龙骧将军，领民别将。正光末，六镇反乱，萨乃将家避难南下，奔尔朱荣于秀容。”

慕容绍宗。《北齐书》卷二〇：“父远，恒州刺史。绍宗容貌恢毅，少言语，深沈有胆略。尔朱荣即其从舅子也。值北边扰乱，绍宗携家属诣晋阳以归荣。”

斛律羌举。《北齐书》卷二〇：“父谨，魏龙骧将军、武川镇将……（羌举）永安中，从尔朱兆入洛，有战功。”

高市贵。《北齐书》卷一九：“孝昌初，恒州内部敕勒刘崙等聚众反，市贵为都督，率众讨崙，一战破之。累迁抚军将军、谏议大夫。及尔朱荣立魏庄帝，市贵预翼戴之勋。”

任延敬。《北齐书》卷一九：“伯父桃，太和初为云中军将，延敬随之，因家焉……初从葛荣为贼，荣署为王，甚见委任。”

尉长命。《北齐书》卷一九：“父显，魏镇远将军、代郡太守。长命性和厚，有器识。拔陵之乱，寄居太原。”

蔡儁。《北齐书》卷一九：“父普，北方扰乱，奔走五原，守战有功，拜宁朔将军，封安上县男，邑二百户。寻卒，赠辅国将军、燕川刺史……儁初为杜洛周所虏，时高祖亦在洛周军中，高祖谋诛洛周，儁预其计。”

潘乐。《通志》卷一五二：“父永，有技艺，袭爵广宗男……北镇乱，魏临淮王或北讨至云中，问士人胆略者，或以乐对。或乃召为军主，每摧坚陷阵，转统军。乐以天下多事，遂归葛荣。”

侯莫陈崇。《周书》卷一六：“父兴，殿中将军，羽林监……（崇）年十五随贺拔岳与尔朱荣征葛荣。”

达奚武。《周书》卷一九：“代人也，祖眷，魏怀荒镇将，父长，魏汧城镇将。”

豆卢宁。《周书》卷一九：“父长，柔玄镇将。”

杨忠。《周书》卷一九：“父祯，以军功除建远将军。属魏末丧乱，避地中山，结义徒以讨鲜于修礼，遂死之。”

梁椿。《周书》卷二七：“祖屈朱，魏昌平镇将。父提，内三郎。”

梁台。《周书》卷二七：“父去斤，魏献文时为陇西郡守。”

侯植。《周书》卷二九：“高祖恕，魏北地郡守。子孙因家北地之三水，遂为州郡冠族。父欣，泰州刺史、奉义县公。……（植）正光中，起家奉朝请。寻而天下丧乱，群盗蜂起，植乃散家财，率募勇敢讨贼。”

窦炽。《周书》卷三〇：“父略平远将军……魏正光末，北镇扰乱，炽乃遂略避地定州，因没于葛荣。荣欲官略，略不受。”

库狄峙。《周书》卷三三：“后徙居代，世为豪右。祖凌，武威郡守，父贞，上洛郡守……（峙）仕魏，位高阳太守。”

赵昶。《周书》卷三三：“因家于代。祖泓，广武令。父琛，上洛郡守……（昶）孝昌中，起家拜都督，镇小平津。”

杨纂。《周书》卷三六：“父安仁，魏北道都督，朔州镇将。”

王士良。《周书》卷三六：“因家于代，父延，兰陵郡守……魏建明初，尔朱仲远启（士良）为府参军事。”

居住于北镇地区的官僚及其子弟大都倾向于反对北镇起义。他们或者南投尔朱荣，或者直接起兵反击起义军队。在政治态度上比较地明朗。

僚吏：

张琼：据《北齐书》卷二〇，代郡人，担任北魏朔州征虏府对外兵参军。后参加葛荣的起义军。

刘贵：据《北史》卷六，怀朔省事，后任尔朱荣府骑兵参军。《北齐书》卷一九，父刘乾，北魏政府在其死后追赠为前将军，肆州刺史。

段荣：据《北史》卷五四，其父段连曾担任安北府司马。北镇起义时，段荣最初被卷入杜洛周军中。后携乡里逃到平城。

尉景：据《北史》卷六，怀朔镇狱队，北魏孝昌年间，北镇起义，尉景参加杜洛周起义军。

史宁：据《周书》卷二八，父亲史遵，曾任征虏府铠曹参军。杜洛周起义后，史遵率二千多家乡邻南投恒州，又逃到洛阳。

宇文盛：据《周书》卷二九，其家上三代都为沃野镇军主。

孙腾：据《北史》卷六，曾任怀朔镇户曹史。北镇起义时，逃到秀容郡。

司马子如：据《北齐书》卷一八，曾任怀朔镇省事，北镇起义时，投靠尔朱荣。

北镇的吏员在北镇起义时，有的参加了起义。有的不愿意参加起义，投靠尔朱荣或北魏政府。

富豪：

张保洛：《北齐书》卷一九："家世好宾客，尚气侠，颇为北土所知。保洛少率健，善弓马。魏孝昌中，北镇扰乱，保洛亦随众南下。葛荣僭逆，以保洛为领左右。"

娄昭：《北史》卷五四："祖父提，雄杰有识度，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

贺拔胜：《周书》卷一四："后随度拔与德皇帝合谋，率州里豪杰舆珍、念贤、乙弗库根、尉迟真檀等，招募义勇，袭杀可孤。"

北州中的豪强是酋长之外拥有相当社会力量的势力。他们中大多数显然对于北镇起义持敌视态度，甚至与之直接对抗，反映了比较明确的

政治态度。

镇民：镇民是北镇起义的主要参与者，情况比较简单，仅举一例说明之。

《周书》卷一七《王德传》："王德字天恩，代郡武川人也。少善骑射，虽不经师训，而以孝悌见称。魏永安二年，从尔朱荣讨元颢，攻河内，应募先登。以功除讨夷将军，进爵内官县子。又从贺拔岳讨万俟丑奴，平之……子庆，小名公奴……初德丧父，家贫无以葬，乃卖公奴并一女以营葬事。因遭兵乱，不复相知。及德在平凉始得之，遂名曰庆。"《周书》纪事一向为尊者讳，在本传中就省去了王德参加北镇起义军的始末。《周书》在述王德事迹时是从永安二年讨元颢开始，其时还不见他有一官半职。可见他未参加讨伐葛荣的战斗。这反而说明了其时他正在葛荣的手下当兵。王德参加北镇起义的动机十分明显，实在是太贫困了，活不下去了。他卖儿卖女的事例很充分地说明了北镇镇民起义的原因所在。

相反，大部分北镇官员与豪强以及一部分吏员站在反对北镇起义的阵营中。这是因为这些人是北镇社会中的既得利益阶层，见《魏书·源贺传》、《魏书·刁雍传》等。

在整个北镇起义的过程中，北镇内部的官员、豪强、左右摇摆的僚吏以及酋长是起义军的心腹之患。如果北魏政府能正确地执行拉拢这些阶层的政策，北镇起义就不会蔓延。

北镇起义的最初阶段（即破六韩拔陵领导起义的阶段）之所以失败，固然是由于北魏政府军与柔然军队的合作，但是北镇内部豪强与酋长的破坏也不可小视。本来起义军最强的一支是由卫可弧领导的起义军，但卫可弧却被武川豪强袭杀，给起义军造成了很大损失。部落酋长斛律金、破六韩孔雀、也列河等人先后投降尔朱荣和北魏军队无疑极大削弱了起义军的实力。《周书》卷一五《于谨传》：

时魏末乱，群盗蜂起，谨乃从容谓广阳王曰："自正光以后，海内沸腾，郡国荒残，农商废业。今殿下奉义行诛，远临关塞，然丑类蚁聚，其徒实繁，若极武穷兵，恐非计之上者。谨愿禀大王之威略，驰往喻之，必不劳甲兵，可致清荡。"广阳王然之。谨兼解诸国语，乃单骑入贼，示以恩信。于是西部铁勒酋长也列河等，领三万余户并款附，相率南迁。广阳王欲与谨至折敷岭迎接之。谨曰："破六韩拔陵兵众不少，闻也列河等归附，必来要击。彼若先据险要，则难与争锋。今以也列河等饵之，当竞来抄掠，然后设伏以待，必指掌破之。"广阳然其计。拔陵果来要击，破也列河于岭上，部众皆没。谨

伏兵发，贼遂大败，悉收得也列河之众。

这是北魏政府军镇压起义军的一个成功战例。其要点是策动起义军中的动摇分子、部落酋长反叛起义军。《魏书》卷四一《原贺传附源子雍传》：

时沃野镇人破落汗拔陵首为反乱，所在蜂起，统万逆胡，与相应接……子雍虽被囚执，雅为胡人所敬，常以民礼事之。子雍为陈安危祸福之理，劝阿各拔令降，阿各拔将从之，未果而死。拔弟桑生代总部众，竟随子雍降。时北海王颢为大行台，子雍具陈贼可灭之状。颢给子雍兵马，令其先行。时东夏合境反叛，所在屯结。子雍转斗而前，九旬之中凡数十战，乃平东夏，征税租粟，运于统万。于是二夏渐宁。

这又是一个策反起义军的战例。源子雍之所以能反败为胜，就是因为他说服朔方胡帅投降。他之所以能够说服朔方胡帅，就说明胡帅本身的立场就不够坚定。正如上文的分析，起义军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着矛盾和动摇。《魏书》卷一八《广阳王元深传》：

深以兵士频经退散，人无斗情，连营转栅，日行十里。行达交津，隔水而阵。贼修礼常与葛荣谋，后稍信朔州人毛普贤，荣常衔之。普贤昔为深统军，及在交津，深使人谕之，普贤乃有降意。又使录事参军元晏说贼程杀鬼，果相猜贰，葛荣遂杀普贤、修礼而自立。荣以新得大众，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便率众北转。

《魏书》卷五八《杨播传附杨津传》：

津与贼帅元洪业及贼中督将尉灵根、程杀鬼、潘法显等书，晓喻之，并授铁券，许以爵位，令图贼帅毛普贤……朝廷初以铁券二十枚委津分给，津随贼中首领，间行送之，修礼普贤颇亦由此而死。

毛普贤、鲜于修礼的被杀是由于元深、杨津利用起义军内部的矛盾分化瓦解的缘故。

可以推测，如果北魏政府能真正了解北镇的社会特点，有针对性地施行镇压安抚政策，北镇起义的平定是毫不困难的。但是，执政者却实施了错误的政策。《魏书》卷一八《广阳王深传》：

及李崇征还，深专总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渡河。先是，别将李叔仁以拔陵来逼，请求迎援，深赴之，前后降附二十万人。深与行台元纂表求恒州北别立郡县，安置降户，随宜赈赉，息其乱心。不从，诏

遣黄门郎杨昱分散之于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谓纂曰："此辈复为乞活矣，祸乱当由此作。"继而鲜于修礼叛于定州，杜洛周反于幽州，其余降户，犹在恒州，遂欲推深为主。

事实证明，在降户问题上元深是正确的。降户原本就是生活在代北地区的镇民，如能安置于代北地区，给与一定的生产资料，在熟悉的环境中安定生活，北镇的社会秩序就可较快恢复。一律迁徙到经济中心冀、定、瀛三州就食并不是明智的选择。这三州虽然富庶，但是人口已经饱和，大量移民，容易引发土客冲突。河北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关系，北镇民众也不一定能适应。我们注意到在破六韩拔陵起义过程中，极力镇压起义军的宇文肱父子、独孤信等人在定州起义时却加入了起义军的行列，而非政府军方面。这也说明了这些豪强对于迁徙是不满意的。可以说，这一次错误的迁徙政策导致了北魏末年的起义进一步扩大到核心地区。

分析北镇地区的社会基层及其政治倾向，可知北镇集团内部并非铁板一块，酋长、官僚、吏员、富豪大多对起义持反对态度，但北魏政府中的决策阶层对此并没有深刻理解，执行了错误的方针，使得起义蔓延到统治核心。

四 北镇的军事潜力

北镇地区与草原部族临接，冲突不断，尚武是普遍的风气。北镇地区的尚武，其最基本的表现为勇敢，善于骑射。在北魏末年的北镇地区，贺拔胜父子享有很高声誉。《周书·贺拔胜传》称，"（尔朱）荣得胜，大悦曰：'吾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 [23] 。又《北齐书·贺拔允传》记"高祖（高欢）以其北土之望，尤亲礼之" [24] 。那么，这两兄弟为什么有如此声望呢？据上引《贺拔胜传》："胜少有志操，善骑射，北边莫不推其胆略。"又上引《贺拔允传》："允父子兄弟并以武艺知名，荣素闻之。"可见，贺拔胜父子因为骑射本领超群，而在北镇乃至北边地区享有盛名。《周书·宇文洛生传》记，"北州贤俊，皆与之游"。史书记载，在魏末战乱中，洛生"帐下多骁勇" [25] 。宇文洛生之所以有如此魅力，是因为"北州贤俊"的武艺不如宇文洛生"才能皆出其下"，因而赢得尊敬。以上事例说明在北镇地区骑射才能是普遍崇尚的价值尺度，是赢得尊敬与拥戴的基本条件。这一种才能的获得，是与北镇的军事社会相关的。《北齐书·独孤永业传》讲独孤永业"止于军士之中，有才干，便弓马" [26] ，说明了军事环境是独孤永业擅长"弓马"的原因。依此类推，北镇长期以来都是边防地区，镇人为职业军人，所以在此环境中生活的民众对骑射自然是熟悉并热爱的。

北镇军人所熟悉的军事技术不仅是骑射，还有其他内容，比如说侦察。《周书·韩果传》："果性强记，兼有权略。所行之处，山川形势，备能记忆。兼善伺敌虚实，揣知情状，有潜匿溪谷欲为间侦者，果登高望之，所疑处，往必有获。"[27] 审读引文似乎韩果高超的侦察能力与其"强记"的天赋有关。优秀的天赋的确是韩果成功的条件之一，但是超强的记忆力可以用在很多方面，而用在什么方面又与其生活的环境是有关联的。在北朝后期，擅长侦察的北镇军人不只韩果。《周书·达奚武传》记载宇文泰多次派达奚武"觇候"东魏的军事动向，达奚武也每每"具知敌之情状，以告太祖"[28] 。可见达奚武虽没有善记的天赋，仍然具有高超的侦察能力。韩果、达奚武都出身于北镇，所以二人擅长侦察的原因应该在北镇社会的军事特征上寻找。北镇的侦察经验其实有悠久的历史。《周书·贺拔胜传》记载"茹茹数为寇，北边患之"，其祖父尔头"将游骑深入觇候，前后以八十数，悉知虏之倚伏。后虽有寇至，不能为害"[29] 。根据以上事例不难看出韩果等人善于侦察实际上是对北镇军事传统的继承，而不应仅仅归结为个人的天赋。

由于北镇军事经验的长期积累，便出现了一批有"计略"、"武略"，即善于军事谋略的军人。《周书·刘亮传》载刘亮有"纵横计略"。又记"亮以勇敢见知，为时名将，兼屡陈谋策，多合机宜。太祖乃谓之曰：'卿文武兼资，即孤之孔明也。'"。可见刘亮在当时是以善于谋略而著称。《周书》还记载了刘亮成功运用计谋的战例，"（侯莫陈）悦平，悦之党豳州刺史孙定儿仍据州不下……太祖令亮袭之。定儿以义兵犹远，未为之备。亮乃将二十骑，先竖纛于近城高岭，即驰入城中。定儿方置酒高会，卒见亮至，众皆骇愕，莫知所为。亮乃麾兵斩定儿，悬首，号令贼党。仍遥指城外纛，命二骑曰，'出追大军。'贼党恼惧，一时降服"[30] 。像这样善于权谋的将领还有叱列延庆。《魏书·叱列延庆传》记尔朱兆杀孝庄帝后，河北豪强拥立刘灵助为首领讨伐尔朱氏集团。当时，派往镇压河北豪强的为侯渊、叱列延庆。侯渊认为刘灵助利用占卜号召群众，势力不小，不宜进攻。叱列延庆分析说："刘灵助，庸人也。天道深远，岂其所识。大兵一临，彼皆恃其妖术，坐看符厌，宁肯戮力致死，与吾争胜负哉。如吾计者，政欲出营城外，诡言西归，灵助闻之，必信而自宽，潜军往袭，可一往而擒。"[31] 可知叱列延庆之指挥作战是凭借对敌情的分析，而不仅仅依赖勇敢。这样的将领还有贺拔岳，史称其"不读兵书而暗与之合"[32] 。也就是说贺拔岳对军事的认识已经达到相当的理论高度。其他将领如独孤信有"奇谋大略"。杨忠"识量沉深，有将帅之略"。可朱浑元有"武略"，"行军用兵务在持重，未尝负败"。

如果说，以上将领对于军事规律有所领悟，那么另外有少数将领对于

兵法已经主动地研究了。《南史·侯景传》："侯景字万景，魏之怀朔镇人也。少而不羁，为镇功曹史。魏末北方大乱，乃事边将尔朱荣，甚见器重。初学兵法于部将慕容绍宗，未几绍宗每询问焉。"[33] 由《南史》，慕容绍宗擅长兵法，《北史》、《北齐书》都未曾明确指出这点，但一些蛛丝马迹显示出慕容绍宗对兵法的精通。《北齐书·慕容绍宗传》记录了慕容绍宗的一段自述："吾自二十以还，恒有蒜发，昨来蒜发忽然自尽。以理推之，蒜者算也，吾算将尽乎。"由此看来，慕容氏用兵是靠"算"的，即谋略。这是一条旁证。在韩陵之战后，尔朱兆打算潜逃，而慕容绍宗"建旗鸣角，招集义徒，军容既振，与兆徐而上马"[34] 这种败而不乱的气度，表现了慕容非凡的军事修养。这是旁证二。其三，当时人对慕容绍宗的才能评价甚高。高欢在临终前对高澄说，"少堪敌侯景者，唯有慕容绍宗，我故不贵之，留以与汝，宜深加殊礼，委以经略"[35] 。以上证据说明慕容绍宗在当时的北镇军人中是相当突出的，他的突出之处就在于他对兵法有所研究。当时，研究兵法的人还有慕容俨，"颇学兵法"[36] 。

北镇地区出现研究兵法的人物，仍然与它处于战争环境之中有关联。《北齐书·段荣传附段韶传》记载了高欢的一段话，"吾每与段孝先论兵，殊有英略"[37] 。由引文可知，高欢与段孝先是经常"论兵"的。可以说，由于经常参与"论兵"使得段孝先成长为一名优秀将领。可以推断，在北镇的环境之中，人们会有很多"论兵"的机会。在此传统之下，军事经验一代代积累，其中的优秀者成为精通军事理论的人物。

由以上论证，可以清楚地看到北镇地区的尚武不仅仅指"骑射"之风，它包含丰富的内容。在最基本的层次上表现为骑射以及侦察等军事技术，在较高层次上表现为在军事活动中自觉运用谋略，在最高层次上出现了总结和运用军事理论的人物。由于北镇军人在军事上有如上成就，所以这个集团成为当时最具潜力的军事集团。

五 小结

综合北镇的社会特征会有以下认识：首先，"鲜卑化"概括不了北镇的文化特征。所谓"鲜卑化"最初是指生活在代北的各个民族最后认同于鲜卑族的习俗的过程。鲜卑化最主要的标志是指使用鲜卑语。代北民族的鲜卑化是与北魏在此地的强势统治分不开的，但是鲜卑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游牧文化，北镇之所以保留了鲜卑化特征，既与北镇处于半游牧化状态有关，也与北镇与游牧民族邻接有关。但是从北魏建国以来，北镇地区就逐渐引入了农耕的生产方式，相当多的部族成为了定居的农民，所以与农耕相适应，鲜卑文化的色彩在淡化；随着北魏中期迁徙汉族到北镇戍守，胡汉通婚的增加，也减轻了鲜卑化的程度；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北镇的富豪家庭为仕宦计，鼓励子弟学

习汉文化；一部分平民为了从事僚吏的工作，程度不同地学习了文书或会计，吏干是北镇培养的非常有特色的一种人才。吏干们因此也算是对中原文化有一定领会。基于以上原因，汉化也是北镇在孝文帝改革后的文化特征。如果将北镇仅仅看作鲜卑化的地域，就不能解释宇文泰对汉文化的了解，也不能解释高欢等北镇军人使用汉语的事实。

其次，北镇的军事传统有丰富的内涵。它既表现为骑射侦察等军事技术，还表现为对军事理论的总结、学习和研究。因而北镇就具备了军事实践与军事理论两方面的人才，而且军事理论家一般来说都有军事经验，因而北镇成为最具潜力的军事集团。

再次，由于北镇与游牧部族邻接，处于半游牧状态，又由于北镇的军事社会特征，所以北镇的民众一般来说文化程度低，缺乏政治经验、意识和眼光。

最后，北镇社会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移民社会，所以血缘在社会关系的建立中作用不太明显，乡里、友情、婚姻成为黏合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乡里关系、友情关系、婚姻关系都不构成等级关系，所以在北镇，人们的等级观念不强烈，适应“等夷”的人际关系。

以上，从各个方面谈了北魏末年北镇的社会特征。这些特征影响了北镇的民众，而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就是北周、北齐、隋的开创者，所以北镇的社会特征必然对北朝后期历史有深刻的影响。

第二节 北镇武人与中原谋士

北镇集团虽然有军事上的优势，但正如上文所论北镇人才是有结构性缺陷的。本节试从侯深（渊）、贺拔胜、侯景的人生挫折去探析北镇因素对北镇人物的影响。侯深（渊）、贺拔胜、侯景是优秀的将领，精通于战术的运用。《魏书》卷八〇《侯渊传》：

及庄帝还宫，荣令渊进讨韩楼，配卒甚少。或以为言，荣曰：“侯渊临机设变，是其所长，若总大众，未必能用。今击此贼故当不足定也。”止给骑七百。渊遂广张军声，多设供具，亲率数百骑，深入楼境，欲执行人以问虚实。去蓟百余里，值贼帅陈周马步万余，渊遂潜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虏其卒五千余人。寻还其兵仗，纵令入城。左右谏曰：“既获贼众，何为复资遣之也？”渊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战，事须为计以离隙之。”渊度其已至，遂率骑夜集，昧旦，叩其城门。韩楼果疑降卒为渊内应，遂遁走，追擒之。

《周书》卷一四《贺拔胜传》：

太昌初，以胜为领军将军，寻除侍中。孝武将图齐神武，以胜弟岳拥众关西，欲广其势援，乃拜胜为都督三荆、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诸军事，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加授南道大行台尚书左仆射。胜攻梁下溠戍，擒其戍主尹道珍等。又使人诱动蛮王文道期，率其种落归款。梁雍州刺史萧续击道期不利，汉南大骇。胜遣大都督独孤信、军司史宁、欧阳鄬城、南雍州刺史长孙亮、南荆州刺史李魔怜、大都督王元轨取六山、白泊，都督拔略昶、史仵龙取义城、均口，擒梁将庄思延，获甲卒数千人。攻冯翊、安定、沔阳，并平之。胜军于樊邓之间。梁武敕续曰："贺拔胜北间骁将，尔宜慎之。"续遂城守不敢出。

《南史》卷八〇《贼臣·侯景传》：

侯景字万景，魏之怀朔镇人也。少而不羁，为镇功曹史。魏末北方大乱，乃事边将尔朱荣，甚见器重。初学兵法于荣部将慕容绍宗，未几绍宗每询问焉。

景右足短，弓马非其长，所在唯以智谋。时欢部将高昂、彭乐皆雄勇冠时，唯景常轻之，言"似豕突尔，势何所至。"

这三位北镇人物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但为什么都落得凄凉的下场，而没有像宇文泰、高欢那样建立霸业呢？魏收对于侯深（渊）、贺拔胜有一个总评，他说侯深（渊）是"反覆取毙"，贺拔胜是"器小谋大，终于颠蹶"《魏书》卷八〇，第1788页。。这里魏收难免有以成败论英雄之嫌，但是，他指出的在政治立场上反复多变的确是包括侯深（渊）、贺拔胜、侯景在内的许多北镇人物的行为特征。魏收所谓的"谋大"是指谋取最高权力。而"器小"如果理解为缺乏政治头脑、战略眼光的话，的确适合北镇的大多数武人，当然也包括侯深（渊）、贺拔胜、侯景在内。武人们之所以在政治立场上反复多变，首先是因为他们缺乏政治头脑、战略眼光，看不到政治形势发展的方向。这三个人之中侯深（渊）最先败亡。《魏书》卷八〇《侯渊传》：

出帝末，渊与兖州刺史樊子鹄，青州刺史东莱王贵平密信往来，以相连结，又遣间使通诚于献武王。及出帝入关，复怀顾望。汝阳王暹既除齐州刺史，次于城西，渊拥部据城，不时迎纳。民刘桃符等潜引暹入据西城，渊争门不克，率骑出奔，妻儿部曲为暹所虏。行达广里，会承制以渊行青州事。齐献武王又遗渊书曰："卿勿以部曲轻少，难于东迈。齐人浇薄，唯利是从，齐州城民尚能迎汝阳王，青州之人岂不能开门待卿也。但当勉之。"渊乃复还，暹始归其部曲。而贵平自

以斛斯椿党，亦不受代。渊进袭高阳郡，克之，置部曲家累于城中，身率轻骑游掠于外。贵平使其长子率众攻高阳，南青州刺史茹怀朗遣兵助之。时青州城人馈粮者首尾相继。渊亲率骑夜趣青州，诈馈粮人曰："台军已至，杀戮都尽，我是世子下人，今已走还城，汝何为复去也？"人信其言，弃粮奔走。比晓，复谓行人曰："台军昨夜已至高阳，我是前锋，今始到此，颇知侯公竟在何处？"城人凶惧，遂执贵平出降。渊自惟反覆，虑不获安，遂斩贵平，传首京师，欲明不同于斛斯椿也。

及子鹄平，诏以封延之为青州刺史。渊既不获州任，情又恐惧，行达广川，遂劫光州库兵反。遣骑诣平原，执前胶州刺史贾璐。夜袭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攻掠郡县。其部下督帅叛拒之，渊率骑奔萧衍，途中亡散，行达南青州南境，为卖浆者斩之，传首京师，家人配役。

从这一段材料看，侯深（渊）依然保持战术上的优秀，几乎是战无不胜。但是很明显，他没有战略上的目的，完全在高欢的支配之下，但他又不甘心居于高欢之下，所以就这样在山东地区不断地反复。侯深（渊）自己也感到自己在政治谋略上的不足，于是向大士族崔光韶请教。《魏书·崔光韶传》："后刺史侯深（渊）代下疑惧，停军益都，谋为不轨。令数百骑夜入南郭，劫光韶，以兵胁之，责以谋略。光韶曰：'凡起兵者，须有名义，使君今日举动直是作贼耳。父老知复何计？'渊虽恨之，敬而不敢害。"[38] 崔光韶没有给侯深（渊）任何指点，只是直截了当地点明侯渊起兵的性质及其在政治上的无知。果然，侯深（渊）在众叛亲离后死去。这样一种缺陷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解救，一种就是紧跟一位有政治眼光的领袖。这是绝大多数北镇武人采取的方式。另外一种就是重用汉族士人。这是高欢、宇文泰所采用的方式。既不投靠领袖，又不重用汉族士人，其代表人物就是侯深（渊）、贺拔胜、侯景。这三个人之所以不投靠东西魏的领袖，还是由于北镇"等夷"思想不能放弃。侯景与高欢的关系令人颇为费解。《北史》卷六《齐神武纪》：

侯景素轻世子，尝谓司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异；王无，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为神武书，召景。景先与神武约，得书，书背微点，乃来。书至，无点，景不至，又闻神武疾，遂拥兵自固。神武谓世子曰，"我虽疾，尔面更有余忧色，何也？"世子未对。又问曰："岂非忧侯景叛耶？"曰："然"。神武曰："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跋扈志，顾我能养，岂为汝驾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发哀……少堪敌侯景者，唯有慕容绍宗，我故不贵之，留以与汝，宜深加殊礼，委以经略。"

高欢很显然知道侯景不会臣服于高澄，但他并没有在生前除掉侯景。甚至在高澄打算召侯景觐见时，都没有把他与侯景的秘密约定告知高澄。可见，高欢出于某种制约不与侯景反目。为什么高欢要在生前维持与侯景的制衡关系呢？其原因就是上文所提到的北镇民众之间的等夷关系。这种等夷的关系在共同的征战之中又被强化，最终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制衡关系，带有很浓的感情色彩。即作为青年时代的朋友，战场上的帮手，侯景不会拆高欢的台，高欢也不会伤害侯景的利益。但是高欢一旦去世，侯景与晚辈高澄之间的关系就要重新界定。即要么侯景向高澄俯首称臣，要么在战场上分个胜负。

这种等夷的观念，同样导致了贺拔胜错误的决策。《魏书·贺拔胜传》："出帝末，诏胜统众北赴京师。军次汝水，出帝入关。胜率所部欲从武关趣长安。行至析阳，闻齐献武王平潼关，擒毛鸿宾，胜惧，复走荆州，城人闭门不纳。"[39] 贺拔胜未能进入关中是不是因为高欢占据了潼关的原因呢？事实上，这也不影响贺拔胜从武关入关中。可见，他不入关中另有原因。《周书》卷三五《崔谦传》：

贺拔胜出镇荆州，以谦为行台左丞……及魏孝武将备齐神武之逼，乃召胜引兵赴洛。军至广州，帝已西迁。胜乃迟疑，将旋所镇。谦谓胜曰："昔周室不造，诸侯释位；汉道中微，列藩尽节。今皇家多故，主上蒙尘，实忠臣枕戈之时，义士立功之日也。公受方面之重，总宛、叶之众，若杖义而动，首唱勤王，天下闻风，孰不感激。诚宜顺义勇之志，副遐迩之心，倍道兼行，谒帝关右。然后与宇文行台，同心协力，电讨不庭。则桓文之勋，复兴于兹日矣。舍此不为，中道而退，便恐人皆解体，士各有心。一失事机，后悔何及。"胜不能用，而人情果大骚动。还未至州，州民邓诞引侯景军奄至。胜与战，败绩，遂将麾下数百骑南奔于梁。

综合以上引文，可知在孝武帝召贺拔胜入卫洛阳时，他表现得比较积极，但当他得到孝武帝已经入关的消息之后，他就对是否入关表现得不那么积极了。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对于进入关中如此地犹豫呢？从崔谦的语气可以判断出贺拔胜是有足够的时间进入关中的。但是，他为什么就不这样做？再看一则史料。《周书·卢柔传》："孝武后召胜引兵赴洛，胜以问柔。曰：'高欢托晋阳之甲，意实难知。公宜席卷赴都，与决胜负，存没以之，此忠之上策也……举三荆之地，通款梁国，可以身免，功名去矣。策之下者。'胜轻柔年少，笑而不应。"[40] 又，《周书·贺拔胜传》："初，胜至关中，自以年位素重，见太祖不拜，寻而自悔，太祖亦有望焉。后从太祖宴于昆明池，时有双凫游于池上，太祖乃授弓矢于胜曰：'不见公射久矣，请以为欢。'胜射之，一发俱中。因拜太祖曰：'使胜得奉神武，以讨不庭，皆如此也。'太

祖大悦，自是恩礼日重，胜亦尽诚推奉焉。”[41] 在武川社会之中，贺拔胜比宇文泰年长，而且成名早。所以，他不甘心于受宇文泰的支配，而是一心想着开创自己的事业，不听谋士的劝告，损失了自己所有的兵马，孤身一人来到关中，只得屈膝于宇文泰来求生存了。

在贺拔胜的决策过程中，有两位汉族士人参与。他们对形势发展的分析与历史的发展全然符合，表现了缜密的政治分析才能。只是贺拔胜不重用，才搞得狼狈不堪。同样侯景之所以在高欢死后，还能发挥他的军事才能攻克建康，使得萧梁元气大伤，这与他重用谋士王伟有关。《南史》卷八〇《贼臣侯景传附王伟传》：

王伟，其先略阳人。父略，仕魏为许昌令，因居颍川。伟学通《周易》，雅高辞采，仕魏为行台郎。景叛后，高澄以书召之。伟为景报澄书，其文甚美。澄览书曰：“谁所作也？”左右称伟之文。澄曰：“才如此，何由不早使知邪？”伟既协景谋谟，其文檄并伟所制。及行篡逆，皆伟创谋也。

根据《南史·侯景》传，每当侯景身处困境，一筹莫展，总是王伟指出应对之策。侯景之所以敢以数百人渡江直取建康，是王伟的主张。可以说没有王伟，侯景恐怕早就被东魏与萧梁除掉了。正是由于侯景的战术加上王伟的谋略，才使得侯景将南朝搞得一团糟，改变了南北的力量对比。

总的来说，侯渊、贺拔胜、侯景都是失败者。其失败的原因深深地根植于北镇出身人的固有缺陷。即，没有高远的战略眼光，没有清晰的政治头脑。更主要的是他们没有得到或者不能得到汉族官僚或知识阶层的支持，因而在政治斗争中因为盲目而失败。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在北镇人物的行事之中，怎样协调往日同伴的关系非常微妙而且关键。

第三节 尔朱氏集团初探

尔朱氏集团是指以尔朱氏家族为领袖，以契胡武士为核心军事力量，以北镇鲜卑武装为外围军事力量所组成的军事政治集团。尔朱氏集团出现在北魏政治史上是肃宗正光四年四月，尔朱荣率四千契胡武士随李崇北追蠕蠕；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北魏孝武帝太昌二年一月，尔朱兆自杀于赤洪岭，历时约十年。这个集团寿命是短暂的，但它一度使蔓延于北方的叛乱平息并先后拥立过三位皇帝，而且，东西魏的主要将领，北齐北周的皇帝、将领大多都出自尔朱氏集团。因而它在北朝政

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学界对于尔朱氏集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尔朱氏的种族及尔朱荣的历史功过这两个方面。对于尔朱氏崛起以及灭亡的原因关注较少，笔者仅见到王延武发表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上的《北魏末的文化模式与尔朱荣的败亡》一篇。王延武提出在北魏末年“鲜—汉文化模式”主宰着各个社会阶层的意识。尔朱荣顺应之就崛起，与之作对就败亡。笔者在讨论尔朱氏集团的兴亡史时与王延武的视角有所不同，写出来或许会有助于学界对此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一 尔朱集团的潜力

尔朱荣家族崛起于魏末的原因是，其他各种政治势力相继衰落之际，尔朱荣有意识地建立了北方最为强大的武力。

尔朱荣并不是出身于一个政治地位显赫的家族。先看一下他父祖辈的历官：

高祖羽健：部落酋长，散骑常侍。

曾祖郁德：部落酋长。

祖父代勤：部落酋长，立义将军，假宁南将军、肆州刺史。

父亲新兴：右将军、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平北将军、秀容第一领民酋长。

除了世袭的酋长外，尔朱荣祖先的官职大多为荣誉性质，在政治生活中无实际意义。所以尔朱荣在政治上没有强大的援手。他的成功依靠其父留下的巨大家产。《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

父新兴，太和中，继为酋长。家世豪擅，财货丰赢。曾行马群，见一白蛇，头有两角，游于马前。新兴异之，谓曰：“尔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之后，日觉滋盛，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裨军用。高祖嘉之，除右将军、光禄大夫。及迁洛后，特听冬朝京师，复归部落。每入朝，诸王公朝贵竞以珍玩遗之，新兴亦报以名马。

排除引文中的神话成分，可以看出尔朱家族在尔朱新兴这一代有两个变化：其一是财产变得异常庞大；其二，企图在政治上有所发展。史料显示尔朱新兴在政治上的野心颇不寻常。《魏书·尔朱荣传》记载：“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测，相传曰祁连池，魏言天池也。父新兴，曾与荣游池上，忽闻箫鼓之音。新兴谓荣曰：‘古

老相传，凡闻此声皆至公辅。吾今年已衰暮，当为汝耳。汝其勉之。'”单看引文不会发现问题。正如上文所论，尔朱家族在仕宦方面并不显赫，到尔朱新兴也不存在儿子位至公辅的可能。由此可知，尔朱新兴的愿望包含着相当的野心。在高山旷野听闻箫鼓之音，却不只是位至公辅的征兆。《周书·文帝纪上》：“太祖（宇文泰）尝从数骑于野，忽闻箫鼓之音，以问从人，皆云莫之闻也。”[42] 箫鼓之音在宇文泰身上的应验是位迫皇帝的霸主，可知尔朱新兴的确有政治上的野心。当然，尔朱荣、宇文泰之听闻箫鼓之音或许是后人伪造，并不可信。但是从《魏书》来看，尔朱新兴对政治颇有兴趣，将其资产投资于政治中，并有所回报。

尔朱新兴对政治的兴趣，与其财产的迅速增加同步。其家族财产的增加，估计与北魏首都的南迁有关。据上引文，尔朱家族财产的增加是在太和年间，这正是孝文帝南迁的年代。引文又记每次朝廷征讨，尔朱新兴都献马匹，并深得孝文帝欢心。尔朱新兴讨好权贵的方式也是赠以名马。我们知道北魏未迁都之前，官府畜养了百万匹的马，因而在那时无论朝廷还是权贵都不大可能以马匹为贵，所以尔朱新兴的送马只能是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可以推测，迁都之后北魏朝廷的马匹来源变得困难，因而对尔朱氏这样的北方牧场主的依赖增加了，这是尔朱氏发展的原因之一；其次，迁都之后北魏朝廷对北方部族的控制放松了，人口的南迁也使得部族的发展空间增大了。所以，尔朱家族壮大的原因在此，而不在于白蛇的佑助。

如果追问尔朱家族壮大的普遍意义，那么可以认为北魏首都南迁之后平城周围及以北地区的社会必然发生了一些调整，一些势力开始脱离北魏控制而独立发展着。这就是尔朱荣崛起的天时与地利因素。

尔朱氏家族，在秀容川拥有相当的社会力量。尔朱氏家族，“常领部落，世为酋帅”。那么这个家族所拥有的部民有多少呢？做一简单推算。尔朱荣最早的军队有四千人，若按每户出一人为兵，每户五口计算，尔朱荣领有部民二万人。这二万人与酋长的关系是怎样的呢？《魏书·尔朱荣传》记其祖父代勤：“曾围山而猎，部民射虎，误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问，曰：‘此既过误，何忍加罪。’部内闻之，咸感其意。”也就是说，尔朱代勤对其部民有司法权，表明了一种较强的依附关系。尔朱氏不仅拥有一支归其支配的人口，而且还拥有世袭领地。在道武帝时，北魏政权割北秀容川，“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43]。这样，尔朱氏家族有土地，有人民，是具备了强大社会潜力的家族。

尔朱氏家族的突出之处并不在于拥有庞大的资产，强大的社会潜力。因为在农耕与游牧结合地带拥有资产与社会力量的家族不只尔朱氏一

家。据《北史·娄昭传》记其家，“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其经济实力不弱于尔朱家。又据《北齐书·破六韩常传》记其父亲破六韩孔雀，“率部下一万人降于尔朱荣”[44]。可见其家族的社会实力也不在尔朱氏之下。然而，这两个家族在魏末，并没有像尔朱氏一样成为一时霸主，其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尔朱荣在北镇起义初期就组建了一支强悍的军队，而这两家没有这样做。《魏书·尔朱荣传》：“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义勇，给其衣马。”[45] 又，《魏书·侯渊传》：“侯渊，神武尖山人也。机警有胆略。肃宗末年，六镇饥乱，渊随杜洛周南寇。后与妻兄念贤背洛周归尔朱荣。路中遇寇，身被苫褐，荣赐其衣帽，厚待之，以渊为中军副都督。常从征伐，屡有战功。”[46] 这两段引文反映了尔朱荣将自己的财富与社会实力转化为军事集团的情形。

当然，尔朱氏军事集团的脱颖而出并不仅仅在于拥有一支军队，更主要是因为这支军队是当时中国境内最能打仗的军队。质言之，这支军队训练的严格，指挥体系的有力，在北魏末年，尚未有其他军队能与之相比。

首先，考察一下尔朱氏军队的训练情况及与北魏政府军的比较。《魏书·尔朱荣传》：“及长，好射猎，每设围誓众，便为军阵之法，号令严肃，众莫敢犯……初，荣之将讨葛荣也，军次襄垣，遂令军士列围大猎……荣性好猎，不舍寒暑，至于列围而进，必须齐一，虽遇阻险，不得回避，虎豹逸围者坐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从容谓荣曰：‘大王勋济天下，四方无事，惟宜调政养民，顺时蒐狩，何必盛夏驰逐，伤犯和气。’荣便攘肘谓天穆曰：‘……今若止猎，兵士懈怠，安可复用也。’”[47] 由此可知，狩猎是尔朱荣训练军队的主要方式。利用狩猎来训练军队，保持军队战斗力，并非尔朱荣独创。游牧民族几乎都用狩猎来训练军队。

在许多民族的早期国家阶段，狩猎与战争有相似功能。在北魏孝文帝之前，政府经常会组织军队，进行狩猎活动。《魏书·神元平文子孙传·六脩传》：“穆帝五年，遣六脩为前锋，与辅相卫雄、范班及姬澹等救刘琨。帝躬统大兵为后继。刘粲惧，焚烧辎重，突围遁走。纵骑追之，杀伤甚众。帝因大猎于寿阳山，陈阅皮肉，山为变赤。”[48] 又，《魏书·太宗纪》：“（泰常四年）冬十有二月癸亥，西巡，至云中，踰白道，北猎野马于辱孤山。至于黄河，从君子津西渡，大狩于薛林山……五年春正月丙戌朔，自薛林东还，至于屋窦城，飨劳将士，大酺二日，班禽兽以赐之。”[49] 以上所引，为西晋末年和北魏初年拓跋鲜卑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的两次狩猎活动。两次活动有两个共同特点：（1）参加者为军队；（2）狩猎的规模很大，猎获物分配给将

士。

再看，北魏早期政府组织的军事活动。《魏书》卷二《太祖纪》：

（登国三年）五月癸亥，北征库莫奚。六月，大破之，获其四部杂畜十余万，渡弱落水。班赏将士各有差。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始光）二年春正月己卯，车驾至自北伐，以其杂畜班赐将士各有差……三年春正月壬申，车驾至自北伐。班军实以赐将士，行、留各有差。

《魏书》卷二五《长孙嵩传》：

（世祖）诏问公卿，赫连、蠕蠕征讨何先。嵩与平阳王长孙翰、司空奚斤等曰:“赫连居土，未能为患，蠕蠕世为边害，宜先讨大檀。及则收其畜产，足以富国；不及则校猎阴山，多杀禽兽，皮肉筋角，以充军实，亦愈于破一小国。”

战争与狩猎一样，其主要目的在于获取生活资料。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战争与狩猎是同一群人，同样采用骑射、围堵的方式。所以说，狩猎对于游牧民族建立的早期国家与战争并无二致。从这个意义上，狩猎是对军队的一种训练。

因此，对于狩猎中表现突出的将士，国家也同样给予封赏。《魏书》卷二七《穆崇传附穆传》：

（穆顗）曾从世祖田于崞山，有虎突出，顗搏而获之。世祖叹曰：“《诗》所谓‘有力如虎’，顗乃过之。”

《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传·常山王遵传附可悉陵传》：

年十七，从世祖猎，遇一猛虎，陵遂空手搏之以献。世祖曰：“汝才力绝人，当为国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内行阿干。

《魏书》卷三〇《来大千传》：

尝从太宗校猎，见虎在高岩上，大千持矟直前刺之，应手而死。太宗嘉其勇壮，又为殿中给事。

勇士通过狩猎表现才艺，国家通过狩猎发现军事人才，这也是狩猎与军事相关的一个方面。

综上所述，狩猎活动在早期国家里有着诸多与战争相通的因素。尔朱氏部落是畜牧部落，狩猎也应是其经济生活中的组成部分。所以，正如早期拓跋国家一样，狩猎是磨炼军人的一种方式。

当然，作为魏末的一名杰出军事家，尔朱荣并非只因袭传统。他的创新之处是将狩猎与阵法结合，突出了狩猎过程中的军事训练色彩。狩猎本身就讲求一套队形的布置与变换的技术。但战场上的形势、地形更加多变，对队形的变化要求更高，阵法就要求更高的技术。所以，在不断总结战场经验的基础上，北魏政府在高宗时期，颁布了官方的阵法。在北魏前期接连不断的战争之中，阵法一代代保留下来，《魏书·高宗纪》：“（和平三年）十有二月乙卯，制战阵之法十有余条。因大傩耀兵，有飞龙、腾蛇、鱼丽之变，以示威武。”[50] 在显祖献文帝时，“（源）贺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旧之说，略采至要，为《十二阵图》以上之。显祖览而嘉焉”[51] 。中国古代行兵布阵之法当然不始于北魏中期，但这里出现的所谓，“战阵之法”与阵图，当是总结骑兵战术而成，并不是对古代阵法的因袭。尔朱荣所采用的阵法，当然是学自以上所说的新阵法了。

通过这一种杂有阵法的狩猎活动，尔朱荣训练出了一支精悍的军队。这支军队之所以屡战屡胜，是因为与它同时代的其他军队相比，较有优势。

通过上面的论述，已经了然尔朱氏军队是久经训练的军队。那么，比较一下北魏政府军的训练情况。《魏书》卷七二《路恃庆传附路思令传》：

时天下多事，思令乃上疏曰：“……窃以比年以来，将帅多是宠贵子孙，军幢统领，亦皆故义托附。贵戚子弟未经戎役，至于衔杯跃马，志逸气浮，轩眉攘腕，便以攻战自许。及临大敌，怖惧交怀，雄图锐气，一朝顿尽。乃令羸弱在前以当锐，强壮居后以安身。兼复器械不精，进止不集，任羊质之将，驱不练之兵，当负险之众，敌数战之虏，欲令不败，岂有得哉！是以兵知必败，始集而先逃；将又怖敌，迁延而不进。国家便谓官号未满，重爵屡加，复疑赏赍之轻，金帛日赐。帑藏空虚，民财殚尽。致使贼徒更增，胆气益盛，生民损耗，荼毒无聊。

《魏书》卷七七《高崇传附高谦之传》：

谦之又上疏曰：“……诸守帅或非其才，多遣亲者妄称入募，别倩他人引弓格，虚受征官。身不赴阵，惟遣奴客充数而已，对寇临敌，曾不弯弓。则是王爵虚加，征夫多阙，贼虏何可殄除，忠贞何以劝诫也？”

在北魏后期的政府中，武官的职位是为那些只领俸禄，从不过问世事的贵族子弟准备的，这些子弟也没有军事经验。招募来的士兵多是替主人当兵的奴隶、宾客，也没有军事经验，并未经过军事训练。再看一下征兵的情况。《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

时天下多难，盗贼充斥，征召兵役，途多亡叛。朝廷患之。乃令兵人所赍戎具，道别车载；又令县令自送军所。时光州发兵，弼送所部达北海郡，州兵一时散亡，唯弼所送不动。他境叛兵，并来攻劫，欲与同去。弼率所领亲兵格斗，终莫肯从，遂得俱达军所。

强迫征来的士兵，既谈不上训练也没有多少作战意愿。让对军事一无所知的将领率领一群未经训练而且不愿服兵役的士兵，去镇压北镇那些善于骑射的军队，其后果必然是一系列的失败。

北魏政府军队之所以在镇压北镇、秦陇起义的过程中一再受挫，其军事指挥系统的混乱是原因之一。《魏书》卷一八《广阳王元深传》：

及李崇征还，深专总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渡河。先是，别将李叔仁以拔陵来逼，请求迎援，深赴之，前后降附二十万人。深与行台元纂表求恒州北别立郡县，安置降户，随宜赈赍，息其乱心。不从，诏遣黄门郎杨昱分散之于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谓纂曰：“此辈复为乞活矣，祸乱当由此作。”既而鲜于修礼叛于定州，杜洛周反于幽州，其余降户，犹在恒州，遂欲推深为主。深乃上书乞还京师，令左卫将军杨津代深为都督，以深为侍中、右卫将军、定州刺史。时中山太守赵叔隆、别驾崔融讨贼失利，台使刘审考覈，未讫，会贼逼中山，深乃令叔隆防境。审驰驿还京，云深擅相放纵。城阳王徽与深有隙，因此构之，乃征深为吏部尚书，兼中领军……

后河间王琛等为鲜于修礼所败，乃除深仪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融为左都督，裴衍为右都督，并受深节度。徽因奏灵太后构深曰：“广阳以爱子握兵在外，不可测也。”乃敕章武王等潜相防备。融遂以敕示深，深惧，事无大小，不敢自决……深遂退走，趋定州。闻刺史杨津疑其有异志，乃止于州南佛寺。停三日夜，乃召都督毛谥等六七人，噬臂肩为约，危难之际，期相拯恤。谥疑深意异，乃密告津云，深谋不轨。津遣谥讨深，深走出，谥叫噪追蹑。深与左右行至博陵郡界，逢贼游骑，乃引诣葛荣。贼徒见深，颇有喜者。荣新自立，内恶

之，乃害深。

元深是北魏政府内少数几个清楚北镇起义的性质并明了平息方针的官员。在破六韩拔陵起义不久，他上奏朝廷，要求实施魏兰根所提出的改镇立州的措施。改镇立州的核心是提高镇户的身份，使他们可以像平民一样通过参加各种途径改善生活处境，比如说为官。这样做，对于起义军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是一个最省事的平息起义的方法，但朝廷拒绝采纳。在平息破六韩拔陵起义之后，他提出将降附的城民迁往恒州以北，设立郡县来安置，反对将降民安置于冀定瀛地区。后来北镇镇民再次于冀定瀛三州起义，说明了他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北魏政府又一次拒绝了他。为什么朝廷不听元深的正确建议呢？一个主要原因是，灵太后的宠臣元徽与元深之间矛盾很深，所以，处处与元深作对。当鲜于修礼的叛军攻到中山时，元深命令正在受审查的中山太守反击，从军事上讲也是正确的。但，这个正确的命令被元徽曲解为对朝廷权威的蔑视。从此，身为大都督统一指挥平叛大军的他处处受到猜忌，以至于“事无大小，不敢自决”。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镇压北镇起义的政府军不可能有一个正常的指挥体系，是散沙一盘，终于被叛军各个击破。

再看尔朱氏集团的指挥体系的功效。《魏书》卷七五《尔朱天光传》：

建义元年夏，万俟丑奴僭大号，朝廷忧之。乃除天光使持节、都督雍岐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卫将军贺拔岳，大都督侯莫陈悦等以讨丑奴。天光初行，唯配军士千人……至雍……以军人寡少，停留未进。荣遣责之，杖天光一百，荣复遣军士二千人以赴……于是泾、豳、二夏平，北至灵州，贼党结聚之类，并来归降。天光遣都督长孙邪利率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镇之。道洛招诱城人来掩，袭杀邪利并其所部……荣责天光失邪利，不获道洛，复遣使杖之一百，诏降为散骑常侍、抚军将军、雍川刺史，削爵为侯……（天光败道洛。道洛）投略阳贼王庆云……天光欲讨之，而庄帝频敕，荣复有书，以陇中险邃，兼天盛暑，令待冬月。而天光知其可制，乃率诸军入陇，至庆云所居水洛城……于是三秦、河、谓、瓜、凉、鄯咸来款顺。天光顿军略阳，诏复天光前官爵，寻加侍中、仪同三司，增邑至三千户。

尔朱荣可以对节度一方的大将严格地执行赏罚之权。对于违反节制的行为绝不姑息，立了功劳则立即给予奖励。这样，军队始终控制在尔朱荣手中，迅速地实施他的战争目的。其次，对于在外作战将领的具体指挥，作战部署，又不妄加干涉。尔朱天光虽然没有按尔朱荣的决策去执行。尔朱荣并没有掣肘，也没有猜忌，更没有命令尔朱天光的

手下防范尔朱天光。这样，具体指挥作战的将领才会发挥自己的才能与权威，顺利实施作战部署。在尔朱氏集团中，尔朱荣作为灵魂人物可以控制在外作战的将领。而将领的能力与权威得到尔朱荣的充分尊重，使得将领可以根据战时实际情况指挥作战。所以与北魏的军队相比，尔朱荣的军队的指挥体系顺畅、有力，士兵经过严格的训练，服从指挥，勇敢善战。而北魏的政府中将相不和，士兵未经训练。故此，尔朱荣的军队数量虽不多，但它却能在魏末所向无敌，应对北魏政府无法解决的军事困境。

二 尔朱集团的败亡

尔朱氏集团拥有北方最强悍的军队，也曾扶立过三位皇帝，但为何政治生命仅仅维持了十年？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解释。

（一）尔朱氏家族的内乱

尔朱氏集团是以尔朱荣为灵魂人物，以尔朱氏家族其他人物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政治集团。作为集团的领袖，尔朱荣对统治集团的成员有较充分的了解。所以他按照每个人的才能相应地安排职位。

在消灭葛荣势力之后，尔朱荣自己坐镇晋阳，巩固后方基地。他的从兄弟尔朱彦伯为尔朱荣大将军府长史，侄子尔朱兆为汾州刺史。这两个人一文一武辅助尔朱荣稳定后方。尔朱世隆为左仆射，尔朱度律为京畿大都督。这一文一武负责监视孝庄朝廷的动态。尔朱羽生为瀛州刺史负责监视河北地区，尔朱仲远以三徐大行台坐镇彭城（后驻滑台），负责河南地区，尔朱天光以雍州刺史坐镇关陇地区。尔朱荣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这是根据每个人的才能做出的。

尔朱兆骁勇善战，又是尔朱荣的亲侄子，按说应该安排行台、都督坐镇一方的。但尔朱荣却安排他在自己身边而且是汾州刺史。这恐怕是因为尔朱兆缺乏统率才能。尔朱荣多次提到尔朱兆统三千骑以上必乱，正是说明尔朱兆不是帅才，不能担任一方面的职位。[52] 尔朱度律之所以无方面之任，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尔朱仲远，从《魏书》本传看不出他有什么才能。但从史书的记载来看，他是相当有军事才能的。首先，他打败了郑先护与贺拔胜的军队；[53] 其次，他又打败了崔祖螭十万多人的军队。[54] 因而，尔朱荣任他为三徐行台坐镇一方。

尔朱世隆的政治见识比之尔朱氏家族的其他人来要高远一些。史称，“世隆之为仆射，自忧不了，乃取尚书文簿在家省阅。性聪解，

积十余日，然后视事。又畏尔朱荣威，深自克勉，留心几案，傍接宾客，遂有解了之名”。他的行政才能看来是过关的。在尔朱兆杀孝庄之后，尔朱世隆拥立比较得人心的广陵王元恭为帝，使中央政府得以维持。在高欢兵讨伐尔朱氏时，尔朱世隆极力地将四分五裂的尔朱家族团结起来，都显示了较高的政治才能。[55]

在尔朱氏家族之中，尔朱荣最看重的人是尔朱天光，“每有军戎事要，常预谋策”。而且曾说过，“我身不得至处，非汝无以称我心”[56]。在平定秦陇起义的过程中，尔朱天光也显示出了一定的军事才能。

所以说，尔朱荣对其家族成员的安排是经过思考的，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布局。但历史的进程并非按尔朱荣的设想走。打乱尔朱荣安排的突发事件就是尔朱荣的死亡。

尔朱荣死后，就尔朱氏家族中的人来说，尔朱兆是最大的赢家。因为他近在汾州，所以很快赶到晋阳，接收了尔朱氏集团的主力兵马与家产。事实上，他成为尔朱荣的接班人。事态的这样一种发展引起了尔朱家族中其他人的妒嫉，这一方面最明显的是尔朱天光，《魏书·尔朱天光传》记在尔朱荣死后，“及闻尔朱兆已入京师，天光乃轻骑向都见世隆等，寻便还雍……于时献武王义军转盛，尔朱兆，仲远等既以败退，世隆累使征天光，天光不从”[57]。尔朱天光之所以留在关中，不愿意回洛阳，也不愿意援助尔朱兆等，主要还是在妒嫉尔朱兆。这是尔朱氏集团分裂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攫取了最大权力的尔朱兆急于建立权威，对待其他成员粗暴无礼，导致了尔朱家族的进一步分裂。

先看一下尔朱兆与尔朱世隆矛盾的扩大，《魏书·尔朱世隆传》：“兆即平京邑，自以为功，让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时，耳目应广，如何不知不闻，令天柱受祸！’按剑瞋目，声色甚厉。世隆逊辞拜谢，然后得已。世隆深恨之。”[58] 再看尔朱兆与度律、仲远的矛盾。《魏书·尔朱兆传》：“齐献武王之克殷州也，兆与仲远，度律向共讨之。仲远、度律次于阳平，兆出井陉，屯于广阿，众号十万。王广纵反间，或云世隆兄弟谋欲害兆，复言兆与王同图仲远等，于是两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不进。仲远等使斛斯椿，贺拔腾往喻之，兆轻骑三百来就仲远，同坐幕下。兆性粗犷，意色不平，手舞马鞭，长啸凝望，深疑仲远等有变，遂趋出驰还。仲远遣椿、腾等追而譬，兆遂拘缚将还，经日放遣。仲远等于是奔退。王乃追击兆，兆军大败。”[59]

尔朱荣死后，尔朱氏集团的大权不意被尔朱兆所获得。所以尔朱兆立即引起了天光、度律、仲远等人的妒嫉与不服气。尔朱氏家族内部开始分裂。尔朱兆得到大权后，并没有对家族成员进行安抚，反而处处

压制、猜忌，使得高欢的反间计得以成功。尔朱氏集团被各个歼灭。

尔朱荣御下甚严，所以他活着的时候，其家族的成员并不敢胡作非为。尔朱荣一死，失去控制的尔朱家族迅速成为北魏社会的灾难。《魏书》卷七五《尔朱仲远传》：

仲远天性贪暴，大宗富族，诬之以反，殁其家口，簿籍财物，皆以入己，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胜数。诸将妇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乱。自荥阳以东，输税悉入其军，不送京师。时天光控关右，仲远在大梁，兆据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专恣，权强莫比焉。所在并以贪虐为事，于是四方解体。又加太宰，解大行台。仲远专恣尤剧，方之彦伯、世隆最为无礼。东南牧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特为患苦。

同卷《尔朱世隆传》：

荣死之后，无所顾惮……既总朝政，生杀自由，公行淫佚，无复畏避，信任群小，随其与夺。

这种无所顾忌的贪暴专恣，所引起的后果就是将各种社会力量推向了敌对的一方，削弱了自己的实力。《北史·齐神武纪》：“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自军次信都，高乾、封隆之开门以待，遂据冀州……神武自向山东，养士缮甲，禁侵掠，百姓归心。”[60] 一方面是四方瓦解，一方面是百姓归心。所以，尔朱氏众叛亲离，最终灭亡。

综上所述，尔朱氏家族人物由两种人组成。第一种以尔朱荣为代表，包括尔朱兆、尔朱度律、尔朱天光。这一类人是在部落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由于缺乏对中原的了解，更由于缺乏系统的知识训练，使得他们在面临政治问题时显得简单粗暴，缺乏理性。另一类以尔朱世隆为代表。他的祖父侯真在孝文帝时出任并安二州刺史，父亲买珍在宣武帝时任武卫将军华州刺史。从其父祖历官看，有可能长时期脱离其部族环境而在中原过官僚的生活，因而其家庭对汉文化的了解是比第一类要深刻。所以，尔朱世隆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得要老练一些。但是在尔朱家族中第一类人掌握实权，所以其家族在关键的决策中往往表现为缺乏理性，这是尔朱集团败亡的主要原因。

（二）尔朱氏集团内北镇势力的分裂倾向

尔朱集团虽然是以契胡为核心军事力量，但是从这个集团的发展过程来看北镇将领越来越成为其依赖的对象。比如说镇压韩楼义军派遣侯渊，镇压山胡义军倚重贺拔岳，在对付南朝入侵方面派遣樊子鹄，镇

压邢杲义军重用高欢等。这些事实说明，严格的军事训练可以造就优秀的军队，却造就不了优秀将领，所以尔朱荣不得不倚重北镇人物。尔朱荣死后，尔朱兆不能抵御费也头的进攻，不得不启用高欢，这个事实暗示出契胡势力与北镇势力的对比，向北镇倾斜了。

尔朱荣势力最初形成时，其大部分将领都出自代郡。在平定北镇叛乱的过程中，北镇起义军中的将领，纷纷投到尔朱荣军中。表面上看起来是尔朱荣集团的实力在增长，其实，尔朱荣将北镇人士集中到一起，正好给北镇中的豪杰组建自己势力的机会。于是以贺拔岳为首的武川集团与高欢为首的怀朔集团，在尔朱荣的眼皮子底下产生了。

贺拔岳集团是在贺拔岳随尔朱天光西征时初步集结起来的。《周书》卷二七《赫连达传》：

（赫）连达性刚鲠，有胆力。少从贺拔岳征讨有功，拜都将，赐爵长广乡男，迁都督。

同上卷《韩果传》：

韩果字阿六拔，代武川人也。少骁雄，善骑射，贺拔岳西征，引为帐内。

《周书》卷一五《寇洛传》：

寇洛，上谷昌平人也。累世为将吏。父延寿，和平中，以良家子镇武川，因家焉。

……及贺拔岳西征，洛与之乡里，乃募从入关。

《周书》卷一六《侯莫陈崇传》：

侯莫陈崇字尚乐，代郡武川人也。

崇少骁勇，善驰射，谨慤少言。年十五，随贺拔岳与尔朱荣征葛荣……后从岳入关，破赤水蜀。

《周书》卷一七《梁御传》：

梁御字善通，其先安定人也。后因官北边，遂家于武川……御少好学，进趋详雅。及长更好弓马。尔朱天光西讨，知御有志略，引为左右，授宣威将军，都将。

同上《若干惠传》：

若干惠字惠保，代郡武川人也……惠年弱冠，从尔朱荣征伐，定河北，破元颢，以功拜中坚将军。复以别将从贺拔岳西征。

同上卷《王德传》：

王德字天恩，代郡武川人也……又从贺拔岳讨万俟丑奴，平之。

《周书》卷二九《王勇传》：

王勇，代武川人也……魏永安中，万俟丑奴等寇乱关陇，勇占募随军讨之。

由以上征引，很明显，贺拔岳幕府之中是以武川将领为主体的。这个以地域乡里关系形成的小集团，一开始当然并不是针对尔朱氏的。但其利益也不是与尔朱氏没有冲突。《周书》卷一《文帝纪上》：

少随德皇帝在鲜于修礼军。及葛荣杀修礼，太祖时年十八，荣遂任以将帅。太祖知其无成，与诸兄谋欲逃避，计未行，会尔朱荣擒葛荣，定河北，太祖随例迁晋阳。荣以太祖兄弟雄杰，惧或异己，遂托以他罪，诛太祖第三兄洛生，复欲害太祖。太祖自理家冤，辞旨慷慨，荣感而免之，益加敬待……太祖与（贺拔）岳有旧，乃以别将从岳……万俟丑奴作乱关右，孝庄帝遣尔朱天光及岳等讨之，太祖遂从岳入关。

宇文泰与尔朱荣有杀兄之仇，虽然尔朱荣对他“益加敬待”，但宇文泰后来还是跟随贺拔岳，而不是尔朱荣。贺拔岳跟尔朱荣也不是没有分歧。[61] 所以，跟随贺拔岳入关的这个武川军人集团内部有一定的凝聚力，对尔朱氏集团有一定的离心倾向。

再看高欢集团的形成。高欢的小集团最初是在他任晋州刺史时形成的。高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善于交结。早在北镇起义之前，他就“倾产以结客”。“与怀朔省事云中司马子如及秀容人刘贵、中山人贾显智为奔走之友，怀朔户曹史孙腾、外兵侯景亦相友结。”[62] 当他投降尔朱荣后，又结交了庞苍鹰，“苍鹰亦知高祖有霸王之量，每加私敬，割其宅半以奉高祖，由是遂蒙亲识”[63]。由以上事实可知，结交人士组成小集团，以增加自己的实力，改善自己的处境，是高欢所擅长的手段。他形成独立的小集团当是在任晋州刺史时。《北史》卷五四《窦泰传》：

窦泰字世宁，太安捍殊人也……神武之为晋州，请泰为镇城都督，参

谋军事……泰妻，武明娄后妹也。

同卷《韩轨传》：

韩轨字百年，太安狄那人也。少有志操，深沉，喜怒不形于色。神武镇晋州，引为镇城都督……

《北史》卷五三《潘乐传》

潘乐字相贵，广宁石门人也……齐神武出牧晋州，引乐为镇城都将。

《北齐书》卷一八《孙腾传》：

孙腾，字龙雀，咸阳石安人也。祖通，仕沮渠氏为中书舍人，沮渠灭，入魏，因居北边。

寻为高祖都督府长史，从高祖东征邢杲……高祖之为晋州，腾为长史，加后将军，封石安县伯。

同卷《高隆之传》：

与高祖深自结托。高祖之临晋州，引为治中，行平阳郡事。

《北齐书》卷一九《蔡儁传附庞苍鹰传》：

高祖之牧晋州，引为治中从事史，行义宁郡事。

如前文所述，孙腾与庞苍鹰为高欢所结交的朋友。高隆之，据引文当是高欢的朋友。窦泰不仅是高欢的乡里人而且是亲戚。高欢之所以引韩轨、潘乐为手下，也是出于乡里关系的缘故。因此，高欢实际上在晋州形成了一个较为凝固的私人团体。这个团体在尔朱荣势力较庞大时，就会依附于它。若尔朱氏一旦削弱，它也就脱颖而出了。《北齐书·斛律金传》："及尔朱兆等逆乱，高祖密怀匡复之计，金与娄昭，库狄干等赞成大谋，仍从举义。"这里斛律金是朔州人，也算高欢乡里。娄昭是高欢的妻兄，库狄干是高欢妹夫。[64] 这三人都是高欢的私人集团成员。"尔朱兆等逆乱"是指尔朱兆杀害北魏孝庄帝一事，时高欢任晋州刺史。所引三人赞成高欢"大谋"亦应在晋州。可见，高欢在晋州形成的私人集团与尔朱氏是有离心力的。

在尔朱氏势力发展的鼎盛期，其内部已出现了分裂倾向。即北镇势力形成了以贺拔岳为首的武川集团和以高欢为首的晋州集团。这两个集团形成之始并不是要对抗尔朱荣，但当他们与尔朱氏在势力的消长发

生变化时，就会独立发展，甚至与尔朱氏为敌。

（三）与汉族豪强的矛盾

《魏书》卷三六《李顺传附孝裔传》：“永安初，尔朱荣既擒葛荣，遂絷裔及高敖曹、薛修义、李无为等于晋阳。从荣至洛，荣死乃免。”按，李裔，出自赵郡李氏。他先后投靠杜洛周、葛荣。

高敖曹，《北齐书》卷二一有传，记其人，“与兄乾数为劫掠，州县莫能穷治。招募剑客。家资倾尽，乡闾畏之，无敢违忤……乾解官归，与昂俱在乡里，阴养壮士，尔朱荣闻而恶之，密令刺史元仲宗诱执昂，送于晋阳”。高敖曹为渤海豪族。

薛修义，《北齐书》卷二〇有传，“修义少而奸侠，轻财重气，招召豪猾，时有急难相投者，多能容匿之……于是修义还河东，仍历平阳、弘农诸郡，合得七千余人，即假安北将军、西道别将……尔朱荣以修义豪猾反复，录送晋阳，与高昂等并见拘防。”可见薛修义是河东豪族。

李无为，无考。

从尔朱荣对待高敖曹、薛修义的政策上可知，尔朱荣对汉族的豪强势力有所认识，但认识不深。有所认识是指他所捕获的高昂与薛修义的确是以轻侠出名，对尔朱氏势力是潜在的威胁。而认识不深，是指对整个河南北地区的豪强的分布以及怎样对付认识不清。其实相对于薛修义与高敖曹，赵郡李元忠，范阳卢文伟等的势力大于高、薛，但尔朱荣就没有发现。其次，在对待汉族豪强的政策上有误，他拘捕薛、高二位的政策，实际上将自己放在了汉族豪强的对立地位。而汉族豪强的势力正足以与尔朱氏势力抗衡。所以，孝庄帝死后，所谓的赵魏齐青豪族都起来反抗尔朱氏势力。[65]

（四）与洛阳鲜汉官僚的矛盾

这个矛盾的起因就是河阴之变。在下一章，“试论北魏孝庄政权”一节中，将论述在尔朱荣拥立孝庄帝南下的过程中，曾得到汉族官僚的河东裴氏子弟裴瑗，荥阳郑氏郑先护，陇西李氏李遐的支持。所以，洛阳鲜汉官僚对尔朱氏集团并无抵触情绪。但尔朱荣在河阴杀死鲜汉官僚一千三百多人。其中包括李遐和孝庄帝的兄长和弟弟。史书对于河阴之变的后果是这样叙述的，“于时或云荣欲迁都晋阳，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警恐，人情骇震，京邑士子不一存，率皆逃窜，无敢出者，直卫空虚、官守废旷”[66]。《魏书·费于传附费穆》：“天下闻之

莫不切齿。”[67] 可以说尔朱荣在河阴的大屠杀将整个汉族官僚的知识阶层推到了对立面。因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坚决不在尔朱氏拥立的政权中做官。《魏书》卷五三《李孝伯传附李玚传》：

建义初，于河阴遇害，时年四十五。

（李郁）建义中，以兄玚卒，遂抚育孤侄，归于乡里。

《魏书》卷五七《崔挺传附崔孝直传》：

尔朱兆入洛，孝直以天下未宁，去职归乡里，劝督宗人，务行礼义。

《魏书》卷六六《崔光韶传》：

永安末，扰乱之际，遂还乡里。

以上所引的汉族官僚对于尔朱氏明显地怀有敌意，不愿与之合作。而留在朝廷内的官僚并不是唯尔朱氏命是从。他们集合起来，却是为了铲除尔朱氏势力。《魏书·尔朱荣传》：“又城阳王徽，侍中李彧等欲擅威权，惧荣害之，复相间构，日月滋甚，于是庄帝密有图荣之意……荣与天穆同时俱死……于是内外喜叫，声满京城。既而大赦。”尔朱荣被刺，是在尔朱氏集团平定北镇与秦陇起义之后，应该是有功勋于天下。但事实上，从上文所反映的荣死后，“内外喜叫”看，朝野内外人士对他并无好感。于此，就可以看到尔朱氏集团是多么的不得人心了。

尔朱氏集团在北魏末年能够崛起于一时，就在于尔朱荣训练出了一支娴于骑射，纪律严明的军队。与北镇义军比，尔朱荣的军队纪律严明；与北魏军队比，尔朱氏不但纪律严明、善于骑射，而且指挥简单有力。因而，尔朱氏有能力击败北镇义军，也能控制北魏政府。但是，军事的胜利并不代表政治统治的成功。从以上论证不难看出，长期生活在北部部落之中，尔朱氏家族的领袖们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经历有着先天的缺陷，对于北魏末的政治形势缺乏洞察，往往错失历史机遇。由于同样的原因，尔朱集团中的决策者们明显地缺乏对中原复杂社会的了解，因而在政治统治上显得过于简单粗暴，从而遭到了中原各个社会集团的敌视。这样他们的缺陷就不可能因汉族士人的协助而得到补救。于是，这个集团很快就被反对者击溃了。尔朱集团的昙花一现，说明了仅靠部族武力是不能统治中原的。

但是，尔朱集团的出现与失败并不是没有意义。尔朱荣将四分五裂的北镇势力集合在一起，这本身就为历史进入下一个阶段埋下了伏笔。

北镇军人是尔朱集团的基本力量。部分北镇系将领深得尔朱氏重用，尔朱荣在军事政治上的特点就为北镇军人所继承。比如说，宇文泰的重视军事训练，高欢在晋阳建立霸府等。尔朱氏反面的教训也为宇文泰和高欢所吸取。比如说拥立元魏稳定政权，优待汉族豪强，重用知识阶层等。

本章总结

本章主要探讨了北镇和尔朱集团。通过与洛阳朝廷的比较，这两个地域集团的显著特征就是其武力的强大，在洛阳朝廷失去有力的武装保护时，这两个集团依然保持着武力上的活力，这正是北镇人物成为北朝后期历史主角的原因。北镇和尔朱集团也有其缺陷，缺乏系统的知识训练，缺乏对中原社会的了解，因而在介入政治时显得缺乏经验和长远目标。这一种缺陷必得中原人士的合作才能解决，如果得不到这种帮助那他们只能在政治斗争中被消灭。所以，怎样结合北镇武力与洛阳文化是北镇领袖需要面对的问题。

---

[1] 《魏书》卷九一《刘灵助传》记载传主“常去来燕恒之界，或时负贩，或复劫盗，卖术于市”。由引文可知从燕州到恒州之间的地域为一联系紧密的相对独立的经济、社会单元。

[2]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很多，代表性的为陈寅恪，见《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268—300页。

[3] 张国安：《试论六镇鲜卑的民族融合》，《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1期。

[4] 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90—302页。

[5] 《北齐书》卷一九，第256页。

[6] 同上书，第248页。

[7] 《魏书》卷九一，第1958页。

[8] 《魏书》卷七上，第155页。

[9] 本节受到日本学者直江直子和谷川道雄的影响。直江和谷川的著作见本章第一节学术史概述及参考文献。

[10] 参见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第十三章第二节《怀朔集团统治下的北齐》，第295—297页；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补编《府兵制国家论》第一章《武川镇军阀的形成》，第273—283页。

[11] 《周书》卷二〇，第333页。

[12] 《周书》卷一，第2页。

[13] 《周书》卷二〇，第342页。

[14] 《周书》卷一〇，第159页。

[15] 《周书》卷二一，第349页。

[16] 《北史》卷六，第209、210页。

[17] 《北史》卷一四，第516页。

[18] 《北史》卷五四，第1953页。

[19] 《北史》卷六，第209页。

[20] 《北史》卷五四，第1954页。

[21] 《北齐书》卷一六，第207页。

[22] 《北史》卷六，第211页。

[23] 《周书》卷一四，第216页。

[24] 《北齐书》卷一九，第245页。

[25] 《周书》卷一〇，第159页。

[26] 《北齐书》卷四一，第544页。

[27] 《周书》卷二七，第441、442页。

[28] 《周书》卷一九，第303、304页。

[29] 《周书》卷一四，第215页。

[30] 《周书》卷一七，第284、285页。

[31] 《魏书》卷八〇，第1771、1772页。

[32] 《周书》卷一四，第221页。

[33] 《南史》卷八〇，第1993页。

[34] 《北齐书》卷二〇，第272—274页。

[35] 《北史》卷六，第231页。

[36] 《北齐书》卷二〇，第279页。

[37] 《北齐书》卷一六，第209页。

[38] 《魏书》卷六七，第1484页。

[39] 《魏书》卷八〇，第1781页。

[40] 《周书》卷三二，第562页。

[41] 《周书》卷一四，第220页。

[42] 《周书》卷一，第3页。

[43] 《魏书》卷七五，第1643页。

[44] 《北齐书》卷二七，第378页。

[45] 《魏书》卷七四，第1644—1645页。

[46] 《魏书》卷八〇，第1786页。

[47] 《魏书》卷七四，第1644—1651页。

[48] 《魏书》卷一四，第348页。

[49] 《魏书》卷三，第60页。

[50] 《魏书》卷五，第120页。

[51] 《魏书》卷四一，第922页。

[52] 《魏书》卷七五，第1664页。

[53] 《魏书》卷七五，第1667页。

[54] 《魏书》卷一一，第274、275页。

[55] 《魏书》卷七五，第1669、1670页。

[56] 同上书，第1673页。

[57] 同上书，第1676页。

[58] 《魏书》卷七五，第1669页。

[59] 同上书，第1664页。

[60] 《北史》卷六，第214、215页。

[61] 《周书》卷一四，第221、222页。

[62] 《北史》卷六，第210页。

[63] 《北齐书》卷一九，第246页。

[64] 《北史》卷五四，第1954—1957页。

[65] 关于北朝豪族，请参考陈爽论著《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66] 《魏书》卷七四，第1648页。

[67] 《魏书》卷四四，第1004页。

第二章 霸主与北魏皇权

所谓霸主就是指，“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军事政治集团的首领。北魏朝廷在各种反叛势力的冲击下，其军队的主力被消耗殆尽，河阴之变后的北魏朝廷已经没有可靠的军队，必得在军阀武力的保护之下才能维持，而挟持皇室的军阀由于敌对势力的对峙，朝野的压力，也不能取北魏政权而代之，于是北魏就进入了霸主与皇权并立的时代。在霸主所拥立的皇帝之中，孝庄帝和孝武帝都不堪皇权的衰落，企图重振权

威。虽然他们的努力失败了，但是研究这两个政权，了解皇权维护阶层的特征，是理出社会变迁线索的重要一环。

第一节 尔朱荣与孝庄政权

一 元子攸与尔朱荣

528年二月，远在晋阳的尔朱荣得到了北魏肃宗皇帝猝崩的消息。《魏书·尔朱荣传》记载，“荣闻之大怒，谓郑俨、徐纥为之”。其实，大怒只是表面文章，他心里面应该是窃喜。自正光四年，尔朱氏以镇压北镇起义发迹，势力急剧膨胀，北魏政府无力控制，只能将其限制在太行山以西以北。肃宗的驾崩，正好给了尔朱荣一个绝好的突出太行山的借口，所以他应该是窃喜而非大怒。史书紧接着写道：“与元天穆等密议称兵入匡朝廷，讨定之，乃抗表曰：‘……听臣赴阙，预参大议，问侍臣帝崩之由，访禁旅不知之状，以徐、郑之徒付之司败，雪同天之耻，谢远近之怨。然后更招宗亲，推其年德，声副遐迩，改承宝祚，则四海更苏，百姓幸甚。’”据此，尔朱荣南下的借口，一是追查并惩罚害死肃宗的凶手；二是立新帝，振朝纲。

其实，立新帝在南下问罪之前就开始酝酿。史载：“荣抗表之始，遣从子天光，亲信奚毅及仓头王相入洛，与从弟世隆密议废立。天光乃见庄帝，具论荣心，帝许之。天光还北，荣发晋阳。”[1] 可见，尔朱荣在南下之前，已经选定长乐王元子攸为拥立对象。这里有两个疑问:第一，元子攸是不是唯一有资格的帝位继承人？显然不是。在上段引文之后，有一节史料可证明孝文及献文六王的子孙都有资格，“（尔朱荣）犹疑所立，乃以铜铸高祖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成者当奉为主，惟庄帝像独就”[2] 。即，元子攸仅为众多候选人之一。第二，为什么选元子攸？对于这个问题，《魏书·孝庄纪》有一个回答，“及武泰元年春二月，肃宗崩，大都督尔朱荣将向京师，谋欲废立。以帝家有忠勋，且兼民望，阴与帝通，荣乃率众来赴”[3] 。对于北魏政权来说，彭城王元勰的文才武功在宗室中确是突出的，尤其彭城王的冤死更是引起朝野普遍的同情。可以说是兼忠勋与民望而有之。但是，彭城王的嫡长子元劭应该更有资格，为什么未被选中？如果是因为元劭年长，尔朱荣担心难以控制，那元子攸还有一个弟弟元子正，又为什么不立元子正？唯一的解释是，元子攸具有独特的条件。

事实确是如此。如果细读以上引文就会发现，尔朱荣在选定元子攸，发兵南下的前夕，又“犹疑所立”。这说明了元子攸的选定，是别人的推荐，而非尔朱荣本人的意思，所以才会疑。尔朱荣是先与“元天穆

等”密议南下的事宜，再与尔朱世隆“密议废立”，然后，与候选人元子攸联系。从字面看，“元天穆等”没有参与废立讨论，尔朱世隆没有参与发兵南下的讨论。其实，这是互文。也就是说，“元天穆等”参加了废立的讨论，并且推荐了元子攸。可以肯定尔朱世隆也推荐了元子攸。那么，“元天穆等”都是些什么人呢？《魏书》卷五六《郑羲传附郑季明传》：

武泰中，潜通尔朱荣，谋奉庄帝。

《魏书》卷三九《李宝传附李季凯传》：

寻除并州安北府长史，肃宗崩，尔朱荣阴图义举，季凯预谋。

《魏书》卷六九《裴延儁传附裴瑗传》：

转太原太守。属肃宗崩，尔朱荣初谋赴洛，瑗豫其事。

由此可知，尔朱荣在废立等问题上，参考了汉族官僚的意见。汉族官僚力荐元子攸。对于尔朱荣，拥立新帝当然是要立获得鲜、汉官僚最大支持的宗王。这样，南下的阻力就会小一些。既然元子攸得到汉族官僚的推荐，以及元天穆与尔朱世隆的认可，尔朱荣自不会拒绝。那么，汉族官僚为什么看好元子攸？这是因为，元子攸早就在笼络官僚，建立自己的势力了。下面，看一下元子攸所团结的社会力量。

元子攸的母亲出自陇西李氏，而其父早亡，元子攸兄弟受母亲的影响更大，即，与舅家的关系密切。所以，元子攸较早发展的势力就是陇西李氏。《魏书·李宝传附李义邕传》：“（李）义邕，庄帝居藩之日，以外亲甚见亲昵。”[4] 《魏书·外戚传下·李延寔传》：“长子彧，字子文，尚庄帝姊丰亭公主。”[5] 按孝昌元年庄帝已20岁，据此可推知，李彧娶元子攸姊是在孝昌元年之前。那么，这一种亲上加亲的关系，使得元子攸与陇西李氏的关系更为密切。

荥阳郑氏与陇西李氏是姻亲关系，因而与元子攸家也是远亲。郑氏家族的子弟与元子攸的结盟，也在元子攸称帝前。《魏书·郑羲传附先护传》：“少有武干。解褐员外郎，转通直郎。庄帝之居藩也，先护深自结讬。”其时，郑氏子弟布列朝廷内外，有较大的政治实力。在河南地区，且有相当的社会基础。《魏书·郑羲传附郑连山传》记载，郑思明的父亲被奴仆杀害，奴逃走，“（思明）骁勇善骑射，披发率村义，驰骑追之，及于河。奴乘马投水，思明止将从不听放矢，乃自射之，一发而中，落马随流，众人擒执至家，脔而杀之”。能率村义，说明了郑氏在当地居领袖地位，有势力。

弘农杨氏。《周书·杨宽传》：“魏广阳王深与宽素相委昵，深犯法得罪，宽被逮捕。魏孝庄时为侍中，与宽有旧，藏之于宅，遇赦得免。”[6] 杨宽是元深与元子攸共同的朋友。元深是有深远见识的军事、政治人才。他的朋友杨宽也应该是优秀的。杨宽家族的实力，《魏书·杨播传》有一段话有充分的说明，“杨播兄弟，俱以忠毅谦谨，荷内外之任，公卿牧守，荣赫累朝，所谓门生故吏遍于天下”[7]。

渤海高氏。《魏书》卷七七《高崇传附高道穆传》：

后属兄谦之被害，情不自安，遂托身于庄帝。帝时为侍中，特相钦重，引居第中，深相保护。俄而，帝以兄事见出。道穆惧祸，乃携家趣济阴，变易姓名，往来于东平毕氏，以避时难。”

《北齐书》卷二一《高乾传》：

乾性明悟，俊伟有知略，美音容，进止都雅。少时轻侠，数犯公法，长而修改，轻财重义，多所交结。魏领军元叉，权重当世，以意气相得，接乾甚厚……魏孝庄之居藩也，乾潜相讬附。

高道穆，“家资富厚，僮仆千余”，是官僚地主。高乾家仕宦不显达，但在冀州有雄厚的势力。高乾的父亲高翼，“豪侠有风神，为州里所宗敬。孝昌末，葛荣作乱于燕、赵，朝廷以翼山东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8] 。于此可见，其家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是多么大了。

范阳卢氏。《魏书》卷四七《卢道虔传》：

道虔外生李彧尚庄帝姊丰亭公主，因相藉讬。

清河崔氏。《魏书》卷八九《崔暹传附崔瓒传》：

瓒妻，庄帝妹也。

博陵崔氏。《魏书》卷五七《崔挺传附崔勉传》：

正光初，除太学博士。庄帝之为御史中尉，启除侍御史。

范阳卢氏、清河崔氏、陇西李氏是北魏第一等世族，在政治上，社会影响力上为其他阶层所不及。弘农杨氏、荥阳郑氏、博陵崔氏，社会声望比上三家稍不及，但也是高门，而且在仕宦上并不比卢、李、清崔差。在本州郡，荥阳郑氏、博陵崔氏、渤海高氏有雄厚的社会基础。由此，能约略感到元子攸早在肃宗朝，已经是在培植自己的政治

集团了。

再看以上引文中杨宽、高道穆的事例。杨氏是在押犯人，高氏是为躲避宠臣李神轨的迫害而潜逃。元子攸帮助二人不是通过法律或行政等公开方式，而是私自放出，藏入家中。这种行为明显具有与政府对抗的性质。《魏书·献文六王子孙传·彭城王勰传》记元子攸的兄长元劭，“孝昌末，灵太后失德，四方纷扰，劭遂有异志。为安丰王延明所启，乃徵入为御史中尉” [9] 。引文中的“异志”，显然可以理解为谋反。以上事实说明，元子攸在肃宗朝已有了离心倾向，开始组建自己的政治集团。

那么，元子攸弟兄有“异志”是始于何时？上引元劭的传记，所载是“孝昌末”。又据上引《北齐书·高乾传》，高乾与元子攸交结，是在元叉倒台之后。 [10] 考《魏书·肃宗纪》，元叉的倒台是孝昌元年四月。 [11] 那么，高乾与元子攸弟兄的暗中来往，是在孝昌元年前后，不会迟至孝昌末。

根据以上论证，北魏宗王元子攸早在孝昌初年就开始秘密建立自己的政治集团。这个集团以汉族官僚为主。在尔朱荣南下的密谋中，有元子攸集团的成员参加。他们向尔朱荣推荐了元子攸为帝位继承人。尔朱荣为了得到汉族官僚的支持，同意拥立元子攸为帝。

事实证明，因为元子攸的缘故，尔朱荣的军队几乎没有遇到多少抵抗。《魏书》卷三九《李遐传》：

出为河内太守。尔朱荣称兵向洛，次其郡境，庄帝潜济河北相会。遐既闻荣推奉庄帝，随开门谒候，仍从驾南渡。

《魏书》卷五六《郑羲传附郑先护传》：

及尔朱荣称兵向洛，灵太后令先护与郑季明等固守河梁，先护闻庄帝即位于河北，遂开门纳荣。

《魏书》卷三八《王慧龙传附王遵业传》：

及尔朱荣入洛，兄弟并在父丧中，以于庄帝有从姨兄弟之亲，相率奉迎。

尔朱荣既然策划拥立孝庄帝，也就是说，他还没有立即篡位的计划。但是，南下的势如破竹，尤其是河阴之变中洛阳官僚的束手就杀，不禁使尔朱荣对元魏政权产生了极度的轻蔑，相应地，他的野心无限膨胀了，一时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做皇帝。《魏书》卷七四《尔朱荣

传》记其在杀害朝臣一千三百人之后，“荣遂有大志，令御史赵元则造禅文，遣数十人迁帝于河桥。至夜四更中，复奉帝南还营幕”。这是说，尔朱荣已准备让孝庄帝禅位了。但，尔朱荣很快又有点不自信，“荣既有异图，遂铸金为己像，数四不成。时幽州人刘灵助善卜占，为荣所信，言天时人事必不可尔。荣亦精神恍惚，不自自持，久而方悟，遂便愧悔。于是献武王、荣外兵参军司马子如等切谏，陈不可之理。荣曰，‘衍误若是，惟当以死谢朝廷，今日安危之机，计将何出？’献武王等曰，‘未若还奉长乐，以安天下。’于是还奉庄帝。”

这段史料的疑点较多，恐怕是出自传闻。疑点一，《魏书·刘灵助传》未提及此事；疑点二，据《北齐书·司马子如传》，当时司马子如任大行台司马、建兴太守，而不是外兵参军，也不可能在洛阳。即，不可能作如上谏言。而且，《北齐书》也未记司马子如做过此事；[12] 疑点三，《北史·齐神武纪》记高欢的进谏是在铸像占卜之前。虽有如上疑点，但有两点可信，一是尔朱荣有过篡位的念头；二是他的部下劝他放弃妄想，推戴孝庄帝。这两点《魏书》可与《北齐书》印证，应当可信。[13] 尔朱荣有篡夺之心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手下众人为何谏止？而尔朱荣后来竟然感到自己处在与自杀无异的危险境地，这又是什么原因？且用其谋士费穆的一段话来说明：“穆潜说荣曰，‘公士马不出万人，今长驱向洛，前无横阵者，正以推奉主上，顺民心故耳。既无战胜之威，群情素不厌伏。今以京师之众，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虚实，必有轻侮之心。’”[14] 也就是说，尔朱荣的成功在于拥立了深孚民望的元子攸，从而获得了元魏政权官僚的合作。质言之，尔朱荣的实力还未达到取元氏而代之的程度。若一旦篡位，不仅得不到鲜汉官僚的支持，而且，北镇、秦陇起义军的矛头也会指向尔朱荣。到那时，尔朱荣，恐怕是亡不旋踵。所以，尔朱荣的唯一选择只能是拥立孝庄帝。

二 孝庄政权的构成

由以上的论证充分说明，尔朱集团如果不拥立孝庄帝，就无法控制北魏朝廷。那么，孝庄正式登基后能不能脱离尔朱集团而独立存在呢？孝庄帝并不甘心做傀儡，他利用皇权，扩张在藩时的势力。一方面，他加大对汉族高门、豪族，以及寒门官僚笼络的力度、广度；另一方面，对宗室进行团结。

如果说，长乐王元子攸与汉族高门与豪族的结合，还处于个人与个人的结合的狭窄范围，那么，作为孝庄帝的元子攸，就是皇权与家族的结合。这样，所形成的势力更加稳固、强大。

陇西李氏。[15] 先将陇西李氏在孝庄朝的仕宦情况列出：

李延寔：侍中—使持节、青州刺史。

李彧：侍中—中书监—广州刺史。

李神儁：殿中尚书—中书监—吏部尚书—卫将军。

李义邕：中书侍郎—太常少卿。

李季凯：给事黄门侍郎—秘书监。

李虔：特进、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

李义直：通直散骑常侍。

李泳：济州刺史—广州刺史。

李孚：沧州刺史。

李遵：定州刺史。

李柬：济州刺史。

李琰之：北道军司—太常卿—荆州刺史—三荆二郢大行台。

陇西李氏，有四人参与门下省、中书省等事关国家最高机密的官职。五人出任刺史，负责巩固地方。这样的内外兼任，说明了孝庄帝对舅家的倚重与信任。陇西李氏对孝庄政权也是全力支持。不仅有许多子弟出任官职，还推荐其他的人才出仕，以加强新政权的实力。《北周书》卷三五《崔猷传》：

崔猷字宣猷，博陵安平人，汉尚书寔之十二世孙也……猷少好学，风度闲雅，性鲠正，有军国筹略。释褐员外散骑侍郎、领大行台郎中。寻为吏部尚书李神儁所荐，拜通直散骑侍郎，摄尚书驾部郎中。

《北周书》卷三六《崔彦穆》：

崔彦穆字彦穆，清河东武城人也，魏司空、安阳侯林之九世孙……彦穆幼明悟，神采卓然……魏吏部尚书陇西李神儁有知人之鉴，见而叹曰，“王佐才也。”

《魏书》卷八五《文苑·邢昕传》：

吏部尚书李神儁奏昕修《起居注》。

李神儁在掌选官大权时很注意吸收文化士族的子弟加入孝庄政权。李彧推荐了另一类人才。《魏书·外戚传下·李延寔传附李彧传》：“彧任侠交游，轻薄无行。尔朱荣之死也，武毅之士皆彧所进。”

弘农杨氏：[16]

杨椿：司徒公—太保、侍中。

杨侃：东雍州刺史—潼关都督—岐州刺史—大梁都督—度支尚书兼给事黄门侍郎—黄门侍郎、关右慰劳大使—侍中。

杨逸：黄门侍郎领中书舍人、吏部郎中—南秦州刺史—光州刺史。

杨津：荆州刺史、都督—吏部尚书—中军大都督、领中军将军、司空，加侍中—都督并肆燕恒云朔显汾蔚九州诸军事、北道大都督、并州刺史。

杨遁：尚书郎—尚书左丞—黄门郎参行省事。

杨宽：通直散骑侍郎、河南尹丞—散骑常侍、安东将军—中军将军、太府卿。

杨师冲：秘书郎。

杨孝邕：员外郎。

杨测：朱衣直阁。

杨昱：徐州刺史—东南道都督—南道大都督—东道行台。

杨顺：冀州刺史。

杨仲宣：通直常侍—正平太守。

从杨宽的历官看，仍然是孝庄帝的心腹，但是，任遇远不如杨侃、杨津、杨昱。这说明了，孝庄帝所看重的不仅是个人的忠心，而是杨氏一族的拥戴，所以，杨氏子弟在政府中的任职多而且重。那么，杨氏对孝庄政权的态度如何呢？试从杨氏对待元颢的态度来验证之。河阴之变后，北海王元颢南奔梁朝，梁主萧衍任命他为魏主，拨给军队，北讨孝庄政权。元颢的军队一路势如破竹，孝庄帝仓皇北行。史称其时，“天下改望”。即，相当一部分官僚投靠元颢了。但杨氏的大部分子弟站在了孝庄一边。《魏书》卷五八《杨播传附侃传》：“孝庄徙

御河北，执侃手曰：‘朕停卿蕃寄移任此者，正为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随朕行，所累处大。卿可还洛，寄之后图。’侃曰：‘此诚陛下曲恩，宁可以臣微族，顿废君臣之义。固求陪从。’”南北朝士族一般都视家族利益较朝廷利益为重。像杨侃这一种舍家报国的忠臣是不多的。《魏书》同卷又记杨昱在元颢打到荥阳时，顽强抵抗，其传曰：“明旦，颢将陈庆之、胡光等三百余人伏颢帐前，请曰：‘陛下渡江三千里，无遗镞之费，昨日一朝杀伤五百余人，求乞杨昱以快意。’”可见，杨昱是不多的抗击元颢的将领。他显然是忠于孝庄的。

渤海高氏：[17]

高道穆：尚书三公郎中—吏部郎中—太尉长史领中书舍人—给事黄门侍郎—御史中尉兼黄门侍郎—大都督兼尚书右仆射，南道大行台。

高子儒：秘书郎中—通直郎—司徒中兵参军、国子祭酒。

高翼：东冀州刺史。

高乾：给事黄门侍郎—河北大使。

高昂：通直散骑侍郎—直阁将军—通直常侍、平北将军。

渤海高氏出仕孝庄朝的人数不多而且分属两支。高道穆、高子儒这一支出自西晋高抚，永嘉之乱，逃于高丽。北魏孝文帝时，道穆的祖父迁回辽东，道穆的父亲定居洛阳。这一支与渤海高氏的其他房支来往不多，可能是假托。但高道穆兄弟文化程度已很高，与高门士族袁翻等人交游，已类同于士大夫阶层。高道穆与孝庄帝已是老关系。从他的历官过程，可以看出他是孝庄的心腹。高道穆不仅在政事上干练强谨，而且很注意拉拢人才。《魏书》卷七七《高崇传附高道穆传》：

除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兼御史中尉。寻即真，仍兼黄门。道穆外秉直绳，内参机密，凡是益国利民之事，必以奏闻。谏诤极言，无所顾惮。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李希宗、李绘、阳休之、阳斐、封君义、邢子明、苏淑、宋世良等四十人。

李希宗《魏书》有传，李绘《北齐书》有传，二人都出自北朝大士族赵郡李氏。阳斐《北齐书》有传，渔阳大姓。阳休之《北齐书》有传，无终大姓。宋世良《北齐书》有传，广平大姓。封君义当出自渤海封氏，邢子明当出自河间邢氏，都是当地大姓。《魏书·薛辩传附薛孝通传》，载河东大姓子弟薛孝通为御史，也是高道穆的推荐。前引《魏书·高崇传附高道穆传》，记其在避难时曾往来于东平毕氏。毕

氏，东平大族。可见高道穆早就与河南、河北的大族有来往。对于他们的实力有认识。因而，在条件成熟时引入朝廷，加强孝庄政权在地方上的影响力。

如前所述，高乾父子在冀州有高度的影响力，孝庄很看重，任高乾以亲近的给事黄门侍郎。不幸，尔朱荣对豪族很是提防，不让其接近孝庄帝，只能放回渤海。

博陵崔氏：[18]

崔秉：卫将军。

崔孝芬：东道行台—西兖州刺史—太常卿。

崔巨伦：假节、东濮阳太守—行兖州刺史。

崔孝暐：通直散骑常侍—赵郡太守。

崔孝直：直阁将军、通直散骑常侍。

崔季民：太尉长史。

崔勉：尚书右中兵郎中、太尉谘议参军。

崔秉、孝芬、孝暐都曾做过彭城王勰的幕僚，崔勉也曾被孝庄帝推举为御史。孝庄帝与博陵崔氏有渊源关系，容易发展成密切的关系。因而，崔秉、孝直被任以禁军将领。崔孝芬在元颢北侵时，不但未投降，且斩其大将侯暄，俘三千余人。史称崔巨伦，“元颢入洛，据郡不从”。表明，博陵崔氏拥护孝庄。

清河崔氏：[19]

崔光韶：齐州长史—东道军司—廷尉少卿—太尉长史—廷尉卿。

崔长文：平州刺史。

崔痒：东郡太守—颍川太守。

崔伯凤：都督。

崔子元：秘书郎。

崔叔义：尚书库部郎。

还是以元颢北侵事来说明清河崔氏的向背。《魏书》卷六六《崔亮传附崔光韶传》：

及元颢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风靡。而刺史、广陵王欣集文武以议所从。欣曰：“北海、长乐俱是同堂兄弟，今宗祏不移，我欲受赦，诸君意各如何？”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独抗言曰：“元颢受制梁国，称兵本朝，拔本塞源，以资仇敌，贼臣乱子，旷代少俦，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齿，等荷朝眷，未敢仰从。”长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张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征士张僧皓咸云，“军司议是。”欣乃斩颢使。

崔光韶不同意投降元颢的理由是，元颢受制于萧梁。崔氏的理由并不足以服人。众所周知，孝庄也受制于尔朱荣。其真正的理由是，孝庄在藩时对世家大族的笼络，使他们觉得孝庄才是正统，而元颢不是。崔氏、房氏、张氏为清河大族，他们的意见元欣不能不采纳。崔痒对元颢的招降也是，“拒不从命”。永安末，清河崔氏的另一子弟崔伯凤战死于防御尔朱兆反扑的战役中。这些事例说明了清河崔氏对孝庄政权的拥戴是衷心的。

荥阳郑氏：[20]

郑先护：通常侍—广州刺史—广州刺史、都督襄广诸军事—东雍州刺史—都督二豫东雍三州诸军事—豫州刺史—二豫郢颍四州行台—车骑将军、左卫将军。

郑伯猷：尚书外兵郎中—著作佐郎，典起居注—散骑常侍、平东将军。

郑辑之：黎阳太守—司州别驾。

郑先护是孝庄在藩时的旧亲信。此时，历任都督、行台，坐镇一方，委寄是重的。元颢北逼洛阳时，先护“据州起义兵，不受颢命”。郑辑之时任黎阳太守，“率厉城民，据河击之”。在政治上是拥护孝庄的。

范阳卢氏：[21]

卢同:都官尚书兼七兵尚书—七兵尚书—殿中尚书。

卢义僖：兼都官尚书—卫尉卿。

卢道约：青州长史。

卢文伟：范阳太守。

卢文翼：范阳三城都督。

卢文伟、卢文翼兄弟是地方豪族。卢文伟任范阳太守时，尔朱氏的亲信侯渊驻兵于范阳。尔朱荣死后，卢文伟，“乃诱之出猎，闭门拒之”。可见，卢氏兄弟拥护孝庄而反对尔朱氏集团。

河东裴氏：[22]

裴良:光禄大夫—持节假安西将军、潼关都督，又兼尚书、河东恒农河北宜阳行台。

裴瑗：行并州事—殷州刺史。

裴赍：济州抚军府长史。

裴景颜：广州防蛮别将，行汉光郡事。

裴景融：著作郎。

裴匡：封丘令。

《魏书·裴延儁传附裴景融传》载：“元颢入洛，与刺史郑先护据州起义，事宁，赐爵保城子。”可见，裴景融是支持孝庄的。裴氏在河东有相当的实力，为孝庄所看重。《魏书·裴良传》记：“尔朱荣死，荣从子天光拥众关西，乃诏良持节、假安西将军、潼关都督，又兼尚书，为河东、恒农、河北、宜阳行台以备之。”

陇西辛氏：[23]

辛雄：度支尚书—兼侍中，关西慰劳大使—都官尚书、行河南尹。

辛纂：南道行台—使持节、平东将军、中郎将—荥阳太守。

辛子馥：尚书右主客郎中—持节为南济冀沧济青四州慰劳使—行台郎中、平原相。

辛珍之：司空谘议参军。

先举一例说明辛雄受孝庄重视的程度。《魏书·辛雄传》：“会尔朱荣入洛，及河阴之难，人情未安，雄潜窜不出。庄帝欲以雄为尚书，门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分。’庄帝曰：‘宁失亡而用之，不可失存

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书，加安南将军。’”辛子馥在元颢入洛时，“不受其赦”，是忠于孝庄帝的。

汉族的高门大姓在孝庄帝的积极政策下，纷纷加入了孝庄集团，成为其政权的主要力量。汉族的高门大姓又可粗分为中央化士族和地方豪族。例如，陇西李氏、范阳卢氏的卢同支、陇西辛氏等已经没有了乡里基础，定居于都城，主要靠做官为生。河东裴氏、渤海高氏高翼支、范阳卢氏卢文伟支等居于乡里，有相当的经济、军事实力。

孝庄帝对宗室的任遇更重。

太师：元继。

太保：元徽。

大司马：元彧、元徽、元延明。

司徒：元彧、元徽。

尚书令：元彧、元延明。

录尚书事：元彧、元徽。

尚书左仆射：元谌。

尚书右仆射：元罗。

吏部尚书：元世儁。

侍中：元徽、元谌。

给事黄门侍郎：元昭业。

卫将军：元昭业、元世儁。

直阁：元融、元绪。

北中郎将：元显恭。

御史中尉：元仲景。

司州牧：元继、元徽。

大司农卿：元显恭。

刺史、行台：元暹、元晔、元显恭、元绪、元贵平。

北魏宗室的仕宦之隆是任何汉族高门所难以比拟的。孝庄帝对宗室的团结还表现为对宗室的宽容。《魏书·文成五王子孙传·元鉴传》：“鉴既庸才，诸弟粗暴，见天下多事，遂谋反，降附葛荣。都督源子恭与裴衍合围鉴，斩首传洛，诏改其元氏。庄帝初，许复本族，又特复鉴王爵，赠司空。”[24] 元鉴所犯为反叛之罪，赦免都难。但孝庄帝不仅赦免，而且复爵赠官，是宽容的。元延明在肃宗朝曾告孝庄兄元劭谋反，孝庄即位后不但没报复，反而任延明以尚书令、大司马。孝庄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重血亲关系，力图将宗室作为他对抗尔朱氏的核心力量。

综上所述，北魏宗室长乐王元子攸，在内政混乱，动乱蜂起的危急状况下，为重振元魏政权做了相当的努力。首先，他注意拉拢汉族官僚的优秀子弟，扩展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与政治资本。在登基之后，他继续联络汉族的中央士族与地方豪族，使这两股力量，成为政权最主要的支柱。对于宗室，他委以重任。对于尔朱氏的势力，他着意分化。但是孝庄政权仍然不能脱离尔朱集团而独立，因为孝庄政权并没有足以对抗国内风起云涌的叛乱的实力。

孝庄帝与尔朱荣虽然暂时取得了妥协，北魏朝廷趋于稳定，但是国内的形势却不容乐观。北镇起义军已经逼近邺城，秦陇义军也逼近岐州。孝庄是四月登基，六月份，邢杲在青州起义。这三支起义军同时存在，显然对刚刚建立的孝庄政权构成严重威胁。下面我们就北魏政府军的表现列举如下。葛荣义军没有与孝庄时期的北魏政府军对抗，但可以将其与此前的北魏军队的战绩列出。据《魏书·肃宗纪》，孝昌三年十一月葛荣攻陷冀州，俘虏刺史元孚，十二月北魏都督源子邕、裴衍战死于阳平郡，第二年春定州被攻陷，瀛州刺史投降义军，三月葛荣攻陷沧州。[25] 北镇义军在五个月之内连下河北四州，说明北魏政府军已经无法有效抵挡义军攻势，更不要说平叛了。再看关陇形势，据《魏书·毕祖晖传》，北魏豳州刺史毕祖晖企图收复豳州，结果“兵少粮竭，军援不至，为贼所乘，遂殁”[26]。又据《魏书·庄帝纪》，永安二年九月，万俟丑奴攻下汧城，杀东秦州刺史高子朗。永安三年三月，秦陇义军包围岐州。[27] 可见在关陇，北魏政府军也是节节失利。邢杲起兵后，北魏派李叔仁讨伐，结果失败而还。以上事实说明，在孝庄登基之前北魏政府军的主力已经损失殆尽，所以孝庄帝并没有可靠的军队来保护政权。孝庄政权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它要想平叛就必须依靠尔朱荣的武力。

三 孝庄政权败亡的原因

尔朱集团必须通过孝庄来控制政权，而孝庄政权也须由尔朱集团的军队来保护，因而，在孝庄政权建立之初，北魏朝廷与尔朱集团就取得了相对的稳定状态。但是平衡很快就被破坏了，尔朱荣虽然放弃了皇位，但未放弃对孝庄帝的控制。他对朝廷的控制采用两手：一是直接安插亲信进入要害部门；二是间接打击孝庄帝的势力。

尔朱荣安插的最主要人物是他的从弟尔朱世隆。《魏书·尔朱世隆传》："建义初，除给事黄门侍郎。庄帝即位，乃除侍中、领军将军、左卫将军、领左右、肆州大中正……又除车骑将军，兼领军，俄授左光禄大夫，兼尚书右仆射，寻既真……除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摄选，左右厢出入。"[28] 尔朱世隆起初负责门下省与禁军，后来负责尚书省。也就是说，他监视孝庄政府的决策，以及政务的处理。朱瑞被安排在门下省，《魏书·朱瑞传》："建义初，除黄门侍郎，仍中书舍人。荣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门下"[29] 。樊子鹄被安排在了三省。[30] 贺拔胜、贺拔岳兄弟是尔朱荣的亲信将领，也被安插在禁军中。[31] 御史台是皇权的一个重要支柱，尔朱荣对它也未忽略。《魏书·高崇传附高道穆传》载："及尔朱荣之死也，帝召道穆付敕书……因谓之曰：'自今日后，当得精选御史矣。'先是，荣常欲以其亲党为御史，故有此诏。"[32] 以上事实说明了，尔朱荣对皇权的四大支柱：门下省、尚书省、禁军、御史台，是力图控制的。

尔朱荣向孝庄帝的亲信施加压力，使他们沉默或者不敢担任要害部门的职位，从而达到孤立孝庄帝，巩固自己势力的目的。《魏书》卷一九下《景穆十二王传下城阳王徽传》：

徽表辞官封，前后屡上。又启云，"河上之功，将士之力，求回所封，加诸勋义。"徽为庄帝所亲待，内惧荣宠，故有此辞，以防外议。

《北齐书》卷二一《高乾传》：

朝廷以乾为给事黄门侍郎。尔朱荣以乾前罪，不应复居近要，庄帝听乾解官归乡里。

《魏书》卷六〇《韩麒麟传附韩子熙传》：

尔朱荣之擒葛荣也，送至京师，庄帝欲面见数之。子熙以为荣即元凶，自知必死，恐或不逊，无宜见之。尔朱荣闻之大怒，请罪子熙。

随着尔朱集团对北镇、秦陇、邢杲势力的平定，牵制尔朱荣的势力减弱了，形势变得对孝庄不利。他对孝庄帝所施加的压力愈发变本加厉。《北史》卷四八《尔朱荣传》：

（尔朱荣）及见四方无事，乃遣人奏曰：“参军许周劝臣取九锡，臣恶其此言，已发遣令去。”荣时望得殊礼，故以意讽朝廷。帝实不欲与之，因称其忠。荣见帝年长明悟，为众所归，欲移自近，皆使由己。每因醉云，入将天子，拜谒金陵后，还复恒朔。而侍中朱元龙辄从尚书索太和中迁京故事，于是复有移都消息。

针对尔朱荣的逼迫，孝庄帝也做了策反的工作。据上文，朱瑞、樊子鹄、贺拔胜是尔朱荣安插在孝庄身边，监视孝庄的亲信。但尔朱荣死后，他们一度投靠了孝庄帝。这是什么原因呢？用朱瑞的事例说明一下。《魏书·朱瑞传》：“尔朱荣死，瑞与世隆俱北走。既而以庄帝待之素厚，且见世隆等并无雄才，终当丧败，于路乃还。”[33] 朱瑞改投靠孝庄，部分是因为孝庄平日待他好。推而广之，樊、贺的投诚，也有孝庄平日着意笼络原因。但是随着尔朱荣势力的增加，孝庄帝的焦虑感在日益增加着。《北史·尔朱荣传》：“庄帝恒不虑外寇，唯恐荣为逆，常时诸方未定，欲使与之相持，及告捷之日，乃不甚喜……”最后采取了极端的手段，“荣乃暂来向京，言看皇后娩难。帝惩河阴之事，终恐难保，乃与城阳王徽、侍中杨侃、李彧、尚书右仆射元罗谋，皆劝帝刺杀之”[34] 。

尔朱荣的被刺，固然避免了北魏政权被尔朱荣篡夺的危险，而且导致了尔朱集团的灭亡，但是对于孝庄朝廷这无异于饮鸩止渴。正如上文所论，孝庄朝廷实际上并没有可靠的军队，所以一旦失去尔朱集团的保护，这个朝廷也就被推翻了。

在尔朱霸府与孝庄政权之间，实际上尔朱氏掌握主动权。对于尔朱荣来说，在对待孝庄帝的策略上太简单粗暴，把孝庄逼上了绝路。这是他在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对于孝庄帝来说虽然处于被动地位，但也不是没有转圜的机会。比如说地方豪族是支持孝庄政权的。《北齐书》卷二一、卷二二记载了孝庄帝被杀后，河北豪族群起为之报仇的事实。起事的豪族有渤海高乾兄弟、渤海封隆之、赵郡李元忠、李密、李愍、范阳卢文伟。这些人首先凭借庞大的宗族力量立足于本州郡；其次，通过减免债务、赈济获得了基层民众的好感；他们还收养、交结无业游民、豪侠之士，拥有相当的武力。再比如，北镇人物与契胡势力不是没有冲突，可以加以利用。但是事实上这些机会孝庄政权的决策阶层并不重视。豪族是孝庄政权最需要的社会势力，遗憾的是二者未能顺畅地结合。客观上，尔朱兆南下速度太快，河北豪族来不及勤王。主观上，孝庄对豪族缺乏了解，未能重用。据《魏书·孝

庄纪》，尔朱荣死后，尔朱兆自晋阳，尔朱仲远自彭城反扑。当时，奚毅、侯渊、杨津、源子恭、元显恭、薛善乐、薛修义、裴元儁、薛崇礼、薛憘族等被派往北线，防御尔朱兆、尔朱世隆。郑先护、李侃希、杨昱、贺拔胜防御尔朱仲远。结果是非败即降。对派往河北地区“召集骁勇”的高乾却被任以“侍中、河北大使”这样的虚职，使得高乾回到河北后作为不大。其次李元忠、李愍、卢文伟官才至太守，尔朱荣死后，也未见加封，足见是不重视的了。[35]

《周书·贺拔胜传》：“及荣被诛，事起仓卒，胜复随世隆至于河桥。胜以为臣无仇君之意，遂勒所部还都谒帝。大悦，以本官假骠骑大将军东征都督，率骑一千，会郑先护讨尔朱仲远。为先护所疑，置之营外，人马未得休息。俄而仲远兵至，与战不利，乃降之。”[36] 综合引文与本书第一章第三节所论，北镇势力与契胡势力是有隔阂的，如果处置适当完全可以利用北镇防御契胡。但是从郑先护对贺拔胜的态度来看，洛阳官僚其实对北镇势力成见甚深，没有与之精诚合作的远见。

孝庄政权为什么在尔朱集团的压力下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比如说团结地方豪族武力和北镇降将？这是由孝庄朝廷的性质决定的。孝庄朝廷的性质是文官化，孝庄朝廷的决策层的特征是贵族化。

孝庄帝登基后显示了刷新政治的积极态势，但是他的朝廷仍然保留了孝文帝改革后北魏朝廷的性质。孝庄朝廷的尚书令、录尚书事元彧，“美风韵，善进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则。博览群书，不为章句”[37]。吏部尚书李神儁，“风韵秀举，博学多闻”[38]。以上两位官员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学者。侍中杨侃，“颇爱琴书”是有一定知识修养的，史书又记“尤好计画”说明是一个谋略家。杨侃本人也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但是，在孝庄政权中他并没有就建军问题提出建议，而是就当时钱币“人多私铸，稍就薄小”的问题提出铸造五铢钱的建议。[39] 御史中尉高道穆，“学涉经史，非名流儁士，不与交结”。看来高氏本人也是名流学者。在孝庄朝廷时期，高道穆先后就“用钱稍薄”，设置“廷尉司直”等问题提出建议。[40] 可见杨、高二人的才能主要表现为行政才能，而不是政治才能。可以说以上两类人才代表了孝庄朝廷内官僚的主要类型。这两类人才是和平时期文官化朝廷的优秀人选，但不具备处理非常情况的政治才能。

士族官僚还不是孝庄朝廷的致命伤，其决策阶层的贵族化将孝庄朝廷引向了死胡同。作为一个年轻的皇族成员，孝庄帝对宗室过于信任，对于宗室的分化状态、政治能力认识不清；元子攸生长在洛阳浓郁的汉文化氛围中，他所认同的是士族的观念与生活，因而，在汉族官僚之中，他比较重用中央士族，对地方豪族有隔膜，利用不足。

元魏宗室经过上百年的繁衍，到魏末，已经成为一个支系繁杂，人口众多的特殊阶层。由于在历次政治斗争中，各个支系的遭际不同，使得各支系在经济、政治待遇上差别相当不同，甚至有天壤之别。孝文帝的改革明确了宗室内的亲疏之别，使得分化加剧了，疏支的政治、经济地位的降低尤其明显。这种差距自然造成了宗室的离心离德。有些宗室的成功，不是因为身份，而是机遇、能力。所以，当机会来临时，他们往往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及元魏政权的安危。质言之，他们是以官僚的身份，而不是以宗室的身份看待元魏政权。因而，一些宗室虽然并没受到孝庄的冷遇，虽然受到重用，但他们仍然在危急关头投降了尔朱氏集团，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孝庄帝的失败。《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子孙元鸷传》：

武泰元年，尔朱荣至河阴，杀戮朝士，鸷与荣登高冢俯而观之，自此后与荣合……庄帝既杀尔朱荣，荣从子兆为乱，帝欲率诸军亲讨，鸷与兆阴通，乃劝帝曰：‘黄河万仞，宁可卒渡。’帝遂自安。及兆入殿，鸷又约止卫兵。帝见逼，京邑破，皆由鸷之谋。

《魏书》卷一九中《景穆十二王中元世儁传》：

尔朱兆寇京师，诏世儁以本官为都督，防守河桥。及兆至河，世儁初无据守意，便隔岸遥拜，时论疾之。

孝庄不仅未能了解宗室的分化状态，对于宗室的政治素质也没有深刻的认识。城阳王元徽是孝庄最信任的宗室，“宗室亲戚没与比焉”，而且委以重任，“除徽太保仍大司马、宗师、录尚书事，总统内外”。但元徽的政治素质实在是差。《魏书·景穆十二王下城阳王徽传》：“及尔朱宗族，聚结谋难，徽算略无出，忧怖而已。性多嫉妒，不欲人居其前。每入参谋议，独与帝决。朝臣有上军国筹策者，并劝帝不纳，乃云小贼何虞不除。又吝惜财用，自家及国。于是有所赏锡，咸出薄少，或多而中减，与而复追。徒有靡费，恩不感物。”[41] 元徽的基本性格特征是怯懦、妒忌、吝啬。具备这样性格的执政大臣，其行为的结果是大臣们的离心离德。这正是孝庄政权解体的原因之一。元彧，是孝庄的另一位亲信大臣。他被尔朱兆的士兵活活打死，是有气节的。元彧气质高雅、学识渊博，是个贵族学者。但作为“尚书令、大司马兼录尚书事”，他的政治素质却是平庸的。史称：“然居官不能清白，所进举止于亲娅，为识者所讥。”[42]

元徽、元彧的事例反映了日渐贵族化的宗室的生存状态。一方面，他们受皇帝宠信，仕宦显达，收入丰厚。在丰奢的生活享受中，他们的气质和体质都文弱化了。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圈子狭小，限制了他们政治视野，束缚了他们的政治实践能力。孝庄让这样的人领袖群

臣，其结果必然使政权削弱。

陇西李氏、弘农杨氏，在孝庄政权中的地位仅次于宗室。两族都是中央化、官僚化的士族。《魏书·外戚传下》记李延寔亡于青州，葬于洛阳。[43] 李延寔不葬于陇西而葬于洛阳，是其家族中央化的重要标志。《魏书·杨播传附杨椿传》记载了杨椿的一段家训："我家入魏之始，即为上客，给田宅，赐奴婢马牛羊，遂成富室。自尔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绝，禄恤甚多。"让杨椿得意的不是田宅广大，而是"禄恤甚多"，重视俸禄，也是士族官僚化的标志。在富足之后，杨椿提到处理社会关系，"至于亲姻知故，吉凶之际，必厚加赠襚；来往宾僚，必以酒肉饮食。是故亲姻朋友无憾焉"[44] 。这里没有提到宗族乡党，可知杨氏是中央化了。

中央化、官僚化的士族对于中央集权是有利的。但孝庄政权面临严重的军事压力，应对这些挑战应该有雄厚的社会势力的支持。而中央化、官僚化的士族恰恰缺少与基层社会的联系。一旦政权出现危机，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看其灭亡或与其同归于尽。《魏书》卷三九《李宝传附李泳传》：

前废帝时，与第三弟通直散骑常侍义真，第七弟中书侍郎、太常少卿义邕，同时为尔朱仲远所害。义邕，庄帝居蕃之日，以外亲甚见亲昵，及有天下，特蒙信任，尔朱荣之诛，义邕与其事，由是并及于祸。

《魏书》卷五八《杨播传》：

世隆将害椿家，诬其为逆，奏请收治。前废帝不许，世隆复苦执，不得已，下诏付有司检闻。世隆遂遣步骑夜围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于华阴。东西两家，无少长皆遇祸，籍其家。

以上事实说明，孝庄朝廷的决策者们缺乏应对非常情况的政治远见，缺乏对基层社会的了解，因而在政权遭遇武力打击时不知如何整合社会资源以对抗外来武力。

四 小结

元子攸之所以成为皇帝，主要靠两大势力的支持。即，尔朱氏集团和洛阳官僚。尔朱荣利用元子攸是显然的，事实上，拥戴元子攸的是洛阳官僚。在尔朱荣死后，孝庄政权的主要成员是洛阳官僚。也就是说，孝庄政权基本上得到北魏各阶层的支持。于此才能解释孝庄死后河北豪族群起为之复仇的现象。虽然孝庄政权的正统性得到确认，无

可替代，并因而获得广泛的支持，但是孝庄政权却没有相应的军队来保卫，所以孝庄政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权，需要武力集团的合作。只有尔朱荣的武力与孝庄帝的皇权结合才能组成完整的政权。但是无论尔朱荣还是孝庄帝都急于夺取对方的权力从而独占政权。就孝庄政权的决策者而言，不足以制定实施壮大北魏朝廷的策略。这是由以孝庄帝为首的决策者的固有缺陷决定的。这批人其实是北魏朝廷贵族化官僚的代表。他们在舒适的生活环境中长大，对社会了解不深，对政治形势更是茫然无知。贵族化官僚不但对尔朱集团无能为力，而且他们也缺乏重用地方豪族的魄力。所以在尔朱荣的逼迫下，官僚选择了刺杀尔朱荣的极端策略，他们没想到，失去尔朱荣的庇护，孝庄政权也就灭亡了。

第二节 北魏孝武帝与东西魏分裂

一 元脩与高欢

532年闰三月，高欢在韩陵大败尔朱氏军队。尔朱兆撤回并州，尔朱仲远逃往江淮，尔朱天光、尔朱度律逃往洛阳。四月，尔朱将帅斛斯椿等活捉尔朱天光与尔朱度律，投降高欢；贾显智等人斩杀尔朱世隆、尔朱彦伯，向高欢投降。高欢随即率兵赶到洛阳，连废中兴主、节闵帝，拥立宗室元脩为皇帝，史称魏孝武帝、魏出帝。本书将就元脩上台的原因、过程；元脩上台后怎样组织力量对抗高欢；元脩西逃关中后对历史的影响等三个问题试加论述。

韩陵之战结束后，高欢没有对尔朱氏主力尔朱兆的军队予以追歼，而是先占据洛阳。其意图是明显的，即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高欢面临选择：继续拥立中兴主元朗，还是拥立节闵帝？据《魏书·出帝平阳王传》："中兴二年夏四月，安定王自以疏远，未允四海之心，请逊大位。齐献武王与百僚会议，佥谓高祖不可无后，乃共奉王。"[45] 引文之中的安定王就是中兴主元朗，他自感与皇室嫡系的血亲关系较疏远，因而要求退位。据引文，皇帝的正当人选应该从高祖孝文皇帝的子孙中产生。

那么，是不是只有高祖孝文皇帝的子孙才有资格做皇帝呢？历史显示这并不是唯一选择。先看孝庄帝，他是孝文帝的弟弟彭城王元勰的儿子，不是孝文帝的儿子。在尔朱荣举兵之后，曾为拥立问题占卜过一次，"乃以铜铸高祖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成者当奉为主"[46]。这说明孝文帝及其兄弟的子孙都有候选皇位的资格。再看北海王元颢，他曾攻下洛阳，自立为皇帝，其时，"颢以数千之众，转战辄克，据有都邑，号令自己。天下人情，想其风政"。说明当时的朝野并未因为元颢非孝文帝子孙就反对他。还可以再看孝闵帝的上台情形。《魏书》卷七五《尔朱世隆传》：

时仲远亦自滑台入京，世隆与兄弟密谋，以元晔疏远，欲推立前废帝。而尔朱度律意在宝炬，乃曰："广陵不言，何以主天下？"世隆兄彦伯密相敦喻，乃与度律同往龙花佛寺观之，后知能语，遂行废立。

尔朱氏杀孝庄之后，提出三位皇帝人选：元晔、元恭、元宝炬。元晔的曾祖父是景穆太子，祖父是南安王元桢；元恭的祖父是献文帝，父亲是广陵王元羽；元宝炬是孝文帝的孙子，京兆王元愉的儿子。三人之中元宝炬的血统最为亲近。但是尔朱氏所拥立不是孝文子孙元宝炬，而是元恭，即节闵帝、前废帝。可见，军阀在选择拥立对象时并

不是以血统为唯一标准。

元晔、元朗血统过于疏远，只可暂时利用，若号令全国，就显得影响力不够，因而被废。但节闵帝的社会号召力相当强，为什么被废呢？在讨论废立问题时，大臣綦俊站出来力保节闵帝，他说："人主之体，必须度量深远，明哲仁恕。广陵王遇世艰难，不言淹载，以人谋察之，虽为尔朱扶戴，当今之圣主也。"《魏书》卷八一，第1791页。在綦俊的辩护之中，他认为血统不是问题所以没提，他是有点担心节闵帝为尔朱氏拥立这个历史瑕疵。正如他所担心，高欢阵营中也有人对节闵帝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河北士族崔㥄斥道："若其明圣，自可待我高王，徐登九五。既为逆胡所立，何得犹作天子。若从俊言，王师何名义举？"《北齐书》卷二三，第333页。《北齐书》卷二三《魏兰根传》：

及高祖将入洛阳，遣兰根先至京师。时废立未决，令兰根观察魏前废帝。帝神采高明，兰根恐于后难测，遂与高乾兄弟及黄门崔㥄同心固请于高祖，言废帝本是胡贼所推，今若仍立，于理不允。高祖不得已，遂立武帝。废帝素有德业，而为兰根等构毁，深为时论所非。

高欢废掉节闵帝是必然的，因为尔朱集团的所有行为都是假借节闵帝的旨意。如果反对尔朱氏不反对节闵帝，这无异于否定高欢起兵的合法性。所以，高欢必须重新拥立皇帝以说明自己权力的合法性。

旧主既然必须抛弃，那么新帝的人选就应提出讨论。同时也应公布一个令人信服的标准。于是，"高祖不可无后"的目标就被制定出来了。在此标准之下果然不包括元朗与节闵。在当时，孝文帝的儿子元悦还在人间。于是高欢派人到梁朝将元悦接回。结果大失所望，元悦是"清狂如故"，精神有点不大健康。[47] 于是只能在孝文帝的孙子辈中寻觅。但这已经不是容易完成的任务。《北史》卷五《魏孝武帝纪》：

孝武皇帝讳修，字孝则，广平武穆王怀之第三子也。母曰李氏。帝性沈厚，学涉，好武事，遍体有鳞文。年十八，封汝阳县公。梦人有从讳谓己曰："汝当大贵，得二十五年。"永安三年，封平阳王。普泰中，为侍中、尚书左仆射。

中兴二年，高欢既败尔朱氏，废帝自以疏远，请逊大位。欢乃与百僚议，以孝文不可无后，时召汝南王悦于梁，至，将立之，宿昔而止。又诸王皆逃匿，帝在田舍。先是，嵩山道士潘弥望见洛阳城西有天子气，候之乃帝也。于是造第密言之。居五旬而高欢使斛斯椿求帝。椿从帝所亲王思政见帝，帝变色曰："非卖我耶？"椿遂以白欢。欢遣四

百骑奉迎帝入氈帐，陈诚，泣下沾襟。让以寡德。欢再拜，帝亦拜。欢出，备服御，进汤沐。达夜严警。昧爽，文武执鞭以朝。使斛斯椿奉劝进表。椿入帷门，罄折延首而不敢前。帝令思政取表，曰："视，便不得不称朕矣。"于是假废帝安定王诏策而禅位焉。

经过五次三番的废立，宗室已经看清军阀们的野心，于是皇位就成为他们纷纷逃避的苦差。高欢只有在元脩亲信王思政的引见下才找到他。而且元脩对于当选为皇帝并不惊喜反而忧心忡忡。

其时元脩已23岁，可以说年富力强，为什么高欢不找年小或懦弱者呢？一是因为诸王逃避不好挑选。二来，客观形势不允许高欢在洛阳久留。531年二月，高欢率北镇流民赶到信都寄食，被河北大族拥为主帅。六月从信都起兵，经过广阿之战站稳脚跟。第二年正月攻下邺城，闰三月在韩陵战败尔朱联军。此刻的高欢军队已经过了一年零两个月的征战，而未经修整。新夺取的土地，还未能巩固统治。其时，尔朱氏的根据地并州尚在尔朱兆手中。如果让尔朱氏缓过劲来，高欢必得面临严重挑战。因此，高欢必得赶回邺城巩固地盘，修整军队，以图并州。当年7月，高欢平定并州，迁大丞相府于晋阳，建立了根据地。到第二年正月，高欢偷袭秀容，尔朱兆自杀，至此高欢才算稳固了后方。[48] 高欢力图将并肆汾地区建成北镇鲜卑的聚居地，以保证军队有足够的善于骑射的武士，所以他一直致力于这个目标而对洛阳政权只是交给若干亲信监视。于是，在两年之间，孝武帝就获得机会集结各种反对高欢的势力。综上所述，孝武帝的拥立过程与孝庄帝不同，孝庄帝在藩时期就有一批支持者，并在朝野享有盛誉，所以他的上台有相当大的主动性，而孝武帝是在高欢的挑选中，被选中的候选人之一，他完全是被动的。这反映了北魏皇权相对于霸权的进一步衰落。在高欢方面，可以看出由于河北士族的协助，在拥立问题上表现了比尔朱氏更成熟的政治见识。

二 孝武政权的构成及特点

虽然孝武帝是高欢所拥立，但是高欢废立皇帝的行为显然超出了一个大臣所应有的权力，证明了自己是北魏皇权的威胁者而非卫士。高欢可以废元朗、元恭，当然也可以废元脩，甚至可以取元魏而代之。元脩要么选择做汉献帝，要么与高欢一搏。在其时，正有一股势力对高欢的得势耿耿于怀。《北史》卷三六《薛孝通传》：

孝武即位后，神武方得志，征贺拔岳为冀州刺史。岳惧，欲单马入朝。孝通乃谓岳曰："高王以数千鲜卑破尔朱百万之众，其锋诚亦难敌。然公两兄太师、领军，宿在其上。侯深、樊子鹄、贾智、斛斯椿、大野胡也杖、吒吕延庆之徒，于尔朱之世，皆其夷等。韩陵之

役，此辈前后降附，皆由事势危逼，非其本心。在于高王，曹操之孔融，马懿之葛诞。今或在京师，或据州镇，除之又失人望，留之腹心之疾。虽令孙腾在阙下，娄昭处钩陈，必不能如建安之时，明矣。”

《北齐书》卷二一《封隆之传》：

时高祖自洛还师于邺。隆之将赴都，因过谒见，启高祖曰：“斛斯椿、贺拔胜、贾显智等往事尔朱，中复乘阻，及讨仲远，又与之同，猜忌之人，志欲无限。又叱列延庆、侯。念贤皆在京师，王授以名位，此等必构祸隙。

薛孝通是贺拔岳的幕僚，封隆之是高欢的智囊，两个人从不同的立场分析了当时的政局，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曾经与高欢名位相当的尔朱将帅成为高欢控制朝廷的主要对手，而高欢要建设晋北军事基地无暇南顾。这样孝武帝就成功地与尔朱将帅联合了。《魏书》卷八〇《斛斯椿传》：

初献武王之入洛，顿于邙山，尔朱仲远帐下都督桥宁、张子期自滑台而至。献武王责宁等曰：“汝事仲远，擅其荣利，盟契百重，许同生死。前仲远自徐为逆，汝为戎首，今仲远南走，汝复背之。于臣节则不忠，论事人则无信。犬马尚识恩养，汝今犬马之不如！”遂斩之。椿自以数为反覆，见宁等之死，意常不安。遂密构间，劝出帝置阁内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数，自直阁已下员别数百，皆选天下轻剽者以充之。又说帝数出游幸，号令部曲，别为行阵，椿自约勒，指挥其间。从此以后，军谋行政，一决于椿。

正如薛、封二人所论断，高欢掌权之后，原尔朱亲信势力便感到如芒在背。斛斯椿取得武帝信任之后，便启用尔朱将帅来与高欢抗衡。《魏书·贺拔胜传》：“太昌初，拜领军将军，余官如故，又除侍中。出帝既纳斛斯椿等谗间之说，将谋齐献武王，以胜弟岳拥众关西，仍欲广为势援，除胜使持节、侍中、都督三荆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49] 孝武与斛斯椿将贺拔胜安置于荆州是想与胜弟贺拔岳的关陇辖区连接，形成一个较为有实力的后方。

尔朱天光被杀之后，关陇实际由贺拔岳控制。在当时，他是较有实力与高欢抗衡的人物。因而孝武帝对待他相当殷勤。《北齐书·高乾传》：“武帝置部曲，乾乃谓所亲曰：‘主上不亲勋贤，而招集群竖。数遣元士弼，王思政往来关西，与贺拔岳计议。又出贺拔胜为荆州刺史，外示疏忌，实欲树党，令其兄弟相近，冀据有西方。祸难将作，必及于我。’”[50] 这是高乾对孝武上台后时局变动的分析。所谓勋贤

指高欢，群竖指尔朱将帅及其他亲附孝武的大臣。

派往关陇与贺拔岳联系的元士弼是元魏宗室。而宗室也是孝武帝重用的人群之一。例如元毗，《北史·元毗传》记，“武帝之在藩邸，少亲之，及即位，出必陪乘，入于卧内”[51] ，是其心腹。下面看一下孝武时宗室的任职情况：

尚书令：元罗、元宝炬。

录尚书事：元谌。

尚书左丞：元玄。

给事黄门侍郎：元昭业。

直阁将军：元景暄。

卫将军：元昭业。

中军四面大都督：元宝炬。

司州牧：元湛。

河南尹：元仲景。

青州刺史：元贵平。

梁州刺史：元罗。

北徐州刺史：元忻之。

兖州刺史：元嶷。

由以上任职可以观察到孝武帝力图让宗室掌握尚书省、中书省、禁军、洛阳及河南地区的意图。孝武帝似乎对尚武的宗室特别亲任。史称元贵平，“人才险薄”[52] 。孝武帝的心腹元斌“性险无行”[53] 。可见孝武对于宗室不能掌握兵权是不满意的，所以力图在宗室中寻找军事人才。宗室在孝武帝的支持下与高欢势力一开始就处于对立状态。《北史》卷五《西魏文帝纪》：

帝性强果，始为太尉时，侍中高隆之恃勃海王高欢之党，骄狎公卿。因公会，帝劝酒不饮，怒而殴之，骂曰：“镇兵，何敢尔也！”孝武以欢故，免帝太尉，归第，命羽林守卫，月余复位。及欢将改葬其父，

朝廷追赠太师，百僚会吊者尽拜。帝独不屈，曰：“安有生三公而拜赠太师耶！”

元宝炬之殴打高隆之是在永熙元年六月，孝武登极两个月之后。其原因是元宝炬看不惯高欢的亲信高隆之的暴发户嘴脸。在对此事的处理上孝武帝和高欢都比较克制，但对各自的亲信持袒护的态度，因而冲突就不断发生。《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元玄传》：

后除尚书左丞。出帝即位，以孙腾为左仆射，腾即齐献武王心膂。仗入省，玄依法举劾，当时咸为玄惧，出帝重其强正，封临淄县子。

《北史》卷六《神武纪下》：

魏帝既有异图，时侍中封隆之与孙腾私言，隆之丧妻，魏帝欲妻以妹。腾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于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孙腾带杖入省，擅杀御史。并亡来奔。称魏帝挝舍人梁续于前，光禄少卿元子幹攘臂击之，谓腾曰：“语尔高王，元家儿拳正如此。”领军娄昭辞疾归晋阳。

此时约在永熙三年二月。看来孝武亲信与高欢亲信的矛盾是越来越激烈，迫使高欢亲信逃回到了晋阳。在反高浪潮中宗室是急先锋。

孝武帝还团结了一部分洛阳官僚。其中有人早在孝武为藩王时就与之订交了。比如宇文显和与王思政。《周书》卷四〇《宇文神举传附显和传》：

宇文神举，太祖之族子也。高祖晋陵，曾祖求男，仕魏，位并显达。祖金殿，魏镇远将军、兖州刺史、安吉县侯。

父显和，少而袭爵，性矜严，颇涉经史，膂力绝人，弯弓数百斤，能左右驰射。魏孝武之在藩也，显和早蒙眷遇。时属多难，尝问计于显和。显和具陈宜杜门晦迹，相时而动。孝武深纳焉。

《周书》卷一八《王思政传》：

王思政字思政，太原祁人。容貌魁伟，有筹策。魏正光中，解褐员外散骑侍郎，属万俟丑奴、宿勤明达等扰乱关右，北海王颢率兵讨之，启思政随军。军事所有谋议，并与之参详。

时魏孝武在藩，素闻其名，颢军还，乃引为宾客，遇之甚厚。

从宇文显和父祖的历官看，这个家族是鲜卑贵族家庭。王思政的父祖

历官不详，可能是假冒太原王氏，然观其起家官，可能出自中级官僚家庭。孝庄帝为藩王时多与士族子弟交往，而孝武帝则多与有武功韬略者来往。这种差异可以认为孝庄帝性好风雅而孝武性喜武事。进一步探究，这种差异，反映了时代的不同。孝庄在藩时，天下还算承平，洛阳的汉化已达顶峰，在这一种氛围之下，孝庄帝自然会与士族为伍。而孝武封王在永安三年，其时尔朱氏已经残害百官，在这一种形势之下，宗室自然看到了武力在乱世中的价值。孝武就极力与武人为伍。孝武登基之后，二人也就成为左右的心腹。史称孝武以显和，“藩邸之旧，遇之甚厚”。对于思政，“委以心膂”。

孝武在位时，洛阳的鲜卑贵族也加入了孝武阵营。魏初的功臣长孙道生的后代长孙稚、长孙子彦也是孝武帝倚重的人。《魏书》卷二五《长孙稚传》：

出帝初，转太傅，录尚书事。以定策功，更封开国子……出帝入关，稚时镇虎牢，亦随赴长安。

子彦，本名儁，有膂力。以累从父征讨功，封槐里县子。出帝与献武王构隙，加子彦中军大都督、行台仆射，镇弘农，以为心膂。后从帝入关。

宇文测、宇文深兄弟的高祖中山、曾祖豆颓、祖父骐、父亲永，其具体历官不详，但从世系推断，应该是随道武帝入塞的小贵族。《周书》卷二七《宇文测传》：

测性沈密，少笃学，每旬月不窥户牖。起家奉朝请、殿中侍御史，累迁司徒右长史，安东将军，尚宣武女阳平公主、拜驸马都尉。及魏孝武疑齐神武有异图，诏测诣太祖言，令密为之备。

从宇文测的传记，可以看出他已经是汉化了的鲜卑贵族。因为与皇室的婚姻而为孝武帝重用。

以上孝武帝所任用的人物，都是洛阳官僚或其子弟。这些官僚与孝庄帝所任用的人物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他们都具有实际的才干，而且偏重于军事方面的能力。

虽然孝武帝成功地集结了一批社会势力，但他并不是总能成功。在争取河北士族的努力之中他失利了。这里所提之山东士族专指与高欢结盟对抗尔朱氏的山东士族。孝武称帝后，这些大族人物一般在洛阳政府出任要职。这一批有深厚地方势力的大族显然会引起孝武帝的关注，但是二者却陷入了怪圈之中。孝武帝最先与原尔朱将帅联盟。但

山东士族是在反抗尔朱氏的斗争中兴起的，所以山东士族与尔朱将帅的关系不可能融洽。这样孝武帝就陷入了尴尬。高欢在羽翼未丰之时，对山东士族尽拉拢之能事，但尔朱氏败亡后，高欢对强大的山东士族的态度也变得暧昧。夹于孝武帝与高欢之间的山东士族也很难受。于是就有了高乾的悲剧。《北齐书》卷二一《高乾传》：

武帝将贰于高祖，望乾为己用，曾于华林园宴罢，独留乾，谓之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复建殊效，相与虽则君臣，实亦义同兄弟，宜共立盟约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事出仓促，又不谓武帝便有异图，遂不固辞，而不启高祖。及武帝置部曲，乾乃私谓所亲曰……乃密启高祖。高祖召乾诣并州，面论时事，乾因劝高祖以受魏禅。高祖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启司空复为侍中，门下之事，一以相委。"高祖屡启，诏书竟不施行。

乾以频请不遂，知变难将起，密启高祖，求为徐州……指期将发，而帝知乾泄漏前事，乃诏高祖云："曾与乾邕私有盟约，今复反覆两端。"高祖便取乾前后数启论时事者，遣使封送武帝。帝召乾邕示之，禁于门下省，对高祖使人，责乾邕前后之失……遂赐死。

高乾之死，使得山东士族对于孝武政权产生了抵触情绪。同时孝武帝对于山东士族的不合作态度也失去了耐心，任由斛斯椿疯狂打击。《北齐书》卷二一《封隆之传》：

后为斛斯椿等构之于魏帝，逃归乡里。高祖知其被诬，召赴晋阳。

《北齐书》卷二三《魏兰根传》：

高乾之死，兰根惧，去宅，避于寺。武帝大加谴责，兰根忧怖，移病解仆射。

《北齐书》卷二三《崔㥄传》：

居门下，恃预义旗，颇自矜纵。寻以贪污为御史纠劾，因逃还乡里，遇赦始出。高祖以㥄本预义旗，复其黄门。

山东士族受到孝武压迫时并没有逃往晋阳，这与高欢心腹孙腾、高隆之的动向不同，说明了山东士族与高欢之间未必没有隔膜，所以不敢贸然去投，怕落得高乾的下场。高欢明白山东士族仓皇的心态，就出面予以保护，将其势力收归幕府。孝武帝因为处理失当，也就失去了山东士族的支持。

没有吸收到山东士族，孝武帝手中可以与高欢一决的就只有尔朱将帅了。斛斯椿的计划是，由宇文泰控制关陇；贺拔胜控制洛阳正南、西南地区；樊子鹄任兖州刺史，侯渊任齐州刺史，大野拔任南青州刺史，元贵平任青州刺史控制河南地区。从关西、河南夹击高欢所控制的河东、河北地区。如果以上将领能够服从孝武政权统一调配，同仇敌忾，即使不能消灭高欢，也足以形成相持局面。遗憾的是这些武人都只想割据称雄不肯与孝武帝精诚合作。河东豪族裴侠对宇文泰的动向有一段分析。《北史·裴侠传》："侠曰："宇文泰为三军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谓已操戈矛，宁肯授人以柄，虽欲抚之，恐是'据于蒺藜'也。"[54] 也就是说宇文泰势力已经独自发展，不可能归附元魏政权了。贺拔胜也一心自保，不肯为孝武出力。《周书·卢柔传》："孝武后召胜引兵赴洛，胜以问柔。曰：'高欢托晋阳之甲，意实难知。公宜席卷赴都，与决胜负，存没以之，此忠之上策也。若北阻鲁阳，南并旧楚，东连兖豫，西接关中，带甲十万，观衅而动，亦中策也。举三荆之地，通款梁国，可以身免，功名去矣。策之下者。'胜轻柔年少，笑而不应。"[55] 从二人的对答看贺拔胜实际上是十分犹豫的。《周书·贺拔胜传》说他率兵到达广州后就"犹豫未进，而帝已西迁"[56]。孝武未获贺拔胜的支援。侯深（渊）也是左右摇摆，想坐收渔利。《魏书·侯渊传》："出帝末，渊与兖州刺史樊子鹄、青州刺史东莱王贵平密信往来，以相连结，又遣间使通诚于献武王。"[57] 宇文泰、贺拔胜、侯深（渊）都只打各自的算盘，并不愿同心协力对抗高欢。于是，孝武帝就只能西逃关中。高欢乘中原群龙无首各个击破，使势力延伸到整个华北平原。

孝武帝为重振皇权做了最大的努力，还是失败了。他的失败主要是由客观原因造成的。从支持孝武帝的阶层来看，远远不如孝庄帝范围广泛，但是高欢集团却掌握了北镇的主要兵力并得到河北士族的支持，从力量对比上孝武帝的失败是必然的。另外一方面，孝武集团却不是一个无能的政治团体。首先，这个团体从一开始就注意军队问题，并且初步形成了让高欢必须全力应对的武装。其次，构想了联合关陇、河南的军阀与高欢划河对峙的战略。这是很高明的设想。再次，支持孝武帝的人物大多数为北魏的中低层官僚。这些官僚大都具备实干的精神，所以孝武集团显得有活力。西魏北周隋唐史表明这一批人代表了新官僚的基本精神。

在与孝武帝对抗的过程中，高欢虽然胜利了，但是孝武帝的西逃立即改变了当时的政治局势，高欢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强大的西魏政府，而不是军阀宇文泰。这个失算无疑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后果。高欢失误的主要原因是对待政治问题缺乏耐性，用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这种策略反映出高欢在政治上的不成熟，而这一种不成熟则反映出高欢仍

然是一个军事集团的首领而不是合格的政治领袖，即高欢缺乏政治参谋的指点。

孝武集团的不屈使得军阀加强了对政权的控制，从此皇权彻底成了表示正统的幌子，并没有实际的权力。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

三 孝武西逃的影响

孝武西逃的最大赢家并不是高欢，而是宇文泰。《周书·文帝纪上》：“七月丁未，帝遂从洛阳率轻骑入关，太祖备仪卫奉迎，谒见东阳驿……乃奉帝都长安。披草莱，立朝廷，军国之政，咸取太祖决焉。”[58] 首先，宇文泰因为元魏皇帝的驾临，使政权的建立顺理成章了。宇文泰因为有了西魏政权做掩护，从而就有了与高欢争天下的合法性。从高欢的行为之中，可以反窥孝武西逃给高欢带来的不利影响。《北齐书·神武纪下》：“七月，魏帝躬率大众屯河桥。神武至河北十余里，再遣口申诚款……魏帝逊于长安。己酉，神武入洛阳，停于永宁寺……神武寻至恒农，遂西克潼关，执毛鸿宾……神武自发晋阳，至此凡四十启，魏帝皆不答。九月庚寅，神武还于洛阳，乃遣僧道荥奉表关中，又不答。乃集百僚四门耆老，议所推立。”[59] 逼迫皇帝出逃，这对高欢的形象无疑是极大的损毁。因而，高欢一直没有立新帝，而是反复劝说孝武帝回洛阳以挽回损失。这种策略更重要的是让宇文泰失去合法地位。但孝武帝的固执使高欢希望落空，从此北魏一分为二。而关中政权因为皇帝的到来而吸引了更多的追随者。

孝武西走之后，河东、洛南、洛西的豪族纷纷起兵阻击高欢军队，同时向西魏政权投诚。河东地区的豪强与东西政权的关系已有毛汉光的论述，此不赘论。[60] 以下就洛西、洛南地区的豪族归服西魏的情形引证如下。

《周书》卷四三《李延孙传》：

李延孙，伊川人也。祖伯扶，魏太和未，从征悬瓠有功，为汝南郡守。父长寿，性雄豪，有武艺。少与蛮酋结托，屡相招引，侵灭关南，朝议恐其为乱，乃以长寿为防蛮都督，给其鼓节，以慰其意。长寿冀因此遂得任用，亦尽其智力，防遏群蛮……及魏孝武西迁，长寿率励义士拒东魏……及长寿被害，延孙乃还，收集其父之众……大统四年，为其长史杨伯兰所害。

同卷《韦法保传》：

法保少好游侠，而质直少言。所与交游，皆轻滑亡命……慕李长寿之

为人，遂娶长寿女，因寓居关南……及魏孝武西迁，法保从山南赴行在所。除右将军、太中大夫，封固安县男，邑二百户。

及长寿被害，其子延孙收长寿余众，守御东境。朝廷恐延孙兵少不能自固，乃除法保东洛州刺史，配兵数百人，以援延孙……及延孙被害，法保乃率所部，据延孙旧栅。

同卷《韩雄传》：

雄少敢勇，膂力绝人，工骑射，有将率材略。及魏孝武西迁，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大统初，遂与其属六十余人于洛西举兵，数日间，众至千人。

同卷《陈忻传》：

陈忻字永怡，宜阳人也。少骁勇，有气侠，姿貌魁岸，同类咸敬惮之。魏孝武西迁之后，忻乃于辟恶山招集勇敢少年数十人，寇掠东魏，仍密遣使归附。

同卷《魏玄传》：

魏玄字僧智，任城人也。六世祖休，仕晋为鲁郡守。永嘉南迁，遂居江左。父承祖，魏景明中，自梁归魏，家于新安。玄少慷慨，有胆略……及魏孝武西迁，东魏北徙，人情骚动，各怀去就。玄遂率募乡曲，立义于关南，即从韦法保与东魏司徙高敖曹战于关口。及独孤信入洛阳，隶行台杨琚防马渚。复与高敖曹接战。自是每率乡兵，抗拒东魏。前后十余战，皆有功。

以上豪强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因而为霸一方；从兵源上看主要是招募来的乡兵，在政治上拥护西魏，不惜一切地防守在边境线上。面对东魏正规军的清剿，这些私人武装并不占优势，易被打垮。但他们占地利的优势，群众基础好，所以是屡败屡战，使东魏军队毫无办法，从而确保了西魏北周西部边境的安全。

随孝武西迁的武人之中相当一部分为武川镇军人，比如独孤信、杨忠、侯莫陈悦、阎庆、念贤等。这些人的到来，自然使武川军人集团更加强固。还有一些将领是洛阳的世家子弟王思政、宇文测、宇文深、陆腾等人。这些人比北镇武人更善于运用谋略，因而能独当一面。《周书》卷二七《宇文深传》：

及齐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将窦泰趣潼关，高敖曹围洛州。太祖将袭泰，诸将咸难之。太祖乃隐其事，阳若未有谋者，而独问策于深。对

曰："窦氏，欢之骁将也，顽凶而勇，战亟胜而轻敌，欢每仗之，以为御侮。今者大军若就蒲坂，则高欢拒守，窦泰必援之，内外受敌，取败之道也。不如选轻锐之卒，潜出小关。窦性躁急，必来决战，高欢持重，未即救之，则窦可擒也。既虏窦氏，欢势自沮。回师御之，可以制胜。"太祖喜曰："是吾心也。"军遂行。果获泰而神武亦退。深又说太祖进取弘农，复克之。太祖大悦，谓深曰："君即吾家之陈平也。"

是冬，齐神武又率大众度河涉洛，至于沙苑。诸将皆有惧色，唯深独贺。太祖诘之，曰："贼来充斥，何贺之有？"对曰："高欢之抚河北，甚得众心，虽乏智谋，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图。今悬师度河，非众所欲，唯欢耻失窦氏，愎谏而来。所谓忿兵，一战可以擒也。此事昭然可见，不贺何为。请假深一节，发王罴之兵，邀其走路，使无遗类矣。"太祖然之。寻而大破齐神武军，如深所策。

在小关之战前，宇文深从窦泰性格急躁和连战连胜的骄傲情绪推断，其军队必会急进，而高欢性格稳重会按部就班地行军，因而两军之间不会有形势上的接应，窦泰必败。在沙苑之战前，段荣《北齐书》[61]、薛琡《北齐书》[62]、杜弼[63]劝谏高欢不要发动战争，但高欢不听。这就是宇文深所推断的愎谏而来。宇文深有两种能力是大多数北镇将领所不具备的：对政治形势的深刻观察和绵密的逻辑推断。这些能力的养成，与系统的知识教育有关。史称宇文深"性多奇谲，好读兵书"[64]。阅读兵书的能力与习惯也不是一般北镇军人所能具备。因为兼具军事知识和文化知识，这批将领往往能独当一面。就东魏北齐的历史来看似乎缺乏能独当一面的将领。这也是兵力较弱的西魏相对于东魏的优势。

孝武西来之前，宇文泰是用一个军府来控制关陇，这种情形在孝武西来之后大大地改善了。因为一个新的政府机构建立起来了。孝武帝所携引的，以及后来陆续西逃的行政人员迅速地充实到政府的各个部门以及各个州郡使西魏更好地利用了关陇地区的资源。而西来的儒家文人也是弦歌于长安，使得比较荒芜的关陇文化也朝着更高的方向发展。下面举几例以说明之。

崔猷出自山东士族博陵崔氏。祖父崔挺、父亲崔孝芬都是有名的文化官僚。崔猷本人是，"少好学，风度闲雅，性鲠正，有军国筹略"。来到西魏后任黄门侍郎等职。当他看到，"四时祭祀，犹设俳优角抵之戏，其郊庙祭官，多有假兼"。崔猷于是上疏要求禁止这一种不合乎礼仪的做法，朝廷也就同意了。在他出任京兆尹时，看到，"婚姻礼废，嫁娶之辰，多举音乐。又廛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织成文绣者"。崔猷认为这种风气不宜提倡，上疏要求禁止，朝廷也是欣然同

意。[65]

礼坏乐崩，对于有儒学修养的士大夫来说是不可容忍的事情，事不师古同样令人遗憾。作为儒者，崔猷对于西魏不合古典的礼乐制度一一重改，使归于雅正，使得西魏政权更合乎中原王朝的典范。再看一例。《周书·赵肃传附徐招传》：“时有高平徐招少好法律。发言措笔，常欲辨析秋毫。历职内外，有当官之誉。从魏孝武入关，为给事黄门侍郎、尚书右丞。时朝廷播迁，典章有缺，至于台阁轨仪，多招所参定。论者称之。”[66] 徐招所擅长的是法律，在百废待兴的西魏政权之中可以发挥所长。从引文中看他似乎为西魏制定的是规范行政程序的法规。

总而言之，西来的文人以他们所承继的洛阳文化在关陇地区充分施展，并且传播开来，使得西魏的社会总体上沿着孝文帝改革以来的方向在发展。他们在制度方面的基础性工作是西魏得以立国的根本因素。

四 小结

尔朱氏势力溃败之后的北魏存在着以下社会势力：高欢集团、河北士族、原尔朱将帅、洛阳官僚以及贺拔岳集团。河北士族因为与高欢共同对抗尔朱氏的渊源，关系比较亲密。洛阳官僚与尔朱将帅无力对抗高欢，但也不甘心屈服，在形势上可以与高欢相抗衡的就是贺拔岳集团。

形势的变动始于孝武帝的上台和高欢北上经营并肆汾地区。在高欢北上的两年之中，部分洛阳官僚、尔朱将帅以及贺拔岳迅速地集结在了孝武帝的旗帜之下。等高欢稳固了后方基地之后，两大阵营的冲突就爆发了。尔朱将帅并不愿意为孝武帝出力死战，只想割据称雄，因而孝武帝被迫流亡关中。虽然孝武朝廷是相当优秀的团体，但是在号召力上比孝庄集团更为单薄，山东士族徘徊在朝廷与高欢之间，表明北魏皇权号召力的下降。

南下的高欢将割据势力各个击破，统一了河北河南和淮北地区。高欢在军事上的成就并不能弥补政治上的失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即孝武帝与宇文泰的结合所造就的西魏朝廷的威胁。这个失误表明了高欢单一的军事集团的缺陷。通过这一次教训，高欢开始重视吸收汉族官僚进入幕府，从而以霸府政治取代了皇权政治。于是历史进入东西魏对峙时期。

由于孝武帝与部分洛阳官僚的到来，宇文泰就获得了建立了一个合法

而完备的中原政府的机会。因而具备了与高欢对抗的政治资本。正因为合法政权的建立，宇文泰获得了河东、弘农、河南地区豪强的武力支持。由于这些豪强在高欢统治区的长期骚扰牵制了高欢的军队，极大地缓解了西魏的军事压力。

---

[1] 《魏书》卷七四，第1647页。

[2] 同上。

[3] 《魏书》卷一〇，第255页。

[4] 《魏书》卷三九，第891页。

[5] 《魏书》卷八三下，第1837页。

[6] 《魏书》卷二二，第365页。

[7] 《魏书》卷五八，第1304页。

[8] 《北齐书》卷二一，第289页。

[9] 《魏书》卷二一下，第584页。

[10] 《北齐书》卷二一，第290页。

[11] 《魏书》卷九，第240页。

[12] 《北齐书》卷一八，第238页。

[13] 《北史》卷六，第211页。

[14] 《魏书》卷四四，第1004页。

[15] 《魏书》卷三九，第890—896页；《魏书》卷八二，第1797页；《魏书》卷八三下，第1837页。

[16] 《魏书》卷五八，第1280—1304页。

[17] 《魏书》卷七七，第1713—1718页；《魏书》卷二一，第289至294页。

[18] 《魏书》卷四九，第1105页；《魏书》卷五六，第1251页；《魏书》卷五七，第1266—1276页。

[19] 《魏书》卷二四，第634页；《魏书》卷六六，第1482、1483页；《魏书》卷六七，第1506页。

[20] 《魏书》卷五六，第1244—1247页。

[21] 《魏书》卷四七，第1052—1054页；《魏书》卷七六，第1684页。

[22] 《魏书》卷六九，第1531—1533页。

[23] 《魏书》卷七七，第1696—1702页。

[24] 《魏书》卷一六，第397页。

[25] 《魏书》卷九，第247、248页。

[26] 《魏书》卷六一，第1363页。

[27] 《魏书》卷一〇，第263、264页。

[28] 《魏书》卷七五，第1668页。

[29] 《魏书》卷八〇，第1769页。

[30] 同上书，第1778页。

[31] 同上书，第1780、1782页。

[32] 《魏书》卷七七，第1718页。

[33] 《魏书》卷八〇，第1770页。

[34] 《北史》卷四八，第1759页。

[35] 关于北朝豪族，请参考陈爽著《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36] 《周书》卷一四，第217页。

[37] 《魏书》卷一八，第422页。

[38] 《魏书》卷三九，第896页。

[39] 《魏书》卷五八，第1281—1284页。

[40] 《魏书》卷七七，第1713—1718页。

[41] 《魏书》卷一九下，第510—512页。

[42] 《魏书》卷一八，第422页。

[43] 《魏书》卷八三下，第1837页。

[44] 《魏书》卷五八，第1289页。

[45] 《魏书》卷一一，第281页。

[46] 《魏书》卷七四，第1647页。

[47] 《魏书》卷二二，第593页。

[48] 《北史》卷六，第216—218页。

[49] 《魏书》卷八〇，第1781页。

[50] 《北齐书》卷二一，第291页。

[51] 《北史》卷一五，第570页。

[52] 《魏书》卷一九下，第520页。

[53] 《魏书》卷二〇，第526页。

[54] 《北史》卷三八，第1400页。

[55] 《周书》卷三二，第563页。

[56] 《周书》卷一四，第218页。

[57] 《魏书》卷八〇，第1787页。

[58] 《周书》卷一，第13页。

[59] 《北齐书》卷二，第17页。

[60] 毛汉光：《中古政治史论》第四篇，《北朝东西政权之河东争夺战》，第148—187页。

[61] 卷一六，第208页。

[62] 卷二八，第370、371页。

[63] 《北齐书》卷二四，第348页。

[64] 《周书》卷二七，第457页。

[65] 《周书》卷三五，第615页。

[66] 《周书》卷三七，第663页。

第三章 多重对立的东魏北齐政局

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研究东魏北齐历史的文章约共有350篇，出版专著约有5部。其中政治史的研究论文约有85篇，主要集中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两都制度、豪族等方面，关于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的研究仅有寥寥几篇。有两部研究专著梳理了东魏北齐的政治史（吕春盛、王怡辰）。东魏北齐政治史的研究，可分为两大门派、两个阶段：缪钺发表《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1] 认为其线索就是胡汉冲突。马长寿、王仲荦和港台学者孙同勋、萧璠大致也持同样的观点。[2] 许福谦进一步发展了缪钺的观点，将北齐后期的政治斗争划为鲜卑勋贵与西胡化内臣之间。[3] 从1962年起，谷川道雄和毛汉光就此提出了不同看法。[4] 1987年，台湾学者吕春盛明确提出，北齐的政治斗争的性质是权力斗争。香港学者王怡辰持同样看法。[5] 20世纪90年代中期，黄永年也认为北齐的政治冲突是权力斗争，且以文武分途来理解北朝后期的历史。[6] 权力斗争论和文武分争论，是比胡汉分争论更深入的观察。不过，作为通解东魏北齐政治史线索的理论，比起“关中本位政策”，似乎并未抓住要害。缺乏“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政策”这样的理论引导，是东魏北齐史研究难以深入的原因。

不论是“胡汉冲突”还是“文武分途”，都是一种对立，如果加上许福谦的“勋贵与西胡化内臣”，东魏北齐的分立就达到了三重，邺与晋阳的分立又是一种对立，河北与河南的分立，也可算做一种对立。也就是说，东魏北齐的政治，分裂的因素比较多，形成了多重对立的社会。

第一节 论高欢的驾驭群豪

王怡辰论“高欢集团的抟成”，认为“东魏在这样复杂的形势下肇建，共有来自北镇、河北坞堡汉人郡姓、洛阳士族、尔朱余部将领四种派阀来源；河北、河南、山西三个经济环境、种族分布相异的地理区；邺城、晋阳两个政治核心，却只有一个出身北镇怀朔、曾任尔朱亲贵将领、在晋阳奠下基础、自称渤海高氏创业河北，又拥立孝武和孝静二帝的高欢。”[7] 王先生的意思是，只有高欢才能驾驭如此复杂的局面，其继任者因为不能驾驭，所以使得东魏北齐的政治常常面临困境。姑且不论东魏北齐的困境是否出于高欢的继任者的驾驭能力，笔者对于高欢是否能够驾驭东魏时期的各种政治力量，也持怀疑态度。以此，有必要探讨高欢和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

一 最初驾驭北镇势力的波折

高欢出身贫寒，青年时期高欢的前途一片灰暗。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是获得富家女子娄昭君的青睐。婚后，高欢的经济情况得到极大改善，顺利进入仕宦阶层，当了队主，由此结交了一批朋友：怀朔省事司马子如、刘贵、贾显智；怀朔户曹史孙腾；怀朔外兵史侯景；蔡儁。若不是北魏很快被北镇起义削弱，高欢肯定只能在怀朔镇度过一生。六镇起义改变了高欢和他的朋友们的命运。

高欢在六镇起义中的动向颇不寻常。在六镇起义的前中期，他一直留在起义队伍中，而他的朋友司马子如、赵贵、贾显智、孙腾、侯景都在起义刚爆发就投靠了尔朱荣；高欢的小舅子娄昭、连襟窦泰、妹夫库狄干也都投向了尔朱荣。和亲戚朋友的动向完全相反，让人觉得高欢十分另类。那么他出于什么目的不投靠尔朱荣，而是选择在北镇起义军队中发展呢？笔者以为要考虑高欢对形势的判断。史称高欢担任怀朔镇函使在洛阳目睹了虎贲、羽林军焚烧领军张彝家之后，就变卖产业，结交豪杰，“自是有澄清天下之志”[8] 。“澄清天下”可能有点夸大，不过高欢的确感觉到了社会动荡前的风潮云涌，提早做了一些准备，他将赌注押在了造反者一方，所以高欢对于起义的到来是持完全欢迎的态度。投靠尔朱荣的确可以做到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但是高欢志不在此。这从高欢在起义军中的表现可以看出来。高欢参加了杜洛周的军队后企图刺杀杜洛周取而代之。 [9] 投靠葛荣后也是这样。想要掌控局面，独立发展的愿望，从这些事例中不难看出。

毕竟还是实力和经验都欠缺，高欢在杜洛周和葛荣那里接连遭遇挫折，不仅权力没有得到，反而常常处于被追杀的狼狈处境。高欢不得

不投靠尔朱荣，获得暂时的休整。

可以预料，半路投来的高欢在尔朱荣那里并没有受到高规格的待遇，甚至在朋友刘贵的极力推荐下，尔朱荣对高欢也比较冷淡。高欢自然不愿意坐以待毙，他又一次在刘贵的操作下面见尔朱荣，向尔朱荣大胆进言，“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乱，孽宠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时奋发，讨郑俨、徐纥而清帝侧，霸业可举鞭而成。此贺六浑之意也”[10]。高欢的方略并不见得高明，尔朱荣及其幕僚也并不是没有想到，但是大家都还是慑于北魏朝廷的权威，不敢公开提出来。高欢一番话，正中尔朱荣的下怀，尔朱荣也看到了高欢的价值。于是，高欢受到了尔朱荣的重视“自是每参军谋”。不过高欢的经济处境并未得到改善，高欢不得不又一次做出出格的事情。当尔朱荣向洛阳灵太后朝廷公开决裂之际，高欢被委任为攻打洛阳的“前锋”。[11] 河阴之变后，高欢又建议尔朱荣取代拓跋氏当皇帝。虽然此事不果，但是高欢的谄媚显然收到了良好的回报，529年，高欢被任命为晋州刺史，终于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机会。在六镇起义过程中，高欢从不屈服于尔朱荣到发展为尔朱荣身边的幸臣，可以看出，高欢在北镇社会中实力、地位和影响力有限。

二“顾我能养”：高欢和勋贵

东魏武定四年末，高欢临终前看到儿子高澄忧心忡忡，就问儿子是否担心侯景造反。高欢说：“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拨扈志，顾我能养，岂为汝驾御也？”[12] 这段话很著名，为研究此段历史的学者所熟知。“养”与“被养”，放在东魏具体的历史场景中，高欢显然是被动的，他不能不养。汉族官僚杜弼三番五次提醒高欢，干涉一下勋贵“掠夺万民”的行为，高欢的回答是：“诸勋人身触锋刃，百死一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13] 这则例证，反映了高欢与勋贵之间“养”的具体涵义：高欢纵容勋贵，换取勋贵在武力上的支持。所以，高欢和勋贵之间的关系，在上下级之外，某种程度上带有对等的性质。

这种对等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平定葛荣之后，北镇余众被安置于并、肆二州，过着被契胡“陵暴”，“草窃不已”的苦日子。高欢从尔朱兆那里骗取了对北镇余众的统帅权之后，镇民“素恶兆而乐神武，于是莫不皆至”[14]。揆之当时的情势，尔朱兆不能完全控制北镇余众，而高欢统御镇民的权力来自尔朱兆，就更加不能确定对北镇余众的统御。高欢对镇民，只能是尽力讨好。在去往山东就食的路上，高欢从尔朱兆的亲信手里解放镇民的家属，“于是士众咸悦，倍愿附从”[15]。一方面我们看到高欢的笼络收到了好的效果，另外也感到了北镇余众的独立性。

当高欢准备和尔朱兆决裂时，他仍不能确定是否得到北镇余众的支持，只能用计谋，“乃诈为书，言尔朱兆将以北镇人配契胡为部曲。又为并州符，征兵讨部落稽”。在骗取了北镇余众的拥戴后，高欢说：“尔乡里难制，不见葛荣乎，虽百万众，无刑法，终自灰灭。今以吾为主，当与前异，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生死任吾则可，不尔不能为取笑天下。”[16] 这是高欢取得统率权的关键一步，换言之，高欢的统率权并不是自然产生而是来源于欺骗与胁迫，所以并不牢靠。在高欢与尔朱集团决战的韩陵之战中，高欢一方“马不满二千，步兵不至三万”[17] 。尔朱荣击败葛荣后，迁往并州、肆州的北镇流民有二十万，被尔朱家族“诛夷者半”，则高欢带到河北的北镇余众仍在十万以上。 [18] 若以留守冀州、定州的兵力以五万计，则韩陵前线的兵力有五万以上，加上河北的豪族军队，绝对不止三万二千兵马。所以，这则史料令人生疑。又据《北齐书·高昂传》：“及战，高祖不利，军小却，兆等方乘之。高岳、韩匈奴等以五百骑冲其前，斛律敦收散卒蹑其后，昂与蔡儁以千骑自栗园出，横击兆军，兆众由是大败。是日微昂等，高祖几殆。”[19] 高昂所统帅军队显然并非主力，因为战前高欢以为高昂“纯将汉儿，恐不济事”[20] ，所以自然不能将高昂放在主力的位置。但是，高欢所帅的鲜卑主力，刚一开战就被尔朱兆军队打败，若不是高昂横击尔朱兆军，高欢收获的恐怕是失败。笔者在这里并不想讨论韩陵之战的战术问题，鲜卑军人显然并未使出全力，至少不如高昂卖力，是可以这样料想的。也就是说，面对强大的尔朱兆军队，鲜卑军人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安全，而非高欢的利益。这种将自己的利益置于高欢的军事目的之上的行为在东魏的战争史上多次出现。

沙苑之战中，东魏军队被西魏伏击，阵脚大乱。高欢派幕僚张华原“以簿帐历营点兵，莫有应者”。当时的东魏将士正如斛律金推测，在没有接到高欢任何军事命令前，已然“众散将离”，各自逃命去了。这种不顾统帅，率先逃走的做法，让高欢既愤怒，又无奈。据史书记载，当时的高欢差点失去理智：“欢犹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众心离散，不可复用，宜急向河东！’欢据鞍未动，金以鞭拂马，乃驰去，夜，渡河，船去岸远，欢跨橐驼就船，乃得渡。”[21] 可以想见，高欢当时失望到绝望的心情。

更富有戏剧性的不服从命令的情节见于邙山之战。大将彭乐私自带一支军队偷袭西魏军营，斩获甚多。在后方，“人告彭乐叛，欢甚怒”。可知，帅对将不存在基本的信任，将对帅也缺乏尊重。彭乐大胜回营后，高欢将追击宇文泰的任务交给了彭乐。就在将要捉住宇文泰的千钧一发之际，宇文泰劝彭乐，“今日无我，明日岂有汝邪？”彭乐觉得宇文泰说的对，于是放走了宇文泰。高欢得知之后，心情的苦涩简直

都无法言表，史称：“令（彭乐）伏诸地，亲称其头，连顿之，并数沙苑之失，举刀将下者三，噤良久，乃止。更请五千骑取周文。神武曰：‘尔何放而复言捉邪？’取绢三千疋压乐，因赐之。”[22] 他最后还是没有杀彭乐，且赐予彭乐三千匹绢。其中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彭乐还有利用的价值，更深层次，高欢还是要讨北镇势力的欢心。以此可见，高欢“养”的功力的确深厚，非常人所能及。

由于高欢和北镇势力的相互利用关系，所以高欢对其不得不养。东西魏之间的对峙关系的形成，预示着高欢对北镇势力养的持久化。这也是影响东魏北齐政治的关键因素。于是，不能不探究持久战是怎么形成的。公元534年高欢建立东魏至546年高欢病倒在玉壁战场，高欢统治东魏共12年，其间东西魏大战六次，平均每两年有一次战争，其中有五次战役由高欢挑起。东魏对于六次大战投入了全力，每一次都消耗了巨大的人员和物资。东魏对西魏的战争，无论从高欢的主观愿望，还是东魏投入的巨大人力和物力，似乎东魏应该在战争中取得一定的优势，事实上由于西魏牢牢控制着豫西和河东，战略并未处于被动，东西魏战争陷入持久战。

高欢轻视宇文泰以至于贻误战机。据《资治通鉴》，在宇文泰刚刚掌握关陇军权之时，高欢派侯景、张华原、王基去陇西打探形势。王基回到晋阳，告诉高欢：“泰雄杰，请及其未定击灭之。”高欢不以为然：“卿不见贺拔、侯莫陈乎？吾当以计拱手取之。”[23] 去除贺拔岳、侯莫陈悦是翟嵩的计谋，而非高欢。高欢其实是觉得宇文泰实力有限，将无所作为。

高欢对于战机的贻误还有一次。北魏孝武帝逃亡关中后，高欢于534年八月追到潼关，进占华州。这时候高欢应当进兵长安，一举打败宇文泰。但是很奇怪，高欢很快“使行台长史薛瑜守潼关，大都督库狄温守封陵，筑城蒲津西岸，以薛绍宗为华州刺史，使守之”[24] 。高欢自己撤回了晋阳。其中的原因说起来也不复杂，高欢撤兵主要是为了对付盘踞在豫南的贺拔胜。主要的证据在于，高欢撤兵的同时，安排“高敖曹行豫州事……遣行台侯景等引兵向荆州。”在此之前，贺拔胜曾经向关中有过试探性的进军，高欢以为贺拔胜向他发起攻击，怕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于是主动撤退。事实上，侯景很快击败了贺拔胜，证明贺拔胜的威胁有限。[25] 宇文泰于当年十月攻占潼关，拔掉了东魏在关中的据点，又派元庆和“率众伐东魏”[26] 。十一月，东魏兖州刺史樊子鹄、南青州刺史大野拔起兵反高欢。535年二月，萧梁司州刺史陈庆之讨伐东魏。东魏河南地区陷入全面战争。战略主动权于是易手，西魏政权获得极为宝贵的喘息机会。

东西魏达到战略的平衡，是在沙苑之战后。535年二月丁亥日，东魏

大将娄昭攻下兖州。六月，西魏元庆和的攻势被东魏豫州刺史击败。536年十二月，东魏与萧梁讲和。于是，高欢腾出手来，准备攻击西魏：高欢率大军从山西晋阳南下，准备从蒲津渡黄河进击渭北；窦泰率一支精锐直扑潼关；高敖曹率一支军队攻击商洛，准备从武关攻击关中。当时西魏的处境比较糟糕，关中大旱，“人相食，死者十七八”[27]，而且西魏的主力精锐也不过万人，与东魏众寡悬殊。不过，战争还是以西魏取胜而告终，西魏又一次获得了九个多月的喘息机会。西魏利用小关战役的胜利，迅速扩大战果：主力进兵豫西，获得充裕的后勤补给。偏师在杨檦的率领下获得了河东地区的一块根据地。豫西和河东的获得对于西魏极为重要，意味着此后，东魏攻击关中的行军线路受到威胁，因而不能直接攻击关中地区。

小关之战，东魏虽然痛失大将窦泰，但未伤及筋骨，所以九个月后，高欢再次率领大军二十五万人，从晋阳南下关中。此时西魏主力是在豫西休整的不足万人的骑兵部队。东西魏军事实力的差异依然显著。此战，西魏俘获东魏士兵就有十万人左右，可知东魏的损失之惨重。西魏牢牢掌握了河东和豫西地区的控制权，从此之后，东西魏大战便未在关陇地区进行，这对西魏北周经济政治的稳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东西魏之间达到了战略的平衡，预示着东西对立的旷日持久。这也意味着，高欢须长期养北镇势力了。

三 “进退维谷”：士族与高欢

河北士族与高欢的龃龉，几乎每个研究者都觉察到了：从高乾被高欢出卖，到高昂不明不白的死亡，再到高慎流亡西魏，高欢父子与高乾兄弟的恩怨迁延达十数年之久。高欢所针对的并不是高乾一家，而是整个河北士族群体，或者说高欢所针对的不是河北士族而是河北士族干政。

真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高欢带领北镇流民队伍，来到河北之时，那境况可是相当的狼狈。见到高乾之后，竟然立刻认高乾为叔父，以求得与河北士族的合作。[28]虽然与河北士族的合作，高欢是最大的受益者，但并不意味着高欢心情始终是愉悦的。河北士族当然有自己的利益要求，高欢不得不妥协。

首先，逼迫高欢与尔朱兆公开决裂的是河北士族。此事在《北齐书》的《高欢纪》、《李元忠传》和《高昂传》中都有记载。一开始，虽然高欢与河北士族结成了反尔朱集团联盟，但是高欢尚未“显背尔朱氏”。李元忠袭杀殷州刺史尔朱羽生，迫使高欢与尔朱氏决裂。[29]

其次，逼迫高欢拥立孝武帝的是河北士族。此事，详见于本书第二章

第三节“孝武帝与东西魏的分裂”第一小节“孝武帝的被拥立”。高欢的被胁迫，亦可见于司马子如在孝武帝西逃关中之后的言论，“本欲立小者，正为此耳”[30]。也就是说，在当年击败尔朱集团之后，在选任新皇帝之前，司马子如是主张拥立小皇帝的。毫无疑问，司马子如是高欢的心腹，但他的意见并没有采纳，可见拥立孝武帝的确是河北士族的意见。

第三，坚持将都城迁往邺的也是河北士族。洛阳还是邺，这在北魏时期，经常是被提出来讨论的问题。孝文帝定都洛阳，使得这一争执暂时平息，随着北魏的衰微，这一问题似乎又凸显出来。孝武帝刚刚上台，高欢就建议将都城迁往邺。此事颇为蹊跷。迁都邺对高欢来说并没有多少好处，倒是符合河北士族的利益。难道迁都邺是河北士族和高欢的事先约定吗？具体的迁都原因，史书是这样表述的，高欢“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陕，洛阳复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晋阳，形势不能相接，乃议迁邺，护军祖莹赞焉。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四十万狼狈就道”。这段史料，有三点值得探讨。其一，有必要这么急吗？迁徙四十万人，这在北朝的运输条件下，工程量非常之庞大，处置不当会造成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事实上，河南地区积聚着对东魏北齐长期的不满，以及大量官员西逃关中，给东魏北齐政治的稳定带来了严重挑战。由于此点和河北士族无关，暂且搁置。其二，都城在洛阳，恐怕受到关中和南朝的威逼，此点理由也颇为牵强。彼时，高欢已经占领潼关和华州，关中政权在当时生存都成问题，尚不能构成对洛阳的威胁。来自南朝的威胁也是子虚乌有，事实上除去陈庆之带兵护送元颢回到洛阳那次之外，南朝对北朝边境的入侵并不多见，更别说威胁洛阳了。此点也和河北士族无关，暂不论。其三，《北齐书》在这里特别强调“护军祖莹”的拥护，而祖莹就是出身河北的士族。河北士族封隆之也“预迁都之议”。可见，这个不是非常明智的政策，却得到河北士族的热情拥护。其用心是明显的。

这三件事情未必不是河北士族“为高欢着想”，但是热心太过，以至于高欢感觉到“压力”很大，误以为河北士族觊觎他的权力。高欢和河北士族的交流，往往是这样，在一连串的误解中，艰难前行。士族们其实很想讨好高欢。杜弼和阳休之，甚至劝高欢取东魏而代之。高欢已经废了两个皇帝，撵跑一个，对于是否篡夺，自然顾虑重重，在没有消灭西魏的情况下不敢贸然取代之，高欢对于士族的好感并没有因此而增加。

高欢与河北士族的交流障碍，可能并不仅仅是权力的争夺与防范，更可能源于文化上的隔膜。高欢的主簿孙搴意外死亡后，魏收被司马子如推荐给高欢，继任主簿。高欢怎么都看不上魏收，“以受旨乖忤，

频被嫌责，加以箠楚，久不得志”。司马子如看不过去，对高欢说：“魏收天子中书郎，一国大才，愿大王借以颜色。”言下之意，魏收曾经做过北魏皇帝的秘书，希望高欢重新认识魏收的才华。魏收虽然因为司马子如的说项而升职，但高欢仍然“未甚优礼”，始终没有赏识魏收。[31] 或许有的学者认为，高欢不喜欢魏收是因为魏收人品有问题。笔者觉得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魏收不是高欢喜欢的类型。

先看魏收的前任孙搴。《孙搴传》说他深受高欢的赏识，是因为文笔美，且作文迅速，不仅如此“又能通鲜卑语，兼宣传号令，当烦剧之任”，所以“大见赏重”[32] 。和魏收同时被推荐给高欢的另外一个幕僚陈元康，也深受高欢赏识。《北齐书·陈元康传》说其人“承受意旨，甚济速用。性又柔谨，通解世事”[33] 。司马子如推荐给高欢的另外一个幕僚赵彦深也深受高欢喜爱。《北齐书》称其：“性聪敏，善书计……文翰多出其手，称为敏给。神武每谓司徒孙腾曰：‘彦深小心恭慎，旷古绝伦。’”[34] 孙搴、陈元康和赵彦深和魏收的区别是明显的，魏收始终不能揣测到高欢的意思，而其他三位则能迅速领会。其次，魏收做事迟缓，其他三位都比较干练。魏收和这三位最大的区别恐怕是身份上的，魏收是士族，其他三位都是庶人。魏收所受的教育是精英教育、贵族教育，所以和高欢格格不入，也就是和其他士族也有心理上的距离。这一种文化上的差异，加剧了高欢对河北士族过分的猜忌。二者之间的关系始终不能理顺。

四 恩倖与吏干

通过上文的分析，高欢在驾驭豪强方面可说是相当的失败：北镇势力桀骜不驯，河北士族难以沟通。高欢对于以上两种势力，难以形成平顺的统辖关系，这无疑令高欢比较烦恼，但他还是努力做了一些弥补：在确立相对于北镇勋贵与河北豪强的优势方面，高欢启用了两类人，恩倖与吏干。

恩倖政治算是南北朝政治史的显著特征之一。东魏北齐的恩倖是从高欢开始的，《北齐书·恩倖传》说：“高祖、世宗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桢干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北齐书》的作者不大认可，东魏北齐的恩倖政治是从高欢开始的，但是《北齐书》所列的第一个恩倖人物却是高欢的幕僚郭秀。史称，郭秀在高欢那里“亲宠日隆”，郭秀去世后，“家无成人子弟，高祖亲至其宅，亲使录知其家资粟帛多少，然后去。命其子孝义与太原公已下同学读书”。可见高欢对郭秀的宠信。史书又说，郭秀人品有问题：“多受赂遗”，且“秀忌杨愔，诳胁令其逃亡”[35] 。高欢宠信郭秀这样有严重缺陷的人物，是出于个人感情的好恶，还是郭秀有特殊的利用价值，史料缺乏不能详考。不过，高欢大量任用吏干，确实是有收拢权力的意思。

高欢让长子高澄去邺城控制朝政，就是出自吏干孙搴的建议。[36] 高澄去邺城主政，是高家父子控制东魏政权最为厉害的一招。在此之前，代表高欢控制邺城的是高欢的堂兄弟高岳、高隆之、司马子如、孙腾，当时称为四贵。这几位虽然是高欢的心腹，但是高欢并不能完全掌控，尤其是高隆之、司马子如、孙腾卖官鬻爵、贪污腐败，已经严重影响到东魏政治的健康发展，而高欢对其无可奈何。高澄到邺城之后，四贵的权力相应地受到制约，而且高家对于邺城有了直接地控制。

参与东魏国家大事决策的有：赵彦深“专掌机密”[37] 、陈元康“内掌机密”[38] 、杜弼“典掌机密，甚见信待”[39] 、薛琡“军国之事，多所闻知”[40] 、慕容绍宗“军谋兵略，时参与焉”[41] 。这里赵彦深、陈元康、杜弼都是属于吏干人物。将吏干人物引入最高的决策层，无疑是东魏政治的又一大特点。

东魏时期，晋阳的大丞相府，主持全国政务。而主管大丞相府财政工作的仓曹参军张耀[42] ，掌管大丞相府军事工作的外兵曹和骑兵曹的赵起、徐远[43] 、唐邕、白建[44] ，都是所谓吏干。对于勋贵，高欢最大优势的获得就在于对东魏财政和军事的控制。毫无疑问，北镇势力是东魏最强悍的军事集团，但是北镇集团的缺陷则在于非常依赖河北地区的粮食和财赋。高欢掌握着财政大权，也等于掐着北镇集团的脖子。当时东魏的士兵管理工作是控制在外兵曹和骑兵曹。这一举措，就等于将勋贵与士兵隔离开来。手中无兵的勋贵很难对高欢形成威胁。

恩倖政治是魏晋南北朝皇权政治的变种，是中央集权不能正常实现的时候，就会出现的扭曲。学者认为东魏北齐的恩倖政治始于武成皇帝高湛。其实在东魏初年就有所表现，当时高欢的权威还是比较大，所以恩倖政治并不典型，而是表现为吏干政治。吏干政治是东魏北齐政治文化的特征之一，也是高欢驾驭群豪遭遇挫折的产物。东魏北齐四十多年的历史，其政治总是不能走上轨道。这其中的缘由是否和吏干政治有关呢？值得考虑。

第二节 乾明政变与北齐前期政局

一 相关史料辨析

研究北齐政治史的学者，首先注意到《北齐书·杨愔传》（即《北史·杨愔传》）不大可靠的是黄永年。[45] 其他学者因为没有注意到此问

题，贸然引用，使得其论断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不过黄永年的《论北齐的政治斗争》侧重于分析“乾明政变不属于胡汉斗争”这一核心问题，对于《杨愔传》的可靠程度并未深入展开。再者，黄先生依然认为，娄太后深深介入了北齐的政治史，笔者对此观点不太认同。故而，本节将就《杨愔传》的可靠性问题先做一辨析，乾明政变的主谋问题，将在后面展开。

《北齐书·杨愔传》已经亡佚，今见于《北齐书》的《杨愔传》是北宋学者从《北史·杨愔传》抄补的。由于研究者大多习惯引用《北齐书》，所以在此以《北齐书·杨愔传》为辨析对象。黄永年认为《杨愔传》不大可靠，主要是根据《北齐书·孝昭纪》。《北齐书·孝昭纪》也是抄补自《北史·孝昭纪》，出于同样的考虑，本书也以《北齐书·孝昭纪》为征引对象。《北齐书·杨愔传》的疑点有以下方面：（1）乾明政变时，郑子默的官职；（2）郑子默在哪个地方被捕；（3）跟随高演进入宫城的是哪些人，参与政变的勋贵是哪些人；（4）成休宁的职官；（5）皇宫侍卫首领是刘桃枝还是娥永乐；（6）政变中，娄昭君与高殷的发言是否属实？

第一，乾明政变时，郑子默的官职。在《杨愔传》中，郑子默的职务是黄门侍郎，而在《孝昭纪》中，是散骑常侍，据《北齐书·郑子默传》，郑子默担任散骑侍郎是“乾明初”。又据《资治通鉴》卷一六八，郑子默的职务是“散骑侍郎兼中书侍郎”。黄门侍郎是门下省官，散骑侍郎是集书省官，中书侍郎是中书省官。参互这几条记载，“散骑侍郎兼中书侍郎”应该是乾明政变时郑子默的官职，《杨愔传》记载有误或失载。

第二，郑子默在哪个地方被捕？据《杨愔传》，郑子默是在尚药局里被捕，《孝昭纪》记录为“中书省前”。尚药局属门下省，而据上文郑子默的职务为“兼中书侍郎”，可见在“中书省前”被捕是对的。

第三，参与政变的勋贵是哪些人，跟随高演进入皇宫的又是哪些人？据《杨愔传》，“二叔率高归彦、贺拔仁、斛律金拥愔等唐突入云龙门”。《孝昭纪》是“帝（高演）戎服与平秦王高归彦、领军刘洪徽入自云龙门”。《杨愔传》中没有记载段韶、刘洪徽，《孝昭纪》中没有记载斛律金和贺拔仁。在高欢的遗嘱中，斛律金是军事将领中的二号人物、段韶是三号人物，无法想象若二人参与乾明政变，《孝昭纪》中会遗漏其中一个？名单中没有列入斛律金只能说明他没有参与。又据《北齐书·废帝纪》，高演政变成功之后，“以司徒段韶为大将军”，三个月以后“以开府仪同三司刘洪徽为尚书右仆射”。很明显这是对于政变的支持者给予的酬劳。在酬庸的名单中没有出现斛律金、贺拔仁，也就说明此二人并没有跟随进入皇宫，也没有参与政变。同

理，斛律光、薛孤延、康买等见于《杨愔传》而未见于《孝昭纪》的勋贵并没有参与政变。《北齐史·薛孤延传》记事止于天保八年，薛孤延可能在天保八年已去世，不可能参与之后发生的乾明政变。

第四，成休宁的官职。《杨愔传》记载，高演等人进入云龙门的时候，“开府成休宁据门”。而在《孝昭纪》中是，“都督成休宁”。这点差异无关大局，可能既是都督，又是开府。

第五，皇宫侍卫首领是刘桃枝还是娥永乐。关于此点，《资治通鉴注》，胡三省认为应该是娥永乐。也就是说，应该以《孝昭纪》为是，《杨愔传》误。

第六，娄昭君与高殷的发言是否属实？据《杨愔传》，高演等人面见娄昭君、小皇帝、李太后，娄昭君“乃让帝（小皇帝高殷）”，又指责李太后“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李太后）斟酌”。小皇帝也对高演说：“但愿乞儿（高殷）性命。”黄永年指出，在昭阳殿两廊之下两千名侍卫严阵以待的情形下，小皇帝再傻，也不可能说出那样的话来，而娄昭君的气焰恐怕也不能有如此嚣张。又，《北齐书·孝昭纪》记载高演等人将杨愔、尔朱天和、燕子献、宋钦道带入宫城，抓住郑子默后，这五位被“斩于御府之内”；而在《杨愔传》中，高演等人见到小皇帝高殷和娄昭君之后，娄昭君屡屡提及杨愔，贺拔仁只是提到伤重，并没有提到已死，杨愔等人之死是在高演政变成功之后。黄永年先生认为《孝昭纪》可信，《杨愔传》不可信。《孝昭纪》对高殷和娄昭君的表现记载为“废帝性吃讷，兼仓促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为皇太后誓，言帝无异志，唯去逼而已”。废帝高殷在高洋的高压教育下的确有“时复昏扰”的心理疾病，在政变的高压情势下病症突发，暂时丧失了语言能力，当时掌控形势的只能是李太后。故此娄昭君才要向儿媳妇发誓，借以欺骗缺乏政治经验的母子，怎么可能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对皇帝母子进行谩骂？

《杨愔传》的六个疑点，可以证明的错误记载有五处之多，这就说明《北史》的作者所依据的材料本身并不可信，征引《杨愔传》必须有旁证才能取信。同时说明，研究乾明政变应该以《孝昭纪》为主要依据。

二 乾明政变的三驾马车

高演等人在彼时彼刻发动政变，是有其不得已的历史和现实背景。高洋虽然立自己的儿子高殷为太子，但是他多次试图将继承人改换为弟弟高演。高洋去世之后，娄太后也曾提议，放弃高殷，立高演为皇帝。为何高洋和娄昭君都曾考虑高演为皇位的继承人？富于政治经验

的汉族官僚王晞在高洋去世后，对高演分析了高殷即位后的北齐政局走向。他说：“天保享祚，东宫委一胡人，今卒览万机，驾驭雄杰。如圣德幼冲，未堪多难，而使他姓出纳诏命，必权有所归。殿下虽欲守藩职，其可得也。假令得遂冲退，自谓保得家祚得灵长不？”[46] 小皇帝高殷，在高洋统治时代，几乎没有接触过政治和社会，没有统治经验，而且在高洋的野蛮教育下，高殷“精神时复昏扰”[47] 。也就是说，高殷难以执行皇帝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高殷必然将皇权转交给别人代为执行，也就对北齐高氏政权有了潜在的威胁，这是高洋和娄昭君曾经考虑过的。高洋最终感情战胜理智，选择让儿子继位而非政治上成熟的弟弟高演。高演，由于曾是潜在的皇位候选人，所以面临小皇帝及其亲信的猜忌。事实上，高演很快被辅政大臣解除了参与军机大事的权力，“以尊亲而见猜斥”[48] 。辅政大臣甚至已经考虑要终结高演和高湛的生命。高演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迅速采取行动，与弟弟高湛密谋除去辅政大臣。

回到乾明政变的历史场景，就会察觉，这不是一次在雄厚的军事集团支持下的政变。篡夺者一方的实力弱小：“长广（高湛）旦伏家僮数十人于录尚书后室，仍与席上勋贵数人相知。”[49] 家僮数十人加上勋贵数人，就是政变者的实力。高演等人发动袭击，将辅政四大臣控制之后，带着辅政大臣进入皇宫。史称“帝（高演）戎服与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归彦、领军刘洪徽入自云龙门”[50] 。突入皇宫的政变者还是未取得优势，因为“时庭中及两廊下卫士二千余人皆披甲待诏，武卫娥永乐武力绝伦，又被文宣（高洋）重遇，抚刃思效”[51] 。小皇帝还掌控着一支实力强大的卫队，政变者的性命掌握在太后与皇帝手中。只有明白了当时的力量对比，才能理解高演为何要“叩头不止”向小皇帝百般解释，娄昭君要“为皇太后（小皇帝的母亲）誓，言帝（高演）无异志，唯去逼而已”[52] 。小皇帝和皇太后没有政治经验，轻易相信高演和娄昭君，遣散宫廷侍卫。高湛这时候假借诏命，率领京畿军入驻皇宫。至此，政变者才掌握了主动权。这次政变虽然策划良久，但是从实施过程看，并非有完全把握，实在是有点孤注一掷的味道。为何会如此？前面分析过，辅政大臣因为有皇权的支持，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并且将高演逼到了墙角。高演不采取行动只有死路一条，只能尽快动手。同时，失去权力的高演等人所能掌握的军事政治资源委实有限。

政变者实力弱小，故而高归彦的加入就显得非常关键。高归彦是高洋的亲信，长期担任领军大将军，负责皇宫守卫。高洋去世前，确定高归彦为辅政五大臣之一，但是高归彦却投靠了高演，参与了乾明政变。高归彦长期担任禁军首领，所以他的加入，无疑大大增强了政变者的势力。那么，政变前贵为“司徒、右仆射”的高归彦为何要投向势

单力薄的高演？

史书说“初济南自晋阳之邺，杨愔宣敕，留从驾五千兵于西中，阴备非常。至邺数日，归彦乃知之，由是阴怨杨、燕”[53]。这则史料，似乎也有问题。“西中”，胡三省认为是“晋阳皇宫”[54]。如果是出自“阴备非常”，即高演和高湛的阴谋，那么五千兵应该留在邺，而非晋阳。因为“二叔”已经随同皇帝回到了邺。如果是防备晋阳勋贵有什么异常的举动，五千人似乎有点太少？况且，辅政大臣都回到了邺，留下五千兵由谁来指挥呢？笔者倾向于认为，五千兵是留在邺城宫殿区，以防备“二叔”的异常举动。杨愔没有和高归彦商量是有原因的：当时高归彦的职务是“右仆射”，当时的“领军大将军”是可朱浑天和，所以不和高归彦商量是正常的。

但高归彦并不这么认为。他在高洋统治时期长期担任“领军大将军”，深知这一权力的重要，虽然升为“司徒、右仆射”，但实际的权力却不如“领军大将军”。身为辅政大臣，但留下从驾兵这么重要的事情没有参与决策，使得高归彦不能不仔细考虑自己的真实地位。考虑之后，高归彦决定暗通“二叔”，以换取更可靠的关系和权力上的更上一层楼。[55]

高归彦当时失去禁军统帅权，也可以从领军刘洪徽参与了政变看出来。参加了政变，刘洪徽肯定与高演、高湛、高归彦中至少一人有密切关系。查刘洪徽的资料，他本是刘贵的儿子，且是高欢的第三个女婿。[56] 娄昭君育有二女，刘洪徽不是娄氏的女婿，所以他并非娄昭君以及“二叔”的关系。刘洪徽也是长期在禁卫军任职，故可能与高归彦关系亲密。高归彦深知禁军的向背对于控制皇宫的重要性，失去禁军统帅权之后，只能将自己的亲信刘洪徽拉进政变阵营，以便于控制禁军。后来，政变者得以顺利进入皇宫并非高归彦一个人的功劳，这里面恐怕还有现任禁军将领刘洪徽的功劳。

高演在得到辅政大臣将对自己不利的消息之后，就假借打猎和弟弟高湛密谋了政变，参与人还有高孝瑜。[57] 是否还有其他人，史缺有间，不能详知。高演是乾明政变的主谋，但当时辅政大臣针对于高演的防范是严密的，所以在政变的筹划过程中，高演自然不能表现得过于活跃。高湛作为政变的二号人物，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前文讲过，政变者的最重要武装是数十位家僮，而这些家僮是高湛提供的。[58] 据黄永年先生的意见，皇宫侍卫被遣散后，京畿军队开入皇宫，是政变取得胜利的关键一步。高湛在政变前刚被辅政大臣解除京畿大都督，委任领并州刺史。政变之时，高湛尚在邺未去并州任职，可能京畿大都督的权力并未移交。也就是说，高湛对于京畿大都督府的掌控，是政变取得成功的保障。其实政变前，辅政大臣将对高演、高湛

不利的消息，是高归彦通过高湛传达到高演的。当时处于辅政大臣地位的高归彦得知杨愔等将对高演等下手，于是将这消息通知了高湛。[59] 高归彦告知高湛而非高演说明两件事：一是高演被严密监视；二是高归彦和高湛关系比较亲密。在政变当天，和数位“勋贵”通了气，取得其支持的正是高湛。在乾明政变的筹划过程中，高湛是牵针引线的联络员。从以上几点看来，高湛在政变中发挥的实际作用远远大于高演，没有高湛的帮助，政变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高湛所扮演的角色很重，在政变筹划中，高演答应事成之后立高湛为皇太弟。

政变成功后，取得最高权力的高演前往晋阳，留下高湛在邺以“录尚书事、领京畿大都督、右丞相”的身份控制邺城政局。这是高演对高湛的酬劳。高演登上皇位之后，兄弟之间的关系就没有那么和谐了。高演并没有立高湛为“皇太弟”，而是“立子百年为皇太子”，使得高湛“甚不平”。紧接着高演“以斛律丰乐为领军，以分武成（高湛）之权”。面对高演的夺权行为，高湛与河南王高孝瑜“谋于野”，显然不打算束手就擒。高演又派高归彦到邺“迎济南赴并州”。失去了监管高殷的权力，高湛的权力基础就被削弱，所以他甚至打算起兵造反。[60] 就在一触即发之际，高演意外受伤，在弥留之际将皇位留给了弟弟高湛，一场政治风波才得以和平解决。

乾明政变发起者势单力薄，但三位主谋各司其职，最终成功。由于曾是皇权的候选人，高演生命面临威胁，政变的策划者只能是他。高演受到严密监视，所以政变的具体工作是由高湛来实施的。感到不受信任的辅政大臣高归彦最终投靠了高演，使得政变者获得了绝密情报，先下手偷袭，这是政变成功的关键因素。另外，高归彦利用他在禁军中的影响力帮助政变者进入皇宫，又为政变一方增添了筹码。

三 娄昭君与乾明政变

据《北齐书·娄昭君传》：“尚书令杨愔等受遗诏辅政，疏忌诸王。太皇太后（娄昭君）密与孝昭（高演）及诸大将定策诛之，下令废立。”[61] 王怡辰据此认为，乾明政变的主谋是以娄昭君为首的勋贵，高演只是幕前傀儡。此为娄昭君主谋论的证据之一。[62] 其次，早在高洋去世后，娄昭君就提出以高演为继承人的提案，这无疑也成为娄昭君主谋论的证据。[63] 作为娄昭君主谋论的证据还有出自于《杨愔传》的一则史料：说是杨愔等人计划将高演和高湛调离中央，出为刺史。恐怕小皇帝“仁慈”不可奏，于是将这个计划密奏给了皇太后。皇太后读了密奏后，将这密件给闺蜜李昌仪看。不料想李昌仪“密启太皇太后”，使得杨愔“疏忌诸王”的事被娄昭君探得，具备了“密与孝昭及诸大将诛之”的动机。[64] 然而，证据一、三都有问题。

从杨愔受遗诏辅政到娄昭君“下令废立”，期间隔了大概有九个月的时间。娄昭君提出高演继位不果到乾明元年二月政变，间隔四个月；从高演掌权到娄昭君下令高演取代高殷为皇帝，又间隔五个月。如若娄昭君真的是“定策诛之，下令废立”两件事的主谋，那么中间肯定不会相隔五个月。其次，“诸大将”也颇让人以为娄昭君为勋贵的代表，其实“诸大将”只是段韶、高归彦和刘洪徽，寥寥数位。段韶是娄昭君的侄子、高演的表兄弟。刘洪徽是高欢的女婿。高归彦是高欢的族弟，在高洋统治时期长期担任禁军首领，也不是勋贵。这三位之中，只有段韶和晋阳六镇势力有比较亲密的关系。

前文已经论证过《杨愔传》作为史料，其可信程度并不高，所以对于李昌仪告密事，应该持谨慎态度。《杨愔传》说李昌仪“坐仲密事入宫”，就不大准确。李昌仪本是高仲密的妻子，高仲密叛逃西魏后，本来应该被“配没”，但是因为高澄喜欢，当了高澄的妾。高澄去世后，李昌仪的去向并不清楚，她和高澄并没有子女，恐怕难以在高澄家待下去。是否因此进入皇宫？还不能遽然断定。史书记载李昌仪“艳且慧，兼善书记，工骑乘”，又曾用计谋杀害高仲密喜欢的僧人显公。李氏如在皇宫，相信能干出来出卖皇太后的事情。与李昌仪告密事极其接近的是，当辅政大臣高归彦知道杨愔等人将对高演不利，也迅速向高湛告密。高归彦告密事，旁证丰富，是可信的。如果这两件事情都是真实的，那么辅政大臣将对“二叔”不利的密谋，就分别被出卖给了娄昭君和高演。即使李昌仪告密事为真，也不能作为娄昭君是政变主谋的证据。

由于证据一、三都缺乏说服力，所以娄昭君是政变真正主谋的论断，也是缺乏说服力的。娄昭君在乾明政变的关键时刻，说服李太后遣散禁卫军，为政变出了大力，但这毕竟和谁是主谋是性质不同的。娄昭君既然不是政变主谋，那么以娄昭君为首的勋贵策划了政变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勋贵假如是个政治集团的话也没有作为整体参与政变。乾明政变真正的主谋是高演。

四 乾明政变的性质

根据上文的分析，对于乾明政变有以下认识。在树立高洋的皇位继承人方面，由于太子高殷先天上的缺陷，恐怕不能很好地执行皇权，所以高演曾被高洋和娄昭君看做继承人。因为这个背景，高殷登基之后，高演就成为辅政大臣防范的主要对象，很快被剥夺了权位，性命堪忧。前领军大将军、右仆射、辅政大臣之一的高归彦对于被解除领军大将军不满，在得知辅政大臣将对高演不利的消息后，立刻告知高演。高演于是和弟弟高湛、侄子高孝瑜密谋了政变。由于高演被严密监视，高湛成为政变筹划中的主要人物。他在尚书省埋伏了自己的家

僮数十人，并且和部分勋贵取得了联系，赢得了他们的同情。于是乎，还蒙在鼓里的辅政大臣杨愔、尔朱天和、燕子献和大臣宋钦道，在参加尚书省的宴会时被偷袭，失去了人身自由。得手之后的政变者，押解着四位大臣前往皇宫。在前领军大将军高归彦和领军刘洪徽的帮助下（现任领军大将军尔朱天和已经被政变者控制）进入皇宫，在中书省前擒拿了另外一位辅政大臣郑颐。五位亲小皇帝派大臣被杀害于御府前，等于说皇帝的一只臂膀被政变者斩去。不过，深入皇宫的政变者还未能掌握主动，小皇帝在两千名全副武装的禁军的保护下安然无恙，倒是叛乱者势单力薄，处于不利地位。在此关键时刻，高演和娄昭君向李太后和小皇帝委婉解释其动机为：去除辅政大臣对于高演的压迫，对于皇权并不觊觎。轻信谎言之后，太后下令禁军遣散。这时候皇帝的另一只臂膀也被废掉，失去左膀右臂的皇帝也就无能为力。高湛假借诏令，带领京畿军入驻皇宫，政变于此时才算成功。

王怡辰认为，乾明政变是在东魏北齐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在此之前，东魏北齐的政治带有浓厚的文官主导的倾向。在此之后，勋贵取得了对政权的控制，北齐政治变为勋贵政治，后来又一变为恩倖政治。这个变化的原因就是，乾明政变是在以娄昭君为首的勋贵的策划下完成的，高演只是傀儡。政变成功后，自然勋贵就掌握了政权。高湛上台后，为了从勋贵手中夺取政权，利用了恩倖势力，于是北齐一变而为恩倖政治。[65] 根据本节的分析，直接参加乾明政变的勋贵严格算起来只有段韶一人，娄昭君并非政变的主谋，所以不能将乾明政变看做是勋贵势力策划，因而勋贵在政变之后也没能控制政权，恩倖政治的原因，要重新解释。北齐前期政治的性质，还是如同黄永年所言以文官政治为主线。

第三节 两都体制与东魏北齐政治

东魏甫建就存在着两个政治中心，即，作为高氏霸府所在地的晋阳和作为朝廷所在地的邺。北齐取代东魏之后晋阳实际上升格为都城，与邺一起形成南北二都。史学界很早就注意到了北朝的两个政治中心的问题。毛汉光曾就晋阳周围地区在北朝史上的意义进行了深入的阐发，说明了高欢建霸府于晋阳的原因。[66] 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将两魏周齐时期看做霸主克服自身的缺陷，建立自己的权威以取代北魏的正统性的时期。由于霸主要保持自己权力的独立性，所以在王都之外另立霸府。周齐建立之后，勋贵与汉人门阀的对立依然存在，因此两都体制依然存在。[67] 毛汉光与谷川都将东魏北齐的陪都看作北镇势力的大本营，这一结论也是本书讨论的基点。与毛汉光和谷川不同的是

本书主要研究北镇势力的长期凝聚给东魏北齐政治带来的负面影响。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解释两都体制形成的原因，而仅就北齐的迁都，以及迁都之后，“军国政务，皆归霸府”，即对政治重心的北移所造成的影响做一些分析。

一 东西魏分裂后社会势力的归向

北魏永熙三年，孝武帝带领部分官员及禁军西逃关中，建立了西魏政权。同年，高欢拥立孝静帝建立了东魏政权。不久，东魏迁都于邺。史称，“自是军国政务，皆归霸府”[68]。这说明了东魏政权的政治重心北移。之后的两年之中，北方出现了社会集团的逆向迁徙。在西魏做官的北镇武人向东魏逃走，而居住于河、洛、汝、颍地区的河南豪族，东魏官吏却逃向西魏。

先看北镇武人东逃的情形。《北史·齐神武纪》：“（天平）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拥众内属，神武迎纳之。”可朱浑道元在西魏已经官至刺史，不可谓不高，那么他为何东逃？从《北齐书·可朱浑元传》看原因有三。第一，“曾祖护野肱终于怀朔镇将，遂家焉。元宽仁有武略，少与高祖相知。”高欢霸业是以怀朔武人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这个特征对于出身于怀朔镇的可朱浑元要比由武川军人所组成的宇文泰幕府更加亲近。第二，“元既早被高祖知遇，兼其母兄在东，尝有思归之志，恒遣表疏与高祖阴相往来。”其实，从本传下文可朱浑元东逃后，“兄弟四人先在并州者，进官爵”看，其母兄得到高欢的照顾。[69] 由于可朱浑元与高欢书信往来，对这一情况是了解的。即，亲人被高欢所控制是可朱浑元东逃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可朱浑元从当时形势分析高欢实力上处于上风，宇文泰处于下风，他自然要弃暗投明。他曾经对刘丰称赞高欢，“英武非常，克成大业”。说明了他对高欢的欣赏。就可朱浑元在西魏的处境而言不是很和谐，他与贺拔岳宇文泰势力早就发生了隔阂。他本是侯莫陈悦的手下，在侯死后还与宇文泰发生过冲突。所以他深知自己处境艰险，一定要逃回东魏。

再看万俟普的东逃。《北齐书》卷二七《万俟普传》：

万俟普，字普拔，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别种也。雄果有武力，破六韩拔陵构逆，授普太尉。率部下降魏，授后将军，第二领民酋长。高祖起义，普远通诚款，高祖甚嘉之。斛斯椿逼帝西出，授司空，秦州刺史，据覆鞅城。高祖平夏州，普及率其部落来奔，高祖躬自迎接，授普河西公……累迁太尉，朔州刺史，卒。

子洛……及起义信都，远送诚款，高祖嘉其父子俱至，甚优其礼。除

抚军，兼灵州刺史。武帝入关，除左仆射。天平中，随父东归，封建昌郡公，再迁领军将军。

从此则材料看起来，万俟父子对高欢早就表示诚意了。但其他材料记载了万俟普的另一种意向。《周书》卷一《周文纪上》：

（侯莫陈）悦既惧太祖谋己，诈为诏书与秦州刺史万俟普拔，令与悦为党援。普拔疑之，封诏以呈太祖……悦遣其党王伯和、成次安将兵二千人助归镇原州。太祖遣都督侯莫陈崇轻骑一千袭归，擒之，并获次安、伯和等，送于平凉。太祖表崇行原州事。万俟普拔又遣其将叱干保洛领二千骑来从军。

侯莫陈悦是在高欢的唆使下才杀害贺拔岳的。万俟普不与侯莫陈悦合作，也就是不与高欢合作。从引文可以看出彼时，万俟普却与宇文泰的关系颇为融洽。那么，万俟普改变立场投奔高欢是在何时，又因为什么呢？《北史》卷六《齐神武纪》：

（天平）三年正月甲子，神武帅库狄干等万骑袭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缚矟为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费也头斛拔俄弥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张琼以镇守，迁其部落五千户以归。西魏灵州刺史曹泥与其婿凉州刺史刘丰遣使请内属。周文围泥，水灌其城，不没者四尺。神武命阿至罗发骑三万径度灵州，绕出西军后，获马五十匹，西师乃退。神武率骑迎泥、丰生，拔其遗户五千以归，复泥官爵。魏帝诏加神武九锡，固让乃止。

二月，神武令阿至罗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拔，神武以众应之。六月甲午，普拔与其子太宰受洛干、豳州刺史叱干宝乐、右卫将军破六韩常及督将三百余人拥部东降。

在《北史·齐神武纪》中，记万俟普投降是因为高欢率大军来逼，是被胁迫而投降。这与万俟普本传不同，《北齐书》其传曰：“高祖平夏州，普乃率其部落来奔，高祖躬自迎接。”[70] 即，万俟普是自动投降。本传为尊者讳也在情理之中，但高欢一逼，不仅引来所逼之万俟普投降，而且还连带着豳州刺史叱干宝乐、右卫将军破六韩常及督将三百人拥众来降。督将在北朝史中一般指鲜卑武人。这么大规模而整齐的东逃，恐怕不是高欢一逼所能生效的。可以推测这是里应外合的一次投降。所以引文中之“逼”，恐怕应该理解为接近，而不应理解为“逼迫”。高欢率众应之，也应该理解为迎接。如果万俟普等人的东逃不是被逼，那又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是高欢建霸府于晋阳以及相关事件对北镇人物所产生的心理影响。

东西魏分立之后，原北魏政治体制中的人员都面临着归东，还是归西的选择。在西魏初年，宇文泰所经营的地盘，其重心在关中地区，而高欢则在并肆汾地区。这样，对于原居住于北镇的鲜卑武人来说，高欢的霸府无疑更有吸引力。其次，高欢迁都于邺，说明了他完全控制了东魏的政局。东魏相对于建设初期的西魏来说无疑是更强有力，更稳定的政权。再次，高欢对陕北高原部族的经略显示了其强大的武力。这些原因不仅使原本就倾向于高欢的可朱浑元东逃，而且使陕北高原的土著曹泥、刘丰也抛弃了西魏。目睹了种种事变之后，原本归心于宇文泰的万俟普也抵挡不住诱惑，因而东逃。

与驻守于陕北高原的北镇武人东逃相反，定居于河洛汝颍地区的豪族、士族以及原洛阳政府的部分官吏都在相同的时期内逃向关中的西魏政权。《周书》卷二《周文纪下》：

（大统三年）八月丁丑，太祖率李弼、独孤信、梁御、赵贵、于谨、若干惠、怡峰、刘亮、王德、侯莫陈崇、李远、达奚武等十二将东伐……先是河南豪杰多聚兵应东魏，至是各率所部来降……遣左仆射、冯翊王元季海为行台与开府独孤信率步骑二万向洛阳……东魏颍川长史贺若统与密县人张俭执刺史田迅举城降。荥阳郑荣业、郑伟等攻梁州，擒其刺史鹿永吉；清河人崔彦穆、檀琛攻荥阳，擒其郡守苏定：皆来附。自梁、陈已西，将吏降者相属。

由引文，不难想象在大统三年，黄河以南地区的官吏、地方豪强纷纷投降西魏的盛况。在西逃的各种人之中，地方豪强的西投无疑最具影响力，我们分别看下这些豪强。

1.荥阳郑氏。上段引文中的郑伟《周书》卷三六有其传：

郑伟字子直，荥阳开封人也，小名阇提，魏将作大匠浑之十一世孙。祖思明，少勇悍，仕魏至直閤将军，赠济州刺史……（伟）起家通直散骑侍郎。及孝武西迁，伟亦归乡里，不求仕进。大统三年，河内公独孤信既复洛阳，伟乃谓其亲族曰：“今嗣主中兴鼎业，据有崤函。河内公亲董众军，克复瀍洛，率土之内，孰不延首望风。况吾等世荷朝恩，家传忠义，诚宜以此时效臣子之节，成富贵之资。岂可碌碌为懦夫之事也！”于是与宗人荣业，纠合州里，建义于陈留。信宿之间，众有万人。遂攻拔梁州，擒东魏刺史鹿永吉及镇城令狐德，并获陈留郡守赵季和。乃率众来附。因是梁、陈之间，相次降款。

2.河内司马氏。《周书》卷三六《司马裔传》：

司马裔字遵胤，河内温人也，晋宣帝弟太常馗之后。曾祖楚之，属宋

武帝诛晋氏戚属，避难归魏。位至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朔州刺史，封琅邪王。

裔少孤，有志操，州郡辟召，并不应命。起家司徒府参军事。后以军功，授中坚将军、员外散骑常侍。及魏孝武西迁，裔时在邺，潜归乡里，志在立功。

大统三年，大军复弘农，乃于温城起义，遣使送款。与东魏将高永洛、王陵等昼夜交战。众寡不敌，义徒死伤过半。及大军东征，裔率所部从战河桥，又别攻怀县，获其将吴辅叔。自此频与东魏交战，每有克获。六年，授河内郡守。寻加持节、平东将军、北徐州刺史。八年，率其义众入朝。太祖嘉之，特蒙赏劳。顷之，河内有四千余家归附，并裔之乡旧，乃授前将军、太中大夫，领河内郡守，令安集流民。十三年，攻拔东魏平齐、柳泉、蓼坞三城，获其镇将李熙之。加授都督。

按荥阳郑氏，河内司马氏从魏晋以后，就一直为本州郡的首望，而成为有名的地方豪族。从郑伟举手一呼“信宿之间，众有万人”，从司马裔所率的义徒“频与东魏交战，每有克获”看，二人在当地有极强的社会影响力。在东西魏分立之后，二人的反应是潜回乡里。其目的呢？据郑伟的言论，他因为“世荷朝恩，家传忠义”，也就是说他们有世代受到北魏朝廷的恩遇，所以他要“效臣子之节，成富贵之资”，拥护西魏朝廷。但是，这些原因都不足以让人信服他为什么只忠于西魏而不忠于东魏。这东西魏的皇帝都是出自北魏孝文帝的嫡系，只忠于这个而不忠于那个，怎能服人？看来其中另有原由。司马裔的理由比较简单，说他潜归乡里，是“志在立功”。这与郑伟“成富贵之资”的愿望相应，看来这是一个可靠的理由。即，二人在东魏境内举义，只是为了建功立业。那么，他们的功业为什么不能通过东魏政府的手中获得呢？这是因为东魏迁都于邺，直接损害了河南豪族的地方利益。陈爽在其专著《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第五章，“荥阳郑氏兴起”一节论述了孝文帝迁洛使得荥阳郑氏政治地位提高，并且其门第也由地方郡姓升为四海大姓的过程。而荥阳郑氏的经济利益较前增加更是意料中事。以郑氏推之，其他的河南豪族，也能从定都于洛阳这一政治变迁之中获得实利。这些豪族对于高欢仓促之中的迁都到底会给其家族造成怎样的影响并不清楚，但这一举动引发了豪族普遍的恐慌，自是情理中事。于是，他们不惜与东魏决裂，招引西魏来谋取功利。再看其他豪族的动向。《周书》卷三六《崔彦穆传》：

崔彦穆字彦穆，清河东武成人也，魏司空、安阳侯林之九世孙。曾祖凯，魏东平府谘议。祖蔚，遭从兄司徒浩之难，南奔江左。仕宋为给事黄门侍郎，汝南、义阳二郡守。延兴初，复归于魏，拜颍川郡守，

因家焉。后终于郢州刺史……魏孝武西迁，彦穆时不得从。大统三年，乃与兄彦珍于成皋举义，因攻拔荥阳，擒东魏郡守苏淑。仍与乡郡王元洪威攻颍川，斩其刺史李景遗。

清河崔蔚从刘宋回到北魏后并没有定居于原籍而是定居于颍川。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到崔彦穆时候在颍川已经有相当的实力，能够号召一支军队了。

《周书》卷三六《刘志传》：

志，弘农华阴人，本名思，汉太尉宽之十世孙也。高祖隆，宋武帝平姚泓，以宗室首望，召拜冯翊郡守。后属赫连氏入寇，避地河洛，因家于汝颍。祖善，魏天安中，举秀才，拜中书博士。后至弘农郡守，北雍州刺史。父环，汝南郡守，赠徐州刺史。……大统三年，太祖遣领军将军独孤信复洛阳。志纠合义徒，举广州归国。

刘志的高祖父刘隆是在北魏明元帝泰常年间从关中迁到汝颍地区。到了刘志这一代，刘氏已经在汝颍地区发展了较可观的乡里势力。当是地方豪族。

《周书》卷三七《赵肃传》：

赵肃字庆雍，河南洛阳人也。世居河西。及沮渠氏灭，曾祖武始归于魏，赐爵金城侯。祖兴，中书博士。父申侯，举秀才，后军府主簿。

肃早有操行，知名于时……东魏天平初，除新安郡守。秩满还洛……

大统三年，独孤信东讨，肃率宗人为向导。授司州治中，转别驾。监督粮储，军用不匮。太祖闻之，谓人曰：“赵肃可谓洛阳主人也。”

北凉沮渠氏是被北魏太武帝所灭，并迁其国人于平城附近。赵肃的祖先应该是在太武帝时迁入平城。赵肃之为洛阳人，当是孝文帝南迁时，从平城南迁到洛阳。从其率宗人，而且监督粮储方面看，赵肃也应该是有相当宗族乡里势力的豪族。

以上例证反映了同一地域洛阳周围地区，同一阶层地方豪族的同一政治动向投降西魏。这三个相同使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高欢的迁都行为严重伤害了河南豪族的利益，迫使他们与东魏决裂，投向西魏。

投奔关中的不仅有地方豪族，也有洛阳官僚。《周书》卷四三《李延孙传》：

自魏孝武西迁之后，朝士流亡。广陵王欣、录尚书长孙稚、颍川王斌之、安昌王子均及建宁、江夏、陇东诸王并百官等携持妻子来投延孙者，延孙即率众卫送，并赠以珍玩，咸达关中。齐神武深患之，遣行台慕容绍宗等数道攻之。

据《北齐书·慕容绍宗传》，慕容绍宗之进攻李延孙是在天平二年。那么天平元年七月的孝武西迁至天平二年之间，应为洛阳百官西逃的时间，这应该包括天平元年九月高欢迁都之后。引文中解释百官西逃的原因是，“孝武西迁之后，朝士流亡”。那么导致朝士流亡的是不是孝武西迁呢？有这一方面的原因，也有高欢处置失当所引发的朝士流亡。首先是高欢杀戮大臣所引发的恐慌与仇恨。

北魏永熙三年七月孝武帝逃入关中，八月高欢气急败坏地赶到洛阳，他斥责百官说：“为臣奉主，匡救危乱，若处不谏争，出不陪随，缓则耽宠争荣，急便逃窜，臣节安在！”接着下令将开府仪同三司叱列延庆，兼尚书仆射辛雄，兼吏部尚书崔孝芬，都官尚书刘廞，兼度支尚书杨机，散骑常侍元士弼处死。[71] 这个行动实在是粗暴无理至极。如果说仅杀曾背叛高欢的叱列延庆与孝武帝的亲信元士弼倒也能理解。但另外四名士大夫却被无理处死，让人感到高欢有打击汉族官僚的倾向。由此而引起的西逃就不可避免。在崔孝芬死后，他的儿子崔猷，“遂间行入关”[72]。

让洛阳官僚更加不能接受的是高欢仓促之间所决定的迁都于邺。在一种没有任何动员，也没有任何事先准备的情形之下，迁徙四十万人到数百里之外，并营造一所新都城。这必然会引发技术环节上的许多困难。如果这些困难不能解决，迁都必然引发社会动荡。《魏书·常景传》：“天平初，迁邺，景匹马从驾。是时诏下三日，户四十万狼狈就道，收百官马，尚书丞郎已下非陪从者尽乘驴。齐献武王以景清贫，特给车牛四乘，妻孥方得达邺。”[73] 常景是在政府特殊资助的情形之下才得以到达邺。如果没有政府帮助，怎样迁徙？其中的困苦不难想象。这种客观的困难或许可以克服，但迁都在心理上给官员们的压力或失落感更大。《北史·齐神武纪》：“初，神武自京师将北，以为洛阳久经丧乱，王气衰尽，虽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狭，不如邺，请迁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为永永之基，经营制度，至世宗乃毕。王即功在社稷，宜遵太和旧事。’”[74] 官僚们对洛阳有特殊的感情。正如孝武帝所言它代表了孝文帝汉化的成果。这些成果会不会因迁都而改变。官僚们没有得到解释，但他们担心高欢会改变制度。所以有一批人宁愿逃向关中。

在东魏迁都之后的两三年之中，东西魏之间的确发生了特定人群的逃亡事件。驻守于陕北高原的鲜卑武人及部族势力向东魏逃亡，而居住

于洛阳及其周围地区的官僚、地方豪族向西魏逃亡。鲜卑武人向东魏的逃亡说明了高欢霸府的吸引力比宇文泰要大。这与高欢政治重心的北移有密切关系。而高欢粗暴地对待洛阳官僚以及仓促地迁都行为导致了洛阳官僚及洛阳附近地方豪族的恐慌与敌视，从而导致了这些人的西逃。这是高欢政治重心北移政策所产生的消极后果。

这两支人群的移动对于东魏政府来说影响并不大。东迁来的武人在高欢的霸府之中只占较小的比例，不足以改变霸府的实力。而西逃的官僚与地方豪族并没有让东魏政府有人才匮乏之感。

然而对于西魏政府来说却是影响重大。西魏政府相对来说人才缺乏。因而西来的官僚无疑地会对西魏的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产生方向性的改变。这些官僚的统治经验、管理经验、制度与文化的知识都是西魏所缺乏的资源。由于这批官僚的加入才使西魏政府得以完备，可以正常运行。而地方豪族所带来的兵马足以弥补东逃武人所带来的损失。河南豪族在当地所引发的暴动更有利于西魏的军事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西逃人员是高欢的损失，给东魏北齐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二 两都的文化差异

高欢的幕僚杜弼看到文武官员纳贿之风甚盛，就提醒高欢加以制止。高欢的回答是："弼来，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 [75] 在高欢看来，成立一个国家需要两大人群的支持，即鲜卑武人和中原士大夫。而且他认为衣冠礼乐是中原士大夫最为关心的事情。因而他不会去伤害两者之中任何一个的利益。所以，迁邺之后的东魏政府在结构上仍然保持着洛阳的模式，在文化上仍然延续着洛阳的脉络。

在高欢的儿子高澄主持下的邺政府在一些制度上还是强化了对汉文人尤其是士族的优待。在选举制度上比之于北魏末年就有改进。《北齐书·文襄纪》："元象元年，摄吏部尚书。魏自崔亮以后，选人常以年劳为制，文襄乃厘改前式，铨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荐擢，假有未居显位者，皆致之门下，以为宾客，每山园游燕，必见招携，执射赋诗，各尽其所长，以为娱适。" [76] 北魏孝明帝时期由崔亮设计的以"停年格"来选拔人才的方式，是在武人参选的情况下做出的。在东魏，高澄废止了"停年格"，专以"才地"作为选举的标准。所谓才是指文笔和经学，地指门阀。在

南北朝时代文笔优美，经学博洽的才名之士大多出身于士族。因而高澄的选举标准是专为文人而设而且偏向于士族的。

这种标准在东魏北齐基本上是一贯执行的。《北齐书·辛术传》："迁邺以后，大选之职，知名者数四，互有得失，未能尽美。文襄少年高朗，所弊也疏；袁叔德沉密谨厚，所伤者细；杨愔风流辨给，取士失于浮华。唯术性尚贞明，取士以才以器，循名责实，新旧参举，管库必擢，门阀不遗。"[77] 史家为了揄扬辛术，将其与另三位吏部尚书一一比较，指出三者的不足。其实都是掌握标准程度的不同，但其标准都是一样，即才地。另外一位吏部尚书也一样。《北齐书·阳休之传》说他，"多识故事，谙悉氏族，凡所选用，莫不才地俱允"[78] 。即达到才干与门阀的完美结合。

因为东魏北齐是以这样一种标准作为任官条件，所以一批批的有才学的士族子弟就被选入政府，从而使邺政府保持中原王朝所应有的方式运转。文献可证，在外交、礼仪、订律、修史等方面文化人积极参与了邺政府的工作。

（一）外交

《北史》卷四三《李谐传》：

天平末，魏欲与梁和好，朝议将以崔为使主。曰："文采与识，不推李谐，口颊翩翩，谐乃大胜。"于是以谐兼常侍、卢元明兼吏部郎、李业兴兼通直常侍聘焉。梁武使朱异觇客，异言谐、元明之美。谐等见，及出，梁武目送之，谓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敌，卿辈常言北间都无人物，此等何处来？"谓异曰："过卿所谈。"是时，邺下言风流者，以谐及陇西李神儁、范阳卢元明、北海王元景、弘农杨遵彦、清河崔瞻为首。初通梁国，妙简行人，神儁位已高，故谐等五人继踵，而遵彦遇疾道还，竟不行。既南北通好，务以俊乂相矜，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梁使每入，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宴日，齐文襄使左右觇之。宾司一言制胜，文襄为之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亲与谈话，甚相爱重。

邻国之间在和平时期的较量尽在于使节之间的辩难。而这就不是武人所能胜任的了。在东魏用以与萧梁抗衡的五大名士都出自中原士族，而且都是在洛阳文化浸润下成长为才名之士的。这样一种文化上的战争无疑抬高了文化士族的地位，急于在文化上证明自己地位的高欢父子不得不重用这些士族文人。对于士族来说，出使本身就等于提升了自家的地位，在当时人来看是光耀门庭的事情。《北齐书·李浑

传》：“浑与弟绘、纬俱为聘梁使主，湛又为使副，是以赵郡人士，目为四使之门。”[79] 可见对于能产生四位使臣的家族，州里是引以为荣的。出使不仅有荣誉上的提高，而且有物质上的收益。《北齐书·魏收传》：“收兼通直散骑常侍，副王昕使梁……收在馆，遂买吴婢入馆，其部下有买婢者，收亦唤取，遍行奸秽……使还，尚书右仆射高隆之求南货于昕、收，不能如志，遂讽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于其台，久之得释。”[80] 可见，出使可以买吴婢、南货。因而出使在士族文人眼中值得珍惜。《北史·李纬传》：“梁谢蔺来聘，纬劳之。蔺问安平诸崔，纬曰：‘子玉以还，雕龙绝矣。’崔暹闻之怒，纬诣门谢之，暹上车不顾。纬语人曰：‘虽失要人意，聘梁使不得舍我。’”[81] 崔暹是高澄的心腹，得罪他不会有什么好处，但李纬唯一担心的是不让他出使梁国。可见他对使臣职务是极为珍惜的。总之，派高门士族出使既提升了东魏的地位，也赢得了士族的欢心，一举两得。

（二）制礼

《北齐书》卷二九《李绘传》：

时勅侍中西河王、秘书监常景选儒学十人缉撰五礼。绘与太原王乂同掌军礼。

（三）订律

《北齐书》卷四三《封述传》：

天平中，增损旧事为《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条，皆述删定。

《北齐书》卷三〇《崔暹传》：

后迁左丞、吏部郎，主议《麟趾格》。

（四）修史

《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

收本以文才，必望颖脱见知，位既不遂，求修国史。崔暹为言于文襄曰：“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文襄启收兼散骑常侍，修国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领兼中书侍郎，仍修史……四年，神武于西门豹祠宴集，谓司马子如曰：“魏收为史官，书吾等善恶，闻北伐时，诸贵常饷史官饮食，司马仆射颇曾饷不？”因共大笑。仍谓收曰：“卿勿见元康等在吾目下趋走，谓吾以为勤劳，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寻加兼著作郎。

史官记录发生在东魏的各项要事，记录高欢父子的功业，也记录他们的不光彩的一面。这不是武人所能胜任的。所以高欢就不能不对史官显示讨好之意，希望其能手下留情。

不难看出，东魏的文职岗位总是由文人来主持政务。因而东魏政府可以说是洛阳政府的延续，东魏邺下文化也应该是洛阳文化的发展，即为东魏的文化传播中心。《北齐书·樊逊传》："时秘府书籍纰缪者多，逊乃议曰：'……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书辛术、司农少卿穆子容、前黄门郎司马子瑞、故国子祭酒李业兴并是多书之家，请牒借本参校得失。'秘书监尉瑾移尚书都坐，凡得别本三千余卷，五经诸史，殆无遗缺。"[82] 以上诸藏书家都当朝为官，故其藏书当在邺下。这些藏书不仅提供给官方，供校勘之用，有时还提供给年轻人，供研读。《北齐书》卷四四《儒林·刘昼传》：

刘昼，字孔昭，渤海阜城人也。少孤贫，爱学，负笈从师，伏膺无倦。与儒者李宝鼎同乡里，甚相亲爱，受其《三礼》。又就马敬德习《服氏春秋》，俱通大义。恨下里少坟籍，便杖策入都。知太府少卿宋世良家多书，乃造焉。世良纳之。恣意披览，昼夜不息。河清初，还冀州。

《北史》卷三〇《卢思道传》：

思道字子行，聪爽俊辩，通侻不羁。年十六，中山刘松为人作碑铭，以示思道，思道读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读书，师河间邢子才。后复为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叹曰："学之有益，岂徒然哉！"因就魏收借异书。数年间，才学兼著。

刘昼与卢思道出身不同，但都因为邺下藏书家的资助，才得以学有所成。可见邺下的确为东魏文化之传播地。在邺下还有学术的讲演与讨论。《北齐书·李绘传》："魏静帝于显阳殿讲《孝经》、《礼记》，绘与从弟骞，裴伯茂、魏收，卢元明等俱为录义。"[83] 东魏孝静皇帝，史书记他善于文学。[84] 由他亲自主持的儒学讲座也由当时的大学者共同参与，可以想象水平是高的，其对带动东魏士大夫学习经典的热情方面也肯定会有所帮助。《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

（武定）六年四月八日，魏帝集名僧于显阳殿讲说佛理，弼与吏部尚书杨愔、中书令邢邵、秘书监魏收等并侍法筵。敕弼升师子座，当众敷演。昭玄都僧达及僧道顺并缁林之英，问难锋至，往复数十番，莫有能屈。帝曰："此贤若生孔门，则何如也？"……（天保中）尝与邢邵扈从东山，共论名理。邢以为人死还生，恐为蛇画足。弼答曰："盖谓人死归无，非有能生之力。然物之未生，本亦无也，无而

能有，不以为疑。因前生后，何独致怪？”……其后别与邢书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证，而违孔背释，独为君子。若不师圣，物各有心，马首欲东，谁其能御。奚取于适衷，何贵于得一。逸韵员高，管见未喻。”前后往复再三，邢邵理屈而止，文多不载。

邺下的学术讲演不仅有儒学，也有佛学。而杜弼与邢邵所争论的问题显然就是哲学命题了。学者态度的严肃，语言的精妙体现了邺下文化的活力。

高欢当然不会只是把汉文人供养起来，他也会利用文人来达到他个人的政治目的，钳制勋贵。那么高欢为什么要钳制勋贵呢？因为勋贵们的贪赃枉法侵蚀了东魏政权的基础，等于是挖高欢事业的墙角。这让高欢无法容忍。但他不能亲自加以制止。高欢清楚地知道勋贵们之所以为自己卖命，就是为了这一天。所以他不能让自己站在昔日战友的对立面去，这样做的后果十分严重。因而，他得找一批打手来替他完成。他所选中的就是汉族文人。汉族文人数量庞大，而且还有着强烈的治世济民、反对腐败的责任感。杜弼曾对高欢说在攻打西魏之前应该先铲除内贼。高欢问他内贼是谁。他说，“诸勋贵掠夺万民者皆是”[85]。让汉文人去扼制腐败的确是找对了人。《北齐书》卷三〇《崔暹传》：

武定初，迁御史中尉，选毕义云、卢潜、宋钦道、李愔、崔瞻、杜蕤、嵇晔、郦伯伟，崔子武、李广皆为御史，世称其知人。

世宗欲假其威势。诸公在坐，令暹高视徐步，两人挈裾而入，世宗分庭对揖，暹不让席而坐，觞再行，便辞退。世宗曰：“下官薄有蔬食，愿公少留。”暹曰：“适受勅在台检校。”遂不待食而去，世宗降阶送之。旬日后，世宗与诸公出之东山，遇暹于道，前驱为赤棒所击，世宗回马避之。

暹前后表弹尚书令司马子如及尚书元羡、雍州刺史慕容献，又弹太师咸阳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罪状极笔，并免官。其余死黜者甚众。高祖书与邺下诸贵曰：“崔暹昔事家弟为定州长史，后吾儿开府谘议，及迁左丞吏部郎，吾未知其能也。始居宪台，乃尔纠劾。咸阳王、司马令并是吾对门布衣之旧，尊贵亲昵，无过二人，同时获罪，吾不能救，诸君其慎之。”高祖如京师，群官迎于紫陌。高祖握暹手而劳之曰：“往前朝廷岂无法官，而天下贪婪，莫肯纠劾。中尉尽心为国，不避豪强，遂使远迩肃请，群公奉法。冲锋陷阵大有其人，当官正色，今始见之。今荣华富贵，直是中尉自取，高欢父子，无以相报。”赐暹良马，使骑之以从，且行且语。暹下拜，马惊走，高祖为拥之而授辔。魏帝宴于华林园，谓高祖曰：“自顷朝贵、牧守令长，

所在百司多有贪暴，侵削下人。朝廷之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弹劾，不避亲戚者，可劝酒。”高祖降阶，跪而言曰：“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谨奉明旨，敢以酒劝，并臣所射赐物千疋，乞回赐之。”帝曰：“崔中尉为法，道俗齐整。”暹谢曰：“此自陛下风化所加，大将军臣澄劝奖之力。”世宗退谓暹曰：“我尚畏羡，何况余人。”由是威名日盛，内外莫不畏服。

《北齐书》卷四七《酷吏传·宋游道传》：

后神武自太原来朝，见之曰：“此人宋游道耶？常闻其名，今日始识其面。”迁游道别驾。后日，神武之司州，飨朝士，举觞属游道曰：“饮高欢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为人，合饮此酒。”及还晋阳，百官辞于紫陌。神武执游道手曰：“甚知朝贵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怀畏虑，当使卿位与之相似。”于是启以游道为中尉。文襄执请，乃以吏部郎中崔暹为御史中尉，以游道为尚书左丞。文襄谓暹、游道曰：“卿一人赴南台，一人处北省，当使天下肃然。”游道入省，劾太师咸阳王坦、太保孙腾、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录尚书元弼、尚书令司马子如官赉金银，催征酬价，虽非指事赃贿，终是不避权贵……

魏安平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诸王妃、太妃是其近亲者皆被征责。都官郎中毕义云主其事，有奏而禁，有不奏而辄禁者。游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于是及诬游道……而文襄闻其与隆之相抗亡言，谓杨遵彦曰：“此真是鲠直大刚恶人。”遵彦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数吠杀之，恐将来无复吠狗。”

从引文反映的情况看，高欢的目的是达到了。汉族文人对于处置贪污果然毫不手软。同时，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高欢父子稍显做作的表演。这种表演一方面是给文人们造势，另外一方面是撇清自己。高欢父子极力给勋贵们造成是文人而不是高氏父子与之作对的假象。其用心可谓阴险。而充当斗犬的汉官僚浑然不觉，干得十分投入，连高澄都感到意外。这两种势力的斗争由此展开，使得北齐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被毒化。

高欢澄清吏治的另外一个方略就是树立典范。《北齐书》卷四三《李稚廉传》：

李稚廉，赵郡高邑人也……聪敏好学，年十五，颇寻览五经章句……（天平中）高祖行经冀州，总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校户口增损。高祖亲自部分，多在马上，征责文簿，指景取备，事绪非一。稚廉每应机立成，恒先期会，莫不雅合深旨，为诸州准的。高祖顾谓司马子如曰：“观稚廉处分，快人意也。”因集文武数万人，令郎中杜弼宣旨慰

劳，仍诘诸州长史，守令等，诸人并谢罪，稚廉独前拜恩，观者咸叹美之。其日，赐以牛酒。

对于统治者高欢，他希望政府由李稚廉这样的官员来治理，国富民强进而统一全国。所以，不惜大肆渲染，以引起仿效。用心是良苦的。

虽然高欢父子在澄清吏治上下了工夫，但仅能做到让吏治不至于腐败到坏死。观东魏北齐，可以说真正胜任的官员是不多的。统治阶层的素质低劣是东魏北齐吏治败坏的根本原因。

以上论述了东魏初年邺下文官政府以及邺下文化的基本性质。邺政府基本上是洛阳政府的翻版，邺下文化是洛阳文化的延续。在高欢与高澄父子的促进下，邺下文化并没有停滞或倒退。但是两都体制的存在，尤其是高欢同样注意保持晋阳的鲜卑化倾向，使得两都文化背道而驰。邺下的文化越进步，人才越繁盛，就越引起晋阳武人的反感与恐慌，北齐的统治因而是不稳定的。

三 政治中心的北移对军事部署的影响

高欢将晋阳作为霸府所在地，其主要的目的是想把晋阳及周围地区建成军事基地，保持鲜卑军人善于骑射的优势。这样，高欢就保证了其军队对西、对南的优势。建都晋阳不利的一面是距游牧民族较近，容易受到侵扰，必得在北境进行防守。

迁都于邺就避开了西魏的突袭，而且与晋阳形势相接，便于控制，加之处于华北平原富庶区，供给便利。然而，从洛阳撤到邺，从战略态势上是退守的姿态。都城撤到河北，河南地区容易动荡，必须有大将独立防守，且距晋阳遥远，颇难控御。

在这种两都体制之下高欢怎样布置大臣？以下我们列举高欢统治时期刺史的任职区域。[86]

并州刺史：齐文襄帝高澄、齐文宣帝高洋、孙腾、高隆之、封隆之。

肆州刺史：斛律平、王基、尔朱文畅、刘贵。

汾州刺史：卢怀道、张琼、侯莫陈相、斛律金。

朔州刺史：库狄盛、万俟普。

恒州刺史：薛孤延。

显州刺史：斛律平、薛孤延、侯莫陈相。

尉州刺史：王怀、张保洛、侯莫陈相。

燕州刺史：斛律平、步大汗萨。

幽州刺史：尉长命、库狄盛、卢文伟、张亮。

营州刺史：牒舍乐。

南营州刺史：赵猛、卢宗道。

安州刺史：尧杰、高延伯、卢文伟。

冀州刺史：封隆之、高昂、司马子如、孙腾、斛律金、尉景、清河王高岳。

定州刺史：赵郡王高琛、娄昭、段荣。

沧州刺史：高慎。

瀛州刺史：韩轨、段荣、尧雄。

相州刺史：段荣、孙腾、高隆之。

济州刺史：高永乐、段荣、斛律平、蔡儁、高季式、封隆之。

青州刺史：清河王高岳、尉景、高隆之、斛律羌举、慕容绍宗、封延之、卢文伟。

齐州刺史：许惇、李义深、薛修义。

晋州刺史：清河王高岳、莫多娄贷文、高市贵、慕容绍宗、薛修义、高季式、封延之。

建州刺史：刘贵、张遵业、李密、韩贤。

东雍州刺史：慕容俨、范舍乐、潘乐、卢文伟。

北雍州刺史：步大汗萨。

陕州刺史：刘贵、卢勇。

洛州刺史：韩贤、王则、破六韩常、卢勇。

华州刺史：金祚、叱列平、薛嘉族。

广州刺史：暴显、卢勇、薛嘉族。

襄州刺史：李密。

扬州刺史：薛嘉族、蔡儁。

颍州刺史：尧奋、李贵遗。

北豫州刺史：高永乐、高慎、王基。

豫州刺史：韦子粲、尧奋、尧雄、高昂。

怀州刺史：平鉴。

徐州刺史：高归彦、任延叔、王则、慕容绍宗、李元忠、崔□。

北徐州刺史：暴显。

东徐州刺史：李玙、薛修义。

兖州刺史：尧杰。

南兖州刺史：尧杰。

西兖州刺史：宋显。

荆州刺史：王则。

东荆州刺史：李愍。

南荆州刺史：李愍。

由上可以看出，并州刺史一般是由高欢的儿子和亲信幕僚担任的。肆、汾、朔、恒、显、蔚、燕七州的刺史基本上是由北镇鲜卑担任。而以上鲜卑族刺史之中除张琼与步大汗萨是尔朱将帅，投靠高欢较晚外，其他都是跟随高欢信都起兵的心腹将领。这样的人员配置，与晋阳及周围地区和北镇鲜卑聚居之地是相适应的。这八州就是东魏的军事重心之所在。

幽州、营州、安州位于东魏东北边境上。其刺史是河北豪族范阳卢氏、渤海高氏以及鲜卑武人。鲜卑武人之中尧杰、牒舍乐出自尔朱将帅。这样非高欢心腹在东北边州刺史中占多数。可见，东北边州虽然要防御奚、契丹，但刺史人选比晋阳周围数州之刺史低一等。

豫、北豫、荆、东荆、南荆、山、陕、梁、洛、襄州等州的刺史有尧雄、尧奋、王则等尔朱将帅，也有卢勇、薛嘉族、李愍、高慎、许琼、封隆之、韦子粲、平鉴等汉人。其中像刘贵、高永乐这样的高欢心腹占比例极小。这些州在东魏属西南行台防区，大约相当于今天河南省西部、南部、湖北省北部、陕西省南部，其行台长期由侯景担任。

徐州、东徐州、北徐州刺史中有王则、慕容绍宗。此二人为尔朱将帅。也有高归彦、任延敬这样的高欢心腹。其中李元忠、崔棱、李玙、薛修义这样的汉人似乎占最大比例。此三州在东魏属东南道行台，担任过行台的有任延敬、慕容绍宗。

综合东南道与西南道防区的刺史任职情况，其中汉人最多，其次是尔朱将帅，再次是高欢心腹。这一种情况与晋阳周围州刚好相反。这显示了随高欢心腹的递减，防区重要性递减的原则。而这一种重要性的设定是服务于高欢的战略取向的。

在高欢一生的最后十数年中，他发动了对西魏的五次战争，最后病倒在战场上。这说明了征服西魏才是他的战略目标。对于北方的柔然民族，高欢实行和亲政策，边境相对宁静。[87] 由于着眼于西进战略，高欢对于河南地区的防务就不能兼顾。

东魏政府迁邺之后，河南对于东魏的战略意义有所减轻。但是与西魏、萧梁邻接承受的军事压力并未稍减。而且，迁邺之后河南地区的豪族纷纷响应西魏，河南地区战火不断。可以说河南地区是东魏疆域内战乱最频繁的地区。

因而河南地区就需要一位帅才来主持防务工作。在高欢的手下不缺乏勇冠三军的武将，但智勇双全的帅才却是难求。合适的人选，只有慕容绍宗和侯景。二者比较之下，侯景与高欢有布衣之旧，而高欢对于布衣之交比较看重。比如司马子如本是尔朱氏的亲信，后来投奔高欢。高欢并没有嫌弃，“仍叙平生恩旧。寻追赴京，以为大行台尚书，朝夕左右，参知军国。天平初，除左仆射，与侍中高岳，侍中孙腾，右仆射隆之等共知朝政，待之甚厚……并坐同食，从旦达暮，及其当还，高祖及武明后俱有赍遗，率以为常”[88] 。对于刘贵也是一样，“虽非佐命元功，然与高祖布衣之旧，特见亲重”[89] 。所以高欢

让侯景长期率兵驻守于河南。而慕容绍宗因为不是布衣之交，是尔朱死党，受到猜忌。《北齐书·慕容绍宗传》记他在任青州刺史的时候，有人诬陷他，说，“慕容绍宗尝登广固城长叹，谓其所亲云，‘大丈夫有复先业理不’” [90] 。因此，慕容绍宗就被高欢召回晋阳。由此看，高欢是不大信任慕容绍宗的，所以不敢让他独当一面。

事实上，高欢对于侯景，也是不大放心，只是相对于慕容而言，相信侯景。侯景刚投降时任职不是武职，而是出任吏部尚书。对于此职侯景很不满意，说，“何当离此反故纸邪？” [91] 任西南道行台之后，高欢也不敢让侯景放手大干。《北齐书·神武娄后传》：“沙苑败后，侯景屡言请精骑二万，必能取之。神武悦，以告于后。后曰：若如其言，岂有还理，得獭失景，亦有何利。” [92] 因此侯景就不能得到精锐部队。在侯景任西南道行台时，高欢还任命高昂为西南道大都督，与侯景共同负责西南道的军事。当时，河南地区分为西南道与东南道也是为了防范侯景。看来高欢并不信任侯景。《北齐书·神武纪下》记载高欢临死前对儿子高澄说，“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跋扈志，顾我能养，岂为汝驾御” [93] 。元象元年高昂战亡，任东南台的任延敬也去世，高欢陷入与西魏的拉锯战，在河南地区越来越依赖长期驻守此地的侯景，从而导致了侯景势力坐大。

高欢去世之后，高澄利用北镇精骑打败了侯景，进而占据淮南部分土地。不久，高澄遇刺，二弟高洋即相位，并且取元魏而代之。高洋利用萧梁的混乱将疆域拓展至长江一线。疆域的南扩并没有使北齐上下有将重心南迁的动议，故北齐的刺史任职就显得更加重北轻南。下面是北齐一代北方边境诸州的刺史任职情况。 [94]

并州刺史：高湛、彭乐、贺拔仁、高孝琬、高长恭、高叡、斛律光。

肆州刺史：薛孤延。

朔州刺史：暴显、高思好、斛律光、库狄盛、库狄回洛。

北朔州刺史：高叡、库狄盛。

北蔚州刺史：傅元兴。

幽州刺史：潘子晃、独孤永业、斛律羡、潘乐。

营州刺史：牒舍乐、高保宁、王峻。

南营州刺史：高长弼。

晋州刺史：斛律光、张保洛、麹珍、尉相贵。

洛州刺史：綦显、独孤永业、王峻、皮景和。

东雍州刺史：傅伏。

东广州刺史：王敬宝。

徐州刺史：张宴之、元景安、赵彦深、阳斐。

东徐州刺史：封述、郭志、辛术、徐远。

北徐州刺史：张宴之。

谯州刺史：慕容俨、崔景凤。

南谯州刺史：阳斐。

扬州刺史：卢潜、李希光、李。

合州刺史：卢叔武、李稚廉、卢潜。

泾州刺史：张雕、宋嵩、源文宗。

以上并、肆、朔、北蔚、幽、营诸州的刺史由北齐宗室和鲜卑武人担任，显示此区仍然是其军事、政治核心地区。在天保之后，此区域与突厥、奚、契丹邻接。由于突厥强大，北边必须屯驻重兵。《北齐书》卷一七《斛律羡传》：

羡（任幽州刺史，幽州道行台仆射）以北虏屡犯边，须备不虞，自库堆戍东拒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凡有险要，或斩山筑城，或断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

《北齐书》卷四一《高保宁传》：

高保宁，代人也，不知其所从来。武平末，为营州刺史，镇黄龙，夷夏重其威信。周师将至邺，幽州行台潘子晃征黄龙兵，保宁率骁锐并契丹、靺羯万余骑将赴救。

晋州、洛州、东雍州、东广州与北齐死敌西魏北周邻接，故其刺史多由鲜卑武人担任。

与以上两个地域不同，天保时期的三徐州与梁邻接，其刺史多由汉人

担任；淮州、南谯州、扬州、合州、泾州、秦州地处淮南多与陈邻接，其刺史基本上由汉人担任。如果说刺史治民与军政无关，不能说明高欢去世后，东魏北齐依然对南部持轻视态度。那么再看东南道行台与西南道行台的人选。《北史》卷五〇《辛术传》：

武定六年，侯景叛，除东南道行台尚书，封江夏县男。与高岳等破侯景，擒萧明，迁东徐州刺史，为淮南经略使。

《北史》卷五五《赵彦深传》：

（天保中）出为东南道行台尚书、徐州刺史。

《北齐书》卷二五《张亮传》：

属侯景叛，除平南将军、梁州刺史。寻加都督扬、颍等十一州诸军事，兼行台殿中尚书，转都督二豫、扬、颍等八州军事、征西大将军，豫州刺史、尚书右仆射、西南道行台。攻梁江夏、颍阳等七城皆下之。

辛术是“少爱文史，晚更修学，虽在戎旅手不释卷”的汉族文人。张亮因为“勤力强济”，受到高欢父子重用，被“委以书记之任”，是个文职人员。赵彦深，“善书记”，“文翰多出其手，称为敏给”，也是文职人员。以汉族文职人员出任黄河以南地区的军事防务官员，总不能说是积极进取的态势吧。另外，与三位行台协商军事行动的还有高氏的亲信将领如高岳、潘乐、段韶。《北齐书》卷四，第59页。应该说能够平定侯景之乱并且略定淮南主要是这几位将领的功劳。但是高澄、高洋并没有让这几位将领长期驻防而是让上述汉文人担任行台，驻防于河南、淮南地区。这也分明是一种保守的战略部署。再看天保六年之后的北齐军队在长江沿岸的失利。《梁书》卷六《梁敬帝纪》：

（绍泰元年十月）丙子，任约，徐嗣徽举兵反，乘京师无备，窃据石头……十一月庚辰，齐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刘仕荣，淮州刺史柳达摩率兵赴任约，入于石头……十二月庚戌，徐嗣徽，但约又相率至采石，迎齐援。丙辰，遣猛烈将军侯安都水军于江宁邀之，贼众大溃，嗣徽、约等奔于江西。庚申，翟子崇等请降，并放还北。

（太平元年三月）戊戌，齐遣大将萧轨出栅口，向梁山，司空陈霸先军主黄葳逆击，大破之。轨退保芜湖。遣周文育，侯安都众军，据梁山拒之。夏四月丁巳，司空陈霸先表诣梁山抚巡将帅。壬申，侯安都轻兵袭齐行台司马恭于历阳，大破之，俘获万计……六月甲辰，齐军潜军至蒋山龙尾，斜趋莫府山北，至玄武湖西北。乙卯，司空陈霸先

授众军节度，与齐军交战，大破之，斩齐北兖州刺史杜方庆及徐嗣徽，弟嗣宗，生擒徐嗣彦、萧轨、东方老、王敬宝、李希光、裴英起、刘归义等，皆诛之。

《南史》卷九《陈文帝纪》：

（天嘉元年）二月丙申，太尉侯瑱败王琳于梁山，败齐兵于博望，禽齐将刘伯求，王琳及其主萧庄奔齐……三月丙辰，萧庄所署郢州刺史孙玚举州内附……戊午，齐军弃鲁山城走，诏南豫州刺史程灵洗守之。

（天嘉二年）六月己亥，齐人通好。

梁承圣四年到陈天嘉二年相当于齐天保六年到大宁元年。在这期间北齐对梁陈的战争以一系列的失败而告终，与此前北齐势如破竹的攻势截然相反。这一方面的原因是南朝的政治日趋稳定，可以组织有准备的反击。另外一方面从齐军看，所统军队非北齐主力。这些将领除王敬宝外都是汉人，其所帅军队自然不会是鲜卑精骑。北齐指挥系统的混乱更加证明这不是一场严肃对待的战争。《北齐书》卷二一解释萧轨五将失败的原因时说，“五将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为军司，萧轨与希光并为都督，军中抗礼，不相服御，竟说谋略，动必乖张。顿军丹阳城下，值霖雨五十余日，及战，兵器并不堪施用，故致败亡”[95]。

自高洋登基始，就在进行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所以不能派主力南下：

1.与库莫奚的争战。《北齐书》卷四《文宣纪》：

（天保）三年春正月丙申，帝亲讨库莫奚于代郡，大破之，获杂畜十余万，分赍将士各有差。以奚口付山东为民。

按：据引文库莫奚在东魏时期已经侵入到代郡，即今山西大同地区，进入了北齐的军事核心区。所以北齐必得驱逐之。

2.与契丹的战争。《北齐书》卷四《文宣纪》：

（天保四年）九月，契丹犯塞……（文宣亲戎北讨）至平州，遂从西道趣长堑，诏司徒潘相乐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复诏安德王韩轨率精骑四千东趣，断契丹走路……帝亲踰山岭，为士卒先，指麾奋击，大破之。虏获十余万口，杂畜数十万头。（相）乐又于青山大破契丹别部。所虏生口皆分置诸州。

3.对蠕蠕、突厥的战争。北魏末年，突厥从阿尔泰山兴起，接连击败蠕蠕，迫其东逃。东逃之中的蠕蠕向北齐求援，齐文宣亲率军队迫使突厥称臣。之后，蠕蠕时叛时降。高洋于天保五年、六年击败蠕蠕，迫使其逃入西魏境内。

以上事实说明在齐天保年间，北齐北境的少数民族进入了一个活跃期，不时入侵塞内，严重威胁到晋阳和华北平原的安全。因而高洋不得不把战略方向指向北方。他一方面军事讨伐，一方面修筑长城以确保北方政治中心的安全。《北齐书》卷四《文宣纪》：

（天保三年）九月，帝自并州幸离石……冬十月乙未，至黄栌岭，仍起长城，北至社干戍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

（天保五年）十二月庚申，帝北巡至达速岭，览山川险要，将起长城。

（天保六年）是年，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

（天保七年）先是，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

到了齐孝昭帝当政时期，对北方的战争才告一段落。但孝昭并未将战略方向南移而是西移。《北齐书·卢叔武传》：“肃宗即位，召为太子中庶子，加银青光禄大夫。问以世事，叔武劝讨关西……帝深纳之。又愿居平阳，成此谋略。上令元文遥与叔武参谋，撰《平西策》一卷，未几帝崩，事遂寝。”孝昭皇帝即位不足两年去世，之后，北周联合突厥不断地侵扰北齐。北齐疲于应付，也就谈不上经略淮南了。

由于东魏北齐以晋阳为其军事政治中心，因而对于河南、淮南的疆域就不能直接控制，必须由行台来代理防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侯景之乱。侯景之乱后，齐文襄、齐文宣对于任用有才干的武人担任河南、淮南地区的行台有了警惕，改而任用汉人担任两地的防务工作。这一种人员布置使得淮南地区的防务长期得不到加强，从而给陈的北伐提供了机会。陈在两淮地区的凌厉攻势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北齐的注意力，这又给北周的攻击提供了机会。在陈、周的夹击之下，北齐灭亡。

本章小结

王怡辰觉得东魏北齐的政治之所以不能走上轨道，主要是因为复杂的

派系和政治集团，除了高欢之外，就没有人可以驾驭，所以高欢去世后，北齐的政治比较混乱。王怡辰其实高估了高欢的能力。北镇势力和河北豪强，都是高欢不能完全驾驭的势力。因此，东魏的政治就不同于一般的文官政治，而是呈现吏干政治的特征：高欢用吏干来掌管财权和军权，形成了相对于北镇势力和河北豪强的优势。而且高欢是东魏北齐第一个任用恩倖的政治领袖。吏干政治和恩倖政治是东魏北齐的政治文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官政府的正常运行。

东魏北齐的政治史上，“胡汉对立”、“文武分途”的影响，前辈学者都已经论证得很充分了。本章着重探讨了两都体制对于东魏北齐政治的影响。两都体制、胡汉问题与文武问题实际上是交错在一起的，东魏迁都邺之后，又造成了河北与河南的对立问题。所以，东魏北齐的政治表现为多重的二元对立格局。

胡与汉、文与武、晋阳与邺、河南与河北，不一定形成对立，完全可以相辅相成，形成政治合力。东魏北齐的统治者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甚至在文武对立这方面还是推动者。质言之，东魏北齐的多重的二元对立格局，与东魏北齐的吏干政治、恩倖政治而非成熟的文官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

[1] 缪钺：四川大学《史学论丛》第1期，1949年。收入《读史存稿》，三联书店1963年版。

[2]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孙同勋：《北魏末年与北齐时代的胡汉冲突》，《思与言》第2卷第4期，1964年11月；萧璠：《东魏北齐内部的胡汉问题及其背景》，《食货月刊》第6卷第8期，1976年。

[3] 徐福谦：《东魏北齐胡汉之争新说》，《文史哲》1993年第3期。

[4] 谷川道雄：《北齐政治史与汉人贵族》，见《隋唐帝国形成史

论》，此文最早发表于1962年的《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绪论》，据毛先生自述，此批文章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5] 吕春盛：《北齐政治史研究—北齐衰亡原因之考察》，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7年6月版；王怡辰：《东魏北齐的统治集团》，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

[6] 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2004年版。黄永年对于北齐政治史的完整表达见于此书，其相关论文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

[7] 王怡辰：《东魏北齐的统治集团》，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137页。

[8] 《北齐书》卷一，第2页。

[9] 同上书，第2、3页。

[10] 《北齐书》卷一，第3页。

[11] 同上。

[12] 《北齐书》卷二，第23、24页。

[13] 《北齐书》卷二四，第347、348页。

[14] 《北齐书》卷一，第4、5页。

[15] 《北齐书》卷一，第6页。

[16] 同上书，第6、7页。

[17] 同上书，第8页。

[18] 同上书，第4、5页。

[19] 《北齐书》卷二一，第294页。

[20] 同上。

[21] 《资治通鉴》卷一五七，第4886页。

[22] 《北史》卷五三，第1924页。

[23] 《资治通鉴》卷一五六，第4840页。

[24] 同上书，第4854页。

[25] 同上。

[26] 同上书，第4856页。

[27] 《北史》卷三一，第1142页。

[28] 《北史》卷三一，第1142页。

[29] 《北齐书》卷一，第7页。

[30] 《北齐书》卷二，第16页。

[31] 《北齐书》卷三七，第485页。

[32] 《北齐书》卷二五，第341页。

[33] 《北齐书》卷二四，第342页。

[34] 《北齐书》卷三八，第506页。

[35] 《北齐书》卷五〇，第686页。

[36] 《北齐书》卷二五，第341页。

[37] 《北齐书》卷三八，第506页。

[38] 《北齐书》卷二四，第342页。

[39] 同上书，第347页。

[40] 《北齐书》卷二六，第370页。

[41] 《北齐书》卷二〇，第273页。

[42] 《北齐书》卷二五，第361页。

[43] 同上书，第362页。

[44] 同上书，第530—533页。

[45] 黄永年：《论北齐的政治斗争》，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6期，1997年，收入《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版。

[46] 《北齐书》卷三一，第419页。

[47] 《北齐书》卷五，第74页。

[48] 《北齐书》卷六，第80页。

[49] 此条引自《北齐书·杨愔传》，又据《北齐书·武成十二王·高俨传》，安德王高延宗说：“孝昭帝杀杨遵彦，止八十人。”可知，《杨愔传》此条史料可信。

[50] 《北齐书》卷六，第81页。

[51] 同上。

[52] 同上。

[53] 《北齐书》卷一四，第187页。

[54] 《资治通鉴》卷一六八，第5196页。

[55] 《北齐书》卷一四，第187页。

[56] 《刘懿墓志》，收入《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第363、364页。《北齐书》卷一九，第251页。

[57] 《北齐书》卷六，第81页；《北齐书》卷一一，第143页。

[58] 《北齐书》卷三四，第458页。

[59] 《北齐书》卷一四，第187页。

[60] 《北齐书》卷一四，第183、184页。

[61] 《北齐书》卷九，第124页。

[62] 王怡辰著：《东魏北齐的统治集团》，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311页。

[63] 《资治通鉴》卷一六八，第5196页。

[64] 《北齐书》卷三四，第458页。

[65] 王怡辰：《东魏北齐的统治集团》，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页。

[66] 《北魏东魏北齐之核心集团与核心区》，见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第二篇，第29—104页。

[67] 《两魏齐周时期的霸府与王都》，见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之补编《府兵制国家论》第三章，第300—306页。

[68] 《北史》卷六，第224页。

[69] 《北齐书》卷二七，第376、377页。

[70] 《北齐书》卷二七，第375页。

[71] 《北史》卷六，第223页。

[72] 《周书》卷三五，第615页。

[73] 《魏书》卷八二，第1806页。

[74] 《北史》卷六，第222页。

[75] 《北齐书》卷二四，第347、348页。

[76] 《北齐书》卷三，第31、32页。

[77] 《北齐书》卷三八，第502页。

[78] 《北齐书》卷四二，第563页。

[79] 《北齐书》卷29，第394页。

[80] 《北齐书》卷37，第484、485页。

[81] 《北史》卷33，第1208页。

[82] 《北齐书》卷四五，第614页。

[83] 《北齐书》卷二九，第395页。

[84] 《魏书》卷一二，第313页。

[85] 《北齐书》卷二四，第348页。

[86] 以下人物引自《北齐书》卷十三、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〇、二一、二二、二三、二五、二六、二七、二九、四一；《北史》卷六、五一、五三、五四、八〇。

[87] 《北史》卷六，第227页。

[88] 《北齐书》卷一八，第239页。

[89] 《北齐书》卷一九，第250页。

[90] 《北齐书》卷二〇，第273页。

[91] 《南史》卷八〇，第1993页。

[92] 《北齐书》卷九，第123、124页。

[93] 《北齐书》卷二，第23、24页。

[94] 以下引自《北齐书》卷四、一三、一七、一九、二〇、二一、二三、二五、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北史》卷八、四三、五一、五二、五三、五五。

[95] 《北齐书》卷二一，第300页。

第四章 西魏北周的政治文化初探

在西魏北周史研究方面，府兵制是长期以来的热点。府兵制之所以成为学界热烈讨论的中心论题，与其史料缺乏有关。仅有的几条史料经过陈寅恪、唐长孺先生的阐释已经没有多少深意可供挖掘，于是学者

们就从不同的角度，运用各种理论来分析这几条史料，虽然不乏新意，但都不是定论。正如滨口重国、谷霁光所言，府兵并不是西魏唯一的兵种，因而对于西魏北周的军事问题可以利用较为丰富的实战史料，去探索西魏北周军事的其他方面，而不仅限于府兵。20世纪90年代以来，值得注意的有关西魏北周的研究有北京大学88级博士研究生张伟国的博士论文，此文于1993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以《关陇武将与周隋政权》为题出版。这部专著主要论述了西魏北周的统治者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文官政府的过程。台湾学者吕春盛将西魏的政治人物划为三大势力：北镇势力，关陇河东土著势力以及魏帝势力。他的文章以这三种势力的消长解释西魏北周史。北京师范大学1996级博士杨翠薇的博士论文《宇文氏家族与西魏北周》，从宇文氏家族着手研究西魏北周中央集权的变化过程。正如学者们所论，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不同，北镇军人数量较少，很难组织成有力的统治集团，所以宇文泰并没有将北镇军人放在特殊的地位上，而是施用“关陇本位政策”，形成了一个新的不同于北镇势力的“关陇集团”。那么，北镇势力进入关陇地区后，具体地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化，才成为“关陇集团”式的人物？北镇因素在西魏北周政权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对于这两个问题，学术研究的空白点较多，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第一节 “内先协和”与关中本位政策

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基于陈寅恪的“关中本位政策”，提出了“府兵制国家”理论，用来解释隋唐帝国的形成问题。他认为，“北镇的‘豪杰’们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形成了一种同类意识非常强烈的社会，说它是潜在的政治军事组织似非过分”的乡兵集团。武川集团由于其特殊性成为“关中军事政权的核心结构”，构成武川集团的原理，是组建关陇集团的原理，也是形成隋唐帝国的原理。武川集团与关陇地区的乡兵集团有着同质的一方面，所以有合作的基础。谷川的理论是依据其对武川社会结构、府兵制、乡兵制的研究得出来的。武川集团和关陇集团的关系是支撑谷川氏理论的关键，却未加详细论证。[1] 有鉴于此，笔者以宇文泰的亲身经历为线索，试图梳理武川军人对于关陇社会的认识与认同的过程，描述从“武川集团”到“关陇集团”的转化，以此来说明府兵制国家理论的缺陷，及关陇集团的政治文化特性。

一 “内先协和”的提出

由于陈寅恪对“关中本位政策”没有明确地界定，所以学者们对于这个概念理解各有差异。笔者认为，邙山之战后，西魏大将贺拔胜临死之前给宇文泰上书中提到的“内先协和”，是理解“关中本位政策”的钥

匙。“内先协和”，说明当时的西魏政权存在着不协和的情况，而且比较严重。这也说明谷川道雄先生以“构成武川集团的原理”来理解关陇集团，并不是很妥当的，必须回到历史场景，理解武川集团在关陇面临的新问题，才能理解关中本位政策。

小关之战、沙苑之战、河桥之战、邙山之战，是确立东西魏对立局面的四次战役。在这四次战役中，西魏方作战的主力是北镇系军队。分析四次战役，北镇系将领在谋略和忠诚方面不无问题。

小关之战前，东魏军队从河东、潼关和商洛三路进攻西魏。宇文泰决定偷袭潼关这路东魏军，遭到“诸将”的反对，“贼在近，舍而袭远，脱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御之”。当时只有苏绰、宇文深和达奚武赞成宇文泰。事实证明宇文泰的策略是正确的。沙苑之战，东魏二十万大军直逼长安。宇文泰决定在华州与东魏决战，此时，“诸将”“以众寡不敌，请待欢军更西，以观其势” [2] ，反对在华州决战。西魏在沙苑埋伏好之后，距离高欢军队六十里，此时“诸将以众寡悬殊，皆惧，惟宇文深独贺” [3] 。战况正如宇文深分析，东魏惨败。

小关之战和沙苑之战的胜利，北镇将士是主力。不过在谋略方面，苏绰、宇文深等士人无疑更有眼光。

河桥之战，赵贵、怡峰所帅之左军、独孤信、李远所帅之右军战败撤退，李虎、念贤所帅之后军也随同撤回关中，西魏战败。右军与左军将领“战并不利，又未知魏帝及太祖所在，皆弃其卒先归” [4] 。这种不顾统帅“弃其卒先归”的做法，不能不说是缺乏纪律的表现。后军李虎和念贤“遇信等退，即与俱还” [5] 。寻绎文意，似乎后军还未参与战斗，就撤回了关中。在河桥之战中“（念）贤不力战，乃先还”，“自是名誉颇减” [6] 。念贤的作战态度是颇为消极的。在《周书·怡峰传》中提到，“时峰为左军，不利，与李远先还，太祖因此班师。诏原其罪”。 [7] 这说明，河桥之战后，西魏曾经追究战败的责任，怡峰因为“先还”而有罪。河桥之战西魏曾取得优势，左、右、后三军统帅作战不力，擅自撤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魏的战败。 [8] 而这三军的六位统帅除李远外，都出身武川镇。三军溃退，影响恶劣。留在弘农、关中的东魏降兵，趁机占领弘农、长安城。在河东地区的战略据点“守令弃城走” [9] 。这样，宇文泰的后方被严重动摇，情势危急。

与北镇系将领的溃逃不同，在宇文泰撤军时担任后殿的是汉人王思政和蔡祐。在这样一次惨败中担任后殿，那是九死一生的任务，王思政“陷阵既深，从者死尽，思政被重创闷绝” [10] 。蔡祐也被“围十余重” [11] 。当蔡祐、王思政摆脱东魏追兵，在弘农赶上宇文泰的时候，宇文泰处于心力交瘁的状态中，“太祖见祐至，字之曰：‘承先，尔

来，吾无忧矣。’太祖心惊，不得寝，枕祐股上，乃安”[12]。可见，处于惊弓之鸟状态的宇文泰从汉人蔡祐的忠诚那里获得了极大的安慰。从河桥之战的善后来看，也是汉人出力较多。善后，最重要是巩固河东和陕州这两个据点。陕州是交给王思政和韦孝宽。到当年十二月，是云宝取得洛阳，赵刚攻占广州，“自襄、广以西城镇复内属”[13]。是云宝是东魏降将。赵刚是河南洛阳人，当地的豪强。河东，辛庆之“独因盐池，抗拒强敌”[14]。综观河桥之战，汉人在全局意识上，在战斗力，在对宇文泰个人的忠诚方面都经受住了考验，被证明是可以信赖的。相反，武川镇将领在忠诚方面不无问题。邙山之战，西魏在兵力、后勤补给、地理形势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失败的概率较大。不过，邙山之战后，若干惠“至弘农，见太祖，陈贼形势”，有“恨其垂成之功，覆于一篑”的说法，[15]使人怀疑战败的原因里面包含着其他因素。宇文泰向朝廷请罪时也有“诸将失律”这么一条。[16]据《周书》：“贵为左军，失律，诸军因此并溃。坐免官，以骠骑、大都督领本军。”[17]这样看起来，邙山失利的主要责任是由赵贵来负的。史书记载简略，无从知道“失律”的具体内容。结合河桥之战来分析，将“失律”理解为不服从指挥，恐怕还是合理的。

老将军贺拔胜在邙山之战后不久去世，临终以“内先协和，顺时而动”告诫宇文泰，可谓深中肯綮。[18]“顺时而动”是对宇文泰不顾与东魏的实力差距，发动战争，相继惨败的批评。初到西魏，贺拔胜“自以为年位素重，见太祖不拜”。在武川社会中，贺拔胜成名早，于宇文泰是长辈，所以不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贺拔胜不但“拜”宇文泰而且“尽诚推奉”[19]。这个转变说明，贺拔胜接受了宇文泰是君，自己是臣的定位，抛弃了武川社会的规则。这是为什么呢？武川社会的凝聚力，的确是西魏立国的关键因素，但是，根深蒂固的“等夷”观念也起到了分权的作用。在战乱频仍的后三国时代，分权思想对于政权的稳定不利。贺拔胜无疑对此有所醒悟，为求“协和”，不惜牺牲个人形象。同时他也认识到，“等夷”观念还是相当一部分武川军人处理个人与宇文泰关系的规则。从河桥之战和邙山之战的蛛丝马迹看，在武川军团内部隐隐约约能感到一种不是那么驯服的情绪。所以贺拔胜强调“协和”，即加强团结。

二 宇文泰对“内先协和”的理解

北魏正光四年（523）北镇起义，宇文泰16岁。此后宇文泰家族就挟裹进长达六年的战乱生活，从武川镇辗转到了河北。在此期间宇文泰对于中原社会有了初步的了解，史缺有间，无从考索详情。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为长辈所卵翼，生活在武川集团之中，对于中原文化的认知有限。530年，宇文泰跟随贺拔岳进入关陇，此时其父兄都已经去

世，在独立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思想发生了一些转变。正是由于以上经历，宇文泰对于“内先协和”有着不同于贺拔胜的理解。

原州：事业的起点。530年，秦陇起义被尔朱天光所率领的北镇军队镇压。此年，宇文泰被任命为“行原州事”。原州，即今宁夏固原，自西汉于此地置安定郡后，一直就是西北军事重镇。其重要性可以概括为两点：（1）地理位置：西域通中原的孔道，关中的屏障；（2）经济地位：既有牧场，又可以屯田。北魏在太延二年设置高平镇，作为经略河西地区的据点。之后，高平镇成为控制河西陇右的枢纽。[20] 正光五年（524）改高平镇为原州。从原州的重要性上，从“行原州事”是宇文泰政治生涯中第一个独立职务上讲，的确是一次重要的升迁。

“行原州事”，从另一个角度看并非肥缺。原州民族构成复杂，政治动荡。后秦姚兴时，“以三城、朔方杂夷及卫辰部众三万配”[21] 赫连勃勃镇高平。北魏显祖时，“蠕蠕万余户降附，居于高平、薄骨律二镇”[22] 。盖吴起义，北魏“诏发高平敕勒骑赴长安”[23] 。可知高平有杂夷、铁弗、柔然、高车等部族。这些部族经过融合形成了山胡。高平镇起义军的领袖多是山胡，战斗力颇强。[24] 尔朱天光入关主要是针对高平义军。原州也是秦陇起义军的最后据点，一直到大统四年才被彻底清除。宇文泰的前任长孙邪利，就被义军联合原州城人杀死。在秦陇起义军余部还在原州活动期间担任行原州事，对25岁的宇文泰来说也是挑战。

宇文泰在原州的事迹，留下来不多，和原州豪强的关系值得关注，“时关、陇寇乱，帝抚以恩信，百姓皆喜，曰：‘早遇宇文使君，吾等岂从逆乱’”[25] 。“抚以恩信”，即怀柔的统治手段。对象自然不是普通民众而是土著豪强。李穆，在宇文泰“入关”时，“便给事左右，深被亲遇”。所谓“入关时”应该是在宇文泰担任“行原州事”时。此前宇文泰并未开府，不可能有“给事左右”之僚佐。原州的另外一名豪强蔡祐也在此时被“招为帐下亲信”。可见，宇文泰在原州恢复秩序的过程中，土著豪强起了作用。[26]

夏州：亲信集团的形成。据张伟国和吕春盛研究，在夏州形成了宇文泰的亲信集团。其成员有：防城大都督兼长史于谨，录事参军长孙俭，记室参军兼主簿申徽；帐下武官有蔡祐、王雅、陆通、宇文盛、伊娄穆、杨荐；宾客韩褒。宇文泰此期的幕僚，北镇出身者不多，汉人占了绝大多数。[27] 宇文泰当时的资历和声望不足以吸引北镇将领。这样，宇文泰在建立幕府的过程中，不得不在关陇本地豪强和山东流亡士人中选择。

宇文泰出任夏州刺史不到半年，贺拔岳被杀，给宇文泰脱颖而出提供了机会。当时宇文泰的处境并不乐观。夏州地方豪强和侯莫陈悦勾结，试图清除宇文泰 [28] ：“及侯莫陈悦害贺拔岳，诸将遣使迎太祖。将赴，夏州首望弥姐元进等阴有异计。太祖微知之，先与祐议执元进。祐曰：‘狼子野心，会当反噬，今若执缚，不如杀之。’太祖曰：‘汝大决也。’” [29] 宇文泰没有与弥姐元进公开决裂，说明弥姐氏势力不小，不能用强。智取，可以依恃者信赖者为关陇豪强蔡祐。对于蔡祐是否愿意担任“执缚”弥姐元进这一极其危险的任务，宇文泰并未有十分把握，所以当蔡祐表明态度后，不禁大喜过望，发出了“汝大决也”的慨叹。蔡祐不负期望，斩杀了弥姐元进，“并其党并伏诛”。于是才有了“与诸将结盟，同心诛悦”的结果。也就是说，宇文泰前往平凉接收贺拔岳余众之前，必须巩固好后方基地夏州，不然进退失据，就陷于危险境地了。由于蔡祐在稳定后方中表现卓越，宇文泰“以此知重之”，收蔡祐为义子。

在接收贺拔岳余部这个问题上，宇文泰的部下有持反对意见者“士吏咸泣，请留以观其变” [30] ，相反，有些幕僚颇能为宇文泰长远打算。长孙俭参与了这一事件所有的“经纶谋策” [31] 。贺拔岳被杀后，传言“岳军府已亡散者”，引起了宇文泰的忧虑。陆通分析了形势，觉得不应该担心，“居数日，果如所策” [32] 。当宇文泰问及韩褒“去留之计”时，韩褒说：“方今王室凌迟，海内鼎沸。使君天资英武，恩结士心。贺拔公奄及于难，物情危骇。寇洛自知庸懦，委身而托使君。若总兵权，据有关中之地，此天授也，何疑乎！且侯莫陈悦乱常速祸，乃不乘胜进取平凉，反自遁逃，屯营水洛。斯乃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不世之勋，在斯一举。时者，难得而易失，诚愿使君图之” [33] 。韩褒的分析，将重点放在“总兵权”上，也就是贺拔岳留下的权力真空，使得宇文泰有机会掌控关陇的局势。其次，充分肯定了宇文泰在武川军团中的突出地位。最后，分析侯莫陈悦军团的动向，指出侯莫陈悦的无能。有理有据，对于宇文泰的决策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34]

宇文泰给儿子宇文毓起名“统万突”以纪念夏州时期。宇文毓当上皇帝后，对于宇文泰夏州时期的僚佐将士进行酬劳，诏书称“颍川从我，是曰元勋；无忘父城，实起王业” [35] 。后一句讲，宇文泰的霸业从夏州开始。前一句强调“从我”之“元勋”，是对夏州幕僚的高度评价。夏州之于宇文泰主要在于笼络了一批人才。《周书》称此事之后，宇文泰对陆通的重视达到“愈见亲礼，遂昼夜陪侍，家人罕见其面”的程度。蔡祐、长孙俭也一直是宇文泰家族的心腹。这些人都不是出自北镇。

宇文泰的霸业在关陇起步，对于关陇有良好的印象。在原州和夏州，

宇文泰主要依靠关陇豪强和山东的流亡士人。通过这些经验，宇文泰对于非北镇系势力的潜能有较为深刻的体认。在与东魏战争中，作为最高统帅，宇文泰感受到北镇系将领和非北镇系人物的区别。北镇系将领在政治素养、谋略方面逊于非北镇系幕僚。非北镇系将领在军事上比北镇系弱，但更容易合作。正是对非北镇势力的高度评价，使得宇文泰考虑西魏政局比贺拔胜多一个维度，不仅仅考虑武川集团内部的“协和”，还考虑到各种势力的“融合”。

三 关中本位政策的宇文泰色彩

关中本位政策，万绳楠总结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物质上指府兵制，精神上指实行周礼、恢复胡姓、改籍贯为关中等。如果从“内先协和”去理解，笔者认为，关中本位政策还可以作如下补证：

霸府。吕春胜统计了宇文泰大丞相府和关西大行台府的僚佐。在大丞相府22位僚佐中，北镇人物只有6人，其中以关陇河南河东人物13人占最多数。关西大行台僚佐中，北镇人物占3人，关陇山东人物占28人。两大机构所计入北镇势力的有：于谨、长孙俭、叱罗协、宇文测、宇文深。[36] 然而，长孙俭本是北魏开国功臣长孙道生的后裔，北魏孝文帝迁都后，落籍于洛阳，文化上也已经汉化，其不属于北镇势力是明显的。宇文测、宇文深兄弟情况类似于长孙俭。这样，大丞相府和大行台僚佐属于北镇势力的只有于谨、叱罗协。[37]

再看东魏，综合高欢大丞相府和大行台僚佐，计有31人。[38] 其中出身于世族豪强的9人，出身于北镇的8人，各占三分之一弱。剩下的人大都是出身河北地区的平民。

在宇文泰霸府中，土著豪强占了将近三分之二，比重远远大于高欢霸府，说明宇文泰掌握的北镇势力有限，巩固政权还需要土著豪强支持，所以他的幕府尽量征辟地方豪族的代表性人物。在宇文泰幕府中，北镇势力所占比重远远少于高欢霸府。这说明高欢因为获得了北镇的大部分人力资源，可以从中选择合适的幕僚；而来到关陇的武川集团中出身北镇的文职人员本来就少，因此宇文泰幕府中的北镇出身幕僚比例极少。同时，宇文泰幕府中北镇势力微弱的事实也影响到西魏北周政治文化的走向。

赐姓。据吕春胜统计，西魏赐姓可考者57例，其中赐姓宇文氏的就有22例。笔者统计，22例赐姓为宇文氏中，仅有叱罗协、薛善、薛端、申徽、唐瑾、柳敏、韦瑱、刘雄等8人担任过宇文泰幕僚，有14位并没有出任过霸府职务。这14个人之中，有令狐整、韦孝宽、韩雄等这样长期在东部边境防守的武将；有崔猷、崔谦、郑孝穆、崔说等这些

在西魏政府任职的文臣。也就是说，这些没有在霸府任职的人都有其客观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宇文泰还是希望与他们保持某种密切关系。赐姓为宇文氏的家族都列入宇文泰的家谱，可见赐姓进一步密切了宇文泰和非北镇系统势力的联系。

吕春胜认为，霸府中大量吸纳“非北镇人物”，是为了摆脱魏帝权威，“亦可视为是北镇势力扩张的一种现象”。而对于赐姓制度中，被赐宇文氏较多的现象，吕春胜认为是宇文泰从北镇诸武将手中转移权力。[39] 笔者不能完全同意这种说法。吸纳非北镇系人物，的确达到了增强宇文泰个人势力的目的，相应地减轻了北镇系武将在西魏政权中的权重。但是考察当时的局势，西魏和东魏的矛盾，尤其是西魏处于劣势的地位。也就是说，内部的矛盾是次要矛盾。所以，通过在幕府和赐姓来团结非北镇势力，其目的主要还在于和东魏对抗上，也就是贺拔胜所说的“内先协和”的用意。

赐名。宇文泰还有改别人名字的习惯。为了便于论证，先将材料列在下面：

独孤如愿：太祖以其信著遐迩，故赐名为信。[40]

长孙庆明：名实理须相称，尚书志安贫素，可改名俭，以彰雅操。[41]

王勇等：仍赐勇（胡仁）名为勇，令贵名豪，文达名杰。[42]

刘道德：太祖乃谓之曰：“卿文武兼资，即孤之孔明也。”乃赐名为亮。[43]

李庆和：太祖尝谓诸将曰：“宇文庆和，智略明赡，立身恭谨，累经委任，每称吾意。”遂赐名意焉。[44]

裴侠：侠原名协，至是，太祖嘉其勇决，乃曰“仁者必有勇”，因命改焉。[45]

薛沙陁：性强直，每有奏请，不避权贵。太祖嘉之，故赐名端，欲令名质相副。[46]

刘思：太祖嘉之，尝谓之曰：“卿之所为，每会吾志。”于是赐名志焉。[47]

崔士约：赐名说焉。[48]

伊娄灵：太祖尝谓之曰："昔伊尹保衡于殷，至主尧舜。卿既姓伊，庶卿不替前绪。"于是赐名尹焉。[49]

令狐延："卿勋同娄、项，义等骨肉，立身敦雅，可以范人。"遂赐姓宇文氏，并赐名整焉。[50]

将胡族色彩浓厚的如愿、沙陁、胡仁、令贵、文达、庆明、道德，改为信、端、勇、豪、杰、俭、亮，这些带有强烈的伦理色彩的名字，似乎可以理解为赐名是赐姓的逆向策略。如果将赐胡姓看作是宇文泰向北镇势力的妥协，那么赐名，似乎可以说是宇文泰对于中原文化的一种认同，并且将这一种认同，通过改名加以宣扬。"信著遐迩"、"志安贫素"、"不避权贵"，这又是在宣扬一种政治伦理。以"每称吾意"、"每会吾志"、"孤之孔明"等因素改名，是拉近这些人与宇文泰私人关系的一种手段，也是在灌输忠诚的意识。

以上被宇文泰改名的人中，有六位曾被赐姓为宇文氏；独孤信、刘道德、王勇、耿令贵、长孙俭、刘志、伊娄穆等七位未被赐姓宇文氏。可知赐名的范围超出了赐姓的范围，是想方设法与各种势力的代表人物建立密切关系的又一种方式。

赐物。宇文泰赏赐他人物品的事例不是很多，却颇有特点。宇文泰"造射堂新成，与诸将宴射"，若干惠看到新射堂非常艳羡，于是宇文泰"即日徙堂于惠宅"[51]。宇文泰在长安见到卢柔"知其贫，解衣赐之"[52]。宇文泰曾经以"所著铁甲赐（田）弘云：'天下若定，还将此甲示孤也'"[53]。大将军、凉州刺史史宁派使者向宇文泰汇报工作，宇文泰"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矟赐宁"，并且告诉使者，"为我谢凉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善始令终，无损名也"[54]。

宇文泰赏赐给别人的物品，并不是新造，而是将自己正在使用的器物转赠。在赏赐物品的时候，还将自己对被赏赐者的期望同时告知。这又是在强调宇文泰本人与这些人物的私人关系。

教育。宇文泰家族对于教育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视，在北魏末年流离失所的处境中还延请老师教育子弟。对于学问的爱好，可以说贯穿于宇文泰的一生，"于行台省置学，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后子史。又于诸生中简德行淳懿者，侍太祖读书"[55]。西魏建立后宇文泰就"置学于东馆，教诸将子弟"[56]。他引导督促大臣子弟读书的例子有：宇文孝伯"生与高祖同日，太祖甚爱之，养于第内，及长，又与高祖同学"；[57] 元晖"少得美名于京下，周太祖见而礼之，命与诸子游处，每同席共砚，情契甚厚"；[58] 李昶"初谒太祖，太祖深奇之，厚加资给，令入太学"。[59]

西魏的教育从制度保障方面也值得一说。据《隋书》，郑译、王谊、元谐、崔仲方与杨坚“同受业于国子”[60]。《隋书·豆卢传》称其“少受业国子，略涉文艺”。[61]以上受业于西魏国子学的学生，都是开国功臣的儿子。由此可知，西魏的中央官学是官僚子弟接受教育的主要方式，没有像北魏北齐那样成为具文。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子弟后来成为隋文帝朝的重要大臣。宇文泰希望北镇系军人子弟不仅仅继承尚武的旧习俗，也希望他们了解中原文化。在官学的教育之下，功臣子弟掌握了程度不同的汉文化。系统的汉文化的教育也使功臣后代在文化认同上与其祖辈不同，与汉人可以相互认同。所以西魏北周的文化方向就是朝汉化这一个方向，而不是像北魏、北齐那样处于两种文化对立发展的困境。所以，西魏北周政权的凝聚力要好于北齐。

从霸府的构成、赐姓、赐名、赐物和教育等各个方面，宇文泰试图将个人影响施加于各种势力，可以理解为在将各种势力融合为“关陇集团”的基础上构建以宇文泰为金字塔尖的等级秩序的过程。虽然这些做法琐碎甚至有点庸俗，但是显得温情，对于凝聚人心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笔者认为，它们也是关中本位政策的组成部分。加强官学教育，在融合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官僚子弟方面的成效尤其值得褒扬。到隋代，关陇集团内部已经看不到胡汉的区别。融合与秩序，使得关陇集团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内部稳定，为“顺时而动”储备了物质和人才。这是后三国时代，西魏北周的优势。

通过梳理“武川集团”到“关陇集团”的转化过程，可以看出，武川集团内部也并非谷川道雄所说的那么有凝聚力。关陇集团的形成原理与武川集团并不相同。表面看起来，“关中本位政策”，为府兵制、实施周礼、赐姓等制度的集合，事实上，它是一种强调政权内部“协和”、“融合”的政治文化。关陇集团并不类同于包括武川集团在内的任何地域集团。

第二节 西魏北周政权中的

关陇山东南朝势力按地域粗略地划分，西魏的政治势力除北镇之外，还有关陇本地势力、山东人物、南朝人物。为了研究北镇人物的作用，首先有必要澄清另外三种势力在西魏北周政权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 西魏建国前的关陇社会

关陇地区自后秦灭国之后，多民族杂居的状态依然存在，只是民族融合的继续使得民族的构成与分布与之前有所不同。唐长孺认为在北朝后期，原先生活在宁夏陕北高原地区的匈奴、鲜卑、西域胡、氐羌等已经融合为山胡。马长寿的专著《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则分析了北朝后期关中地区部族分布的复杂情况。通过《周书》、《北史》，可以了解到关陇的山区还有大量的氐羌部族。这些部族势力的社会潜力是很强大的，往往通过社会暴乱体现出来。在北魏末年的大起义中，秦陇起义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从秦陇起义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观察关陇地区的社会势力的分布与实力。唐长孺、黄惠贤的论文《北魏末期的山胡勅勒起义》与《二秦城民暴动的性质和特点》，是研究秦陇起义的力作。他们深入地分析了关陇地区城民的民族构成，认为秦州的城民是由羌、氐、汉、胡、鲜卑等民族组成，族类是复杂的。他们又分析了“山胡”的种族，认为山胡包括各种胡人而且与氐羌在融合之中。正如他们所言，南秦城城民暴动的失败是由于城民得不到土著的氐民的支持，反映了城民和当地势力的矛盾和隔阂。对于秦州暴动和山胡起义，二位先生认为主要是阶级矛盾，反映了城民和起义民众，与部族酋豪和汉族豪强的矛盾。

这个观察无疑是对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就会发现秦陇起义的领导权是从城民起义领袖转到了山胡起义领袖手中，同样显示出本地势力超出城民势力的事实。孝昌元年（525）正月，秦州起义军被北魏军队打败，之后氐豪吕伯度兄弟反叛，联结高平义军又击败了秦州义军，使得义军首领莫折念生投降北魏。从此，秦陇起义的领导权就转入了高平山胡义军手中。[62] 这个转变反映了城民在社会实力上的欠缺。我们知道，北魏的城民是城居的职业军人。他们对于军事当然是熟悉的，也比较骁勇善战。社会地位、生活习惯的相同使得城民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比如，秦州义军曾派军队支援南秦城城民的起义，秦州义军打到岐州时，岐州城民就开城迎接，梁州、河州的城民也是相继响应秦州城民的起义。[63] 善于战斗，又善于联络，所以城民是秦陇起义爆发和蔓延的主要因素，因而也受到最严厉的镇压。秦州的城民被刺史元暹屠杀，“存者十一二”[64] 。所以，城民势力在起义被镇压后被屠杀殆尽，就没有影响到西魏北周的政权。又因为城民

的生活习惯、社会地位与普通民众的区别，使得城民不能在当地的社会中发展出深厚的势力。这是他们被山胡起义取代的主要原因。

以高平为中心的山胡起义以及二夏豳华四州的山胡起义，是北魏以来山胡起义的延续。由此看来，山胡是关陇地区的一大势力。《周书·稽胡传》记载山胡，“其俗土著，亦知种田。地少桑蚕，多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殡葬，与中夏略同”。又“与华民错居，其渠帅颇识文字”[65] 。由此看来，山胡已经相当程度上采用汉族的生活方式。但是山胡并不认同于汉民族，其民族内部有相当强的凝聚力。万俟丑奴曾在建义元年自称皇帝，分立百官。从史书中，可以爬梳出一些山胡政权的官员：太傅萧宝夤、太尉侯伏侯元进、仆射万俟仵、大行台尉迟菩萨、万俟道洛、刺史侯几长贵。萧宝夤本是北魏官员，叛变失败后投降到高平军中。[66] 其他的官员都是一色的胡族，可见高平义军内部组织是相当封闭的。

关陇地区的羌胡势力与北镇势力在某些方面是不同的。在北镇地区，由于邻接北方部族，人们一般比较擅长于骑射。据《魏书·尔朱天光传》、《周书·贺拔胜传附贺拔岳传》，尔朱天光因大旱便不得不解高平之围，到有水草的地方牧马，可见入关的北镇军队以骑兵为主。[67] 羌胡势力与之不同，据《周书·稽胡传》，山胡是土著的而不是游牧的，以种田为生。又《魏书·尔朱天光传》、《周书·贺拔胜附贺拔岳传》记载山胡军队在战役的间隙“营农”于百里细川。[68] 可知山胡军队中的主要成员是以种田为生的农民。羌胡一般居住在多山地带，故《周书·稽胡传》称山胡，“凶悍恃险，数为寇乱”[69] 。其实，不仅在北周，而且早在北魏时期秦陇地区的叛乱就有这个特点。《魏书·吕罗汉传》记载：“上邽休官吕丰屠各王飞廉等八千余家……据险为逆。”又记：“秦益阻远，南连仇池，西接赤水，诸羌恃险，数为叛逆。”[70] 《周书·稽胡传》记载山胡是，“居山谷间”。[71] 《魏书·封敕文传》记载边冏梁会起义时，“氐羌一万屯于南岭，休官、屠各及诸杂户二万余人屯于北岭，为边冏形援”。当官军击败边军时，“北岭之贼，从高射敕文军人，飞矢如雨”[72] 。《魏书·尔朱天光传》记万俟丑奴被天光击败后，其弟万俟道洛，退据于牵屯山。可知，秦陇叛军所据之险一般指山地。据以上论述可知羌胡势力一般从事农业，居于山谷之中，那么其军队应该以步兵为主。与尔朱天光对抗的尉迟菩萨的军队是“步骑二万”。战后，被俘虏骑兵三千，步兵一万多人。可知，山胡军队以步兵为主。另一方面，山胡是由诸种胡人融合而成，其中就有善于骑射的鲜卑和高车族。据《魏书·侯莫陈悦传》，陕北高原有牧子，据《周书·宇文贵传》陕北高原有高车部族[73] ，据《魏书·皮豹子传》在高平镇驻扎过“突骑”[74] 。据以上事实，可知山胡军中有骑兵是有渊源的。《魏书·崔延伯传》记录崔延伯战败的原因

为，“贼本轻骑，延伯兼步卒，兵力疲惫，贼乃乘间得入排城。延伯军遂大败”[75]。大败延伯的正是山胡骑兵。但是，羌胡军队的步骑并用，以步兵为主，与北镇军队以骑兵为绝对主力是有差异的。山胡军虽然“凶悍”，但是其山居农耕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其在军事上的不成熟。这种不成熟的证据之一就是在秦陇起义之前的北魏历史上叛军从来没有战胜过政府军。在山胡军与北镇军的对抗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周书·贺拔岳传》记载北镇军进入关中时是三千人，贺拔岳所率前锋为一千人，与贺拔岳对峙的尉迟菩萨的军队是二万人，兵力相较是悬殊的。于是，贺拔岳“密于渭南傍水，分精骑数十为一处，随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将数百骑，隔水与贼相见。岳渐前进，先所置骑随岳而进，骑既渐增，贼不复测其多少。行二十里许至浅水可济之处，岳便驰马东出，以示奔遁，贼谓岳走，乃弃步兵，南渡渭水，轻骑追岳。岳东行十余里，依横岗设伏兵以待之。贼以路险不得齐进，前后继至，半度岗东，岳乃回与贼战，身先士卒，急击之，贼便退走。岳号令所部，贼下马者，皆不听杀。贼顾见之，便悉投马。俄而虏获三千人，马亦无遗，遂擒菩萨。仍渡渭北，降步卒万余，并收其辎重”。[76]贺拔岳的意图在于多方面的迷惑山胡军，一方面使其不能了解贺军的实力，另一方面引诱敌军渡河使得其步兵不能使用，又利用地形使敌军的优势兵力不能发挥作用。这样在兵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一举击败敌军，显示了贺拔岳优秀的指挥能力。相反，山胡将领对敌军的计谋反应迟钝，说明其对军事谋略的无知。在此后的百里细川之战中，北镇将领依然采用了分散敌人优势兵力然后一一歼灭的战术。山胡将领依然是被动挨打。[77]

其次在军事技术上，山胡军队不如北镇军队。北镇军队善于骑兵战术，在与山胡作战中应用的淋漓尽致，“岳星言径趣泾州，其刺史侯几长贵以城降。丑奴乃弃平亭而走，欲向高平。岳轻骑急追，明日，及丑奴于平凉之长坑，一战擒之”[78]。山胡军看起来不能适应这种战术，所以一败涂地。在水洛城之战中，尔朱天光在城外设置木枪，防备山胡军突围，结果山胡果然中了木枪，束手就擒。看来山胡对于木枪在攻防中的作用并不了解。[79]

以上事实说明，山胡在军事经验的积累方面不如北镇军人。之所以这样是与两地生活方式的差异有关的。北镇处于与草原部族对峙的开阔地带，北镇居民以职业军人为主，一般有较多的参与军事的机会，因而在军事方面有较丰富的经验的积累与总结。羌胡一般居于内地，过着山居农耕的生活，参与军事的机会不多，故而经验不如北镇军人丰富。其次，山胡虽然“凶悍”，即经常暴动，战争经验应该不缺乏，但似乎缺乏总结和提炼。

《魏书·外戚传·冯熙传》："熙生于长安，为姚氏魏母所养，以叔父乐陵公邈因战入蠕蠕，魏母携熙逃避至氐羌中抚育。年十二，好弓马，有勇干，氐羌皆归附之。魏母见其如此，将还长安。始就博士学问，从师受《孝经》《论语》，好阴阳兵法。及长游华阴河东二郡间。性泛爱，不拘小节，人无士庶，来则纳之。"[80] 冯熙在氐羌之中，就养成了"好弓马，有勇干"的尚武性格，说明氐羌地区是尚武的。而冯熙要学习文化，就不得不到长安，说明氐羌聚居的地区汉文化是不发达的。在此尤其要注意冯熙之学习"阴阳兵法"是在长安而不是在氐羌地区，可知，氐羌虽尚武，但是对于军事经验的积累，军事理论的总结则不如汉地。

据上文，在抵抗秦陇起义之中，部族酋豪和汉族豪强起了相当的作用。高平是山胡起义的中心，但是，李贤兄弟、蔡祐、田弘却没有参加起义，反而多方阻挠起义的发展。[81] 宇文贵是夏州豪强，在北镇义军包围夏州时帮助北魏刺史源子恭。[82] 关中士族武功苏亮兄弟、京兆韦孝宽参加北魏政府的镇压军队。[83] 张伟国博士在其专著《关陇武将与周隋政权》中研究了西魏建立之前的关陇豪族。张先生认为在北魏政府的有意扶植下关陇的豪族在北魏后期势力有所复兴。张先生还分析了关陇豪族在魏末大起义中的处境与作为。他认为豪族的实力不足与起义军相比，所以在独立反对义军时常常失败，所以，他们多利用政府力量或者假借政府之名的北镇军队。[84] 高平李贤兄弟、蔡祐、田弘以及夏州宇文贵都是生长在胡汉杂居的地区，但是，这些豪族子弟都学习了一定的汉文化。关中士族基本上沿袭了中原文化传统。据《周书·崔彦穆传》："年十五，与河间邢子才、京兆韦孝宽具入中书学，遍相友爱。"[85] 如果这一条史料属实，那么韦孝宽就是在洛阳受过教育。据《周书·苏亮传》："初举秀才，至洛阳，遇河内常景。景深器之，退而谓人曰：'秦中才学可以抗山东者，将此人乎。'"[86] 常景的话反映了这之前关陇人才的凋零，也反映了关陇人才的异军突起。苏亮的传记记其祖父曾任魏中书侍郎、玉门郡守，父亲曾任泰山郡守。中书侍郎任职于朝廷，泰山郡属于山东地区，估计苏亮的教育也会受到洛阳文化的影响。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文化相当发达，北魏统一河西之后迁徙河西士人到平城，此后河西及关陇地区的文化就不如之前繁盛。从史书所反映的情况看来，关陇地区还有零散的私学教育。牛弘在隋代以经学著名。据《周书》卷三七附《尞允传》："安定尞允，本姓牛氏。"[87] 又据《隋书·牛弘传》，牛家"本姓尞氏"。牛弘家到底本来姓牛还是姓尞，现在还缺乏直接的证据来证明，但是，《隋书》错误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因为《隋书》记载尞允曾被西魏赐姓为牛氏。我们知道西魏北周的赐姓主要是赐予代北复姓，牛氏不属于代北复姓，所以《隋书》所记有误。《周书》记载尞允被赐予"宇文氏"，正符合赐姓政策，是正确的。又，《隋书》与

《周书》相同的一点是认为牛弘的父亲被赐姓时的姓氏是尞氏。关于尞氏何出？现在还缺乏证据，但显然不是汉姓，这说明了牛弘家族可能本出自少数民族。他的祖父任郡中正，可知其人是当地豪强。尞允担任侍中工部尚书，是在西魏，那么牛弘的教育只能在关陇地区接受，而其本传没有记载他受过官方教育，那么他的教育只能是在他的家乡安定进行。牛弘的学问以渊博著名，说明他所受的私学教育是相当成功的。[88] 虽然关陇地区有一定的私学，部分豪族还到洛阳接受过教育，但总体来讲文化水平不高。《隋书·地理志》记载关中地区，“俗具五方，华戎杂错……贵者崇侈靡，贱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窶者窘蹙，桴鼓屡惊，盗贼不禁。”陇右地区，“其人性犹质直，然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盗寇矣。”渭河以北的高原地区，“多尚武节”[89] 。总的来说，文化是比山东，江南要质朴一些，但尚武的风气颇为浓厚。

综上所述，在魏末关陇地区的社会势力主要有城民、羌胡势力和豪族势力三种。城民是职业军人，善于军事，但是缺乏深厚的社会势力的支援，在起义中最先失败，并被屠杀殆尽，没能影响后来的历史。羌胡势力在关陇地区是一股强悍的社会力量，但是作为军事集团，他们缺乏训练，缺乏政治眼光，所以，也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集团。豪族一般具有成熟的社会管理经验和政治意识，但是社会实力不足。由于羌胡势力与豪族之间分裂状态，所以关陇内部不具备建立政权的条件。这一种缺陷由于北镇军人的加入而得到改善，而孝武帝的入关引入了相当数量的洛阳官僚，使得关陇地区初步具备了建立政权的条件。如前文所论，北镇集团在军队的组织、训练以及兵法上有相当成熟的经验，这必然会改善关陇社会在军事上的缺陷。洛阳官僚所带入关陇的文化代表了当时北方最高的文化类型。这种文化不但会改变关陇地区文化的落后面貌，而且北镇武人的后代也会被此文化所改变。在这一章中，主要论述西魏北周的军事与教育，但我们的目的是阐述北镇军人带给关陇社会的新变化，以及北镇军人自身的变化。

二 山东人物与政权建设

关于山东人士与西魏北周制度之关系，刘驰有所研究。[90] 刘驰论文的主要方面在于说明山东世族与西魏北周制度建设的关系，但是，事实上参与西魏北周政权建设的人物还包括非世族的山东人物，所以对于此问题有补证的必要。

1.均田制。在敦煌文书中，有一件西魏大统年间的文书。据王永兴的研究，此文书为计账户籍文书，就是按《周书·苏绰传》所记的苏绰所制定的“计账户籍之法”制定的文书。这件文书反映了西魏的确实行了均田制。[91] 北周的均田制记载于《隋书·食货志》，此不详引。据上

文，西魏北周均田制的具体实施方法由苏绰制定，但是均田制却是北魏首先制定，所以西魏北周在此制度上是继承北魏的。

2.官制。《隋书·百官志中》，“周太祖初据关内，官名未改魏号”[92]，西魏实行六官制是在西魏恭帝三年，可见此前西魏基本上沿用北魏的官制。据《周书》，参与六官制设计的人物有苏绰、卢辩、柳敏、唐瑾。

苏绰，为武功人，从其父亲苏协曾任武功郡守看，他出身于地方豪族。史称苏绰，“少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算术”[93]。但不曾记载他与北魏政权的关系。据《周书·苏亮传》，苏亮的祖父苏权出任过北魏的中书侍郎等官；父亲苏祐，曾任泰山郡守；苏亮本人曾举秀才，到过洛阳；其弟苏湛在北魏末年出任过尚书郎等职。由此可知，武功苏氏与北魏朝廷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苏绰应该了解北魏的制度与文化。

卢辩，出身于北魏第一大族范阳卢氏家族。这个家族世传经学，尤其擅长礼学。其家在北魏冠冕蝉联，并参与过北魏制度的建设。[94]可知卢辩对于北魏制度是熟悉的。

柳敏的家世为河东大族。其父柳懿曾任汾州刺史。柳敏本人在洛阳担任过员外散骑侍郎。[95]柳敏的家世与本人的经历说明他对北魏制度有所了解。

唐瑾，据《北史》，其曾祖父唐揣担任过北海郡太守，并因此定居于北海郡，这说明唐瑾本是山东人。此后，其祖父唐伦出任过青州刺史。父亲唐永出任过北地太守南豳州刺史。史书称唐永，“博涉经史，雅好属文”。可见，唐瑾出自有文化的官僚家庭。以上事实说明，唐瑾虽然在十七岁就出任西魏官员，但他的家世决定了他必然受到北魏制度文化的影响。

3.法律制度。据《隋书·刑法志》，修订《周大律》的是赵肃、拓拔迪。[96]又据《周书》参加格、式制定的还有徐招、裴汉、郭彦、高宾。[97]

赵肃为河南人，魏末曾任廷尉平、廷尉监、廷尉正，可知其对北魏的法律制度有所了解。拓拔迪无考。裴汉为北魏中书侍郎之孙，银青光禄大夫之子，其家定居于洛阳，裴汉兄弟在北魏末闻名于洛阳，可知其对北魏的典章制度是熟悉的。高宾原居住于辽东，太和初年其祖父高嵩投靠北魏，官至卫尉卿。其父高季安曾任抚军将军、兖州刺史。高宾本在东魏做官，大统六年入关。由其家世经历，可知高宾对北魏东魏的典章制度有所了解。郭彦，关中人，文化程度不详。

4.礼乐制度。为西魏北周治礼作乐的人有：苏绰、薛憕、薛寘、卢辩、崔猷、檀翥、周惠达。

薛憕，河东大族，其祖先在赫连夏时，迁居于襄阳。薛憕在南朝不得意，孝昌年间回到洛阳居住，河阴之变后，又回到河东闭门读书，普泰年间出任给事中。可知，他是对于北魏礼乐制度有所了解的文化官僚。[98] 薛寘也是河东大族。其祖父薛遵彦为北魏河东郡守，封安邑侯。其父薛乂任北魏尚书吏部郎，清河广平二郡守。薛寘本人曾任北魏左将军，太中大夫。[99] 从其家世历官来看，薛氏应该对北魏的礼乐制度有所了解。

崔猷出自山东士族博陵崔氏。祖父崔挺，父亲崔孝芬都是有名的文化官僚。崔猷本人是，“少好学，风度闲雅，性鲠正，有军国筹略”。来到西魏后任黄门侍郎等职。当他看到，“四时祭祀，犹没俳优角抵之戏，其郊庙祭官，多有假兼”。崔猷于是上疏要求禁止这一种不合乎礼仪的做法，朝廷也就同意了。在他出任京兆尹时，看到“婚姻礼废，嫁娶之辰，多举音乐。又廛富室，衣服奢淫，乃有强成文绣者”。崔猷认为这种风气不宜提倡，上疏要求禁止，朝廷也是欣然同意。[100] 看来崔猷是以传统的礼学矫正西魏的失礼之处，反映出山东学者在学问上的优势。高平金乡檀氏从魏晋以来就是有名的家族。檀翥早年以学识为名士瑯邪王诵所赏识，19岁担任孝明帝挽郎，后任元徽的府从事。[101] 由此可知，檀氏必为熟于传统礼乐制度，并了解北魏礼乐制度者。

宇文弼、长孙绍远、斛斯徵其祖先都是随孝文帝南迁的北族贵族。在定居洛阳之后融合于洛阳文化之中。[102]

周惠达，章武郡文安县人，家世并不显赫，但他“好读书”，对传统经学有一定修养。[103]

综上所述，西魏北周的基本制度虽然形式上与北齐不同，但是其订立制度的人员与北齐并无不同，即同出于北魏制度影响下的官僚和知识分子手中，所以西魏北周虽然为了附和西周制度，其制度因而显得怪异，但其结构与精神却沿袭自北魏制度。创立西魏北周制度的人物多出自山东，可知在孝武帝入关之前的关陇人物很难胜任创建一套与东魏北齐相抗衡的典章制度的工作。

西魏北周的第一批文武合一型人才，并不是西魏北周培养出来的，而是来自跟随孝武帝入关的部分洛阳官僚，比如宇文深、于谨、长孙俭等人。宇文深在谋略上的优长前文已述。至于于谨，张伟国曾专门研究了北朝的于谨家族，认为可以用官僚化来解释于谨家族在周隋的政

治取向。这一点，是正确的，而且适用于宇文深、长孙俭。此三人原本是代北的部族贵族，南迁后逐渐的汉化，同时官僚化。此三人的特殊之处是，虽然汉化但保留了相当的鲜卑习俗，比如熟悉军事，成为文武合一型人才。这类人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要比武人理性，比文人务实。《周书》卷二六《长孙俭传》：

又除行台仆射、荆州刺史。时梁岳阳王萧詧内附，初遣使入朝，至荆州。俭于厅事列军仪，具戎服，与使人以宾主礼相见。俭荣貌魁伟，音声如钟，大为鲜卑语，遣人传译以问客，客惶恐不敢仰视。日晚俭乃著裙襦纱帽，引客宴于别斋。因序梁国丧乱，朝廷招携之意，发言可观。使人大悦。出曰："吾所不能测也。"

这段史料的背景是萧詧与梁元帝萧绎发生了冲突，受到萧绎的军事压迫，所以，萧詧企图利用西魏来牵制萧绎。对于西魏来说，这无疑为它向南开拓疆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怎样使萧詧与西魏合作，对西魏来说很关键。长孙俭的上述表现，说明他在对萧詧使者的外交攻关上是成功的。而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既展示了西魏的军威又展示了西魏的文明，是使者感到可以依靠又可以交流。又据《周书·长孙俭传》：

及梁元帝嗣位于江陵，外敦邻睦，内怀异计。俭密启太祖，陈攻取之谋，于是征俭入朝，问其经略。俭对曰："今江陵既在江北，去我不远。湘东即位，已涉三年。观其形势，不欲东下。骨肉相残，民厌其毒。荆州军资器械，储积已久，若大军西讨，必无匮乏之虑。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经，国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汉，抚而安之，收其贡赋，以供军国，天下不足定也。"

萧詧附西魏之后，襄阳已为西魏所掌握，所以说，江陵"去我不远"。萧绎不愿东下建康，给西魏以歼灭江陵政权的较好机会。这是，长孙俭对敌方的分析。长孙俭又认为西魏要想平定天下，必得夺取江汉，收其赋税，以弥补西魏财政的困难。由此看来，他对敌我的形势有全盘的了解，表现了长远的战略眼光，这是一般武人所不具备的。另一方面，他在荆州储积了大量的军用物资，以备征讨之用。这种切实地安排准备工作的素质，也是文人们所缺乏的。

所以说，西魏之所以能在既贫且弱的情况下发展起来，正因为其在人才上还是有其优势的。这一种优势，在西魏北周的特有环境下，被源源不断的培养出来。

三 文化上的南朝化倾向 [104]

西魏建国之后，一度在文学上有复古倾向。《周书》的《苏绰传》、《柳庆传》记载，当时宇文泰和苏绰极力提倡《尚书》体的文风。[105] 但这种风气并没有维持多久。《周书》卷四十一传论，“然绰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秕魏晋，宪章虞夏。虽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没能常行焉” [106] 。即文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不是行政命令所能干预的。上引传论又云，“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笼一代。是时，世宗雅词云委，滕赵二王雕章间发。咸筑宫虚馆，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遗韵，眩精于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引文概括的是南朝文风风靡于北周。又《周书·唐瑾传》记其子唐令则，“文多轻艳，为时人所传” [107] 。“轻艳”为南朝的文风。“为时人所传”说明南朝文风为北周人所推崇。《周书·艺术传·赵文深传》记载，“及平江陵之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 [108] 这是南朝书法风靡于北周的情况。

不仅南朝的文学书法影响了北周，而且南朝的学术也传到了北周。沈重，梁朝大儒。史书称其于学无所不窥，尤其精通《诗》、《礼》、《左氏春秋》。北周天保末年被征入长安，任露门博士。 [109] 《隋书》记载张衡问《三礼》于沈重。 [110] 刘臻，南朝人，精于《两汉书》，时人称其为“汉圣”。江陵陷落后，被征入北周，任露门学士。[111] 史记杨汪曾问“礼”于沈重从刘臻学《汉书》。 [112] 《隋书》记载于仲文曾从刘臻问学。后来于仲文撰写了《汉书刊繁》，应该是研究《汉书》的成果。 [113]

四 文武合一

陈寅恪在阐述关陇集团这个历史名词时提出，关陇集团的一个特征就是其官员人物从才能上，是文武合一的。日本学者谷川道雄从理论上说明了文武合一型的人才，比之单纯的武人或文人有其优势。但是二位学者都没有关注西魏北周的文武合一型人才是如何产生的这一历史问题。本章主要说明西魏北周文武合一型人才的来源及其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所表现的优点。

如上文所述，关陇地区的文化特征是质朴尚武，这一地域特征随着西魏政权的建立有所改变，也有所保留。

西魏北周基本上由北镇武人执政，故其政权也崇尚武功，军功为仕途升迁的最快途径。这样，关陇地区的尚武之风得以保留，甚至更加浓厚。《隋书》卷五一《长孙炽传附长孙晟传》：“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书记，善弹工射，矫捷过人。时周室尚武，贵游子弟咸以相矜，每共驰射，时辈皆出其下。”《隋书》卷五十《李礼城传》：“于时贵公子皆竞习弓马，被服多为军容。”《隋书·地理志》所总结的尚

武之风，是民间的风气，而以上两则引文所描述的是官僚子弟的尚武之风。这应该是其父辈或者西魏北周政府所提倡的结果。在这样一种气氛的渐染之中，山东文化世族子弟也不禁舍弃好学的家风，转而学习武功。《隋书》卷四六《李雄传》：

李雄字毗卢，赵郡高邑人也。祖榼，魏太中大夫。父徽伯，齐陕州刺史，陷于周，雄因随军入长安。雄少慷慨，有大志。家世并以学业自通，雄独习骑射，其兄子旦让之曰："弃文尚武，非士大夫之素业。"雄答曰："窃览自古诚臣贵仕，文武不备而能济其功业者鲜矣。雄虽不敏，颇观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旦无以应之。

据李子旦的提问，可以推断其父其祖是学文的，而且凭借文化在北魏北齐做官。据李雄的回答，可知要在北周建功立业不能执守祖先的章句之学，而是要学习武功，文武兼备。可见，李雄的转变是为适应北周社会而发生的变化。李雄学习的是骑射。这是北镇军人的特长。可知，北周注意保存北镇的优势。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此问题，还可以举一反证。《北齐书·魏收传》记载："收年十五，颇已属文。及随父赴边，好习骑射，欲以武艺自达。荥阳郑伯调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惭，遂折节读书。"[114] 引文反映的是北魏末的事，可知在北魏末年，社会上是重文轻武的。这说明西魏北周的尚武不是继承北魏，而是北镇。

那么，在西魏北周是不是光有一身好武艺就可以功成名就了呢？事实证明这在制度上是不提倡的。《隋书》卷六四《麦铁杖传》："麦铁杖，始兴人也……陈亡后，徙居清流县。遇江东反，杨素遣铁杖头戴草束，夜浮渡江，觇贼中消息，具知还报……特奏授仪同三司。以不识书，放还乡里。"麦铁杖的事例说明在隋初，没文化的人是没有做官资格的。考虑到北周与隋的继承性，可推知北周应该有相同的制度。史料也显示了出身于武人家庭的子孙，成长过程中普遍地学习了一定程度的文化。

据《周书·豆卢宁传》，豆卢宁出身于北镇，"少骁果，有志气，身长八尺，美容仪，善骑射"[115]，是一位标准的鲜卑武将。史书不曾提到他的文化程度。但他的儿子豆卢却热衷于读书。《隋书·豆卢传》记载他，"少受业国子学，略涉文艺……明帝时，为左武伯中大夫。自以经业未通，请解职游露门学。帝嘉之，勅以本官就学"[116]。据《周书·韩雄传》，韩雄为新安县豪强，"少敢勇，力绝人，工骑射，有将率材略……前后经四十五战，虽时有胜负，而雄志气益壮，东魏深惮之"[117]。可见韩雄是一位猛将，史书没有提及他的知识程度。《隋书》记载他的儿子韩擒虎，"少慷慨，以胆略见称，容貌魁岸，

有雄杰之表。”看来是继承了武勇的家风。但史书又记载，“性又好书，经史百家皆略知大旨”[118]。则韩擒虎比其父的文化程度要高。

鲜卑武将贺若敦，《周书》本传没记录他的受教育情况。《隋书》记载了他的儿子贺若弼，“骁勇善弓马，解属文，博涉书记，有重名”。贺若弼曾撰写《平陈十策》，可见其写作能力、分析能力是达到一定水平的。在平陈之战前，他曾赠诗给源雄。诗曰：“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骐驎上，无我二人名。”[119] 客观地说，诗的水平一般，但一位武将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思想，说明北周文学气氛是较为浓厚的。

《周书·田弘传》记其，“少慷慨，志立功名，膂力过人，敢勇有谋略”。作战，“每临阵，摧锋直前，身被一百余箭，破骨者九，马被十矟，朝廷壮之”。又称，“弘虽武将，而动遵法式，百姓颇安之”[120]。史书记载他的儿子田仁恭，“性宽仁，有局度。在周以明经为掌式中士”[121]。以明经而入仕，说明田仁恭的经学已经达到相当水平。其性格迥异于其父，应该是研读经典以后性格所发生的变化。

综合以上武将之子普遍习文的事实，可以推断这与西魏北周的教育有密切关系。教育的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图书、师资、学校、激励机制等。

西魏建立后，关陇地区的公私藏书比以前有所增加。《周书》卷三七《寇儁传》，“大统二年，东魏授儁洛州刺史，儁因此乃谋归阙。五年，将家及亲属百余口入关，拜秘书监。时军国草创，坟典散逸，儁始选置令史，抄集经籍，四部群书，稍得周备。”《周书·裴汉传》记载裴汉，“借人异书，必躬自录本”。《周书·贺兰祥传》记梁岳阳王萧詧曾以“经史”赠送贺兰祥。《周书》卷三二《唐瑾传》，“于谨南伐江陵，以瑾为元帅府长史。军中谋略，多出瑾焉……及军还，诸将多因掳掠，大获财物。瑾一无所取，唯得书两车，载之而归。”西魏政府也因为征服江陵而获得了一些图书。《周书》卷四二《萧大圜传》记载北周麟趾殿藏有“《梁武帝集》四十卷，《简文集》九十卷”，而且是“江陵平后，并藏密阁”的。书籍的陆续入藏，使得有志于教育及学习的人，有了最基本的条件。

北朝以来，关陇地区的文化水平落后于山东、江南地区。西魏政权的建立，吸引了一批山东学者来到关陇，被任命为官学教师。如卢光，史书记载他，“性温谨，博览群书，精于三礼，善阴阳，解钟律，又好玄言。”大统六年，来到长安，曾教授周武帝等。[122] 樊深是河东猗氏人，“弱冠好学，负书从师于三河，讲习《五经》，昼夜不倦”。沙苑之战后，被于谨引为僚佐，教其子读书。后来宇文泰，“置学东

馆，教诸将子弟，以深为博士”。之后，樊深历任国子博士，太学助教，太学博士等教职。[123] 乐逊也是河东猗氏人，北魏正光年间，从徐遵明问学。他先后研读了《孝经》、《丧服》、《论语》、《诗》、《书》、《礼》、《易》、《左氏春秋》，了解了经典的意义。大统九年，西魏太尉李弼请乐逊教其儿子读书。魏废帝二年，宇文泰延请乐逊教育诸子。乐逊还出任过太学助教，太学博士。[124]

西魏攻陷江陵后，萧梁的文人学者在江陵者多被掳掠到了关中。于是，江南文化开始风靡关陇。前文对此有所论述，此处不赘。羁旅于关中，对于南朝学者并不是愉快的事情，于郁闷之中，学者们力图用一些文学集会来冲淡乡愁。《隋书·庾季才传》，“季才局量宽弘，术业优博，笃于信义，志好宾游。常吉日良辰，与琅琊王褒、彭城刘毂、河东裴政及宗人信等为文酒之会。次有刘臻、明克让、柳辩之徒，虽为后进，亦申游款”。这一种南人的文学集会在北朝时期的关陇还是新生事物，多少为尚武的北周政权平添了一丝文雅之气。

西魏北周中央官学教育的实绩在历史上确确实实起到了教育官僚子弟的作用。中央官学包括国子学和太学。《隋书》卷一〇《崔仲方传》：“崔仲方字不齐，博陵安平人也。祖孝芬，魏荆州刺史。父宣猷，周小司徒。仲方少好读书，有文武才干。年十五，周太祖见而异之，令与诸子同就学，时高祖亦在其中，由是与高祖少相款密。”《隋书》卷三八《郑译传》：“初高祖与译有同学之旧。”《隋书》卷四〇《元谐传》：“元谐，河南洛阳人也，家代贵盛。谐性豪侠，有气调。少与高祖同受业于国子，盛相友爱。”《隋书》卷二九《豆卢传》：“父宁，柱国，太保。初生时，周太祖亲至宁家称庆，时遇新破齐师，太祖因字之曰定东。聪悟，有器局。少受业国子，略涉文艺。”以上受业于国子学的学生，都是西魏的开国功臣的儿子。从引文所记载的事实不难推断，西魏北周的中央官学是官僚子弟接受教育的主要方式。

西魏北周的中央官学还有麟趾学、露门学、通玄馆。通玄馆，是宗教机构，此处不论。

麟趾学、露门学都兼具学术研究与政策顾问的性质。《周书·明帝纪》记载：“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说明该机构有研究性质。《隋书》卷七三《循吏传·辛公义传》记载：“辛公义，陇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庆，青州刺史。公义早孤，为母氏所养，亲授书传。周天和中，选良家子任太学生，以勤苦著称。武帝时召入露门学，令受道义。每月集御前，令与大儒讲论，数被嗟异，时辈慕之。”辛公义太学毕业后才得以进入露门学，说明露门学的程度高于太学。每月讲论，说明了研究性质。

露门学还兼国家顾问的功能。《隋书》卷七六《王传》：“年二十，尚不知书。为其兄颙所责怒，于是感激，始读《孝经》，《论语》，昼夜不倦。遂读《左传》、《礼》、《易》、《诗》、《书》，乃叹曰：‘书无不可读者。’勤学累载，遂遍读五经，究其旨趣，大为儒者所称。解属文，善谈论。年二十二，周武帝引为露门学士。每有疑决，多所为。”可证露门学士在国家政策制定上起咨询作用。

综上所述，西魏北周的中央官学由国子学，太学以及麟趾学、露门学组成。官僚子弟或者经过遴选的平民子弟在国子学或太学接受基础教育。根据史料，几乎所有的官僚子弟都经过了基础教育。如果想进一步接受教育，可在麟趾学、露门学学习。这两个机构主要集合了关陇、山东、江南的文人学者。这些文人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或者完成朝廷交付的文化任务。翻阅《隋书》列传，不难发现隋初的大臣基本上都接受过西魏北周的官方教育。这说明西魏北周的教育是成功的。

西魏北周的官方教育之所以没像北魏、北齐那样有成为具文，这是因为西魏北周执政者切实地提倡教育。

前文曾引用过宇文泰，“置学于东馆，教诸将子弟”。这说明宇文泰不仅注意保持官僚子弟尚武之气，他还希望他们能学习汉文化以改变粗暴的气质。宇文泰督促大臣子弟读书的例子很多。《周书》卷四〇《宇文孝伯传》：

宇文孝伯字胡三，吏部安化公深之子也。其生与高祖同日，太祖甚爱之，养于第内，又与高祖同学。

《隋书》卷四六《元晖传》：

元晖字叔平，河南洛阳人也。祖琛，魏恒、朔二州刺史。父翌，尚书左仆射。晖须眉如画，进止可观，颇好学，涉猎书记。少得美名于京下，周太祖见而礼之，命与诸子游处，每同席共砚，情契甚厚。

《周书》卷三八《李昶传》：

初谒太祖，太祖深奇之，厚加资给，令入太学。

宇文泰最著名的劝学事例，是在行台办学。《周书》卷三五《薛善传附薛慎传》：

太祖于行台省置学，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后子史……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学佛义，使内外具通。由是四方竞为大乘之学。

宇文泰对教育的重视产生了良好的接力效应。他的儿子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因而在执政后更加提倡教育与文化事业。周明帝创立了麟趾学，周武帝创立了露门学，有助于学术文艺的发展。周武帝在天和元年、三年曾两次为大臣讲演《礼记》。这反映了周武帝的儒学修养已经达到相当水平，而且这一种示范，会引发北周社会学习经典的热情。

宇文氏父子对于人才是注意保护的。《周书·艺术传》的卷首议论道："太祖受命之始，属天下分崩，于时戎马交驰，而学术之士盖寡，故曲艺末技，咸见引纳。至若冀儁、蒋升、赵文深之徒，虽才愧昔人，而名著当世。"[125] 这段评议，一方面揭示了西魏人才的匮乏；另一方面显示西魏用人不拘一格。凡有一技之长者，莫不用之。《周书》卷四七《艺术传·黎景熙传》：

时王思政镇颍川，累使召。季明不得已，出与相见。留于内馆月余。太祖又征之，遂入关。乃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于东阁。

《周书》卷三八《柳虬传》：

大统三年，冯翊王元季海、领军独孤信镇洛阳。于时旧京荒废，人物罕极，唯有虬在阳城，裴诹在颍川。信乃具征之，以虬为行台郎中，诹为都督府属，并掌文翰。

黎景熙为河间人。柳虬、裴诹河东人。三人的父祖都为北魏官僚。黎景熙的祖父从崔弘崔浩父子学习文字学，并世代相传，则黎景熙所学为河北古学。柳裴二人都是洛阳文化熏染之下成长起来的文人。三人所学虽不同但同样受到西魏政府的热情礼聘，可见其对人才的渴望与重视。

西魏政府获得大量而且优秀的文人学士是在攻下江陵之后。客观地说，西魏攻陷江陵之战是一场人间惨剧，文化的浩劫。所幸，被掳掠到关中的文人学士逐渐获得了优待，从而推动了北周文化的发展。《隋书》卷七八《庾季才传》：

周太祖一见季才，深加优礼，令参掌太史。每有征讨，恒预侍从。赐宅一区，水田十顷，并奴婢牛羊什物等，谓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赐者，欲绝卿南望之心。宜尽诚事我，当以富贵相答。"初，郢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没为贱。季才散所赐物，购求亲故。文帝问曰："何能若此？"季才曰："仆闻魏克襄阳，先昭异度，晋平建业，喜得士衡。伐国求贤，古之道也。今郢都覆败，君信有罪，缙绅何咎，皆为贱隶，鄙人羁旅，不敢献言，诚切哀之，故赎购

耳。”太祖乃悟曰：“吾之过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为奴婢者数千口。

江陵之役，宇文泰不知求贤，的确反映了北镇军人的固有缺陷。宇文泰经庾季才提醒，犹能悔悟。之后，南人在西魏北周的处境进一步改善。《周书》卷三〇《于翼传》：

世宗雅爱文史，立麟趾学，在朝有艺业者，不限贵贱，皆预听焉。乃至萧，王褒等与卑鄙之徒同为学士。翼言于帝曰：“萧，梁之宗子；王褒，梁之公卿。令与趋走同侪，恐非尚贤贵爵之义。”帝纳之，诏翼定其班次，于是有等差矣。

《周书》卷四五《儒林传·沈重传》：

高祖以重经明行修，乃遣宣纳上士柳裘至梁征之……又敕襄州总管、卫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给，务从优厚。保定末，重至于京师。诏令讨论《五经》，并校定钟律。天和中，复于紫极殿讲三教义。朝士、儒生、桑门、道士至者二千余人……六年，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露门博士。仍于露门馆为皇太子讲论。

从萧、王褒、沈重在北周所受到的高级礼遇，说明了随着北周朝野的文化程度的增长，南人的处境在改善，而南人处境的改善加快了北周对南朝文化的认识。

综上所述，在西魏建立之后文化人才相对落后，所以宇文泰父子积极从各方面汲取人才。西魏北周不仅任用关陇本地人，而且热情招揽山东学士。江陵之役后，被掳掠到关中的南朝文人学士的处境不断得到改善，被吸收到文化教育机构。山东、南朝学人加入西魏北周，使得关陇地区的文化状况得到改善。

以上我们重点探讨了西魏北周的执政者在改变关陇地区文化落后面貌上所做的努力，尤其是他们着力于改变功臣子弟的文化面貌。也就是说，宇文泰并不希望北镇军人子弟仅仅继承武勇的风格，更希望他们了解中原文化。在官学的教育之下，功臣子弟掌握了程度不同的汉文化。系统的汉文化的教育也使功臣后代在性格特征上与其祖辈不同。也就是说，他们与汉人可以相互认同。其次，由于西魏北周政权的官方教育覆盖了北镇军人子弟，所以西魏北周的文化方向就是朝汉化这一个方向，而不是像北魏、北齐那样处于两种文化对立发展的困境。所以，西魏北周政权的凝聚力要好于北齐。

从另一个方面看，西魏北周的文化创造力不强，没有自己的学者，文

化主要靠山东江南学者提供。也就是说，西魏北周的教育仅能使学生学到儒学的基础知识，没有继续研究的动力。这与西魏北周的政策有关。西魏北周的国策是消灭北齐，所以整个国家始终处于战争状态。这样军功就成为仕途上升的最佳途径，因而官僚子弟比较重视军事训练。在既重视文化教育，又崇尚军功的社会中，其人才特点就是才兼文武。

西魏北周培养出来的文武合一型人才比较多，这里举出宇文宪、于翼、宇文弼，来说明文武合一型人才在实际的政治军事活动中的优势。《隋书·宇文弼传》：“武帝将出兵河阳以伐齐，谋及臣下，弼进策曰：‘齐时建国，于今累叶，虽曰无道，藩屏之寄，尚有其人。今之用兵，须择其地。河阳冲要，精兵所聚，尽力攻围，恐难得志。如臣所见，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过于此，愿陛下详之。’”宇文弼的祖父宇文直力觐，为北魏钜鹿太守，父亲宇文珍为北周宕州刺史，可见其出自官僚家庭。宇文弼曾“修定五礼”，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史书记载，宇文弼，“奉使邓至国及黑水、龙涸诸羌，前后降附三十余部”可知他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为文武合一型人才。[126] 北周的伐齐之役之成功，最为关键的是先攻取晋州，这与宇文弼的分析相合，可见其人对军事形势认识得深刻。当时，提出取道晋州以伐齐的大臣还有赵煚，他认为“河南洛阳，四面受敌，纵得之，不可以守，请从河北，直指太原，倾其巢穴，可一举以定”[127]。鲍宏也说：“我强齐弱，势不相牟。齐主昵近小人，政刑日紊，至德仁惠慈恕，法令严明。事等建瓴，何忧不克。但先皇往日出师洛阳，彼有其备，每不克捷。如臣计者，进兵汾潞，直掩晋阳，出其不虞，以为上策。”[128] 赵煚是天水西县人，“略涉书史”有一定文化。《隋书》记其在洛阳，“与齐人前后五战，斩郡守、镇将县令五人，虏获甚众”，这又说明他兼具军事才能。正因为他在洛阳的军事经历他才得出洛阳并非战争的首选方向。鲍宏，出自南朝，曾出使陈朝，与陈商讨联合伐齐的事宜。可能是因为做过伐齐的工作，所以鲍宏才对伐齐的主攻方向有如此高超的见解。但是可以看出，作为文人，他显然不像前两位一样从军事地理的角度分析，而是从政治，以及历次军事经验总结的角度，所以他的分析同样深刻，只是显得不够具体。西魏北周之所以由弱变强，是因为在机遇出现的时候多得到及时地把握，而洞察到机遇的人物往往是以上这样一批智勇双全的大臣。他们使北周在政治、军事、外交上渐渐地处于主动，而北齐则越来越被动。

据《周书·宇文宪传》，他少年时期对于儒家经典，“咸综机要，得其指归”，表明宇文宪在文的一方面有相当的修养。宇文护执政时期，对宇文宪，“雅相亲委，赏罚之际，皆得预焉”。在周武帝执政后，“高

祖将欲东讨，独与内史王谊谋之，余人莫得知也。后以诸弟才略无出于宪右，遂告之。宪赞成其事”。由此可知，宇文宪的政治能力是相当高的。据《周书·武帝纪下》，周武帝在伐齐之前，发生了“诸将多不愿行”的情况。“诸将多不愿行”自然是认为北齐依然强大，而没有看到北齐与北周在力量对比上所呈现的劣势。这也反衬出宇文宪对形势的认识，要比“诸将”深刻。《周书·宇文宪传》记载：“宪常以兵书繁广，难求指要，乃自刊定为《要略》五篇，至是表陈之。高祖览而称善。”[129] 宇文宪虽然只是删削兵书，而不是写作，但也说明他对于当时流传的兵书是熟悉的，而且删改也是创造性劳动。据现有材料，他是北朝传述兵法的第二人。这说明，宇文宪在同时期的将领中理论化的意识是突出的。

说到兵法就不能不提到韩擒虎和李靖。李靖，雍州三原人。其祖父李崇义为西魏殷州刺史。父亲李诠为隋朝赵郡郡守。从其父祖的历官及籍贯看，李靖应当是在北周时期的关中长大。《旧唐书》记载李靖，“有文武才略”说明他正是文武合一型人才。史书又称：“其舅韩擒虎号为名将，每与论兵，未尝不称善，抚之曰：‘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130] 《隋书·韩擒虎传》仅记录了传主的武功之盛，没有说明取得武功的原因。从上段引文，我们才知道韩擒虎原来是好谈孙吴之术的，也就是说对于兵法素有研究，可以推测韩擒虎在众多的武将之中脱颖而出，其原因必然与他深于兵法有关。而李靖之精通兵法是与这位名将切磋的缘故。李靖在历史上以兵法出名，他的兵法的部分内容保存在《通典》中。其实，他在唐初就以兵法而出名了。《新唐书·侯君集传》记载：“始，帝命李靖教君集兵法，继而奏曰：‘靖且反，兵之隐微，不以示臣。’帝以让靖，靖曰：‘方中原无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尽臣术，此君集欲反耳。’”[131] 此事又见《隋唐嘉话》等唐代笔记，说明此事流传甚广，这也说明唐代人对李靖兵法是相当推崇的。从宇文宪的删削兵书，到韩擒虎的“好谈孙吴之术”，再到李靖著作兵法，可以看出西魏北周的文武合一型官僚在军事实践理论化的道路上不断努力，逐步深化的历程。从这种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培养了一代代的优秀将领，从中可以领悟到西魏北周隋唐军事强大的原因。

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在其专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认为，文武兼备的官僚执政是隋代开皇政治的特征。这个特征，是开皇盛世的主要原因。他又认为随着太子杨勇的被废，标志着以高颎为核心的文武合一型的官僚集团失势。[132] 也就是说，文武合一型官僚的影响一直到隋代仁寿初年。熟悉唐史的人知道唐代有所谓的“出将入相”的节度使。这一制度，恐怕还是文武合一政治的影响。

第三节 西魏北周军队的构成

西魏北周的政治史、军事史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关陇地区的北镇鲜卑数量不足以支持西魏的立国。于是，关陇地方势力、河南、河东地方势力便不断地被吸收进了政府和军队。对目前为止，学界围绕这个前提，做了不少的研究，但是，就笔者所见，还没有学者注意北镇军人与汉族军人在军事素质上的差异，以及西魏针对差异而作的不同运用。对于军队汉化所引起的兵种变化，学界亦未涉及。本节仅就以上两个方面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大统十二年之前的兵种构成

大统十二年是东西魏对峙史上的一次转折。此前，东魏处于攻势，两个政权进行了六次激烈的战争；此后，两国在经历了约十七年的和平后，西国处于优势。所以，大统十二年以前可以作为一个独立时段来研究。为了清楚地呈现这一时段西魏军队的两种构成，及其不同应用，有必要将此期发生的四次野战，两次攻守战分别予以陈述。

小关之战。北魏永熙三年，魏孝武帝西逃，展开了东西魏的对抗史。大统二年十二月，高欢亲率大军驻扎于蒲津，准备渡河东进，另派骁将窦泰攻潼关。高昂攻上洛。此时的西魏刚刚经受北方的叛乱，而且遭遇大旱，处境十分艰难。据《周书·文帝纪》，战役的过程为，“庚戌，太祖率骑六千还长安，声言欲保陇右。辛亥，谒帝而潜出军。癸丑旦，至小关。窦泰卒闻军至，惶惧，依山为阵，未及成列，太祖纵兵击破之，尽俘其众万余人。斩泰，传首长安。高敖曹适陷洛州，执刺史泉企，闻泰之殁，焚辎重弃城走。齐神武亦撤桥而退。”宇文泰俘虏万余人，可知，窦泰军队在二万人左右。西魏军队是骑兵六千人。以六千敌二万而能胜利，说明西魏的野战能力是强的。尽用骑兵，说明西军主力是北镇军人。

沙苑之战。小关取胜后，西魏军队乘势夺取了弘农，在此地修整了五十多天。此期间，河南豪杰，“各率所部来降”。高欢不能容忍小关的失败，急于再战。据《周书·文帝纪下》，高欢参与沙苑之战的军队是十万人。当时，西魏的诸州援兵迟迟未能到达作战区域，战后才到达沙苑。西魏参战的是驻扎在弘农不足一万人的军队，估计这支军队以北镇军人为主。沙苑之战，西军不足一万，东军十万。西军以一抵十，说明战斗力是强的。

如果把小关之战与沙苑之战放到北朝历史的大背景之中去看，会发

现，这是关陇军事集团抗击外敌的初次胜利，而两次战役的主力都是北镇军人，因而，可以推断北镇军人的到来，提供了关陇地方武力所不足的野战能力。使得建立于此地的西魏政权可以与外来侵略势力相对抗了。

河桥之战。沙苑之战后，西魏夺取了河东、陕州，既而派大将独孤信占领了洛阳，并派兵到颍川等地扩大战果。大统四年，东魏派侯景、库狄干、高昂、韩轨、可朱浑元、莫多娄贷文等收复失地，包围了洛阳。此战西军败归，被俘数万人。河桥之战是侯景与宇文泰的较量。胡三省对二人的表现评论为："（侯）景置阵北据河桥者，虑兵有利钝，先保据其北归之路也。南属邙山，可以见其兵多矣。景军参用马步，其置阵坚固，宇文泰以轻骑来，见其阵势如此，敛兵不进可也，遽前合战，亦屡胜而骄也。"[133] 胡的分析十分中肯。史称侯景擅于兵法，观其排兵布阵可见一斑。此战也反映了西魏军队的弱点。西军之先胜说明其军队冲击力颇强。后败，说明持续作战实力弱，即兵力不足。凸显西魏兵力不足的另外一个事实是，留守关中兵力太少，引发了内乱。《周书》卷二《文帝本纪下》：

大军之东伐也，关中留守兵少，而前后所虏东魏士卒，皆散在民间，乃谋为乱。及李虎等至长安，计无所出，乃与公卿辅魏太子出次渭北。关中大震恐，百姓相剽劫。于是沙苑所俘军人赵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据长安子城，伏德保咸阳，与太守慕容思庆各收降卒，以拒还师。长安大城民皆相率拒青雀，每日接战。魏帝留止阌乡，遣太祖讨之。长安父老见太祖至，悲且喜曰："不意今日复得见公。"士女咸相贺。华州刺史导率军袭咸阳，斩思庆，擒伏德，南渡渭与太祖会攻青雀，破之。太傅梁景睿先以疾留长安，遂与青雀通谋，至是亦伏诛。关中于是乃定。魏帝还长安，太祖复屯华州。

关中留守兵少是叛乱蔓延的主要原因。由此，可以推断河桥之战西魏是倾全国之师与东魏对决，而东魏的主力尚未参战。可见，大统初年，东西魏兵力差距之大。于伏德与梁景睿的附逆，显示宇文泰在关陇地区的权威还未完全建立。这也说明宇文泰的对外战争操之过急。宇文泰可能也意识到了，所以直到大统九年，他再未出兵东讨。

此战，西魏以轻骑兵冲击东魏军阵，可知西军仍以北镇军人为主力。

邙山之战。大统九年的邙山之战的诱因是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西降。大统九年三月宇文泰率兵包围河桥南城，高欢率十万大军南攻，西军退至瀍曲。高欢渡河，屯军于邙山，数日不进。宇文泰率轻骑兵夜间偷袭。黎明，两军交战，西军败。第二天再战，西军中右两军合击，破东军，但左军败退，东魏集军再战，西军大溃。据《魏书·孝静

帝纪》，东魏的战果是，擒获西魏临洮王元森，蜀郡王元荣宝，江夏王元升，钜鹿王元阐，谯郡王元亮，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太子詹事赵善，督将参僚等四百余人，俘斩六万余，甲仗牛马不可胜数。收复豫、洛二州。

战争的过程与河桥之战相似，西魏先败，再胜，最后大败。同样说明了西魏军队勇猛有余而兵力不足的弱点。东西魏的军队都以北镇军人为主力，作战方式是相同的，所拼的只是实力。西魏实力弱，只有失败。

以上所述，是大统十二年之前东西魏之间发生的四次野战。两方各有两次胜利。胜方总是在内线作战，由败方主动引发战争。由此证明，东西两国要灭掉对方都不可能。西魏之所以能在内线取得胜利，这与北镇军人的浴血奋战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以北镇军人为核心的西魏军队，使关陇政权获得了与东魏决战内线的实力。为了更明晰地证明这一点，下面列举出四次战役的主要将领。

小关之战：

贺拔胜、李弼、于寔、侯莫陈崇、若干惠、怡峰、刘亮、达奚武、杨忠、豆卢宁、尉迟纲、韩果、库狄昌、王勇、宇文虬、耿豪、王雅、侯植、段永，以上19人出身于北镇。[134]

常善、宇文泰、达奚寔、窦炽、窦毅、陆通、元定、崔谦、崔猷，以上9人出身于洛阳官僚或山东大族。[135]

蔡祐、薛端、韦孝宽等3人出身关陇。[136]

沙苑之战：

贺拔胜、李弼、李摽、于谨、于寔、赵贵、独孤信、侯莫陈顺、豆卢宁、杨忠、王励、尉迟纲、尉迟迥、杨俭、韩果、库狄昌、田弘、梁椿、王勇、宇文虬、宇文盛、耿豪、王雅、侯植、段永，以上25位将领都出身北镇。

常善、宇文深、高琳、达奚寔、窦炽、窦毅、陆通、唐谨、王庆、元定、杨摽、崔谦、崔悦、崔猷等14人出身于洛阳官僚或山东大族。

蔡祐、权景宣、王杰、裴侠、薛端、韦□、梁昕等7人为关陇土著。

河桥之战：

贺拔胜、念贤、寇洛、李弼、李摽、于谨、于寔、赵贵、独孤信、侯莫陈崇、若干惠、怡峰、杨忠、贺兰祥、尉迟纲、阎庆、韩果、库狄昌、梁椿、贺兰敦、宇文虬、侯植、杨纂、段永，以上24位将领都出身于北镇。

王思政、常善、宇文深、高琳、窦炽、陆通、唐谨、王悦、元定、崔谦、郑伟、韩雄、陈忻等13人出身于洛阳官僚或山东大族。

王杰、裴果、薛端、韦孝宽等4人为关陇土著。

邙山之战：

贺拔胜、李弼、于谨、于寔、赵贵、独孤信、若干惠、达奚武、杨忠、贺兰祥、尉迟迥、阎庆、韩果、田弘、梁台、王勇、耿豪、伊娄穆、王雅、赵善、杨纂，以上21位将领都出身北镇。

长孙澄、高琳、窦炽、杨摽、元定、韩雄、陈忻等7人出身洛阳官僚或山东大族。

李远、王杰、裴果、蔡祐、赵昶等5人为关陇土著。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在每一次野战之中北镇将领都是占半数以上。可以推断，如果没有北镇军人，仅靠关陇本地势力是不能抵挡高欢入侵的。北镇军人的战斗使得东西魏处于对峙的局面。这一种局面对西魏比较有利，因为西魏实力较弱，需要时间、机会发展。实际上，历史恰恰给了西魏北周一些机会，西魏北周也抓住了机会，所以西魏北周的实力在不断地增长，逐步地赶上了北齐，使得西魏北周实力不足的弱点得以克服。克服了这个弱点，北周就有机会击败北齐。

东西魏之间当然不可能只有野战，长期对峙，攻防战是不可避免的。东强西弱，西魏自然处在守势。东魏的军事重心位于晋阳，所以讨伐西魏，选择的路线是从晋阳南下河东，从蒲津渡河入关。沙苑之战后，西魏夺得了河东，于是在玉壁修筑城防。玉壁处于晋阳到蒲津的咽喉位置。所以，东魏西伐，就不得不先攻打此城。于是，在玉壁城就发生了两次规模较大的攻防战。

第一次玉壁之战发生在河桥之战后的大统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围西魏仪同三司王思政于玉壁城，欲以至敌，西师不敢出。十一月癸未，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师。”《周书》卷一八《王思政传》，“八年，东魏来寇。思政守御有备，敌人昼夜攻围，卒不能克，乃收军

还。”从引文看不出西魏曾派援军。《周书·文帝纪下》记载：“（大统八年）冬十月，齐神武侵汾绛，围玉壁。太祖出军蒲坂，将击之。军至皂荚，齐神武退。太祖渡汾追之，遂遁去。”又据《周书》各传，从宇文泰援助玉壁的将领有：赵贵、怡峰、杨忠、尉迟纲、长孙澄、梁台、李穆、陆通。由此可证，宇文泰援助过玉壁。又据引文，高欢九月发兵，十月到达玉壁。十一月撤围，而宇文泰十一月才到达蒲津。此时，王思政已经坚守一月了。

第二次玉壁之战是在大统十二年九月。高欢出兵之前，有殿中将军曹魏祖以，“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气逆生气，为客不利，主人则可，兵果行，伤大将军”的理由加以劝阻。但是非常迷信的高欢没有听从望气专家的预言。[137] 这很不正常。又据《周书·韦孝宽传》：“十二年，齐神武倾山东之众，志图西入。”可见高欢带着强烈的意志来进行这场战争。从高欢不久病逝的事实，可能高欢觉察到身体状况的恶化，所以一定要发动这一场试图灭西魏的战争。据《周书·韦孝宽传》：“神武无如之何，乃遣仓曹参军祖孝征谓曰：‘未闻救兵，何不降也？’孝宽报云：‘我城池严固，兵食有余，攻者自劳，守者常逸。岂有旬朔之间，已须救援。适忧尔众有不返之危，孝宽关西男子，必不为降将军也。’”可见这次攻守战，西魏没有派援军。韦孝宽是以一城之众抗击倾国之师，坚守达五十天，歼敌达七万。此战严重消耗了东魏的作战能力，尤其是挫伤了东魏的士气。从此，东魏北齐再也没有发动过对西魏北周的大规模入侵战争。西魏北周因而获得了发展壮大的机会。

如果考察一下指挥这两次防守战的西军将领，会发现王思政、韦孝宽都是汉人。这显然与野战军队的北镇将领形成鲜明对比。如果对史料进行更细密的爬梳，会发现西魏成功的防守战例几乎都由汉族将领指挥。

（一）王罴守华州

北魏孝武帝逃入关中时，王罴任华州守将。东军将领韩轨、司马子如率军追到华州。当时正修城墙，梯子还在城外。夜间东军爬入城内。王罴还在睡觉，听到外面有动静，衣服都没穿，提了一根大棒子，冲了出去。东军大吃一惊，连忙后撤。赶到东门时，西军集合，打败东军。沙苑之战前，高欢又一次来到华州。《周书》卷一八《王罴传》：

沙苑之役，齐神武士马甚盛。太祖以华州冲要，遣使劳罴，令加守备。罴语使人曰：“老罴当道卧，貊子安得过？”太祖闻而壮之。及齐神武至城下，谓罴曰：“何不早降？”罴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罴家，生

死在此，欲死者来。”齐神武遂不敢攻。

高欢的目的是寻求西魏主力决战，不想消耗实力在攻城上，当时王罴的气势也使高欢觉得华州不是轻易就能攻下，所以才撤军。

那么，王罴用以攻守的兵力来自何处？据《周书·王罴传》，柔然入侵关中时，王罴对西魏大臣说：“若茹茹至渭北者，王罴率领乡里自破之，不烦国家兵马。”可见王罴所用的是关中地方势力。

（二）陕州防守

《北史》卷六四《韦孝宽传》：

文帝自原州赴雍州，命孝宽随军。及剋潼关，即授弘农郡守。从擒窦泰，兼左丞，节度宜阳兵马事。仍与独孤信入洛阳，为阳城郡守。复与宇文贵、怡峰应接颍川义徒，破东魏将任祥、尧雄于颍川。孝宽又进平乐口，下豫州，获刺史冯邕。又从战河桥。时大军不利，边境骚然，乃令孝宽以大将军行宜阳郡事。寻迁南兖州刺史。是岁，东魏将段琛、尧杰复据宜阳，遣其阳州刺史牛道恒扇诱边人，孝宽深患之，乃遣谍人访获道恒手迹，令善学书者伪作道恒与孝宽书，论归款意……还令谍人送于琛营。琛得书，果疑道恒，其所欲经略皆不见用。孝宽知其离阻，日出奇兵掩袭，擒道恒及琛等，崤函遂清。

从引文看，韦孝宽虽然也参加野战，但是宇文泰主要还是让他担任防守之职。

邙山之战后，李远担任都督义州弘农等二十一防诸军事，史称，“远善妥抚，有干略，守战之备无不精锐。每厚抚境外之人，使为间谍，敌中动静，必先知之”[138]。大统八年之后，王思政镇守弘农。河桥之战后，高欢曾追至弘农。王思政此时出任守将，可见宇文泰对王防御能力的信任。《周书·王思政传》记载王到任后，“于是修城郭，起楼橹，营田农，积刍秣，凡可以守御者，皆具焉。弘农之有备，自思政始也。”王思政所率的军队，也不是北镇军人。《周书·王思政传》记宇文泰“令募精兵”，也就是说由王思政自己组建军队。军队在关中招募，自然以关陇人为主。《周书·王思政传》记载王思政，“有帐下督雷五安”。雷姓为关中羌族大姓，可证王的军队以关中人为主。

陕州一带的防守战，不应该忽视当地豪族的支持。《周书》第四三卷记载了李延孙、韦法保、韩雄、陈忻、魏玄等河南、关中豪强与东魏军队在宜阳一带周旋的事迹。传末，唐代史家评论为，“二国争强，四郊多垒，镇守要害，义属武臣。李延孙等以勇略之姿，受扞城之

寄。灌瓜赠药，虽有愧于昔贤；用能观兵伊洛，保据崤函，齐人沮西略之谋，周朝援东顾之虑，皆数将之力也”[139]。由此可见唐人对这些豪强在陕州的防御作用评价还是较高的。

（三）河东防守

薛善，河东郡汾阴县人，当地大族。沙苑之战后，高欢任命薛崇礼为河东郡郡守。西军李弼攻城。薛善劝崇礼投降，崇礼不从，此时，薛善堂弟薛馥、妹夫高子信为防城都督，守城南。二人建议薛善投降。善命令弟薛济率门生数十人，汇同薛、高二人以城南降。薛善因此被任为汾阴令。[140]

当李弼攻到河东时，敬珍敬祥兄弟率猗氏、南解、北解、安邑、温泉、虞乡六县人户十万投降。宇文泰任命敬珍为平阳太守，领永宁防主；敬祥相里防主。宇文泰对敬珍说，“国家有河东之地者，卿兄弟之力。还以此地付卿，我无东顾之忧矣”[141]。

以正平、邵郡为基地在河东河南为西魏严防死守的是杨摽。杨摽，河南马渚豪族。大统二年，宇文泰攻弘农时得到杨摽帮助。杨摽的父亲曾在河东邵郡白水县做过县令，他与河东豪族有过交往。杨摽向宇文泰自荐，让他去说降河东豪族。杨摽到河东后说服邵郡豪族王覆怜，率义军二千人，攻拔邵郡。之后，又收复正平、河北、南汾、二绛、建州、太宁等城。沙苑之战，夺据东魏东雍州。杨摽先后被任命为行正平郡事，行建州事，建州刺史，晋建二州诸军事，建州郡河内汲郡黎阳等诸军事。从其任职，可以看出杨摽一直在河东河内一带活动。这些地区是东西魏的边境。可知他一直在此地防守，并试图扩展领土。杨摽的活动不是一帆风顺，他与侯景等有过多次交手，正平等地多次沦陷，战斗是艰苦的。据《周书·杨摽传》，杨摽所率的军队是由义徒、义士所组成。也就是说，并不是政府所配，而是杨摽自己招募的河东河内当地人。[142]

李远曾出任河东郡守。《周书·李远传》记录：“时河东初复，民情未安，太祖谓远曰：‘河东国之要镇，非卿无以抚之。’乃授河东郡守。远敦奖风俗，劝课农桑，兼修守御之备。”

大统六年后，宇文测以大都督行汾州事。宇文测到达汾州时，两国互相抢掠的事时有发生。宇文测对被俘虏的东魏士兵，以礼相待，发给钱粮，送其回家。于是，东魏不再入境掠夺。[143]

《周书·韦瑱传》记载他曾在大统八年镇守蒲津关，后任蒲州总管府长史。韦瑱后领乡兵，可知，其所领之兵由他的关中乡里组成。

大统十二年之前是东魏全力进攻西魏的时期，西魏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无论攻还是守，都很艰巨。西魏通过野战夺得了河东、陕州，使得关中免于直接受到攻击，政权的安全性提高了。这是野战的功绩。在野战不利的情况下，河东、陕州防守的任务更加艰巨。如果没有顽强的防守，西魏政权也不会持久。

正如前面提到的，韦孝宽、韦瑱、韦法保、王罴为关中豪族，李远为陇西豪族，李延孙、韩雄、陈忻、魏玄、杨摽为河南豪强，薛善、敬珍等为河东豪族，宇文测、王思政为原洛阳官僚。也就是说，指挥西魏防守战的将领几乎没有北镇军人。这与野战将领北镇占绝对多数形成鲜明的对比。关陇河东河南豪强所领军队，由以上材料显示由豪强招募当地百姓组成。以上引证显示，这些汉族将领都是宇文泰慎重考虑后的任命，所以，这一种不同类型战役用不同地域将领的现象，是有意的安排。《周书·侯莫陈崇传》，在列举完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之后，有一段话，“右十二大将军，又各统开府二人。每一开府领一军兵，是为二十四军。自大统十六年以前，十二大将军外，念贤及王思政亦作大将军。然贤作牧陇右，思政出镇河南，并不在领兵之限”。念贤与王思政之不在领兵之限，是说不在府兵系统之内。之所以不在府兵系统，是因为二人不在关中驻扎。可见，府兵不属于防守军队。府兵实际上是按照野战标准训练的野战军队。可以推断，在西魏建立初期，宇文泰就将军队按作战能力划分为两种，组建了以北镇军人为核心的府兵作为野战军队，同时，授权关陇河东河南豪强组建军队负责边境防守。

二 大统十二年之后的兵种构成

事物总是在变化，西魏军队的这一种分类也是。变化主要是由于西魏北周可用的北镇将领越来越少。随着历史的演进，老一代的北镇将领在不断地减员。下面列出西魏北周北镇将领的去世时间表：

梁御，大统四年。（《周书》卷一七，第280页）

念贤，大统五年。（《周书》卷一四，第227页）

寇洛，大统五年。（《周书》卷一五，第238页）

王励，大统一〇年。（《周书》卷二〇，第334页）

贺拔胜，大统一〇年。（《周书》卷一四，第220页）

王盟，大统一一年。（《周书》卷二〇，第334页）

若干惠，大统一三年。（《周书》卷一七，第281页）

刘亮，大统一三年。（《周书》卷一七，第285页）

王德，大统一四年。（《周书》卷一七，第286页）

怡峰，大统一五年。（《周书》卷一七，第283页）

王懋，西魏恭帝二年。（《周书》卷二〇，第335页）

李弼，北周孝闵帝一年。（《周书》卷一五，第241页）

赵贵，北周孝闵帝一年。（《周书》卷一六，第263页）

独孤信，北周孝闵帝一年。（《周书》卷一六，第267页）

侯莫陈顺，北周孝闵帝一年。（《周书》卷一九，第308页）

李摽，武成四年。（《周书》卷一五，第243页）

梁椿，保定一年。（《周书》卷二七，第451页）

贺兰祥，保定二年。（《周书》卷二〇，第338页）

王雄，保定四年。（《周书》卷一九，第320页）

豆卢宁，保定五年。（《周书》卷一九，第310页）

宇文贵，天和二年。（《周书》卷一九，第314页）

杨忠，天和三年。（《周书》卷一九，第319页）

于谨，天和三年。（《周书》卷一五，第250页）

达奚武，天和五年。（《周书》卷一九，第306页）

而且北镇将领去世的损失，不能靠北镇军人后代的成长而自然解决。

贺拔胜，无后。

若干惠，有子若干凤，建德二年封柱国，史书未记载其参加过灭齐之战，隋代无闻。

怡峰，有子怡昂、怡光、怡春，均未参加灭齐之战，隋代无闻。

王德，有子王庆，未参加灭齐之战，隋代无闻。

库狄昌，子孙无闻。（《周书》卷二七，第449页）

梁椿，有子梁明，天和年间封东陵郡守，任刺史。未参加灭齐之战，隋代无闻。

宇文虬，子孙无闻。（《周书》卷二九，第492页）

耿豪，有子耿雄，官至大将军，未参加灭齐之战。（《周书》卷二九，第494页）

侯植，有子侯定，位至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未参加灭齐之战，隋朝无闻。

念贤，有子念华，位至开府仪同三司，合州刺史，未参加灭齐之战，隋朝无闻。

寇洛，有子寇和，位至开府仪同三司，宾部大夫，未参加灭齐之战，隋朝无闻。

梁台，子孙无闻。（《周书》卷二七，第453页）

杨纂，子孙无闻。（《周书》卷三六，第636页）

一方面是北镇将领的不断去世，另一方面是其子孙没能继承其父祖的军事特长，所以越来越多的军事任务就由汉族将领来承担了。大统九年后，西魏北周大量征召关陇豪族进入府兵，加速了这一过程。

553年的尉迟迥伐江陵，与563年的杨忠北伐晋阳分别是西魏末年，北周末年的大型战役。其幕府人员已经与大统十二年前不同。

尉迟迥的幕府：

元帅：尉迟迥。（《周书》卷二一，第305页）

长史：叱罗协。（《周书》卷一一，第178页）

司马：柳敏。（《周书》卷三二，第561页）

司录：元伟。（《周书》卷三八，第688页）

后勤：达奚寔。（《周书》卷二九，第503页）

将领：元珍、乙弗亚、俟吕陵始、叱奴兴、綦连雄、宇文升、郭贤、裴果、辛昂、司马裔、任果、杨乾运。（《周书》卷二一，二八，三六，三九，四四。）

杨忠的幕府：[144]

元帅：杨忠。

将领：尉迟运、贺若敦、杨纂、尔朱敏、慕容延、王杰、李穆、元寿、田弘。

以上尉迟迥、叱罗协、乙弗亚、俟吕陵始、叱奴兴、綦连雄、杨忠、尉迟运、贺若敦、杨纂、尔朱敏、慕容延、田弘等13人是北镇出身的将领。柳敏、元珍、元伟、郭贤、裴果、辛昂、司马裔、任果、杨乾运、王杰、李穆、元寿等12人为汉人或汉化鲜卑。汉人与北镇军人的比例相当接近，与大统十二年前，北镇将领占绝对优势已经有所不同。

再看554年，于瑾伐江陵之役的幕府成员。[145]

元帅：于瑾。

长史：唐谨。

司录：薛德。

僚佐：裴尼、崔延穆。

将领：杨忠、韦孝宽、宇文护、权景宣、王杰、杨绍、王悦、郭延。

以上将领，杨忠、宇文护为北镇出身；韦孝宽、权景宣、王杰、杨绍、王悦、郭贤为关陇人。而僚佐唐谨、薛德、裴尼、崔延穆也都是汉人。这样一种人员配置，说明主要由关陇汉人将领组成的军队也能达到作战目的。也就是说，北镇军人在野战中的重要性下降了。

576年、577年，周武帝两次伐齐。此时北周军队有两个显著的变化。其一，主要将领不再是开国元勋，而是下一代将领。周武帝灭齐之后对韦孝宽说："世称老人多智，善为军谋，然朕唯共少年，一举平贼。"[146] 周武帝这段话，揭示了北周将领更新换代的事实。另一个变化是军队将领中北镇军人及其后代在将领中的比例继续下降。随

从周武帝灭齐的北镇将领有：贺若谊、宇文忻、杨坚、杨整、达奚震、窦恭、韩明、独孤善、侯莫陈芮、侯莫陈琼、贺兰璨、王谦、达奚长孺、李衍、宇文宪、宇文招、宇文纯、宇文亮、宇文盛、宇文俭、司马消难等，这21人为北镇军人之后。[147]

洛阳鲜卑之后有：丘崇、宇文神举、宇文神庆、宇文弼、于翼、于玺、窦荣定、元景山、源雄等9人。[148]

山东人士有：王谊、鲍宏、李子雄、樊叔略、崔弘度、卢贲、高、苏孝慈、郭荣、韩擒虎、和洪、崔仲方、段文振、郭衍，共14人。[149]

关陇人物有：薛迥、李穆、尹升、辛韶、李端、李崇、韦世康、柳机、柳带韦、梁彦光、梁毗、梁士彦、李礼成、李徹、李景、赵芬、赵仲卿、田式、田仁恭、杨素、杨文思、权武、董纯、史静、杜整、令狐熙、王韶、薛世雄、宇文述、辛公义、燕荣、阴寿、刘雄等33人。[150]

就文化认同而言，正如陈寅恪的论断，洛阳鲜卑实际上与山东关陇汉人为同类。[151] 如果把后三类算作一类，那么北镇军人之后代在所有参战将领中占不到三分之一。正如前文所论，北镇军人的后代也融合于关陇集团，在文化认同上趋向中原文化，而不是鲜卑文化，所以严格来说伐齐之战的将领都可以称为汉人。这说明北镇军人在北周军事中渐渐地淡化，汉族将领的地位尤其是关陇人物在军事中的地位在增长。

以上变化，尤其是关陇人物在军队中所占比例的增加，引起了兵种构成的关陇地方化，即步兵成为主力兵种。《北齐书》卷一六《段韶传》：

（大宁二年）十二月，周武帝遣将率羌夷与突厥合众逼晋阳，世祖自邺倍道兼行赴救。突厥从北结阵而前，东拒汾河，西被风谷。时事既仓卒，兵马未整。世祖见如此，亦欲避之而东。寻纳河间王孝琬之请。令赵郡王尽护诸将。时大雪之后，周人以步卒为前锋，从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诸将咸欲逆之。韶曰：“步人气势自有限，今积雪既厚，逆战非便，不如阵以待之。彼劳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战，大破之，敌前锋尽殪，无复孑遗，自余通宵奔遁。仍令韶帅骑追之，出塞不及而还……（宇文）护既得母，仍遣将尉迟迥等袭洛阳。诏遣兰陵王长恭、大将军斛律光率众击之，军于邙山之下，逗留未进……乃令韶督精骑一千，发自晋阳。五日便济河，与大将共量进止。韶旦将帐下二百骑与诸军共登邙坂，聊观周军形势。至大和谷，便值周军，既遣驰告诸营，追集兵马。仍与诸将结阵以待之……周军仍以步

人在前，上山逆战。韶以彼徒我骑，且却且引。待其力弊，乃遣下马击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溃。

在河桥之战中，侯景以步骑战术战胜了宇文泰的骑兵就是一例。这两次战役都以北周失利而告终，但是不难看出北周与北齐的兵种差异，即北周以步兵为主力，北齐以骑兵为主力。在野战中骑兵的机动性冲击力要好于步兵，但在近身搏斗，防御战中步兵的优势比较明显，所以不能因为段韶发挥骑兵的优势击败西军，而否认西军的优势。在北周灭齐战役之中，周军的防守要好于齐军。北周时期最艰苦的防御战是伐齐之役中的晋州防守战。周军占领晋州后，北齐后主率大军来战，周军撤退让梁士彦防守晋州。《周书》卷三一《梁士彦传》记载了战役的艰苦状况：

及帝还，齐后主亲攻围之，楼堞皆尽，短兵相接。士彦慷慨自若，谓将士曰："死在今日，吾为尔先。"于是勇猛齐奋，号声动天，无不一当百，齐兵少却，乃令妻及军人子女昼夜修城，三日而就。武帝大军亦至，齐师围解，士彦见帝捋须而泣，帝亦为之流涕。

晋州防御战是灭齐之役的关键性战役。若齐军初下时周军主力与之交战，那么胜负就很难预料，所以周军主动西撤，将晋州留给齐军。齐军顿于坚城之下，士气受到影响。此时周军再来迎战，就一举击败了齐军。也就是说，梁士彦的防守越持久，周军反攻时的胜算就越大。引文显示，梁士彦成功地坚守到了最后。

《隋书·礼仪志》的军礼部分记录了北周的振旅之礼，涉及北周的战阵，"乃陈徒骑，如战之阵……险野则徒前而骑后，易野则骑前而徒后" [152] 。由引文可知，北周的战阵由步兵和骑兵组合而成，根据地形的不同有不同的排列。那么，步兵与骑兵的比例如何呢？《通典·兵典一》引《大唐李卫公兵法》记载唐初兵种构成为，"马步通计，总当万四千，共二百八十队当战，余六千人守辎重……计二万兵，除守辎重六千人，马军四千人，步兵令当二百队"。即唐初的步兵一万人配骑兵四千人。考虑到李靖为关陇人士，唐代府兵继承了北周，可以推测北周的步骑构成也是步兵远多于骑兵。北周府兵的作战训练，也可以参照李靖的兵法。《通典·兵典九》"下营斥候并防捍及分布阵"条引《大唐李卫公兵法》：

布阵讫，鼓音发，其弩手去贼一百五十步即发箭，弓手去贼六十步即发箭。若贼至二十步内，即射手、弩手俱舍弓弩，令驻队人收。其弓弩手先络膊，将刀棒自随，即与战锋队齐入奋击。其马军、跳荡、奇兵亦不得辄动。若步兵被贼蹙回，其跳荡、奇兵、马军即迎前腾击，步兵即须却回，整顿援前。若跳荡、奇兵、马军被贼排退，战锋等队

须齐进奋击。其贼却退，奇兵及马军亦不得远趁，审知贼惊怖散乱，然可乘马追趁。其驻队不得辄动。前却打贼，退败收军，举枪卷幡，一依教法。

这是一种非常严密的步骑配合的阵法，可以想见是多年战争经验的积累。根据此战法，步兵是作为前锋使用的，这与前引《段韶传》中的周军战法相同，可见二者有渊源关系。那么，步兵何以能担当前锋?这就要回顾一下军事史。在西晋之前，军队以步兵车兵为主力，骑兵作用有限。其主要原因是当时还没有发明马镫，骑兵不能借助马力，而且容易疲惫。马镫在西晋被发明，此后一度时期骑兵纵横战场，成为决定野战胜负的关键。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经验的累积，一些步兵战胜骑兵的战术也产生了。如前文所述，《资治通鉴》卷一六〇，“梁武帝太清三年”：

慕容绍宗引军击侯景，景辎重数千辆，马数千匹，士卒四万人，退保涡阳。绍宗士卒十万，旗甲耀日，鸣鼓长驱而进……景命战士皆被短甲，执短刀，入东魏阵，但低头视，斫人胫马足。东魏兵遂败。

这是步兵战胜步骑混合军队的成功战例。在上引《李卫公兵法》中，步兵所使用的兵器就是刀棒。据李锦绣先生研究其刀正是为了克制骑兵而配备的。[153] 李靖还使用弓弩，可以在较远距离给骑兵以杀伤。

在东西魏的实战之中，在短兵相接的情况下，骑兵会下马步战。《周书·王思政传》：“河桥之战，思政下马，用长矟左右横击，一击踣数人。”《周书·蔡祐传》，“又从太祖战于河桥，祐乃下马步斗”。《周书·王雅传》，“（沙苑之战，雅）乃擐甲步战，所向披靡”。以上骑将之所以要下马步战是因为在大兵团混战中，步兵比骑兵要灵活，更有杀伤力。上引《段韶传》，北齐将领段韶之所以让骑兵下马步战，就是这个原因。又据《魏书·杨播传附杨侃传》，杨侃在攻打河东时，因为“所领悉是骑士，习于野战，未可攻城”，所以不得不等待步兵。

综上所述，在北朝的军事实践中，步兵的作用渐渐地得到重视，步兵克制骑兵的战术也在不断完善。这种战术因为西魏北周的特殊国情而被最先采用，并被隋唐所继承。

与北周不同，北齐还是相对地更依赖传统的骑兵战术。北周保定五年，宇文护伐齐，两国对峙于洛阳。据《北齐书·斛律金传附斛律光传》，“光率骑五万驰往赴击”。两军仍然相持不下，于是北齐又派段韶率“精骑”五千往洛阳增援。可见，到北齐末年其军队依然以骑兵为主力。据上引《斛律光传》，记斛律光“行兵仿其父金之法”。史称斛律金，“行兵用匈奴法”。也就是说，北齐的主要战术仍然是骑兵战

术。

反观齐军的防守，在晋州、高梁壁、晋阳、邺城都没有出现成功的防御，说明齐军在防守上有严重缺陷。这种缺陷是与北齐以骑兵为其主力兵种有关的。当然北齐也有独孤永业、傅伏这样的防御型将领，但是二人防守在洛州，并不在周军的主攻方向上，所以其才能没有发挥。这里要补充的是此二人长期防守于洛州，此处正是周军长期攻围之地，因此二人才练就了高超的防御战术。但是齐军以驻扎在代北的北镇骑兵为主力，所以从整体上来看，北齐在防守上要略输一筹。

本章总结

在西魏建国之前，关陇社会有两大势力：一是部族势力。关陇的部族势力有羌族、氐族、山胡、鲜卑杂人等，据马长寿、唐长孺先生的研究，这些部族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其文化水平都低于汉族，其民族性格大都表现为尚武，具有极强的军事潜力。这些部族虽有军事潜力，但是他们缺乏对军事经验的积累，也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二是汉族豪强。汉族豪强整体上具备军事理论的修养，也不乏政治管理人才，但是他们的社会实力不如部族，文化程度不如山东、南朝。这两大势力基本上处于对峙状态，所以关陇地区没能形成有力的政权。北镇集团进入关陇之后，带来一批经验丰富的将领；孝武帝的入关带入了洛阳文化；西魏征服江陵后南朝文化也进入关陇。所以，西魏北周的文化可以说是多源的。这个政权并没有因为文化的多源而导致政治的分裂。这是因为其对教育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山东、南朝的学者对官员的子弟普遍地进行了教育，其中就包括北镇军人的后代，因而西魏北周的各种势力在文化逐渐趋同，而不是分裂。

在军事上，由于北镇军人的加入，关陇政权防止了东魏的入侵，使得政权的发展成为可能。北镇的军事经验也成为西魏建军的原则和军事理论探讨的起点。但是入关的北镇军人有限，西魏的防守得依赖汉族豪强和他们的防守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队中的关陇本地人在增加，于是步兵在人数上超过了骑兵。也就是说即使在军队中北镇因素也在淡化。与兵种变化的同时步骑配合的战术等军事理论也在一代代地传承、提高。而军事理论的总结与将领文化程度的提高是分不开的。

在这个重视教育，又尚武的社会，其人才特征就是文武合一。文武合一型人才，理性又有实干精神，所以西魏北周总能抓住机遇，壮大自己，削弱敌人。因而，西魏北周在实力上逐渐地超过了北齐。

---

[1] 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补编·府兵制国家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这一关系，据笔者查阅所及，未见其他学者论述。

[2] 《周书》卷二，第23页。

[3] 《周书》卷二七，第456页。

[4] 《周书》卷二，第26页。

[5] 同上。

[6] 《周书》卷一四，第227页。

[7] 《周书》卷一七，第283页。

[8] 河桥之战，东魏方面也遭遇到极大的困扰，见《北齐书·高季式传》。

[9] 《周书》卷三九，第696页。

[10] 《周书》卷一八，第295页。

[11] 《周书》卷二七，第444页。

[12] 同上。

[13] 《周书》卷二，第26页。

[14] 《周书》卷三九，第696页。

[15] 《周书》卷一七，第281页。

[16] 《周书》卷二，第28页。

[17] 《周书》卷一六，第262页。

[18] 《周书》卷一四，第220页。

[19] 同上。

[20] 罗丰：《丝绸之路与北朝隋唐原州古墓》，《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21] 《晋书》卷一三〇，第3202页。

[22] 《魏书》卷五八，第1286页。

[23] 《魏书》卷四，第99页。

[24] 唐长孺、黄惠贤：《北魏末期的山胡敕勒起义——北魏末期人民大起义研究之二》，《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4年第4期。

[25] 《周书》卷一，第3页。

[26] 宇文泰入关时仅带侄子宇文导，据《周书》，宇文泰在原州任上，曾将侄子宇文导、宇文护，外甥王励、王显、贺兰祥、尉迟迥、尉迟纲接来关陇，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宇文泰的势力。除此之外，未见史书记载宇文泰原州时期的北镇系僚佐。

[27] 张伟国：《关陇武将与周隋政权》，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吕春盛：《关陇集团的权力结构演变——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稻乡出版社2002年版。

[28] “都督弥姐元进规应悦，密图帝”，见《周书》卷一，第5页。

[29] 《周书》卷二七，第443页。

[30] 《北史》卷九，第314页。

[31] 《周书》卷二六，第427页。

[32] 《周书》卷三二，第558页。

[33] 《周书》卷三七，第660页。

[34] 《周书·于谨传》记载了于谨对于当时形势的判断，没有针对宇文泰在夏州的情况来分析，过于迂远。考虑到于谨的孙子于志宁在唐初担任过史官，或许这段话就是为了虚饰于谨的功业而添加上去的。

[35] 《周书》卷四，第57、58页。

[36] 吕春盛：《关陇集团的权力结构演变——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稻乡出版社2002年版。

[37] 于谨长期生活于洛阳，完全归于北镇势力也有不妥。

[38] 陶贤都：《魏晋南北朝霸府与霸府政治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9] 吕春盛：《关陇集团的权力结构演变——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稻乡出版社2002年版。

[40] 《周书》卷一六，第263、266页。

[41] 《周书》卷二六，第427、428页。

[42] 《周书》卷二九，第489—495页。

[43] 《周书》卷一七，第284、285页。

[44] 《周书》卷二九，第498页。

[45] 《周书》卷三五，第618页。

[46] 同上书，第620页。

[47] 《周书》卷三六，第648、649页。

[48] 《周书》卷三五，第614页。

[49] 《周书》卷二九，第499页。

[50] 《周书》卷三六，第641—643页。

[51] 《周书》卷一七，第282页。

[52] 《周书》卷三二，第563页。

[53] 《周书》卷二七，第449页。

[54] 《周书》卷二八，第467、468页。

[55] 《周书》卷三五，第624、625页。

[56] 《周书》卷四五，第811页。

[57] 《周书》卷四〇，第716页。

[58] 《隋书》卷四六，第1256页。

[59] 《周书》卷三八，第686页。

[60] 同上书，第1136页；卷四〇，第1170、1171页；《隋书》卷六〇，第2447页。

[61] 《隋书》卷三九，第1155页。

[62] 参见朱大渭主编的《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卷》第五章第三节，第235—240页。

[63] 《魏书》卷九，第239页；《北史》卷一五，第559页；《北史》卷九六，第318页；《魏书》卷三二，第754页。

[64] 《北史》卷一七，第640页。

[65] 《周书》卷四九，第896、897页。

[66] 《魏书》卷七五，第1674、1675页；《周书》卷一四，第222页。

[67] 《魏书》卷七五，第1674页。

[68] 同上书，第1675页。

[69] 《周书》卷四九，第897页。

[70] 《魏书》卷五一，第1138、1139页。

[71] 《周书》卷四九，第896页。

[72] 《魏书》卷五一，第1135页。

[73] 《周书》卷一九，第311页。

[74] 《魏书》卷五一，第1131页。

[75] 《魏书》卷七三，第1639页。

[76] 《周书》卷一四，第223页。

[77] 同上。

[78] 《周书》卷一四，第224页。

[79] 《魏书》卷七五，第1675页。

[80] 《魏书》卷八三上，第1818、1819页。

[81] 《周书》卷二五，第414页；卷二七，第442、449页。

[82] 《周书》卷一九，第311页。

[83] 《周书》卷三八，第677页；《北史》卷六四，第2259页。

[84] 张伟国：《关陇武将与周隋政权》第一章，第1—24页。

[85] 《周书》卷三六，第640页。

[86] 《周书》卷三八，第677页。

[87] 《周书》卷三七，第671页。

[88] 《隋书》卷四九，第1297页。

[89] 《隋书》卷二九，第817页。

[90] 《山东士族入关房支与关陇集团的合流及其复归》，见刘驰《六朝士族探析》，第139—155页。

[91] 《介绍敦煌文书西魏大统十三年（547）的计帐户籍残卷》，见王永兴《陈门问学丛稿》，第256—281页。

[92] 《隋书》卷二七，第770页。

[93] 《周书》卷二三，第381页。

[94] 《北史》卷三〇，第1102页。

[95] 《北史》卷六七，第2357页。

[96] 《隋书》卷二五，第707页。

[97] 《周书》卷三四，第594—599页；《周书》卷三七，第662页；《周书》卷三七，第670页；《周书》卷三七，第666页。

[98] 《周书》卷三八，第683、684页。

[99] 《周书》卷三八，第685页。

[100] 《周书》卷三五，第615、616页。

[101] 《周书》卷三八，第687页。

[102] 《隋书》卷五六，第1389页；《周书》卷二六，第429页；《周书》卷二六，第432页。

[103] 《周书》卷二二，第361页。

[104] 请参阅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牟发松《梁陈之际南人之北迁及其影响》，收入《北朝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本文引自牟发松《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05] 《周书》卷二三，第391页。

[106] 《周书》卷四一，第744页。

[107] 《周书》卷三二，第565页。

[108] 《周书》卷四七，第849页。

[109] 《周书》卷四五，第809、810页。

[110] 《隋书》卷五六，第1391页。

[111] 《隋书》卷七六，第1731、1732页。

[112] 《隋书》卷五六，第1393页。

[113] 《隋书》卷六〇，第1455页。

[114] 《北齐书》卷三七，第483页。

[115] 《周书》卷一九，第308—310页。

[116] 《隋书》卷三九，第1155页。

[117] 《周书》卷四三，第776页。

[118] 《隋书》卷五二，第1339页。

[119] 同上书，第1343、1344页。

[120] 《周书》卷二七，第449、450页。

[121] 《隋书》卷五四，第1364页。

[122] 《周书》卷四五，第807、808页。

[123] 同上书，第811、812页。

[124] 同上书，第814、818页。

[125] 《周书》卷四七，第837页。

[126] 《隋书》卷五六，第1389—1391页。

[127] 《隋书》卷四六，第1249、1250页。

[128] 《隋书》卷六六，第1546页。

[129] 《周书》卷二〇，第187—196页。

[130] 《旧唐书》卷六七，第2475页。

[131] 《新唐书》卷九四，第3828页。

[132] 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三编第四章第二节，第260—262页。

[133]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第4894页。

[134] 六镇将领引自《周书》卷一〇、一四、一五、一六、一七、一九、二〇、二一、二二、二七、二八、二九、三四、三六。

[135] 山东将领引自《周书》卷一八、二六、二七、二九、三〇、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四三。

[136] 关陇将领引自《周书》卷二五、二七、二八、二九、三一、三三、三五、三六、三九。

[137] 《北史》卷六，第229页。

[138] 《周书》卷二五，第420页。

[139] 《周书》卷四三，第780页。

[140] 《周书》卷三五，第623页。

[141] 同上书，第626、627页。

[142] 《周书》卷三四，第590—592页。

[143] 《周书》卷二七，第45页。

[144] 《周书》卷一九，第318页；卷二八，第476页；卷四〇，第709页。

[145] 《周书》卷一五，第247页；卷三二，第564页；卷三八，第685页；卷三六，第640页；卷三四，第589页；卷二八，第479页；卷三三，第580页；卷三七，第667页。

[146] 《周书》卷三一，第542页。

[147] 《周书》卷六，第93、95、96页，卷一六，第267页；《隋书》卷三九，第1159页，卷五三，第1349页，卷五四，第1362页。

[148] 《周书》卷六，第93页，卷四〇，第715页；《隋书》卷五〇，第1313页，卷五六，第1389页，卷六〇，第1475页，卷三九，第1150、1152、1154页。

[149] 《周书》卷六，第96页；《隋书》卷六六，第1547页，卷七〇，第1619页，卷七三，第1677页，卷七四，第1698页，卷三八，第1141页，卷四〇，第1168页，卷四一，第1179页，卷四六，第1259页，卷五〇，第1319页，卷五二，第1339页，卷五五，第1380页，卷六〇，第1447、1458页，卷六一，第1469页。

[150] 《周书》卷六，第93、95、96页，卷二二，第375页，卷二九，第505页；《隋书》卷三七，第1123页，卷四七，第1265、1271页，卷七三，第1674页，卷六二，第1479页，卷四〇，第1163页，卷五〇，第1316页，卷五四，第1367页，卷六五，第1529页，卷四六，第1251页，卷七四，第1693页，卷五四，第1364页，卷四八，第1282、1294页，卷六五，第1536、1539页，卷五三，第1353页，卷五四，第1366页，卷五六，第1385页，卷六二，第1473页，卷六五，第1533页，卷七三，第1681页，卷七四，第1695页，卷三九，第1148页，卷四〇，第1165页。

[15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章，第78、79页。

[152] 《隋书》卷八，第165页。

[153] 李锦绣：《陌刀与大唐帝国》，《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308页。

第五章 勋贵与隋朝政局

从某种程度上说，隋朝的开皇政治是北周政治的延续。杨坚是一位平庸的武将，同时也是一位心思缜密的官僚，做事有一股浓厚的吏干格调。在北周末年的混乱形势下，杨坚靠着双重的政治身份和机缘做了皇帝。作为政治家，杨坚精细有余而雄远不足，但他似乎崇拜周武帝，继续了周武帝未完成的事业。在杨坚长达24年的统治期间，一代新贵成长起来。这些北镇武人的后裔在南朝化的路上，走得更远，初步掌握了精致文化。和平、优越的生活环境下，这批新贵比之前辈，社会经验缺乏、政治素养不足、气质上也不够强悍。以上变化影响了隋朝的历史。

第一节 《隋书》所记杨坚史事辨析

中国古代的朝代更替之后，往往有人造作歌谣、图谶、历史，宣传新朝获得政权的合法性。这些伪造的史料，有容易分辨的，也有隐秘而不容易分辨者；对于这种材料史学研究者一般会保持警惕，但是也有轻信伪证的。在研究杨坚的早期历史方面，即使警惕如胡如雷、韩昇先生，偶尔也会轻信伪证使其研究成果的可信度降低。[1] 前辈学者不能彻底辨伪的原因是，相信个别人造伪，没有认识到是一批人造伪；只看到术士造伪没有看到大臣造伪，更没有发现造伪是在杨坚的鼓励之下。

本节的前半部分就是对于伪史进行甄别的。透过这些造伪的材料，我们看到一幕生动的造伪运动。有了这个参照，接触杨坚的史事，就不是那么轻信了。其次，经过辨伪，研究者所描画出的“王莽—司马懿式”的杨坚并不真实。那么真正的隋文帝是什么样子的，他凭借什么

来取得政权？这就是本节的第二部分要论述的内容了。

一 隋初的神化杨坚事辨

《隋书》中多次提到杨坚取代北周是天命不可抗拒的作用。其中称说天命的人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术士、相者、道士等预测命运的专业人士；一类是北周的普通大臣。据笔者观察，这些天命说恐怕都不可信。本节试图结合胡如雷、韩昇的辨伪，进一步揭示隋初伪造历史的真相。

王邵本来是北齐的一位著名学者，北周灭齐后，郁郁不得志。隋朝建立之初，他“言上有龙颜戴干之表”并且“指示群臣”。隋文帝对于王邵的行为颇为赞赏，“大悦，赐物数百段，拜著作郎”。王邵得到鼓励，继续“上表言符命”。他说：“昔周保定二年，岁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黄河变清，十里镜澈，齐氏以为己瑞，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兴公始作随州刺史，历年二十，隋果大兴。”[2] 这段文字已经韩昇辨伪：隋文帝以大兴公做随州刺史，是在保定五年而非保定二年。王邵为了附会杨坚得天命而“河清”而“大兴”，将发生在不同年份的事情拼接到一年。 [3] 作伪的手段是比较明显的。作伪，杨坚当然心知肚明，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断鼓励这种造假行为“上览之大悦，赐物五百段”。二人相互唱和，将造假活动推上一个又一个高潮“邵于是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谶纬，依约符命，捃摭佛经，撰为《皇隋灵感志》，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闭目而读之，曲折其声，有如歌咏。经涉旬朔，遍而后罢。上益喜，赏赐优洽”。

并不是所有术士的表演都像王邵这么夸张而富有戏剧性，专门相面的人称说符命还是颇为周详的。 [4] 术士对于杨坚拥有天命的说法集中记录在《隋书·艺术传》。其中的《来和传》比较详细：

高祖微时，来诣和相，和待人去，谓高祖曰：“公当王有四海。”及为丞相，拜仪同，既受禅，进爵为子。开皇末，和上表自陈曰：

臣早奉龙颜，自周代天和三年已来，数蒙陛下顾问，当时具言至尊膺图受命，光宅区宇。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无劳效，坐级五品，二十余年。臣是何人，敢不惭惧！愚臣不仅区区之至，谨录陛下龙潜之时，臣有所言一得，书之秘府，死无所恨。

昔陛下在周，尝与永富公窦荣定语臣曰：“我闻有行声，即识其人。”臣即言公眼如曙星，无所不照，当王有天下，愿忍诛杀。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云阳宫，谓臣曰：“诸公皆汝所识，隋公相禄如

何？”臣报武帝曰：“隋公止是守节人，可镇一方。若为将领，阵无不破。”臣即于宫东南奏闻。陛下谓臣，此语不忘。明年，乌丸轨言于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寻以问臣，臣知帝有疑，臣诡报曰：“是节臣，更无异相。”于时王谊、梁彦光等知臣此语。大象二年五月，至尊从永巷东门入，臣在永巷门东，北面立，陛下问臣曰：“我无灾障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气色相应，天命已有付属。”未几遂总百揆。[5]

来和这一段话时间、地点、证人齐全，初读颇让人信服。不过反复研读之后，仍有如下疑点。来和提供的种种证据，《周书·武帝纪》、《周书·乌丸轨传》、《隋书·窦荣定传》、《王谊传》、《梁彦光传》均没有相印证的记载，目前看来属于孤证。这么多证据都是孤证，这就很让人怀疑他在说谎。从来和的证言之中，也能发现若干与事实不符合的地方。（1）来和讲到周武帝在建德四年之后两次怀疑杨坚有野心。这与历史事实不符。据《周书》和《隋书》，建德四年，杨坚率领水师配合陆军攻打洛阳。[6] 建德五年，杨坚担任周军主力右路第三军总管。[7] 建德六年，担任定州总管，升任柱国。[8] 所谓的右路第三军是周军攻打北齐的六支主力之一；定州总管，是北周灭齐之后在山东地区所设的十大总管之一。这两次任命的职位非常重要，说明周武帝对于杨坚是信任的。有些人会说，周武帝之所以让杨坚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是因为来和告诉周武帝，“隋公止是守节人，可镇一方。若为将领，阵无不破。”这个“阵无不破”的评价，完全不符合杨坚在北周同仁心目中的印象和杨坚的实际表现。《隋书》曾经评价杨坚是“与能之议，未为当时所许”。[9] 也就是在当时人看来，杨坚能力比较低。（具体论证详下节）

（2）来和提到乌丸轨曾经向周武帝揭发“隋公非人臣。”这种揭发只能是在乌丸轨和周武帝两人之间秘密进行。来和怎么能知道这件事情？这是疑点一。疑点二，假设乌丸轨揭发杨坚事大家都知道，为何没有记录在《周书》乌丸轨的传记里面？有这两个疑点，我们觉得来和所述的乌丸轨告密事，恐怕是不可信的。

来和所讲述的周武帝怀疑杨坚事、杨坚有超强的军事能力事、乌丸轨曾经揭发杨坚谋反事，或者是孤证没有任何材料可供印证，或者与历史事实不符。这说明，在这几件事情上来和撒了谎。

杨坚篡位前，曾就天命问题请教过一位术数专家庾季才。杨坚当时的疑惑是：“吾以庸虚，受兹顾命，天时人事，卿以为何如？”庾季才的回答是：“天道精微，难可意察，切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纵言不可，公岂复得为箕颍之事乎！”[10] “天命”假如存在，从理论上讲，具备一定水平的术数家都应该可以看出来。庾季才说他没有看出

来，这里面可能性有二：（1）庾季才水平不够；（2）其他术数家都撒谎了。在《隋书·艺术传》中，庾季才排第一，是当时公认的术数权威，其水平是没有问题的。既然庾季才的水平没有问题，那就说明其他的术数家都在撒谎。即，杨坚并不拥有天命。

对于这类材料，有的学者认为里面包含可信的成分。胡如雷先生认为："来和敢于私下对杨坚说'当王有四海'，并非由于他有神奇的相术，而是早已摸透了杨坚的内心隐秘。"胡先生还认为："不仅与杨坚关系密切的人早已深知其内心打算，甚至一般人对此也有觉察。前述相者赵昭即其一例。此外还有道士张宾、焦子顺、董子华三人"。[11]这里，胡先生的言辞不够严谨。谋反之事，哪能"一般人对此也有觉察"？若事实如此，杨坚恐怕性命难保。从来和、王邵与杨坚的唱和不难看出，这是隋代初年术士和皇帝合演的一场戏。其目的在于制造舆论：要老百姓相信，隋取代北周是天意。

《隋书》卷五〇还记载了世俗大臣宇文神庆和郭荣所记的一些预言。据说有一次宇文神庆和杨坚聊天，杨坚就对宇文神庆说，"天元实无积德，视其相貌，寿亦不长。加以法令繁苛，耽恣声色，以吾观之，殆将不久。又复诸侯微弱，各令就国，曾无深根固本之计，羽翮既剪，何能及远哉！尉迥贵戚，早着声望，国家有衅，必为乱阶。然智量庸浅，子弟轻佻，贪而少惠，终致亡灭。司马消难反复之虏，亦非池内之物，变成俄顷，但轻薄无谋，未能为害，不过自窜江南耳。庸、蜀崄隘，易生艰阻，王谦愚惷，素无筹略，但恐为人所误，不足为虞。"史书记载着："未几，上言皆验。及此，庆恐上遗忘，不复收用，欲见旧蒙恩顾，具录前言为表而奏之"。[12]

郭荣的故事和宇文神庆基本相同，"荣少与高祖亲狎，情契极欢，尝与高祖夜坐月下，因从容谓荣曰：'吾仰观玄象，俯察人事，周历已尽，我其代之。'荣深自结纳。宣帝崩，高祖总百揆，召荣，抚其背而笑曰：'吾言验未？'"[13]

这两件事情恐怕也是编造的成分居多。《隋书·郑译传》载：

高祖为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尝在永巷私于译曰："久愿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译曰："以公德望，天下归心，欲求多福，岂敢忘也。谨即言之。"时将遣译南征，译请元帅。帝曰："卿意如何？"译对曰："若定江东，自非懿戚重臣无以镇抚。可令隋公行，且为寿阳总管以督军事。"帝从之。乃下诏以高祖为扬州总管，译发兵俱会寿阳以伐陈。[14]

《郑译传》所记的这一段材料显示，在北周宣帝时期，杨坚的处境艰

难，为了避祸，他想方设法请求外调。如果杨坚阴谋篡权就不可能要求外调，一旦外调机会就完全丧失了。杨坚请求外调有多种材料可以印证，是真实的。[15] 那么，《宇文神庆传》、《郭荣传》所记录的这两则故事出于伪造，就昭然若揭了。

《隋书》所记，北周时期看出杨坚有天命的普通人有：宇文宪、乌丸轨、卢贲、窦荣定、郎茂、李谔、庞晃、李礼成。既然这么多人看出来杨坚的异相，而且这些人都没有特异功能，合理的推论就是："性既明察"的周武帝也能看出杨坚拥有天命这个异常现象。假如是这样，"少于恩惠"、"多所罪杀"的北周武帝肯定会对这一威胁政权的人予以果断镇压。宇文护和宇文直被镇压充分说明了周武帝对于这类人的处理手段。在北周武帝时期杨坚步步高升，说明北周武帝并没有怀疑杨坚。既然号称"明察"的周武帝没有觉察到杨坚的"天命"，所谓杨坚"拥有天命"恐怕不是被看出的而是被编造出来的。

比较宇文神庆、来和、王邵的称说天命之事，三者的情节何其相似：都是臣子上书请求记录下杨坚得天命的符兆和杨坚本人神奇的能力，上书之后都是龙颜大悦。情节的相似性显示出，上奏杨坚得天命事件在隋初不是零星出现也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曾经上演过的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这些材料被隋朝"书之秘府"，后来被写进《隋书》，误导了读者。[16] 《隋书·高祖纪上》有一段材料明显的可以与来和的上书相印证：

武帝娉高祖长女为皇太子妃，益加礼重。齐王宪言于帝曰："普六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帝曰："此止可为将耳。"内史王轨骤言于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坚貌有反相。"帝不悦，曰："必天命有在，将若之何？"[17]

"此止可为将耳"，与来和所说的"隋公止是守节人，可镇一方。若为将领，阵无不破。"若合符契，说明两者之间有渊源。乌丸轨告密事，不见于其他史料，也没有其他史料可以印证，仅见于来和的上书。在来和上书中，有这么一句话"臣即言公眼如曙星，无所不照，当王有天下，愿忍诛杀。"这在《隋书·高祖纪》也有相对应的话：（相者赵昭）对杨坚说"公当为天下君，必大诛杀而后定。善记鄙言"[18]。种种相似的文字不是巧合，说明了修《隋书》的史臣在《高祖纪》这一段就是用了术士上奏的材料。[19] 这些材料，都是隋初上演造神运动的时候，编造出来的，不可凭信。由于《隋书》中大量使用这种造神材料使得我们对于隋文帝杨坚的早期历史，就看不清楚了。

那么，真正的随国公杨坚是什么样子的人呢？

二 “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考

《隋书·高祖纪》记载杨坚在16岁的时候，受到宇文泰的品评“周太祖见而叹曰：‘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 [20] 。这一事件，《北史》和《隋书》的用词小有不同：“周文帝见而叹曰：‘此儿风骨，非世间人’”。 [21] “非世间人”之“非”字显然是“不似代间人”的“不似”的改写。那么“代间人”和“世间人”是不是改写的关系呢？古今学者普遍认为原话应该是“世间人”。“代间人”是为了避李世民的讳而改写。韩昇先生在引用的时候直接引用《北史》，而没有引用《隋书》，可见他也是认可传统说法的。仔细审读这句话，觉得“非世间人”，好像有点不顺。“世间人”这个词汇出现于北朝史籍凡四次，都是源于《北史》。第一次，见于上引隋文帝纪；第二次，见于《北史》卷四三邢邵传，“季节，才学之士，谓子才曰：‘世间人多不聪明，思误书何由能得？’”； [22] 第三次，见卷五五陈元康传：“及暹见神武，将解衣受罚。元康趋入，止伍伯，因历阶升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尔，况世间人邪？’” [23]

《北齐书》也有邢邵传记，但是业已亡逸，今传是宋人所补，所用的材料也是来源于《北史》，所以今本《北齐书》邢邵传和《北史》完全一致。陈元康传又见于《北齐书》，尚未亡逸，且与《北史》文字不同。《北齐书·陈元康传》此段为：“暹在廷，解衣将受罚，元康趋入，历阶而升，且言曰：‘王方以天下付大将军，有一崔暹不能容忍耶？’” [24] 《北齐书》并没有“世间人”这一词汇。这说明，《北史》在改《北齐书》这段话的时候并没有吃透原意。种种迹象表明，“世间人”似乎是《北史》的作者习惯用语，而且并非其他北朝史学家乐于使用的词汇。这样，“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或许并不是因为避讳才被改为“世间人”的，而是出于《北史》作者的习惯，《隋书》的原话应该是“代间人”。

假如这个推断成立，那么语义就有了本质的区别。宇文泰称赞杨坚“非世间人”，那是说有点仙风道骨的味道。如果是“不似代间人”，就是说杨坚的气质和北镇军人的气质并不相同。睽之当时的历史背景，我认为评价杨坚的气质不像北镇军人，可能更符合宇文泰的身份。那么，杨坚的气质是什么样子的呢？《隋书》的概括是“沈深严重”， [25] 又说“性严重，有威容，外质木而内明敏” [26] 。通俗地说就是，沉默寡言，心思缜密。

这种性格特征显然不是杨坚的父亲杨忠为代表的北镇军人所具备的。一般来说，北镇军人的特征是比较外向。《周书》和《隋书》描述北镇军人或者及其后代的词汇有“慷慨”、“聪敏”、“干济”，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外露的个性特征，与隋文帝的“外质木而内明敏”，是有很大

区别的。所以宇文泰评价杨坚“不似代间人”。

杨坚不似“代间人”的品格，魏徵有一段话也可印证之。《隋书·高祖纪》后的史臣评论有这么一句“与能之议，未为当时所许”[27]。笔者以为，这不是对作为皇帝的杨坚的评价。大量的历史事实显示，杨坚作为皇帝，干得还不算坏。这里的“时”指北周。“能”指军事才能和行政才能。从家庭到朝廷，杨坚在北周的表现的确“平庸”。

杨坚不善于处理家庭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废黜太子杨勇，还是幽禁蜀王杨秀，都体现着其手段的凉薄。杨坚对亲情的冷漠，不仅仅是对儿子，在没有当皇帝之前，杨坚就和两位成年的弟弟关系不好。

杨坚的弟弟杨瓒“素与高祖不协”[28]，弟弟杨整“与高祖不睦”。[29] 杨坚同胞的弟弟就这两位，都和杨坚关系不好。从《隋书》记载看来，似乎兄弟不睦与妯娌之间的不和有莫大关系。杨瓒的妻子宇文氏、杨整的妻子尉氏与杨坚的妻子独孤氏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

妯娌不和可能导致兄弟不睦，不过兄弟不和可能蕴含更隐晦的原因：两位弟弟看不起杨坚。《隋书·滕穆王瓒传》有这么一段记录：“高祖入禁中，将总朝政，令废太子勇召之，欲有计议。瓒素与高祖不协，闻召不从，曰：‘作隋国公恐不能保，何乃更为族灭事邪？’”[30] 杨瓒对杨坚的评价是“作隋国公恐不能保”，对杨坚的蔑视是显而易见的。这很难怪，北周时期的杨瓒远远比杨坚显赫。史书记载：“瓒贵公子，又尚公主，美姿仪，好书爱士，甚有令名于当世，时人号曰杨三郎。武帝甚亲爱之。平齐之役，诸王咸从，留瓒居守，帝谓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将遂事东方，无西顾之忧矣。’”[31] 杨瓒的妻子是长公主，这个杨坚比不了；杨瓒美姿仪，杨坚“长上短下”；杨瓒好书爱士，杨坚是素无学术；从受重用的程度来看，杨坚也远远不如杨瓒。所以杨瓒看不起杨坚。杨整虽然没有杨瓒那么多优势，但是从他“力战而死”的事迹看，他可能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将领。这就继承了父亲杨忠的性格，与内向的在军事上毫无特长的杨坚相比，杨整更为关陇勋贵所看重，所以他也看不起杨坚。

北周时期的杨坚不仅受弟弟轻视，当时的人物对杨坚也并不看好：《隋书·元谐传》：“元谐，河南洛阳人也，家代贵盛。谐性豪侠，有气调。少与高祖同受业于国子，甚相友爱。后以军功，累迁大将军。及高祖为丞相，引致左右。谐白高祖曰：‘公无党援，譬如水间一堵墙，大危矣。公其勉之。’”[32] 无论这个“无”理解为“假如没有”，还是理解为“没有”，都说明杨坚在篡夺前，人际关系比较薄弱，没有多少朋友可以依赖。《隋书·高祖纪》说杨坚读书的时候，同学对于杨

坚，“虽至亲昵不敢狎也”。杨坚自己有一个表白说：“朕少恶轻薄，性相近者，唯窦荣定而已。”这两段材料实际上说明，杨坚这个人朋友很少，只有窦荣定和他比较亲密。因此，元谐虽然和杨坚同学，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只是一般，达不到“甚相友爱”的程度。由于，知道杨坚这个人比较薄情，人际关系不好，所以元谐才对杨坚说以上话。杨坚总结他人际关系紧张的原因是“恶轻薄”，这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从同时代人的角度来说，他们正如元谐一样对于杨坚的能力评价较低也是原因之一。

杨坚虽然是一代名将杨忠的长子，但是很少单独统帅军队。在建德四年，北周进攻北齐的战役中，杨坚统帅了一支三万人的水军，不过是和广宁侯薛回并列为统帅。这支军队八月进攻河桥，九月班师，“水军焚舟而退”[33]，战果并不辉煌。在建德五年进攻北齐的战役中，杨坚任右三军总管，并且取得战功：攻占冀州。可惜的是，这次夺取冀州的战役，指挥官是宇文宪不是杨坚。[34]灭亡北齐后杨坚担任了他作为臣子最重要的职位：定州总管。二月任命，十二月就被改派为南兖州总管。据《隋书·庞晃传》，定州总管任职不久，南兖州总管之前是任南亳州总管，可见在定州并没有待多长时间就被调离。在离开定州之前，杨坚“意甚不悦”[35]。这是因为，定州是“燕代精兵处”，很重要，南亳州只是南方小州。北周灭亡北齐后，挥兵南下与陈争夺淮南，主要的将领都参与了这次战役，根据史书记载，杨坚并没有参与这次战役。在北周，军功是衡量一个人能力的主要尺度，尤其是在勋贵子弟中间。杨坚在北周参加的战役比较少，而且在战争中缺乏上佳表现。因此，在当时的社会评价体系中，杨坚是一个平庸的人物。这也体现在他的任职不是很重要。综上所述，杨坚这个人的性格特征在北镇人物中属于另类，就是宇文泰所说的“不似代间人”。具体说来就是，性格内向，心思缜密。这在尚武的西魏北周时代，不是主流的性格特征。因此，在西魏北周，杨坚虽然是统治阶层的核心成员之一，但是没有进入决策层。要进入决策层，杨坚必须在军事方面，引起注意。杨坚在参加的为数不多的几次战役中，表现平庸。因此，在北周时期杨坚只能是默默无闻。由于军事才能的平庸，他不仅没有获得同时代人的尊敬，连自己的兄弟都看不起他。

余论 杨坚的优势

在剥离了种种迷雾之后，我们看到了真实的杨坚：性格内向，心思缜密，才能平庸。才能平庸，不是一个好评语，但是处于北周时期诡谲的政治环境中，这种性格却不能不说是有其优势：不被注意，就意味着保存实力。属于宇文护势力集团的，被周武帝清洗；属于周武帝亲信的，被周宣帝猜忌。杨坚在周宣帝朝，由于外戚的身份不是没有受

到猜忌，但是由于才能平庸，才得以化险为夷。杨坚取得皇权，当时就有“刘昉牵前，郑译推后”的说法，当时人并不认为杨坚曾经有过长期的阴谋。“平庸”的杨坚在机会来到的最后一刻，还在请求外调以保命，更加证明他并无“大志”。他之所以被牵前推后，只是身份特殊。周宣帝暴卒的关键时刻，宗室都在外地，皇亲国戚只有杨坚在长安。杨坚既是“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之后，又改宗为“弘农杨氏”。留在长安的各种势力权衡利弊之后，都觉得杨坚能够照顾自己的利益，所以杨坚被选择为皇帝并不是因为能力而是因为身份。

第二节 李密家族史补证

隋末群雄之一的李密，其家族原是显赫的“八柱国家”之一，不过由于正史记事的缺略，其家族史有模糊、断裂的遗憾。可喜的是，近年来李密家族成员的墓志多有出土，可供补证正史缺略者甚多。本节就是利用墓志对李密的家族史进行增补，不足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 李密祖先在北魏的迁徙地问题

关于李密的祖籍，《周书·李弼传》、《隋书·李衍传》的口径一致，即辽东襄平人。[36] 不过《北史·李弼传》说李弼是“陇西成纪人”[37] 。《旧唐书·李密传》说李密，“本辽东襄平人……徙为京兆长安人”[38] 。这三种说法看似不同却可以调和：辽东襄平是祖籍，西魏之后李氏家族迁居于长安。至于陇西成纪是指郡望，并不是李密家族真正定居于此。根据以上传世文献，似乎李密的家族从辽东迁往长安，只迁徙过一次。但是墓志却提供了新的线索。李弼儿子李纶的墓志说他是“梁城郡泉洪县人”[39] 。李密的姑姑李丽仪的墓志认为“其先赵国人。寓居于平城之桑乾”[40] 。李弼的小儿子，后来过继给李檦的李椿，其墓志写到，“（李椿）字牵屯，陇西敦煌人。”[41] 李椿的曾孙李则政的墓志却说他是，“陇西成纪人”[42] 。李密的墓志也不写他是京兆长安人，而是陇西成纪人。[43] 以上就是李密家族的墓志对其籍贯的不同记载，不用说这与正史整体划一的记载相去甚远。一般来说，一个家族的籍贯只可能有一个，那么李密家族在墓志中出现这么多的说法的原因是什么呢？解决这个疑问的思路可以在李椿身上得到启发。关于李椿籍贯的问题，《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有个解释，此书的《董敬墓志疏证》说，“董敬著籍陇西敦煌，陇西与敦煌并无行政隶属关系，墓志如此记载董敬的郡望或者籍贯，非常不规范。也许陇西只是泛指，正如《□遵墓志》称尊为‘关西武都人’”。可是，本书所收李椿墓志也称“陇西敦煌人也”，显然当时这样表述并不罕见。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即董敬和李椿现籍敦煌，郡望却在陇

西。[44] 但是，李椿为何要著籍敦煌这样的偏僻之地？我们看他葬于长安，可知他或许并不著籍于敦煌。李椿字“牵屯”。《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于此也有解说，“‘牵屯’在北朝为山名，侯莫陈悦即败死于牵屯山”[45] 。牵屯山就是今天的崆峒山，在甘肃省平凉市西三十里。在北魏末年的乱世中，李椿生父李弼曾背弃侯莫陈悦，导致侯莫陈悦在牵屯山被宇文泰所杀。侯莫陈悦被杀后，李弼出任秦州刺史，牵屯山就在秦州边界。于此，可以推测，李椿之字“牵屯”，可能是李弼为了怀念早年的这段经历而取。又据《周书·明帝纪》，北周明帝宇文毓“小名统万突”。得名的原因是“永熙三年，太祖临夏州，生帝于统万城，因以名焉”[46] 。可见以具有纪念意义的地名作为孩子的小名或者表字，不仅仅是李弼一人的做法，也是宇文泰的做法。这种情况当然不止这两例，似乎在当时是一种习俗。

这就提示我们，李纶墓志和李丽仪墓志所说的籍贯是否是李弼为了纪念其人生经历而告知其子女，被子女作为家族史记录下来的？墓志记载李纶是“梁城郡泉洪县人”。查中华书局本《魏书》，在《地形志上》“恒州”条下有“梁城郡”不过没有“泉洪县”，有“桓鸿县”[47] 。“桓鸿县”条的校勘记引《水经注》卷一三〈水篇〉云，“如浑水出凉城旋鸿县”[48] 。那么“桓鸿县”就是“旋鸿县”，因为境内有“旋鸿池”而得名。“泉洪县”也就是“旋鸿县”，音近而误。李丽仪墓志所说的，“其先赵国人，寓居于平城之桑乾”。《水经注疏》卷一三“㶟水”条，“枝津上承桑乾河，东南流，迳桑乾郡北，大魏因水以立郡，受厥称焉”。于桑乾郡，熊会贞有考订曰：“《地形志》无此郡，而《灵徵志》有恒州之桑乾郡。《北齐书·张纂传》，父烈，桑乾太守。《隋志》，善阳有后魏桑乾郡。皆魏立郡之确证。当是孝昌中陷，天平末复置，故《地形志》不载，在今山阴县东。”则此“平城之桑乾”是指北魏迁洛阳之前的称呼，即平城畿内的桑乾郡。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的称呼应该是，“恒州，桑乾郡”。北魏梁城郡之旋鸿县和桑乾郡，都在北魏前期的平城畿内，也都在迁洛之后的恒州境内。所以可以推测，李弼或者其父祖辈曾经在平城附近居住过。这个推测，还可以得到其他证据的支持。据《周书·李弼传》，“弼妻，悦之姨也”[49] 。“悦”指侯莫陈悦。据《魏书·侯莫陈悦传》，侯莫陈悦是代郡人，也就是平城人。[50] 既然侯莫陈悦是平城人，那么他的舅家也应该是在平城。那么李弼也应该是定居于平城。如果是远在辽东襄平，那么这亲事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综上所述，李密家族祖籍是辽东襄平，但是在北魏时期其家族可能已经迁徙到都城平城周围居住。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后，这一家族并没有迁往洛阳，依然在恒州居住。根据李椿和宇文毓表字的命名规律，似乎牵屯和统万是李弼和宇文泰亲身经历过的地方，是不是可以推测：

梁城郡之旋鸿县和桑乾郡也是李弼亲自居住过的地方？

二 李密家族的葬地

北周时期去世的李纶葬于“三原县之浊谷原” [51] 。北周之设置三原县是在北周武帝建德二年。李纶之葬于三原在建德四年，于史实是契合的。至于“浊谷原”的具体位置，由于墓志是盗掘而来的，其出土地点难以确定了。根据北周大臣墓志的出土地点和今天三原县的地理位置，“浊谷原”大约就在今天咸阳国际机场以东的台原上。李纶的弟弟李椿却埋葬在“蓝田县童人乡原” [52] 。该墓志1984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李椿的曾孙李则政埋葬于“万年县同人原” [53] ，葬地和李椿一样。李密埋葬于“黎阳县之南五里之平原”，即今天河南省浚县。[54] 由于李弼和李檦的墓葬还没有发现，还不能肯定是不是也葬在北周三原县境内。由于李衍、李宽等人的墓葬也没有发现，所以也不能肯定他们是否葬在“铜人乡”。所以对于李密家族是否有家族墓地我们还是不太清楚的。

三 李密家族的通婚

上文我们说过，李弼的妻子是侯莫陈悦的姨母。李弼和侯莫陈悦舅家的通婚关系，是代北还未完全汉化的小贵族之间的通婚关系。李弼在西魏的地位迅速上升，荣任“八柱国”之一。他的儿子的通婚关系完全就是为了巩固这一关系而发生的。

李弼的长子李耀所娶的是另外一个柱国侯莫陈崇的姐妹。 [55] 李弼的二儿子李晖“尚主”，娶的是宇文泰的女儿。 [56] 李弼的四子李纶所娶是“广业郡君宇文” [57] 。李檦的儿子李椿的夫人是刘氏。 [58]

很清楚，李弼和侯莫陈家族的通婚，以及他与宇文泰家的通婚，是北族军功贵族之间的政治婚姻，是为了巩固他们之间的联盟关系。

李纶的妻子宇文氏的族类不好判断。由于西魏北周执行恢复胡姓的政策，本来是汉姓的大臣也有很多被赐为“宇文氏”，所以也就不好判断此“宇文”，是哪个家族。墓志说李椿的妻子刘氏是“中山安喜人。祖敬夏，本州别驾，蒲阴侯。父贞，光禄勋、定州刺史、西郡文公” [59] 。北魏中山郡属定州，所以“本州别驾”应该是定州别驾。由于西魏北周没有定州，所以刘贞的“定州刺史”可能是北周灭齐之后出任，也可能是赠官。中山刘氏，出自屠各，族群很是庞大。比如《周书》卷一七，“刘亮中山人也” [60] 。《北齐书》卷四一，“独孤永业，字世基，本姓刘，中山人。母改适独孤氏，永业幼孤，随母为独孤家所育养，遂从其姓焉。止于军士之中，有才干，便弓马。被简擢补定州六州都

督，宿卫晋阳”[61]。刘氏的父亲当是北魏末年来到关中的官僚。

从李弼的儿子辈的通婚情况来看，李弼的儿子还是与东来的北镇军人的通婚情况比较多，尤其是和勋贵阶层的通婚。

这种情况到李弼的孙子辈出现了一些变化。李弼的孙女李丽仪嫁给了山东大姓博陵崔氏崔仲方。[62] 山东大姓和北朝勋贵在文化背景、价值观上相去甚远，两者之间要结成亲家是有困难的。要冲破这个障碍，虽然汉族大姓要面临更多的困难，但是作为来自北方的勋贵能够和汉姓通婚，说明了这个家族对于汉文化的仰慕。也就是说，李耀要比父亲李弼更了解汉文化。

但是作为八柱国家，李弼家族还是被皇族重视。李纶的儿子李长雅在隋代初年，又一次尚主。[63] 不过这次是隋文帝杨坚的女儿。这又是八柱国家之间的一次通婚，应该是杨坚出于拉拢李弼家族的目的。

四 李密家族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

李氏家族的早期历史，正史和墓志的记载还是有出入的。《周书·李弼传》记载：“六世祖根，慕容垂黄门侍郎。祖贵丑，平州刺史。父永，太中大夫，赠凉州刺史。”[64]《北史·李弼传》作“六世祖振”[65]。《徒何纶墓志》记为，“曾祖贵，开府仪同三司。祖永，镇西将军，凉州刺史、河西郡公”[66]。《李椿墓志》：“曾祖贵，魏开府、平州刺史、卫尉卿。祖永，柱国、太傅、河阳公。”《李丽仪墓志》：“曾祖延，魏太保、恒朔十州诸军事、恒州刺史、赵郡公。”[67]

关于李弼的六世祖是叫李根还是叫做李振？这个问题不好判断，是“根”、“振”音近而误，还是字形相近而误，不好判断，但是根据十六国北朝北族姓名的特点还是“根”比较可信。

李弼的祖父是叫“贵丑”还是“贵”？虽然《徒何纶墓志》和《李椿墓志》都是写作“贵”，但是揆之他的生活时代，还是“贵丑”比较符合史实。“贵”当是后代子孙为了面子好看而改写。

李贵丑的历官。《徒何纶墓志》所记的“开府仪同三司”，在《李椿墓志》里面记作“魏开府”。《周书·李弼传》所记的“平州刺史”，在《李椿墓志》里面可以印证。至于《李椿墓志》所记的“卫尉卿”却不见于《李弼传》和其他家族成员的墓志。所以，李贵丑曾出任平州刺史大概是真实的历官，他也可能被加官为开府仪同三司，只是他是否出任卫尉卿还得存疑。

李弼的父亲的名字是叫“永”还是叫“延”？在《周书》、《北史》、《徒何纶墓志》、《李椿墓志》都是写作“永”，唯有《李丽仪墓志》写作“延”。现在看来“永”是正确的。“延”和“永”意思接近，改写为“延”可能是出于避讳。查李丽仪丈夫崔仲方的家史，没有名“永”的，那就不是避家讳，可能是避隋文帝太子杨勇的名讳吧？

李永的历官。李永的历官，《周书》和《北史》的李弼传都记为“太中大夫，赠凉州刺史”。但是在后代的墓志里面就显赫起来。《徒何纶墓志》记为“镇西将军、凉州刺史、河西郡公”。《李丽仪墓志》记为“魏太保、恒朔十州诸军事、恒州刺史、赵郡公”。《李椿墓志》记为“柱国、太傅、河阳公”。既然《徒何纶墓志》所记的“凉州刺史”在正史里面记作赠官，可见其他的公爵、太保太傅之类都是赠官。那么李永的官职仅仅就是太中大夫。

综上所述，李弼的祖籍是辽东襄平，由于这一地域关系，和崛起于辽东的慕容燕就不能不有关联。他的六世祖李根曾出任后燕的黄门侍郎。后燕被北魏灭亡之后，李弼的家世就衰落了，很可能被迁徙到平城附近居住。到李弼的祖父李贵丑的时候才又一次崛起，做到了平州刺史这样的大官。李弼的父亲可能并没有保持这一良好势头，以至于官位并不显赫。

五 李密家族的盛衰

李密家族的兴盛始于北魏末年混乱的局势给其曾祖父李弼所提供的机会，当然还有李弼本人的努力。据上文李弼家是定居于恒州的小官僚。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包括恒州在内的北方州镇陷入了不可逆转的衰落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李弼要出头是很困难的。我们看到李弼在北魏末年，虽然“有大志，膂力过人”，但是并没有获得一官半职。不过很快北魏政府就陷入了各地起义的困境中，代北豪强尔朱荣兴起，李弼于北魏永安元年被“尔朱天光辟为别将”[68]。跟随尔朱天光进入关中，平息了关陇各地的叛乱。在这过程中，李弼战功卓著，官爵也是节节高升。

尔朱荣集团的核心是其家族武装。仅次于家族武装的是代郡的鲜汉官僚。李弼就是出身代郡的官僚。如果李弼紧跟尔朱氏，那么其下场恐怕不会太好。幸运的是，尔朱天光离开关陇去对付高欢的时候，并没有带领李弼同去。李弼留在关陇隶属于侯莫陈悦。尔朱天光进入关陇的时候，手底下的势力实际上分为两派。一派是侯莫陈悦为首的代郡势力。一派是以贺拔岳为首的武川集团。而以武川集团的势力较大。李弼是侯莫陈悦的亲戚，深受侯莫陈悦重用。无论是从地域还是从亲缘关系，李弼都是代郡集团的干将。在尔朱氏集团被高欢消灭之后，

侯莫陈悦投靠了高欢，设计害死了贺拔岳。武川集团经过短暂的混乱选举宇文泰为领袖，发兵讨伐侯莫陈悦。这时候的力量对比是有利于宇文泰的。李弼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背弃了侯莫陈悦，离散了侯莫陈悦的武装，带兵投降了宇文泰。宇文泰大喜过望说，“公与吾同心，天下不足平也” [69] 。之后，在西魏与东魏的战争史上，李弼也是战功卓著，得以列名八柱国之一。李弼去世的较早，是在北周建立的当年去世的。这对家族的昌盛有一定程度影响，不过李弼有七个儿子，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李弼早逝的损失，所以李弼家族在北周继续保持了显赫的地位。李家显赫有三个标志，其一是“尚主”，就是李晖娶宇文泰的女儿为妻。其二，从爵位上看，李弼的几个儿子都为公爵。[70] 其三，从官职上看。李衍曾担任左宫伯，[71] 李椿曾担任右宫伯。[72] “左右宫伯”执掌皇宫禁军，非亲信不能得此职。可见李弼家族在北周是被当作亲信看待的。

隋取代北周之后，李弼家仍然保持其显赫的地位。其中的原因可能与李弼的孙子李长雅娶杨坚的女儿有关系。李杨两家的亲事，大约是在北周末年还是在隋朝初年，是有疑问的，但是北周末年的可能性更大。原因是《隋书·李衍传附李长雅传》的表述是这样的：“尚高祖女襄国公主，袭父纶爵，为河阳郡公，开皇初，拜将军。” [73] 似乎拜将军在婚后，那么结婚应该在北周。其次根据李纶的墓志，李纶去世时候是在北周建德三年 [74] ，年纪是40岁。那么作为李纶长子的李长雅，在北周显然已经成年，所以婚事不可能拖到隋。既然，李杨两家在北周结为亲家，所以李家对于杨坚取代北周是支持的。《隋书》记载李衍在王谦叛乱时候，以行军总管的身份，随从梁睿讨伐王谦。[75] 李椿的墓志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证据，“大隋建极，海内清荡，以漳滏经离，风尘始灭，眷言抚压，是属勋贤。开皇二年敕领东土相州十二州兵” [76] 。意思是说，隋初经过尉迟迥的叛乱，山东地区需要一位杨坚信得过的将领坐镇。杨坚把这个重任托付给了李椿。可见杨坚对于李家的人是非常信任的。直到开皇十二年，李椿主动上书才得以从这个重要的岗位上退下来，从李椿第二年去世的事实看，可能是由于病重才退休的。

有的学者认为，李密反隋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家族的衰落。这个看法无疑是有其道理的。但是李密家族衰落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一方面，是李家人才的迅速凋零。李衍去世于开皇十年，李椿去世于开皇十三年。这两个人在李氏家族中，能力强官位高。李密的父亲李宽曾经参与过开皇十年再次平叛江南的战役。[77] 《隋书·李密传》：“开皇中，袭父爵蒲山公，乃散家产，周赡亲故，养客礼贤，

无所爱吝。”[78] 也就是说，在开皇十年到开皇二十年之间已经去世，所以李密才能袭爵。

另一方面，可能是隋炀帝对关陇世袭勋贵，不再眷顾。根据《李则政墓志》，其祖父李匡曾任“隋朝请大夫、盖州别驾，袭爵河东公”[79]。据《李椿墓志》，李匡是李椿最小的儿子，所以他是否能袭爵，我们是存疑的。[80] 但是李匡出任盖州别驾恐怕是有可能。估计这就是李匡的最高官职了。这与他父亲比较起来是差太远了。《旧唐书·李密传》也记载了李密与隋炀帝的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密以父荫为左亲侍，尝在仗下，炀帝顾见之，退谓许公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儿为谁？’许公对曰：‘故蒲山公李宽子密也。’帝曰：‘个小儿视瞻异常，勿令宿卫’”。《旧唐书》紧接着说，“他日，述谓密曰：‘弟聪令如此，当以才学取官，三卫丛脞，非养贤之所。’（《新唐书》作：‘君世素贵，当以才学显，何事三卫间哉。’）密大喜，因谢病，专以读书为事，时人希见其面。”[81] 李密虽然大喜，但是之后一直没有担任过隋朝官职。是否隋炀帝压抑李家的人才？从种种迹象看来，有这种可能性。

李密本来可以成为重振李氏家族的人物，但是随着他本人的被杀，李家就彻底地衰落了。李椿的孙子李虔惠的最高官职是唐齐州临济令、朝散大夫、行兰州长史。[82] 曾孙李则政又衰落一步，最高官职是朝议郎行常州司法参军事。[83] 李则政“解褐左卫翊卫”。[84] 这个出身可能还是八柱国家的余荫，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是科举的时代，李家子孙似乎没有在文化上取得进步，所以其在仕宦上就没能显赫。

第三节 杨玄感·李密·李渊——勋贵

在隋朝的嬗变及叛乱杨玄感、李密、李渊出身于勋贵阶层，在隋末社会动乱中分别为发起者、高潮的领导者和结束者。勋贵的身份，与社会动乱中不同阶段的领袖身份，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必然？又，同样的出身，不同的人生轨迹和命运，到底是什么左右着勋贵子弟的命运？观察勋贵（军功贵族）及其子弟在隋代的变化，能够明确感到文弱化的倾向。由于西魏北周对于军功和教育的重视，勋贵的子弟大都具备了文武合一这种才性特征。这种人才大量的储备使得北周继而隋拥有了比北齐、陈乃至于突厥更大的政治优势。随着南朝士人、北齐士人陆续进入关中政权，勋贵子弟程度不同但是普遍地接受了精致文化的熏染，尚武的风气渐淡，对于精致文化的爱好在增长中。于是，北镇勋贵的子弟程度不同地文弱化了。[85] 处于统治核心的集团的文弱化倾向及其差异，是解读隋朝后期历史的关键之一。

一 大业新政与勋贵的叛乱

隋大业九年，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发动叛乱，两个月之后叛乱被平定，数万人因为牵涉叛乱而被清洗，其中包括一部分隋朝大臣。学者们认为，杨玄感之乱是标志隋朝走向衰亡的事件。如果考察这一事件的前后，从仁寿四年（604）汉王杨谅在晋阳起兵，一直到大业十三年（618）骁果在江都叛乱，整个杨广统治期间，勋贵的叛乱时有发生，成为大业政局的特色。作为统治阶层的勋贵的叛乱，是触及隋朝末年历史的深层结构的切入口。

（一）释“楚公好反而不欲胜”

有学者称杨玄感叛乱为“兵变”，这似乎是误解。据《资治通鉴》：“玄感选运夫少壮者得五千余人，丹杨、宣城篙梢三千余人。”[86] 也就是说，以礼部尚书在黎阳“督运”的杨玄感并未统辖军队，所能征发的只有这些“运夫”和“篙梢”等搬运工。这些搬运工自然不会是正规士兵。史书记载，杨玄感统帅的造反军队最初“皆执单刀柳楯，无弓矢甲胄”[87]。杨玄感不仅没有现成可用的兵，最基本的军事装备也没有。所以，不能说杨玄感是“兵变”，因为他无“兵”可变。

率领不足一万手执“单刀柳楯”的搬运工叛乱，而且前去攻打东都洛阳。史学家无不为杨玄感策略的失误而扼腕。杨玄感在有李密的参谋之下依然选择了最容易导致军事失败的策略，尤其让学者们认定杨玄感是有勇无谋的武夫。但事实可能是，包括李密在内的关注这一事件的人，没有理解杨玄感。杨玄感发动叛乱的动机，重点不是在军事上

而是在政治上。也就是说，杨玄感的目的是反对隋帝杨广，并不是要推翻隋朝政权。

先说李密为何没能理解杨玄感？杨玄感和李密是刎颈之交，在动乱前派人将李密请到黎阳，问计于李密。李密献计三条：（1）占据蓟城，扼隋帝杨广的退路，“不过旬月，赍粮必尽。举麾一召，其众自降，不战而擒，此计之上也”。（2）占据长安，“天子虽还，失其襟带，据险临之，故当必克”。（3）“若随近逐便，先向东都，唐祎告之，理当固守。引兵攻战，必延岁月，胜负殊未可知。”[88]

杨玄感采纳第三策，理由是，“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不取之，安能动物？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89] 胡三省认为，以此可以看出杨玄感见识的闇劣。其实，考虑叛乱者的真实处境，李密并不比杨更加务实。李密三策的着眼点是取得战略优势。杨玄感与李密不同，他的目的在于“动物”、“示威”，也就是将叛乱看作是一种宣传，吸引号召更多的“百官”加入到反杨广的阵营中。所以他选择攻打洛阳，“玄感既至东都，皆捷，自谓天下响应，功在朝夕”[90]。所谓“天下响应”并没有成为事实，永远的成了杨玄感的期望。这个期望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杨玄感误判了形势。

由于杨玄感和李密在认识上的差距，杨对李密有所疏远。据《隋书·李密传》，杨玄感在东都城下俘获韦福嗣后，“委以腹心，是以军旅之事，不专归密”[91]。后来杨玄感虽然听从李密进军关中的策略，但又违背李密直趋长安的原则，攻打弘农宫，导致全面失败。军事失利后，这对刎颈之交没有沿同一条道路逃亡，杨玄感逃往商洛山区，李密逃往关中。可见到了最后，两个人分歧已经明朗化。就在此时，李密发出“楚公好反而不欲胜”的抱怨。[92]

从叛乱的谋划过程，也可以感受到杨玄感的动机。大业五年，玄感跟随炀帝出征吐谷浑，归途中，“欲袭击行宫”[93]。而在大业五年之前，杨玄感就已经不满炀帝的统治，“自以累世尊显，有盛名于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将吏，复见朝纲渐紊，帝又猜忌日盛，内不自安，遂与弟潜谋废帝，立秦王浩”[94]。由此段文字，可以理解杨玄感的策略是通过“废昏立明”来刷新政治，而不是取而代之。杨玄感这个动机，可能其他人并不是很了解，所以李密感慨，“楚公好反而不欲胜”。这也反映了两个人政治理想的不同：李密的重点在于“胜”，枪杆子里出政权；杨玄感的重点在于“天下响应”，获得舆论的支持。

分析杨玄感交游圈子也可以了解杨玄感的政治意愿。史称，杨玄感交游广泛，“四海知名之士多趋其门”[95]。虞绰、王胄和杨玄感过从甚密。他们之间除了友情之外，杨玄感恐怕另有企图。虞绰“长居禁

中，以文翰待诏，恩盼隆洽”[96]；王胄“以文词为炀帝所重”[97]。与虞、王二人交往，对于了解政治机密很有帮助，虞绰就曾经将宫禁中的兵书私自借给杨玄感。[98] 即使他们之间没有政治利益的交换，杨玄感也可通过与大名士的交往增加社会声望。

文献可证，参与了杨玄感反叛密谋的大臣有斛斯政、赵元淑。大业初，赵元淑因为在平定汉王杨谅的战斗中表现突出，加勋为柱国，历任德州刺史、颍川太守，后破格升为司农卿。大业九年，从征高丽，镇守临渝。此人一直是隋帝杨广的亲信。斛斯政本是尚书兵曹郎，炀帝不顾兵部尚书段文振反对，升其为兵部侍郎，对其也是赏识有加。

这两个人与杨玄感同谋反叛，颇耐人寻味。很显然，即使叛乱成功，二人所得回报，恐怕不会高于炀帝所能给予者。也就是说，二人参与谋反不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而是追求某种政治理想。同时说明了，亲信对于杨广的信心也已经消耗殆尽。正是在这种政治氛围下才有那种“楚公好反而不欲胜”的谋反类型。

（二）朝臣对大业新政的批评

杨玄感在黎阳叛乱后，“署官属，皆准开皇之旧”[99]。在杨玄感的政治主张中，恢复开皇时期的政治，是目的之一。这里面暗含着对大业政治的否定，也显示着杨玄感不想与隋朝政府整体决裂的策略。李唐王朝建立之后，也“废隋大业律令，颁新格”[100]。要说大业政治在各个方面都是一团糟，也有失公允。杨广的眼光和气魄都有其父难以企及之处。令人遗憾的是，宏伟的蓝图在实施的过程中，杨广是个糟糕的工程师：他完全忽视了农业社会的经济规律，使得整个社会的再生产被破坏，百姓生活陷入困境。与生活在理想状态的炀帝不同，隋朝不缺乏务实的官僚。他们从一开始就对隋炀帝的新政持批评态度。大业三年，高颎、贺若弼、宇文弼因为批评隋炀帝的政策而被处死。大业四年，张衡进谏，被隋炀帝贬斥。大业五年段文振也曾上书进谏。

高颎等私议朝政与张衡、段文振进谏相比，性质颇有不同。高颎、贺若弼、宇文弼，是前朝的旧臣。高颎是能干的行政人才，贺若弼是隋朝最有才干的将领之一，宇文弼“以才能著称，历职显要，声望甚重，物议时谈多见推许”[101]。这三位大臣在官民的心目中有非常高的地位，杨广“颇忌之”。“颇忌之”，反映了新皇帝对德高望重的前朝大臣的提防心理。前朝重臣和隋炀帝之间也没有畅通的沟通渠道，高颎等人对于朝政的关切只能通过与大臣的议论来疏导：高颎对太常丞李懿批评朝廷的“好乐”，对太府卿何稠批评朝廷的突厥政策，对观王杨雄批评“近来朝廷殊无纲纪”[102]。考虑到何稠和杨雄都是炀帝的亲信，可以看出高颎希望自己的意见能被皇帝倾听的苦心。只是高颎等

人并没有照顾到炀帝本人的感受，新上任的皇帝急需要建立权威。其结果是三位大臣被处死。

与高颎等人不同，张衡和段文振是杨广的心腹：张衡是杨广在藩王时期的班底，在夺嫡的密谋中出了大力。段文振是杨广一手提拔的亲信。这两个人对于杨广越来越铺张的政策感到担心，大业四年，张衡告诫杨广，“比年劳役繁多，百姓疲敝，伏愿留神，稍加折损”[103]。大业五年，段文振就隋炀帝任突厥居住塞内，赏赐过于丰厚，提出了抗议。对于段文振的上奏，史书没有记载炀帝的反应；对于张衡，炀帝“意甚不平”，并将其贬斥。张衡后来被处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杨广的亲信集团频频向其示警，说明到大业五年，隋朝统治的危机已经相当严重。但是杨广并未采纳亲信的建议，仍然一意孤行。这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

第一，朝臣直接的劝谏减少。《隋书·郎茂传》记载：“于时帝每巡幸，王纲已紊，法令多失。茂既先朝旧臣，明习世事，然善自谋身，无謇谔之节。见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窃叹而已。”[104]

第二，叛乱事件渐露端倪。大业五年，杨玄感准备偷袭炀帝的行宫，虽然没有实施，这是勋贵谋叛的一个信号。大业六年，“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余家”[105]。这是利用民间宗教组织，在统治核心东都洛阳发生的叛乱。这两次叛乱，在规模上与大业九年之后蔓延于全国的民众起义比要小很多，不过从时间上要比其他反叛事件早。这似乎显示着，统治阶层比下层民众更早地对隋炀帝的统治失去了信心，所以他们对于风暴似乎有更充分的准备。《新唐书》载：“初，士及为奉御，而高祖任殿中少监，雅自款结……士及谢曰：‘臣罪当死，但臣往在涿郡，尝与陛下夜论世事，顷又奉所献，冀以此赎罪。’帝笑谓裴寂曰：‘彼与我论天下事，逮今六七年，公等皆在其后。’”[106] 宇文士及投降李渊在武德二年，上推六七年正在隋大业九年前后，而宇文士及在“涿郡”与李渊“夜论世事”之时，揆之背景，当是大业九年第二次征高丽时期。所谓的“世事”、“天下事”，可能就是对大业九年时局的议论，估计二人对于隋朝的前途持悲观态度，并且对于保身之计也有过讨论。此年恰好是杨玄感叛乱之年，所以杨玄感所预计的“天下响应”，也不是没有根据的臆想。

隋朝大臣思想和政治立场的混乱，也可以用杨玄感兵临洛阳城下的一些事例来说明。据《隋书·李景传》：“杨玄感之反也，朝臣子弟多预焉”。[107] 又据《资治通鉴》，这些朝臣子弟有，“韩擒虎子世咢、观

王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来护儿子渊、裴蕴子爽、大理卿郑善果子俨、周罗睺子仲等四十余人皆降于玄感，玄感悉以亲要重任委之”[108] 。这些人之所以投降杨玄感直接原因是樊子盖斩杀河南赞治裴弘策，引起达官子弟的兔死狐悲之感。不过考虑到观王雄是隋朝宗室，来护儿、裴蕴是隋炀帝的心腹大臣，因此他们的子弟投靠杨玄感恐怕与他们对隋朝统治的不信任有密切关系。当时的东都洛阳真可谓人心惶惶。史称：“及杨玄感反河南，赞治裴弘策出师御之，战不利，弘策出还，遇汪而屏人交语。”[109] 据《资治通鉴》：“裴弘策与子盖同班，前出讨贼失利，子盖更使出战，不肯行，子盖命引出斩之以徇。”[110] 裴弘策当时任将作监、河南赞治，是主要的将领，他先“屏人交语”，又拒不出战，颇能反映他复杂的心态。

杨玄感攻打洛阳的确给隋炀帝带来极大的压力。据《资治通鉴》：“杨玄感反书至，帝大惧……帝又闻达官子弟皆在玄感所，益忧之……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诸将，使引军还，军资、器械、攻具，积如丘山，营垒、帐幕、案堵不动，皆弃之而去。众心恟惧，无复部分，诸道分散。”[111]

从上文的论证不难看出，勋贵阶层实际上对隋炀帝已经失望。他们对于变乱有更早的预感和筹备，也拥有相对丰富的政治资源。介入政治，或被政治介入的隋末勋贵，大多以悲剧结束。下文将从勋贵家族的气质变化来理解。

二 勋贵阶层在文化上的嬗变

（一）北镇军功贵族联姻的新倾向

在中古时期，社会上层婚姻关系的缔结，几乎没有感情的因素，基本上是双方家长为了家族利益而缔结的。李渊家族婚姻关系的缔结也是这样。

李渊的母亲是西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的第四个女儿。其姐嫁给了北周明帝，七妹嫁给了隋文帝杨坚。很明显，这是军功贵族家庭之间的通婚，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李渊家族是这个婚姻关系的受益者。李渊的祖父李虎在西魏就早早去世，李渊的父亲李昞也在李渊七岁时过世。可以说，李渊家族的人丁并不旺。这在崇尚军功的社会里，是门第衰落的导因。不过李渊由于其姨母的关系在北周和隋代受到了特殊的照顾。李渊在隋代尤其受到独孤皇后的照顾“由是特见亲爱”[112] 。

李渊的妻族比之舅族，有个明显的变化。李渊的岳父是隋神武公、定州总管窦毅。窦毅家族本是鲜卑纥豆陵氏，北魏孝文帝改姓时改为窦

氏，是北魏著名的贵族。到了窦毅的祖父辈，家道中落，沦为小贵族，也已经汉化。窦毅的叔父窦炽“少从范阳祁忻受毛诗、左氏春秋，略通大义”，不过尚武的家风也没有失传。北魏末年的动荡中，文武兼备的才性特征给窦氏家族带来了无限的机会。窦毅的两位叔父窦炽、窦善带领整个家族跟随北魏孝武帝逃到长安，是建立西魏的功臣。窦炽凭借战功、政绩和资历在北周末年已经贵为太傅，“及其望位隆重，而子孙皆处列位，遂为当时盛族”。就在这个时候，李渊娶了窦炽侄子窦毅的女儿，而窦毅的妻子就是宇文泰的第五女襄阳公主。娶窦氏对于李渊影响甚大。李渊家族人丁单薄，在北周社会的影响力远远不如“子孙皆处列位，遂为当时盛族”的窦氏家族。[113] 从文化上来讲，李渊家族和其舅族都是来自北镇，文化程度很低。窦氏家族早年居住于北魏后期的洛阳，经历过孝文帝改革后洛阳繁荣的文化氛围。和窦氏联姻，改善了李渊家族的文化素质。

窦炽的侄子窦荣定，在北周娶杨坚的姐姐为妻，在杨坚篡周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因此，窦氏家族在隋代更加荣盛。李渊将女儿襄阳公主嫁给窦诞，加强了两个家族的关系。

李渊的妹妹同安大长公主嫁给了王裕。[114] 王裕是并州祁人，是否出自太原王氏，不是很清楚。但是，从王裕出任过刺史，王裕的二子王方翼列入《良吏传》来看，[115] 这是一个官僚家族。北镇勋贵家族和官僚家族的联婚，是个颇值得关注的现象。

李渊儿女的婚事自然是李渊亲自操持的，反映了李渊对于隋代社会认识。李渊的二子李世民娶长孙晟的女儿。长孙氏本出自拓跋氏，是北魏的亲族。长孙晟的直系祖先可以上溯到北魏的开国功臣长孙道生。长孙氏在北魏一直保持显赫的权位，北魏末年长孙晟的曾祖父长孙承业随同北魏孝武帝来到长安，建立西魏。在西魏北周隋做官的长孙氏基本上都是长孙晟直系或者旁系亲属。杨坚篡位之际，长孙晟的哥哥长孙炽“率官属先入清宫”，从而获得了隋文帝的赏识，官位显赫。在隋代，长孙家族最为贵盛的当为长孙览，曾任东南道行军元帅，女儿嫁给蜀王杨秀。长孙晟本人一直在做离间突厥各部的工作，在大业年间也深受隋炀帝的信赖。所以，李渊家族和长孙家族的通婚是勋贵之间的通婚。

长孙家族一直是北魏的勋贵家族，孝文帝改革后，这个家族出现了一些文化人。长孙承业的孙子长孙兕，“性机辩，强记博闻，雅重宾游，尤善谈论”，这正是北魏后期洛阳士人的风气。长孙兕的儿子长孙炽“性敏慧，美姿容，颇涉群书，兼长武艺”。长孙晟的从祖父长孙绍远“雅好坟籍，聪慧过人”。长孙绍远的儿子长孙览“略涉书记，尤晓钟律”[116]。长孙家族的文化素质要高于李渊家族。

李渊的四子元吉娶杨氏女。[117] 这个杨氏应该出自弘农杨氏。弘农杨氏是魏晋以来的著名门阀。自从杨坚改宗弘农杨氏后，弘农杨氏在隋代地位很高。李渊联姻弘农杨氏，是企图和关陇地方门阀取得联系的表现。

李渊太原起兵前，有两个女儿出嫁。长广公主嫁陇西赵慈景，平阳公主嫁河东柴绍。陇西赵氏是当地的望族，但是在北周和隋代并没有显赫的人物。柴绍甚至都不是贵族子弟。李渊将女儿嫁给这两位的原因，可能不是出于家世背景的考虑，或许是更看重年轻人的才华。史称赵慈景，是因为“其姿制美”，[118] 才被李渊看重。柴绍“矫捷有勇力，任侠闻于关中”[119] ，这种品质可能是李渊嫁女的原因吧。

总结李渊家族在隋代的婚姻关系，会发现：李渊家族没有跟北镇其他家族联姻。在西魏北周，北镇家族之间的通婚关系比较盛行，尤其是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之间的通婚关系，使得这些家族被复杂的婚姻纠结在一起。李渊家族在隋代竟然没有和北镇任何家族联姻，这个现象值得深思。

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李渊的通婚家族集中在两个群体之中。一是来源于北魏末年的洛阳官僚群体，像窦氏、长孙氏。二是关陇地区的地方豪族。

李渊的联姻观念反映了北镇子弟怎样的变化？还得增加例证。杨坚的子孙除过襄国公主嫁给李弼家族的李长雅，杨广的女儿嫁给宇文士及，这两个出自北镇的家族外，其他的联姻关系如下。

杨坚的长子杨勇娶元孝矩女。《隋书》提到，“重其门地”是杨坚联姻元孝矩的原因。元孝矩是西魏的皇族，也就是北魏的宗室。其祖父元脩义在北魏末年曾任吏部尚书，史称“涉猎书传，颇有文才”是已经汉化的鲜卑贵族。[120] 杨坚的孙子杨楷娶元岩女。这个元岩家世不详，据史书，元岩郡望为河南，当是北魏的远系宗室，北魏末年随孝武帝逃到关中。隋文帝去世时候，元岩以黄门侍郎的身份侍候，可知是隋文帝的亲信。

杨坚的二子杨广娶兰陵萧氏女。据《隋书》，“炀帝为晋王时，高祖将为王选妃于梁，徧占诸女，诸女皆不吉。岿迎后于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于是遂策为王妃。”很显然，杨坚联姻萧岿，是为了取得政治上的支持。史书又记载“后性婉顺，有智识，好学解属文，颇知占候。高祖大善之，帝甚宠敬焉”[121] 。高祖指杨坚，帝指杨广。看来杨坚对于这位来自南方的儿媳妇非常满意。

杨坚的三子杨俊娶长孙览女。长孙家族来自洛阳官僚。见上文。

杨坚四子杨秀娶博陵崔氏女，崔弘度妹。杨坚又做主为孙子河南王娶崔弘昇女。崔弘昇为崔弘度兄长。两次婚姻显示，杨坚对于博陵崔氏非常看重。博陵崔氏是北朝的门阀大族。崔弘度兄弟的父亲崔说、伯父崔士谦。史称，“士谦性至孝，与弟说特相友爱，虽复年位并高，资产皆无私焉。居家严肃，旷及说子弘度并奉其遗训云”[122]。也就是说，崔弘度虽然依靠军功获得高位，但是门阀大族的那种家风还是保持着。

仁寿年间，杨坚做主给孙子杨暕纳韦冲女为妃，又给杨昭纳韦寿女为妃。京兆韦氏是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大族。西魏北周时期，以韦孝宽为代表的韦氏子弟依靠军功使韦氏家族的门第更为显赫。

杨坚的女儿兰陵公主嫁河东柳氏家族的柳述，杨勇的儿子杨恪娶河东柳旦女。柳述父柳机，祖父柳庆。柳庆，《周书》有其家族传记。柳家自魏晋以来就是河东大族，在十六国时期南渡，居住于河南南部，在南朝为官。北魏景明年间回到北方。柳庆“博涉群书，不治章句”，柳机“风仪辞令，为当世所推”，柳机的弟弟柳弘，“善草隶，博涉群书，辞彩雅赡。与弘农杨素为莫逆之交”[123]。看来柳氏家族是个文化士族。

回顾杨坚家族的联姻并且结合李渊家族的联姻关系，事实证明这两个出自于北镇的军功贵族在隋代的通婚关系上很少与出身北镇的家族联姻。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家族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和中原士族联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身于北镇的家族在文化认同上已经比较企慕世家大族的那种精细的文化，与质朴的北镇文化保持距离。

（二）勋贵在文化修养上的进步

李渊的早期事迹，史书记载的不多，不过可以从李渊太原起兵前的交游情况来考察李渊性格的某些方面。

首先看李渊招引欧阳询、张后胤为门客所蕴含的意义。张后胤的父亲以儒学著名，后胤传家学。李渊引张后胤为宾客，显然是为了教育子女。[124] 欧阳询也是“博览经史，尤精三史”[125]。不过，李渊聘请欧阳似乎是为了切磋书法。唐太宗李世民对于书法的痴迷，是众所周知的。唐高宗也继承了这个爱好，多次以飞白书赏赐臣下。李渊对于书法的精通可能大家还不甚了解。《大唐创业起居注》提到李渊“特善书，工而且疾，真草不拘常体，而草迹韶媚可爱。尝一日注授千许人官。更案遇得好纸，走笔若飞，食顷而讫。得官人等，不敢取告

符，乞宝神笔之迹，遂各分所授官名而去”[126]。这一年李渊大概是52岁，书法已经炉火纯青。由此可以推知欧阳询被请为宾客，不是那种清客，而是在书法上对李渊有所指导。

西魏书法上最有造诣的是赵文渊（深）和冀儁，两个人尤其以碑牓而著名。西魏攻陷江陵后，南朝王褒被掳到长安，史称“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文深之书，遂被遐弃”。但是在碑榜方面，王褒却不及赵文渊。说明北朝的书法法度谨严，适合于碑榜，南朝书法正是流利婉转，适合于日常书写。李渊书法“韶媚可爱”，能够“走笔若飞”[127]，正是南朝书法的特征。欧阳询，少年时对于王羲之书法下过工夫，对于南朝书法的特征自然熟悉，所以李渊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老师。

李渊家族对于儒学和书法的重视，反映了对于精致文化的一种热爱和基本的掌握。这种现象在其他的北镇家族也有表现。西魏开国功臣八柱国之首的李弼，对于精致文化基本上没有认识，也谈不上喜爱。到了他的儿子辈，对于武功的重视还是超过了精致文化。李衍，“少专武艺，慷慨有志略”[128]。李弼的孙子也就是李密的父亲李宽也是以“名将”而著称。到了李密这一辈，已经有所不同。李密字法主。法主是佛教名词，指佛。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李密家族是信仰佛教的。李密本人，“师事国子助教包恺，受《史记》、《汉书》，励精忘倦，恺门徒皆出其下”[129]。说明李密对于《史记》、《汉书》的研究和李渊父子对于书法的研究一样达到了南朝一流文人的程度。李密曾经写过一首五言诗：“金风荡初节，玉露凋晚林。此夕穷途士，空轸郁陶心。眺听良多感，慷慨独沾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合，万古传名器。”[130]李密的诗作只有这一首，但是仍然能够看出来作者将境遇与写景融合无间，表现了比较高的技巧。

上面提到，杨坚在子孙的婚事上尽量跟来自北魏洛阳的官僚或者世家大族联姻，反映了精致的文化未尝对杨坚没有冲击。其父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的杨忠，和李弼一样，对于精致文化是陌生的。杨坚，据说也是对于学习素无兴趣。杨坚的儿子辈情况就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杨坚的长子杨勇：“颇好学，解属词赋，性宽仁和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引明克让、姚察、陆开明等为之宾友。”[131]明克让、姚察、陆开明都是来自于南朝的文人，对于南朝的精致文化有较高的造诣。杨勇引为宾友，是其对于精致文化喜好的表现。三子杨俊“仁恕慈爱，崇敬佛道，请为沙门”[132]。杨俊的这种气质完全不似北镇勋贵，气质的嬗变是在精致文化氛围中浸染的结果。杨坚的二子隋炀帝杨广，对于精致文化的那种狂热痴迷，自然不用在这里详述。

由于北周和隋代前期，关中地区相对和平，也由于南朝的文人陆陆续

续来到关中。使得关中地区在这一时期成为多种文化交流碰撞的熔炉。气质粗犷的北镇武人及其后代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也慢慢开始接受那种精致的文化。到隋代后期，北镇武人的三四代传人已经熟练掌握了精致文化的某些方面，从而在气质上已经不同于其祖父、曾祖。

三 文弱化与勋贵的命运

从李渊的仕宦生涯看，没有大起大落，但也不是很受重用。李渊自己也说，“吾生自公宫，长于贵戚，牧州典郡，少年所为，晏乐从容，欢娱事极。饥寒贱役，见而未经，险阻艰难，闻而不冒”[133]。主要是说，物质享受方面从来是不缺乏的。但是要说“险阻艰难，闻而不冒”却并非事实。

史称李渊“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又说“历试中外，素树恩德”[134]。从李渊的结交情况来看，很多人都是李渊在担任各种官职时候认识的，[135]《旧唐书》对李渊的评价应该是客观的。李渊在隋初以千牛备身，开始了仕宦的生涯。在隋文帝时期，担任过谯州、陇州、岐州刺史。大业初年，又任荥阳、楼烦二郡太守、殿内少监、卫尉少卿。隋炀帝征高丽时在怀远镇负责后勤保障。杨玄感叛乱时，驰赴弘化郡并知关右诸军事。大业十一年，往河东讨捕盗贼，十二年升任右骁卫将军，十三年任太原留守，其时李渊已经52岁。从政三十多年，经历过各种行政职务，使得李渊对于行政事务非常熟悉。从他在种种职务上都能有所结交，说明李渊这个人是老练圆熟的。杨玄感叛乱后，隋炀帝畏于谶言，杀李浑满门，并且怀疑及于李渊。在担任河东讨捕大使时，李渊带领军队亲自冲锋，生死悬于一线。这些事情说明李渊在政治军事斗争中接受过考验。

有无行政经验这方面，体现了李密和李渊的差异。在义宁元年，李渊初定关中，就“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进封唐王，总录万机。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为令”[136]，及时控制了政权。李渊刚登基，就下令，“官人百姓，赐爵一级。义师所行之处，给复三年。罢郡置州，改太守为刺史。丁卯，宴百官于太极殿，赐帛有差……壬申，命相国长史裴寂等修律令。”武德二年七月，又恢复了府兵系统，“秋七月壬申，置十二军，以关内诸府分隶焉”[137]。以上事实，明显地看出李渊对于政权建设的重视。李密在大业初，本来已经进入仕宦系统，担任左亲卫大都督。《隋书》说是“非其所好，称疾而归”[138]，《两唐书》认为是隋炀帝的猜忌使李密失去了这一职务。不管怎样，在以后的十年间，李密是在隐居中度过。隐居生活可能使得他学识大增，但是没有行政经验的缺憾，却使得英雄的事业毁于一旦。《隋书》说李密，“多筹算，才兼文武，志气雄远，常以济物为己任”[139]，优长是在筹划方面。李密不同于杨玄感和李

渊，没有多少资源可以利用，所靠只是自己的谋略。李密在大业九年为杨玄感筹划三个方略，用奇计逃出监管，又将瓦岗军发展壮大，当时河南河北各个叛乱势力拥立李密为盟主。这些都说明李密的谋略非同一般，但李密夺取洛口、黎阳二仓之后，其势力基本上就没有超出过河南地域，似乎达到了李密能力的极限。唐人总结李密失败的原因为“虽据仓，无府库，兵数战不获赏，又厚抚初附之兵，于是众心渐怨”[140]。“无府库”，也就是没有财政收入。没有财政收入，表明李密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地方行政体系，来完成对所征服地区的控制。李密的洛口政权虽然是当时势力最大的集团，但是一战失利，迅速瓦解。

缺乏行政经验所造成的悲剧，不仅仅发生在李密一个人身上。杨坚的五个儿子的悲剧无一不与此有关。杨勇“率意任情”，身为太子在元旦接受百官朝贺，犯了臣子的大忌。失宠之后，“忧惧，计无所出”，“以铜铁五兵造诸厌胜。又于后园之内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时于中寝息，布衣草褥，冀以当之”[141]。杨勇的这些行为和杨广紧锣密鼓的篡夺行为比起来，实在是太软弱无力了。但是，这位长于富贵，毫无人生经验的太子，所能做的只有这样。秦王杨俊，“奢侈，违犯制度，出钱求息，民吏苦之”[142]。蜀王杨秀，“奢侈，违犯制度，车马被服，拟于天子”[143]。汉王杨谅“自以所居天下精兵处，以太子谗废，居常怏怏，阴有异图”同上书，第1242页。。杨坚的这三位皇子，不甘居于人臣之位。那么他们的实际才干如何呢？下面以汉王杨谅的谋反事例来说明。

杨谅实力相当雄厚，史称：“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为所属”[144]，这是他的权力所在。汉王的准备也比较充分，“大发工役，缮治器械，贮纳于并州。招佣亡命，左右私人，殆将数万”[145]。杨谅身边的谋臣武将也不弱：谋反之初，王为谋划两个方略：一是 任用关西人，直入关中；二是任用山东人，建立割据政权。总管府兵曹裴文安建议，由他率领精锐直趋蒲津，杨谅帅大军从之，直扑长安。杨谅的实力足以与太子杨广周旋，但是杨谅本人却没有统帅才能。对于王的谋划，“不能专定，乃兼用二策”。当裴文安的军队到达蒲津的时候，“谅忽改图，令纥单贵断河桥，守蒲州，而召文安”。杨素带领隋军节节进逼，杨谅率军截击，“属天大雨，谅欲旋师”。谋臣王认为杨素远来疲敝，应该乘机攻击，不应撤退。杨谅不听。对于谋士的谋划，不管正确与否，杨谅都没有自己的决断，巨大的压力已经摧毁了心智。[146]

隋炀帝杨广是另外一个意气用事的典型。筑长城、建东都、修运河、征高丽，从战略上讲都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当时的社会能否承受这

么巨大的劳动力付出？这个现实的技术问题，却是应该考虑的。从历史事实来看，隋炀帝没有考虑过社会的承受能力。唐代史家评论隋炀帝时说，“恃才矜己”，可以概括隋炀帝的性格，也可以说是生长于富贵之中的军功贵族子弟的通病，当然程度有所不同。当四方叛乱，局势不可控制的时候，这些贵族往往束手无策，转而自欺欺人，“犹谓鼠窃狗盗，不足为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乱”[147]。

李渊和杨玄感的区别也在社会经验方面。据上文，大业九年杨玄感起兵的时候，李渊和宇文化及也预感到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但是，李渊一直到大业十三年才起兵反隋。此年也是隋炀帝被禁卫军刺杀之年。就此可以看出李渊对时局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杨玄感对时局的判断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准确性，叛乱的筹划时间不可谓不长，但是从上文的分析看，杨玄感起兵又不能不说是仓促的。杨玄感所预计的“天下响应”的形势，也并未到来。这说明杨玄感对于时局的判断也有一定的盲区。

杨勇、杨广、杨谅、杨玄感、李密，分别是北周勋贵杨忠、杨素、李弼的子孙，子孙与父祖比，文弱化的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些人过着李渊所说的“晏乐从容，欢娱事极”的生活。人生、社会政治的复杂艰险，他们并没有经历多少，“险阻艰难，闻而不冒”。他们将事情想得过于简单，勇于挑起事端，真正遇见困难时，往往因为没有经验而束手无策。

回顾对隋末唐初政治史的研究，无疑应该重新认识勋贵所扮演的角色。炀帝上台之后所施行的新政一开始就受到大臣的批评，大业时期，朝臣始终郁积着对炀帝新政的不满，并且从大业五年开始部分大臣，如杨玄感就谋划推翻炀帝的统治，其中的参与者，就有炀帝身边的亲信。在整个隋末战乱中，李密、李渊等勋贵就深深介入其中。由此，我们才能了解占据关中的重要性——获得勋贵的支持。然而，战乱中也暴露了勋贵文弱化的缺点，但文弱化毕竟是历史的潮流，是政治稳定时期的潮流。

---

[1] 韩昇：《隋史考证九则》，《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韩昇：《隋文帝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胡如雷：《隋文帝杨坚的篡周阴谋与即位后的沉猜成性》，收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

[2] 《隋书》卷六九，第1602页。

[3] 见韩昇《隋史考证九则》第四考“杨坚任随州刺史的时间”，《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1期。

[4] 当然，这之中还有比较容易识破的。比如《隋书·高祖纪》记载了：在北周明帝即位之年，明帝就派“善相者”赵昭审视杨坚。赵昭“诡对”杨坚并无天命。这件事情，胡如雷已经辨伪：是年杨坚仅17岁，这条记载出于隋代史臣的附会。说见胡如雷撰《隋文帝杨坚的篡周阴谋与即位后的沉猜成性》，中国唐史学会编《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第145页。

[5] 《隋书》卷七八，第1773页。

[6] 《周书》卷六，第93页。

[7] 同上书，第95页。

[8] 同上书，第101页。

[9] 《隋书》卷二，第5页。

[10] 《隋书》卷七八，第1766页。

[11] 胡如雷：《隋文帝杨坚的篡周阴谋与即位后的沉猜成性》，中国

唐史学会编《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第145页。

[12] 《隋书》卷五〇，第1314页。

[13] 同上书，第1320页。

[14] 《隋书》卷三八，第1136页。

[15] 《周书》卷七，第124页，“以上柱国、大前疑、随国公杨坚为扬州总管”。

[16]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其论著《宫崎市定说隋炀帝》中对隋文帝杨坚在北周的处境有一个判断：“正是由于杨坚家世平平，加之年纪较轻，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他都没能得到很好的表现机会。杨坚三十七岁那年，北周武帝征讨北齐，并将其灭掉。这样绝好的机会，杨坚也几乎没能赚取明显的政治资本，发挥应有的作用。当时在前线担任军队总统帅的是武帝的弟弟宇文宪。”宫崎先生最后断定，杨坚篡位唯一的优势是其外戚的身份和北周宗室的外放。引自《宫崎市定说隋炀帝》，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47页。

[17] 《隋书》卷一，第2页。

[18] 同上。

[19] 《隋书·王邵传》记载：“邵在著作，将二十年，专典国史，撰《隋书》八十卷，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辞义繁杂，无足称者，随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将善恶之

迹，湮没无闻。”我很怀疑，唐初修撰的《隋书》基本上是以王邵《隋书》为蓝本的，删改不多。

[20] 《隋书》卷一，第2页。

[21] 《北史》卷一一，第399页。

[22] 《北史》卷四三，第1593页。

[23] 《北史》卷五五，第1983页。

[24] 《北齐书》卷二四，第343页。

[25] 《隋书》卷一，第1页。

[26] 《隋书》卷二，第54页。

[27] 同上书，第5页。

[28] 《隋书》卷四四，第1221页。

[29] 同上书，第1225页。

[30] 《隋书》卷四四，第1221页。

[31] 同上。

[32] 《隋书》卷四〇，第1170页。

[33] 《周书》卷六，第93页。

[34] 同上书，第101页。

[35] 《隋书》卷五〇，第1321页。

[36] 《周书》卷一五，第239页；《隋书》卷五四，第1362页。

[37] 《北史》卷六〇，第2129页。

[38] 《旧唐书》卷五三，第2207页。

[39] 《徒何纶墓志》，见《新出土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265页。

[40] 《崔仲方妻李丽仪墓志》，见《新出土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366页。

[41] 《李椿墓志》，见《新出土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432页。

[42] 《大周故李府君墓志》，见《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371页。

[43] 《唐上柱国邢国公李密墓志铭》，见《唐代墓志汇编续编》，第1页。

[44] 《董敬墓志疏证》，见《新出土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513页。

[45] 同上书，第435页。

[46] 《周书》卷四，第53页。

[47] 《魏书》卷一〇六上，第2497页。

[48] 同上书，校勘记之卷八四，第2518页。

[49] 《周书》卷一五，第239页。

[50] 《魏书》卷八〇，第1784页。

[51] 《徒何纶墓志》，见《新出土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266页。

[52] 《李椿妻刘琬花墓志》，见《新出土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559页。

[53] 《大周故李府君墓志》，见《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372页。笔者按，《汇编续集》作“同平原”，误。墓志图版作“同人原”。图版见《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第2册，图版64。

[54] 《唐上柱国邢国公李密墓志铭》，见《唐代墓志汇编续编》，第2页。

[55] 《崔仲方妻李丽仪墓志》，见《新出土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366页。

[56] 《周书》卷一五，第241页。

[57] 《徒何纶墓志》，见《新出土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266页。

[58] 《李椿妻刘琬花墓志》，见《新出土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559页。

[59] 同上。

[60] 《周书》卷一七，第284页。

[61] 《北齐书》卷四一，第544页。

[62] 《崔仲方妻李丽仪墓志》，见《新出土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366页。

[63] 《隋书》卷五四，第1363页。

[64] 《周书》卷一五，第239页。

[65] 《北史》卷六〇，第2129页。

[66] 《徒何纶墓志》，见《新出土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265页。

[67] 《崔仲方妻李丽仪墓志》，见《新出土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366页。

[68] 《周书》卷一五，第239页。

[69] 《周书》卷一五，第239页。

[70] 同上书，第241、242页。

[71] 《隋书》卷五四，第1362页。

[72] 《李椿墓志》，见《新出土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433页。

[73] 《隋书》卷五四，第1363页。

[74] 《徒何纶墓志》，见《新出土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266页。

[75] 《隋书》卷五四，第1362页。

[76] 《李椿墓志》，见《新出土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433页。

[77] 《隋书》卷六四，第1515页。

[78] 《隋书》卷七〇，第1624页。

[79] 《大周故李府君墓志》，见《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371页。

[80] 《李椿墓志》，见《新出土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434页。

[81] 《旧唐书》卷五三，第2207页。

[82] 《隋书》卷七〇，第1624页。

[83] 同上。

[84] 同上。

[85] “文弱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和平环境下贵族过于优渥的生活。“文弱化”的原因不是本文的主旨，还是另文讨论为好。

[86] 《资治通鉴》卷一八二，第5673页。

[87] 同上书，第5675页。

[88] 《隋书》卷七〇，第1625页。

[89] 同上。

[90] 同上。

[91] 同上。

[92] 《隋书》卷七〇，第1625页。

[93] 同上书，第1616页。

[94] 同上书，第1615页。

[95] 同上。

[96] 《隋书》卷七六，第1739页。

[97] 同上书，第1741页。

[98] 蹊跷的是，虞世南曾经告诫虞绰，“上性猜忌，而君过厚玄感。若与绝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无咎，不然，终当见祸。”见《隋书》卷七六，第1740页。

[99] 《隋书》卷七〇，第1616页。

[100] 《旧唐书》卷一，第7页。

[101] 《隋书》卷五六，第1391页。

[102] 《隋书》卷四一，第1184页。

[103] 《隋书》卷五六，第1392页。

[104] 《隋书》卷六六，第1555页。

[105] 《隋书》卷三，第74页。

[106] 《新唐书》卷一〇〇，第3935页。

[107] 《隋书》卷六五，第1531页。

[108] 《资治通鉴》卷，第5676页。

[109] 同上。

[110] 同上。

[111] 《资治通鉴》卷一八二，第5677页。

[112] 《旧唐书》卷一，第1、2页。

[113] 《北史》卷六一，第2176页。

[114] 《新唐书》卷八三，第3642页。

[115] 《旧唐书》卷一八五上，第4802—4803页。

[116] 《北史》卷二二，第816—828页。

[117] 《新唐书》卷八〇，第3579页。

[118] 《新唐书》卷八三，第3643页。

[119] 《旧唐书》卷五八，第2314页。

[120] 《魏书》卷一九上，第451页。

[121] 《隋书》卷三六，第1111页。

[122] 《北史》卷三二，第1166页。

[123] 《周书》卷二二，第369—375页。

[124]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第4950页。

[125] 同上书，第4947页。

[126]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第22页。

[127] 同上。

[128] 《隋书》卷五四，第1362页。

[129] 《隋书》卷七〇，第1624页。

[130] 同上书，第1626—1627页。

[131] 《隋书》卷四五，第1230页。

[132] 同上书，第1239页。

[133]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第21页。

[134] 《旧唐书》卷一，第1、2页。

[135] 李渊在隋朝的结交：勋贵：宇文士及、权弘寿、李安远、丙粲；关陇人士：京兆韦氏、刘文静、姜謩、刘弘基；山东人士：卢赤松、傅奕、唐俭、武士彟、常达、刘政会；南方人士：夏侯端、欧阳询、张天胤、贺德仁、孔绍安、许绍宗。以上引证的出处见于《旧唐书》和《新唐书》易于复检，为避繁复，故而不一一注明。

[136] 《旧唐书》卷一，第4页。

[137] 同上书，第9页。

[138] 《隋书》卷七〇，第1624页。

[139] 同上。

[140] 同上书，第1632页。

[141] 《隋书》卷四五，第1232页。

[142] 同上。

[143] 同上书，第1239—1240页。

[144] 同上书，第1244页。

[145] 同上书，第1245页。

[146] 同上书，第1224页。

[147] 《隋书》卷四，第96页。

本书总结

如果把北镇起义的原因归结为孝文帝的改制，这是不公允的，但是孝文帝的改制引起了北魏社会深刻的变迁。由于北魏的权力中心南迁，北镇社会逐渐形成了在经济文化上的独立单元。从贺拔胜、宇文洛生在北镇地区享有的普遍声誉可以发现这一事实。北镇与洛阳的不同在于北镇仍然继承了北魏前期的军事特征。北镇又是一个移民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几乎打破了血缘的纽带，建立在婚姻、友情以及乡里关系之上，这与中原社会的宗族社会和大族支配基层社会的情况是不同的。北镇的军事人才在北魏末年的乱世之中显示了极大的优势，同时其领袖人物渐渐以乡里等关系结成军事集团，成为当时最有潜力的军事势力。于是北镇集团就成为黏合各种势力，扶植新政权，建立霸府，进而建立政权的主体。当然北镇的文化整体上相当落后，军人几乎没有受到系统的教育，他们的政治意识相当薄弱。侯渊、侯景、贺拔胜的人生挫折，尔朱集团的灭亡以及高欢在应对孝武政权上的失误，充分显示了北镇人物在政治经验上的缺乏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在东西政权建立之后，尤其在东魏北齐，北镇将领成为“勋贵”阶层。北镇集团的长期存在是高欢努力经营的结果，旨在保持着武力上的优势。同时，北镇集团又成为东魏北齐的政治包袱，蜕化为政治上的保守集团，而其自身也成为皇权的防范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之间的关系渐趋冷漠。在此背景下，东魏北齐在政治上日渐处于多重分立的局面，并且衍生出吏干政治、恩倖政治等皇权政治的变态，抵消了文官朝廷在制度文化上所取得的相比于北周的优势。另外一方面，

晋阳的北镇集团的长期存在，使得北齐的战略布局就不得不迁就北方，于是就形成了长期冷落河南的局面，尤其是淮南的战略，给南朝以可乘之机。南朝与北周的夹击就直接导致了北齐灭亡。拙著并无将北镇集团的长期存在归结为北齐的灭亡唯一因素。北齐的政治文化，及其北齐迅速衰亡的探讨才刚刚开始。

西魏是建立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关陇地区，入关的北镇军人也不多，与东魏相比处于劣势。正因为这样，西魏才融合胡汉势力形成文武合一为特征的关陇集团。关陇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接受变革的统治集团。在本书中可以看出西魏北周社会善于吸收山东南朝文化，乐于改变自己子弟的文化面貌，这样北镇将领的缺陷就被克服，演化成富有活力的文武合一型官僚。西魏北周同样根据北镇的军事经验结合关陇社会的特点改变军队的兵种构成、战术布置，形成不同于北镇但同样强大的军队。北齐灭亡后，晋阳的北镇军人被北周迁往关中，从此不知所终。这说明北周、隋、唐初的文官朝廷可以不依靠北镇军人而保持军事优势。北镇起义到北周灭齐，再到隋亡唐兴的历史，可以说是北镇军人克服自身缺陷建立政权的过程，也是其各种地域文化和政治集团融合在关陇政权中的历史。

对比北齐与北周的政治文化，虽然都是六镇势力所建立的国家，区别仍是明显的。北齐的政治文化深受两大因素影响：北镇集团和北魏旧势力。如这两大势力能取长补短，相互融合，那么一定能创造出非常有潜力的政治文化，但是就本书的论述来看，由于种种因素的阻碍，东魏北齐甚至都未能处理好北镇集团长期存在的不利因素，使得分裂因素始终存在并且不断分化，北齐的政治终于因为分裂因素较多而未能走上轨道。本书虽然并未深入挖掘北魏旧势力对北齐政治文化的影响，不难体会，东魏北齐也未能克服北魏旧势力的消极影响。西魏北周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国，却能意外地不受北镇势力和北魏旧势力的影响，从而在政治文化上有所突破，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关中本位政策”。

隋代的政治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阶段，隋文帝统治时期，实际上是北周政治的继续，隋炀帝上台后，执行了比较激进的“南朝化”政策。隋炀帝执行“南朝化”政策，并非隋炀帝本人的一意孤行，隋炀帝那一代及其下一代的勋贵子弟，有明显的文弱化的趋势。“南朝化”是勋贵阶层文弱化的后果。隋朝的速亡可以理解为对激进“南朝化”以及统治阶层文弱化的一种纠正？

附录一 西魏北周的财政与政治

西魏北周所据有的疆域除关中、河西、川西等几块小平原外大多为山地，经济远不如东魏北齐、梁陈发达。这直接限制了西魏北周的财政收入。这些山地中的居民为蛮僚氐羌等部族，他们的叛服不定更影响了赋役的征发。因而，西魏北周的财政一直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之下。在沙苑之战前东魏谋士薛俶曾对西魏的财政有一个评价，他说：

西贼连年饥馑，无可食啗，故冒死来入陕州，欲取仓粟。今高司徒已围陕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诸道，勿与野战，比及来年麦秋，人民尽应饿死，宝炬黑獭，自悉归降。愿王无渡河也。

据薛俶的推断，只要东魏截断山东运往关中的粮道，就会使得发生粮荒的西魏不战而降。那么薛俶的推断是不是符合实际呢？据《周书·王罴传》记载："时关中大饥，征税民间谷食，以供军费。或隐匿者，令递相告，多被箠捶，以是人有逃散。"[1] 这段话反映了西魏严重的财政危机。

虽然上文所反映的西魏早年的财政危机是由于自然灾害，不可据以说明西魏财政的正常水平。但史料显示，在整个西魏北周史上，军队缺少物资的情况是史不绝书。《周书·赵肃传》："大统三年，独孤信东讨，肃率宗人为向导。授司州治中，转别驾。监督粮储，军用不匮。太祖闻之，谓人曰：'赵肃可谓洛阳主人也。'"[2] 从宇文泰的话中透露出的信息是，供给独孤信大军的粮储，是由赵肃征自洛阳周围地区。这说明以西魏此时的财政储备不足以供给大军出征的消耗。《周书·赵刚传》云："大行台元海遣刚还郡征粮。时景众已入颍川，刚于西界招复阳翟二万户，转输送洛。明年洛阳不守。"按，西魏大行台元季海镇洛阳为大统三年之事，时赵刚任西魏"行颍川郡守事"，所以"还郡征粮"之郡当指颍川郡。据引文，赵刚出发后侯景已攻占颍川，所以赵刚的征粮任务是在阳翟完成的。[3] 可见，驻守于洛阳的西魏军队的军粮不是由关中供给。这又说明了西魏初年的财政是相当艰窘的。

《周书·杨传》："太祖以有谋略，堪委边任，乃表行建州事。时建州远在敌境二百余里，然危恩夙著，所经之处，多并赢粮附之。比至建州，众已一万。东魏刺史车折于洛出兵逆战，击败之。又破其行台斛律俱步骑二万于州西，大获甲仗及军资，以给义士……又分土人义首，令领所部四出抄掠，擬供军费。"[4] 杨为西魏派出在河东、河内等地建立根据地的汉人豪强。杨的部下由他本人招募而不是由政府配给，而且军用物资也主要依赖于缴获和抄掠，而不是由西魏政府供给。

《周书·达奚寔传》："大军伐蜀，以寔行南岐州事，兼督军粮。先

是，山氐生犷，不供赋役。历世羁縻，莫能制御。寔道之以政，氐人咸悦，并从赋税。于是大军粮饩，咸取给焉。”[5] 伐蜀之役是西魏北周史上的一次关键性战役。但是西魏军队的物资供给却不是预先筹备，而是临时从南岐州的氐族居民手中征发。同样的事例还记载在《周书·赵刚传》，当时宇文贵西征，朝廷任命赵刚为行渭州事，“资给粮饩”。而这一种做法在北周晚期依然存在。《周书》卷一九《杨忠传》：

是岁，大军又东伐，晋公护出洛阳，令忠出沃野以应接突厥。时军粮既少，诸将忧之，而计无所出。忠曰：“当权以济事耳。”乃招诱稽胡诸首领，咸令在坐。使王杰盛军容，鸣鼓而至。忠怪而问之。杰曰：“大冢宰已平洛阳，天子闻银夏间生胡扰动，故使杰就公讨之。”又令突厥使者驰至而告曰：“可汗更入并州，留兵马十余万在长城下，故遣问公，若有稽胡不服，欲来共公破之。”坐者皆惧，忠慰喻而遣之。于是诸胡相率归命，馈输填积。

杨忠伐齐是在保定四年，距西魏建立已经有29年，可是在大军出讨之际，仍然要大将亲自解决军粮的供给。这说明此时北周的财政储备依然是不足的。

当然，西魏北周对于军粮并不是完全不予供给，而是不能充足供给。《周书·王悦传》：“（大统）十四年，授雍州大中正，帅都督，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都督。率所部兵从大将军杨忠随郡、安陆并平之。时悬兵深入，悦支度路程，勒其部伍，节减粮食。及至竟陵，诸军多有匮乏，悦出稟米六百石分给之。”[6] 杨忠征随郡这一次，军粮倒是供给的，但不够。又据《周书·陆腾传》，在天和初年，陆腾平定信州蛮的反叛。战争从夏天开始，进行到秋季时军队就发生了“师老粮尽”的困难。这个困境不是由政府派兵接济而解决，而是“士皆争奋，复攻鱼令城，大获粮储，以充军实”[7] 。

与西魏北周不同的是东魏北齐的后勤补给是相当及时而充裕的。《陈书·高祖纪上》记载了梁绍泰二年四月，北齐与梁之间的一次大战。此战由陈霸先指挥，“高祖（陈霸先)潜撤精卒三千配沈泰，渡江袭齐行台赵彦深于瓜步，获舟舰百余艘，陈粟万斛……高祖遣钱明领水军出江乘，要击齐人粮运，尽获其船米，齐军于是大馁，杀马驴而食之”[8] 。此战虽以齐军大败而告终，但不难看出齐军后勤补给的充裕。《周书·陈忻传》载，“时东魏每岁遣兵运米馈宜阳”[9] 。史书的记载中还没有发现哪一位齐军将领像杨忠一样为军粮而发愁。这表明东魏北齐的财政储备远好于西魏北周。

对于处于割据状态下的各个地方政权来说，军队无疑是最重要的支

柱，而对于一支军队来说后勤补给的及时充足与否决定了其战斗力的有无，所以通过观察其军队的后勤补给，就可以反映政权的财政状况。西魏北周的后勤补给说明了这个政权的财政是相当困难的。但是贫困并没有拖垮西魏北周政权，反而是北周统一了北方，而不是富足的北齐。其原因何在呢？如果从西魏北周的财政切入，就会发现这个政权由于财政的拮据，反而在吏治方面有所创新。《周书·令狐整传》："初，梁兴州刺史席固以州来附，太祖以为丰州刺史。固莅职既久，犹习梁法，凡所施为，多亏治典。朝议密欲代之，而难其选。遂令整权镇丰州，委以代固之略。整广布威恩，倾身抚接，数月之间，化洽州府。于是除整丰州刺史，以固为湖州。"宇文泰之所以要将席固调离丰州，其表面原因是席固，"犹习梁法，凡所施为，多亏治典"。但是从其先密令令狐整离间席固的部曲来看，恐怕不是这么简单。据席固本传，其人为襄阳著姓，在侯景之乱中梁境大乱，"遂有亲兵千余人"。成为襄阳的豪强。在兴州刺史任上，其部曲增加到五千多人。史称其时，"固遂欲自据一州，以观时变"。投靠西魏之后依然为当地豪强，对于西魏的权威也并不在乎，从其，"莅职既久，犹习梁法"，可见一斑。这当然引起西魏的不快。于是派令狐整"镇"丰州。这就是武力监视。在令狐整一番离间之后席固的部曲多已与之离心，史称，"其部曲多欲愿留为整左右"。实际上席固是被迫离开的。后，"固以未经朝谒，遂蒙荣授，心不自安，启求入觐"。可见席固也清楚自己身处险境，故自动表示顺服。[10] 虽然席固的离任不是因为"犹习梁法"，但这句话却表明在地方行政上南朝与西魏北周是不相同的。那么，梁法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周书·申徽传》记载："出为襄州刺史。时南方初附，旧俗，官人皆通饷馈。徽性廉慎，乃画杨震像于寝堂以自戒。"[11] 这说明梁朝地方官收取百姓钱物是合法的。但是申徽的行为说明在西魏北周这一种做法却不被允许。这暗示出，西魏北周的地方官的权限是不如南朝的。那么西魏北周的地方官所应遵守的法律是什么呢？其基本的原则是苏绰所制定的六条及记账户籍程式。《周书》卷二三《苏绰传》：

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

太祖方欲革易时政，务弘强国富民之道，故绰得尽其智能，赞成其事。减官员，置二长，奏施行之……

太祖甚重之，常置诸左右。又令百司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

可见文案程式、计账户籍、六条是西魏北周的牧守令长必须学习和遵守的。自然地方官也得熟悉法律。《周书·周文帝纪下》："（大统十年）秋七月，魏帝以太祖前后所上二十四条及十二条新制，方为中兴

永式，乃命尚书苏绰更损益之，总为五卷，班于天下。于是搜简贤才，以为牧守令长，皆依新制而遣焉。数年之间，百姓便之。”[12] 按，引文中的五卷新制，可能就是《大周律》的渊源之一，其具体的条文，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也就无法与梁法比较。但是“搜简贤才，以为牧守令长”却是颇有创新精神。据《北齐书·元文遥传》记载：“齐因魏朝，宰县多用厮滥，至于士流耻居百里。文遥以县令字人之切，遂请革选。于是密令搜扬贵游子孙，发敕用之。犹恐其披诉，总召集神武门，令赵郡王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为县，自此始也。”[13] 这说明重视吏治人才是北朝后期的新现象。这一种现象是北魏南朝所不具有的。在重视的力度上西魏北周是大于东魏北齐的。苏绰在“六条”之中对于地方行政是再三致意。“先治心”条就是直接针对“今之方伯守令”。“尽地利”条，又以为“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长而已”。“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都是针对牧守令长的。

西魏对吏治重视，还专门颁布法令来说明这立场。《周书》卷二《周文帝纪下》：

（大统）十一年春三月，令曰：

……位不虚加，禄不妄赐。为人君者，诚能以此道授官，为人臣者，诚能以此情受位，则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矣。昔尧舜之为君，稷契之为臣，用此道也。及后世衰微，此道遂废，乃以官职为私恩，爵禄为荣惠。人君之命官也，亲则授之，爱则任之。人臣之受任也，可以尊身而润屋者，则迂道而求之；损身而利物者，则巧言而辞之。于是至公之道没，而奸诈之萌生。天下不治，正为此矣。

今圣主中兴，思去浇伪。诸在朝之士，当念职事之艰难，负阙之招累，夙夜兢兢，如临深履薄。才堪者，则审己而当之，不堪者，则收短而避之。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虚受，则淳素之风，庶几可返。

这是一条带有浓厚的专制集权意味的令文。官僚基本上失去了选择的权利，被要求无条件地服从于职责的要求。可以说，这个程度是北齐所没有达到的。

西魏北周如此重视吏治，尤其是地方行政，其目的何在?从以上引证不难推测，其目的在于解决财政困难，即六条诏书中的“尽地利，均赋役”。《隋书·苏威传》记载：“初威父绰在魏，以国用不足，为征税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14] 正因为西魏财政困难，苏绰的税法才定重额。而要将此税法推行，其难度可想而知。这就对地方行政人员的才能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针对民户，要严格户籍制度防止逃避赋役。针对

官僚要严格公文程式，采用计账方式，以防止各级官吏上下其手。这样一来，虽然赋役较重，但是平均公正，实际上老百姓还是能接受。然而，地方官吏的施政就显得严格，工作量也加大了。这与东魏北齐、梁陈的地方行政模式显得不同了。《北史》卷六三《苏威传》：

寻令持节巡抚江南，得以便宜从事，过会稽，逾五岭而还。江表自晋以来，刑法疏缓，代族贵贱，不相陵越。平陈之后，牧人者尽改变之，无长幼悉使诵五教。威加以烦鄙之词，百姓嗟怨。使还，奏言江表依内州责户籍。上以江表初平，召户部尚书张婴，责以政急。时江南州县又讹言欲徙入关，远近惊骇。

南朝与周隋的不同之处在于南朝的地方行政是疏缓之政，人身控制比较松。周隋的地方行政比较严格，人身控制比较严格。这一种区别是门阀社会与官僚社会的区别，是南北经济模式的区别在政治上的表现。由于二者的区别过于巨大，所以将周隋之政施于江南就引发了暴动。

北周的地方行政也不同于北齐。《隋书》卷五五《乞伏慧传》：

高祖受禅，拜曹州刺史。曹土旧俗，民多奸隐，户口簿籍多不以实。慧下车按察，得户数万……转齐州刺史，得隐户数千。

《隋书》卷五六《令狐熙传》：

拜沧州刺史。时山东承齐之弊，户口簿籍类不以实。熙晓谕之，令自归首，至者一万户。在职数年，风教大洽，称为良两千石。

曹州、齐州、沧州本是北齐的属地，由此可知，北齐政府对于户口账籍的管制是与北周不同的，比较松弛。当出身于北周的官吏上任后，就按照北周的习惯严格户籍之法。隋在北齐旧地施行急政，并没有引发暴乱。其原因在于北齐与北周都源于北魏，均田制、三长制、户籍计账之制都是传自北魏，其区别仅在于施政的力度。其次，北齐的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北周，但都是商品经济不发达。以上两点上北周与北齐接近而与陈差距较大。所以发生在江南的暴动不会发生在山东。对于北齐混乱的行政而言，北周的制度反而公平，容易为百姓所认可，收到“风化大洽”的效果。

西魏北周的地方行政服务于赋税征收的目的，地方官吏自然清楚。所以，记录于史书中的政绩，除军功外，善于开发税源是重要的一笔。《周书·郭彦传》：“孝闵帝践祚，出为沣州刺史。蛮左生梗，未遵朝宪。至于赋税，违命者多。聚散无恒，不营农业。彦劝以耕稼，禁共

游猎，民皆务本，家有余粮。亡命之徒，咸从赋役。先是以沣州粮储乏少，每令荆州递送。自彦莅职，仓廪充实，无复转输之劳。”郭彦在沣州的作为完全符合苏绰“尽地利”的要求，而且达到了“亡命之徒，咸从赋役”的效果。[15]《周书·赵刚传》记载他在担任利州刺史、利沙方渠四州诸军事时，使得“方州生獠，自此始从赋役”的政绩。[16]《周书·元定传》记载他担任岷州刺史时，“威恩兼济，甚得羌豪之情。先时生羌据险不宾者，至是并出山谷，从征赋焉”[17]。由于财政的拮据，西魏北周极力提倡节俭之政。苏绰在“六条”的第一、第二条都提到了节俭的重要。在“先治心”中，他认为，为人君者要“躬行廉平，躬行俭约”。在“敦教化”条，提出“夫化者，贵能扇之以淳风，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中迁于善，雅伪之心，嗜欲之性，潜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者，此之谓化也。”

《周书》在评价宇文泰时写道，“性好朴素，不尚虚饰，恒以反风俗，复古始为心”[18]。看来他是躬行了朴素节俭的生活方式，用行动来支持苏绰的理论。周明帝对简朴之风的提倡与力行，史书记载更为详细。《周书·明帝纪》中记载了明帝临终前的诏书。他对于群臣的告诫中，念念不忘的是节俭。诏书云：“朕禀生俭素，非能力行菲薄，每寝大布之被，服大帛之衣，凡是器用，皆无雕刻。身终之日，岂容违弃此好。丧事所须，务从俭约，敛以时服，勿使有金玉之饰。若以礼不可缺，皆令用瓦。小敛讫，七日哭。文武百官各权辟衰麻，且以素服从事。葬日，择不毛之地，因地势为坟，勿封勿树。且厚葬伤生，圣人所诫，朕既服膺圣人之教，安敢违之。凡百官司，勿异朕此意。”[19] 从书面看来，周明帝之提出俭葬，是服膺儒家教育的结果，与财政毫无关系。但是，濒死的皇帝用三分之一的诏书来说节俭，难道仅仅是为了信仰吗?在武成元年五月的诏书中，记录了周明帝对财政的特殊关注。诏书云：“比屡有纠发官司赦前事。此虽意在疾恶，但先王制肆眚之道，令天下自新。若又推问，自新何由哉。如此之徒，有司勿为推究。惟库厩仓廪与海内所共，汉帝有云，‘朕为天下守财耳’。若有侵盗公家财畜钱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远，一不须问，自周有天下以来，虽经赦宥，而事迹可知者，有司宜推穷。得实之日，但免其罪，征备如法。”[20] 这条诏书虽然是针对赦宥的，但是对于侵盗国家财物的犯罪嫌疑却另行从严追查。最妙的是，对于核实的已经赦宥的经济罪犯的罪行不予追究，但侵盗的财物却必须追回。由此诏令，不难看出周明帝对财政是非常关注的。所以，其提倡节俭与国家财政有密切关系。

周武帝在临终诏书中也提出丧事从俭。他说对于节俭，“非直以训子孙，亦乃本心所好”。这是否说明他的节俭与财政无关呢？其实，西魏北周的所有当权者中，他把节俭与财政之间的关系表达得最清楚。

他说："今巨寇未平，军戎费广，百姓空虚，与谁为足。凡是供朕衣服饮食，四时所须，爰及宫内调度，朕今手自减削。纵不得顿行古人之道，岂曰全无庶几。凡尔百司，安得不思省物，勖朕不逮者哉"[21]。这则诏书，清楚地要求百官向皇帝学习节俭，学习的目的就是节省物资以满足军费的需求。由此，就可明了西魏北周统治者们躬行节俭，并不是他们的爱好，而是为了迫使百官效法，节约财政支出，最大程度地满足军费支出。

在皇帝"躬行俭约"的倡导下，朝臣也颇能体会其苦心，注意效法，注意提倡。《周书》卷一九《达奚武传》：

武贱时，奢侈好华饰。及居重位，不持威仪，行常单马，左右止一两人而已。外门不施戟，恒昼掩一扉。或谓武曰："公位冠群后，功名盖世，出入仪卫，须称具瞻，何轻率若是？"武曰："子之言，非吾心也。吾在布衣，岂望富贵，不可顿忘畴昔。且天下未平，国恩未报，安可过事威容乎。"

《周书》卷三○《窦炽传》：

世宗以炽前朝忠勋，望实兼重，欲独为造第。炽以天下未定，干戈未偃，不宜辄发徒役，世宗不许。寻而帝崩，事方得寝。

达奚武的本性是喜好奢侈生活的，而他之所以不持威仪，是因为北周还处于与北齐南陈对峙的局面，在政治军事上还很艰难。窦炽也认为北周的国力应该用于针对北齐的战争准备，而不应用于住宅的兴建。二人的言行与执政者如出一辙，可见执行俭约之政，是西魏北周的国策之一。这种风气显然与北齐、梁、陈的奢华之政大相径庭。

---

[1] 《周书》卷一八，第292页。

[2] 《周书》卷三七，第663页。

[3] 《周书》卷三三，第573页。

[4] 《周书》卷三四，第591、592页。

[5] 《周书》卷二九，第503页。

[6] 《周书》卷三三，第579页。

[7] 《周书》卷二八，第472页。

[8] 《陈书》卷一，第10、11页。

[9] 《周书》卷四三，第778页。

[10] 《周书》卷三六，第643、644页。

[11] 《周书》卷三二，第557页。

[12] 《周书》卷二，第28页。

[13] 《北齐书》卷三八，第504页。

[14] 《隋书》卷四一，第1185页。

[15] 《周书》卷二九，第667页。

[16] 《周书》卷三三，第574页。

[17] 《周书》卷三四，第589页。

[18] 《周书》卷二，第37页。

[19] 《周书》卷四，第60页。

[20] 《周书》卷四，第57页。

[21] 《周书》卷六，第107页。

附录二 试论骑兵战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骑兵战术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最引人瞩目的军事变革是重装骑兵出现。重装骑兵，一直是比较冷清的课题。邓广铭对于金国“铁浮屠”的辨认，可能是史学界第一次正视中国古代的重装骑兵问题。[1] 从1978年开始，杨泓利用考古材料，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说明中古时期的甲骑具装的形制，并且指出在西晋到唐初，甲骑具装是军事力量的核心部分。杨泓的研究，丰富了学界对于我国重装骑兵的认识。杨泓的论点也成为撰述中古军事史经常引用的经典论述。[2] 1996年王援朝对于杨泓的部分观点提出商榷。王文认为，甲骑具装衰落的原因，并非杨泓等所认为的是世族门阀衰落所引起的。[3] 无独有偶，2007年，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生凌文超的毕业论文《略论六世纪前中原骑兵的渊源及其演进》，也对甲骑具装和世族门阀的关系提出商榷。这篇论文认为，中国中古时期并不存在门阀士族

和骑兵等军事力量的结合。凌文超还认为，“甲骑具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兵种，但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兵种”。这个观点显然是针对于杨泓的“甲骑具装成为军队主力兵种的新的历史阶段”的观点。凌文超甚至认为杨泓所提出的甲骑具装于“鲜卑族有着紧密的联系”的观点也不对。自然并不是每个商榷者的意见都代表着更正确，凌文超的有些意见还有继续推敲的必要。

王援朝以及凌文超对于甲骑具装的兴起和衰亡提出新说。王援朝从甲骑具装机动性差和杀伤兵器的发展来谈甲骑具装的衰落是有道理的。凌文超认为，甲骑具装的兴起要从马匹价格的高昂和作战区域由平原转移到山川地带来考虑。凌文的论证尚有纰漏，却很有启发性。

魏晋南北朝也是轻骑战术发展重要阶段。汪篯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指出对于轻骑战术的成功运用是李唐战败群雄，获得胜利的关键因素。[4] 这一观点，已经成为研究隋末唐初历史的经典论断。不过，汪篯认为李唐轻骑战术源于突厥的观点，似乎没有将轻骑兵在十六国北朝的演进考虑进去。

以上学术史的回顾，不难体会到中古骑兵史研究的两种倾向：一是以考古类型学的方法来研究甲骑具装的形制，及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形制的演变。考古学者所提供的知识，可以弥补历史学观察的盲点。不过考古学者对于甲骑具装在战争中的实际运用并没有仔细推敲，也缺乏将研究对象融入历史背景的全局意识。[5] 倾向之二，就是历史学者似乎更愿意进行理论的探讨。汪篯的论著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仔细分析史料的学风并没有引起重视。

基于以上认识，这篇文章，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战例入手，来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骑兵战术的特点和影响。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单骑战术的发展

从战国到东汉末年，骑兵的单人作战技能很少被记载在史书中。是史学家无意的遗漏，还是单骑战术并没有独立发展？根据杨泓的研究，从战国到东汉末，马具还比较简单，骑兵的鞍还是一张垫子，马镫也没有出现。这样的话，骑乘者容易疲惫，也不容易掌握平衡。这种技术条件下，骑兵主要是以群体发挥其战术功能，单打独斗“大战三百回合”或者“万马军中取上将头颅”的个人战术，基本上还不可能出现。《史记》、《汉书》里面提到单骑战术主要还是骑射。《项羽本纪》：“汉有善骑射曰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羽大

怒，自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羽瞋目叱之。楼烦目不能视，手不能发，走还入壁，不敢复出。”[6] 这段文字主要是为了彰显项羽的神武，但是项羽并没有击杀楼烦骑士。从战术角度来看似乎楼烦的骑射更有效率，更有其时代的典型性。垓下之战中，项羽突围，也有数次击杀汉骑将的记载。说明骑兵与骑兵、骑兵与步兵之间，也会发生短兵相接的情况。不过除过骑射之外的个人技能，并没有凸显出来。

随着高马鞍和马镫的装备，单骑战术在东汉末年开始出现于史书，像关羽击杀颜良、文丑。不过，关羽的战术动作并非“斩”而是“刺”，所使用的兵器是矛。这也是汉末三国时期，著名将领的标准配置。东汉建安三年（198），孙策讨伐祖郎，被围。大将程普“与一骑共蔽扞策，驱马疾呼，以矛突贼，贼披，策因随出”[7] 。曹魏末年（255），司马氏专政，大将文钦投降吴国。吴与曹魏大战于高亭，吴国大将丁奉“跨马持矛，突入阵中，斩首数百，获其军器”[8] 。不过戟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东汉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大将与孙权争夺合肥，这一次战斗中，张辽表现了突出的个人作战技能，“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9] 。汉末三国的单骑战术，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使用戟、矛就不能使用弓箭；其次，使用戟、矛主要是叉或者刺，劈砍的战术动作并没有出现。单骑战术的成熟，是在十六国时期。具体的特征就是，“马上持三仗”的出现。“三仗”是三种武器，到底是哪三种？恐怕在不同历史阶段，是不同的。具体说来，就是双手各执一种近距离格斗兵器，并且能在远距离上进行弓弩攻击。《晋书·刘曜载记》提到陇西陈安“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近交则刀矛俱发，辄害五六；远则双带鞬服，左右驰射而走”[10] 。《晋书·石季龙载记下》同样提到冉闵“所乘赤马朱龙，日行千里，左杖双刃矛，右执鉤戟，顺风击之，斩鲜卑三百余级”[11] 。一直到西魏大统九年（544），西魏将领王豪仍然采用这种双手各执一种兵器的战法“右手拔刀，左手把槊，直刺直斫”[12] 。这种“执三仗”的战斗技能，显然与骑手能够稳定地骑乘在马背上有密切关系，也只能在马镫和高马鞍被成熟运用后的十六国才开始出现。刀、双刃矛以及槊的出现，使得武器在刺的同时也可以实施“斫”，这种劈砍的动作，作战的效率大大提高了。

单骑战术的成熟，使得个人在决定战争胜负方面能够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370年，前秦军队与前燕决战于潞川。当时，前秦军队是六万，前燕是四十万，相差比较悬殊，即就是前秦的统帅王猛也“望评师之众也，恶之”，进而求助于邓羌，“今日之事，非将军莫可以捷。成败之机，在斯一举。将军其勉之！”王猛还不得不答应胜利后推荐邓羌为司隶校尉的要挟。于是，邓羌“与张蚝、徐成等跨马运矛，出入数四，旁若无人，搴旗斩将，杀伤甚众。及日中，评众大败”[13] 。

这就说明，在当时人看来，战争的胜负，不仅仅取决于形势、士气、民心的向背，还取决于将领的战斗能力。

当然也不能认为，邓羌等几人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负。邓羌等人的作用主要是“陷阵”，也就是打开敌军阵营的缺口，让己方军队从缺口进入敌阵，将敌人分割，从而导致敌军大败。《宋书·薛安都传》记载元嘉北伐中，“（柳）元怙与幢主宗越，帅手下猛骑，以冲贼阵，一军皆驰之。安都、方平等督诸军一时齐奋，士卒无不用命，安都不堪其愤，横矛直前，出入贼阵，杀伤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复入。军副谭金率骑从而奔之。自诘旦而战，至于日昃，虏众大溃” [14] 。这段史料的关键是“军副谭金率骑从而奔之”这句。这就充分说明了薛安都“横矛直前，出入贼阵”的主要作用是打开敌阵的缺口，让其他士兵从缺口深入敌阵，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在西方军事史上，骑兵有一种“楔形”的战斗队形，或者也叫“野猪头”的战斗队形。队形的最前端是骑兵，其主要作用是“突破、扰乱和分散”敌人的军阵，让后面的重装步兵得以突入敌阵。处于前锋的骑兵中，像薛安都这样的战斗技能优秀的骑士，就处于最前列。所以，骑兵要突破敌阵，个人的战斗技能至为关键。十六国时期，开始成熟的能够身执三仗的将领就恰恰起到这样的作用，为新战术的创造，打下了基础。

成书于西汉之前的《六韬》在其《犬韬·均兵篇》论述了车兵、骑兵、步兵的作战能力对比问题，详引如下：

武王问太公曰：以车与步卒战，一车能当几步卒？几步卒当一车？以骑与步卒战，一骑当即步卒？几步卒当一骑？以车与骑战，一车当几骑？几骑当一车？

太公曰：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也。骑者军之伺侯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故车骑不敌战，则一骑不能当步卒一人。三军之众成阵而相当，则易战之法，一车当步卒四十人，四十人当一车；一骑当步卒四人，四人当一骑；一车当六骑，六骑当一车。夫车骑者，军之武兵也，十乘败千人，百乘败万人；十骑败百人，百骑走千人，此其大数也。 [15]

《六韬》这部兵书，虽然不是对中古时期战争规律的总结，但是它提出了一个其他兵书并未涉及的问题：即骑兵的作战效率相当于多少步兵？在车战时代，车兵的作战效率是骑兵的十倍。不过，从东汉晚期开始，车兵就基本上不见于战争史了。车兵的消失，大体上和高马鞍、马镫装备于骑兵同时。这就说明，装备了马镫和高马鞍的骑兵，其作战效率要高于车兵，不然就没有办法解释车兵的消失。也就是说，从东汉末年开始，骑兵的作战效率恐怕要达到一个骑兵相当于八

十个步卒的水平。骑兵形成了对步兵的绝对优势。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重装骑兵的战术

骑士身披铠甲，马披铠甲的重装骑兵的出现，只能是在高马鞍和马镫被用于马具之后。重装骑兵相对于轻骑兵和步卒有两个优点：一是防护好；二是自身重量远远大于轻骑兵和步兵，所以一旦冲锋起来，其突防能力显然是要优于轻骑和步兵。所以，重装骑兵出现之后，骑兵的新战术也就应运而生。

（一）正面迎击

刘裕北伐南燕，南燕慕容超提出的应对战术是："今据五州之强，带山河之固，战车万乘，铁马万群，纵令过岘，至于平地，徐以精骑践之，此成擒也。"[16] 这就说明了，铁骑对东晋的步卒具有绝对优势，应该实施正面的攻击。在北魏阻击后秦的柴壁之战中，拓跋珪"诏毗陵王顺以精骑冲击，获兴甲骑数百，斩首千余级"。北魏太武帝时期，秦州大族杨难当反叛，围攻上邽城，镇将元意头"简千余骑"，"直冲难当军，众皆披靡"[17] 。北魏末年，柔然反叛，入侵凉州，北魏将军费穆"简练精骑，伏于山谷，使羸步之众为外营以诱之。贼骑觇见，谓为信弱，俄而竞至。穆伏兵奔击，大破之，斩其帅郁厥乌尔、俟斤十代等"[18] 。《隋书》记载，北周末年，宇文亮叛乱，"以轻兵袭孝宽。孝宽窘迫，未得整阵，为亮所薄。景山率铁骑三百出击，破之，斩亮传首"[19] 。用重装骑兵作为前锋或者突击力量是魏晋南北朝经常使用的战术。

正是由于重装骑兵防护好突击能力强的特点，所以被经常用来做前锋和后殿，以及将领的贴身卫队。北魏孝文帝时期的将领宇文福"领精骑一千，专殿驾后"。在北魏太和二十二年，攻打邓城的战役中，宇文福"与右卫将军杨播为前军"。南朝军队十万来救邓城，孝文帝"敕福领高车羽林五百骑出贼南面，夺其桥道，遏绝归路。贼众大恐，六道来攻。福据鞍誓众，身先士卒，贼不得前，遂大奔溃"[20] 。

以重装骑兵为卫兵的最佳例证见于《晋书·刘曜载记》："召公卿以下子弟有勇干者为亲御郎，被甲乘铠马，动止自随，以充折冲之任。"这支重装骑兵卫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当时前凉张骏与前赵将领刘胤相持于秦州达七十天，最后"冠军呼延那鸡率亲御郎二千骑，绝其运路"，才使得前凉军队大溃而逃。[21] 北魏太和年间，梁州刺史元英与南朝相持于汉中，氐族豪强婆罗阿卜珍袭击元英"众散，

射中英颊。伪陵江将军悦杨生领铁骑死战救之，得免”[22]。

（二）突袭并且分割敌军

上文所引的“冲击”就说明了重装骑兵的突防能力强，有利于突破敌阵。北魏攻打后燕的一次战役中，后燕“出步卒六千余人”，攻击拓跋氏的屯田，拓跋珪“诏将军长孙肥等轻骑挑之，帝以虎队五千横截其后，斩首五千，生虏七百人，宥而遣之”[23]。所谓“虎队”恐怕就是虎纹具装的重装骑兵。“横截”就是将敌军一分为二，使其失去照应而败。北魏孝文帝时期，北魏将领韦珍和刘宋将领荀元宾有一次战役，“珍乃分遣铁马，于上流潜渡，亲率步士与贼对接。旗鼓始交，甲骑奄至，腹背奋击，破之”[24]。“腹背奋击”也可以达到使敌军首尾难以兼顾而失败的效果。这种突击并且分割敌军的战术，往往会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东西魏之间的沙苑之战，是西魏的生死存亡之战。当时东魏军队有二十万之多，西魏只有不到万人，“诸将以众寡不敌”。不过这次战役，西魏大胜。探究西魏胜利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史书记载李弼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第一，李弼建议，“彼众我寡，不可平地置阵。此东十里有渭曲，可先据以待之。”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如果在平原地带置阵，就会被四面包围，非常危险。李弼选择的地形两面有水，敌人只能攻击正面。第二，当时，东魏大军主力攻击西魏的“左拒”，左拒面临崩溃的危险。这时候，处于“右拒”的“李弼等率铁骑横击之，绝其军为二队，大破之，斩六千余级，临阵降者二万余人。齐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复大克获。前后虏其卒七万。”[25] 这是重装骑兵战术的一次辉煌运用。在东魏军队集中力量攻击左军时，西魏右军将东魏横截为二。顿时引起东魏军队的溃退，西魏转败为胜。据《周书·李弼传》当时横断东魏军队的铁骑只有“麾下六十骑”[26]。由此可见，重装骑兵由于其较好的防护性能和冲击力，使用得当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战术效果。

（三）重装骑兵的防护较好，可以发挥骑射的最佳效能

《宋书·蛮夷传》记载南朝讨伐“沔北诸蛮”的时候，“军以具装马夹射，大破之”[27]。

重装骑兵是防御与突击的结合，虽然这种结合并不是很理想，但在中古时代，的确有非常优越的战术价值。首先，在突击能力上与轻骑兵和步兵相比优势是明显的，所以拥有重装骑兵的一方可以较为容易击溃对方。在敌方人数占优势的时候，重装骑兵可以实施中央突破，将敌军割裂为数段，从而导致敌军溃败。其次，重装骑兵可以将骑射发挥到比较好的效能，由于防护较好，可以实施抵近围射，给敌军造成较大的杀伤。再次，断绝敌军归路或者断绝其后勤补给路线，是在战

争中获得优势的战略之一。在遏绝道路方面，重装骑兵无疑比轻骑要有利。因为切断道路容易，但是要遏绝补给就要长时期占领交通线，能占还要能守。这一点重装骑兵的优势要明显得多。当然，在一次战争中，这些战术是综合使用的。《南齐书》记载了北魏太和二十二年初，在邓城北魏与南齐的一次战役，北魏军队综合使用了重装骑兵的各种战术，给南齐军队以较大杀伤。史书记载，北魏军队首先“趣城东南，断慧景归路”。同时其他两支军队分别在城北和城东“交射城内”。南齐军队撤退“刘山阳与部曲数百人断后死战”。北魏派遣“铠马百余匹突取山阳”迫使刘山阳撤退。这时候，撤退中的南齐军队遭到断其归路的北魏军队的又一次“夹路射之”的攻击，“军主傅法宪见杀”，“死者相枕”[28]。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轻骑战术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装骑兵在史籍中的身份暧昧难明，要靠考古材料才得以了然其意义，那么轻骑在这一时期的史籍中是常见的。这一晦一明之间，说明了轻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术史上要活跃得多。重装骑兵的淡出历史，应当从轻骑兵能够取代重装骑兵的战术作用，但是轻骑没有重装骑兵昂贵的装备费用来考虑。

上文从重装骑兵的突击能力、重装骑兵在断敌归路绝其粮运以及发挥最大的骑射效能方面进行了论述。事实上，轻骑兵也能实施这三个战术。

一 轻骑兵的中央突破战术及其相关问题

隋唐之际，李世民因为善于使用轻骑突击战术而称雄，对于这个战术他自己有总结，“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29]。这段话包括了多个战术思想的综合运用，其中“出其阵后反击之”，将敌军断为两截或者多截的战术，需要发挥骑兵的突击作用。据汪篯先生研究，李世民用以突破敌阵，分割敌军的骑兵是轻骑兵。

汪篯以为李世民的战术是学自突厥，这个观点可能是不对的。佐克·海厄姆在《简明战争史》中总结了突厥骑兵的战术：保持距离，等待有利的时机进行攻击；佯作退却，引诱追兵进入埋伏圈；攻击后方和侧翼；在十字军前进中经常从后方攻击和迫战。突厥骑兵的四大战术并没有从中央突破这一条。翻检中国史籍，突厥人的战术也没有中央突

破的战例。

纵览十六国北朝的军事史，从中央突破的战术，有一个渐进的不断成熟的过程。北魏中期，将领封敕文和关陇反叛势力边冏在上邽有一次战役。封敕文设伏于城门内，令一组骑兵引诱边冏，然后，“敕文轻骑横冲，大破之，斩冏”[30]。这个事例说明轻骑兵的冲击力也是足够的。史籍中明确记载中央突破战术的是《魏书·尔朱荣传》。当时驻扎在晋阳的尔朱荣“率精骑七千，马皆有副，倍道兼行”，出太行山抵御葛荣军队。当时，葛荣军队有几十万之众“自邺以北列阵数十里，箕张而进”，准备包围尔朱荣。尔朱荣的战术是“身自陷阵，出于敌后，表里合击，大破之”[31]。这个战术，和李世民的轻骑战术完全相同。后来，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在韩陵和高欢决战的时候也是使用的这一战术，“兆率铁骑陷阵，出齐神武之后，将承其背而击之”。[32]有意思的是，同一次战役中，尔朱兆的对手高欢以及汉人高昂使用的战术和尔朱兆竟然是相同的，“及战，高祖不利，军小却，兆等方乘之。高岳、韩匈奴等以五百骑冲其前，斛律敦收散卒蹑其后，昂与蔡儁以千骑自栗园出，横击兆军，兆众由是大败。是日微昂等，高祖几殆”[33]。这一次战役中高昂和蔡儁就是从侧翼突破尔朱兆军队，导致尔朱兆大败。在同一次战役中，双方使用同一战术，可见这一战术已经被证明是成功有效的。东西魏的征战中，双方也使用了轻骑正面突击的战术，在邙山之战中，宇文泰“率轻骑奋击，中军与右军大破之，悉掳其步卒”[34]。这个虽然不是中央突破的战术，但是轻骑正面突击大败步卒，说明了轻骑可以达到重装骑兵那样的突击效果的。也说明了，轻骑中央突破战术，并不是学自突厥而是十六国北魏在长期的战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二 长途奔袭战术

十六国时期，石勒奇袭幽州王浚是长途奔袭战术比较早的一个运用。314年，石勒从襄国（今河北邢台）出发，偷袭远在幽州（今北京市大兴县西南）的王浚。石勒对于王浚早就如鲠在喉，但是“惧刘琨及鲜卑。乌桓为后患，沉吟未发”。石勒的谋士张宾分析了远袭的可能性：第一，王浚众叛亲离“内无强兵以御我”；第二，“轻军往返，不出二旬。使就三方有动，势足旋趾。宜应机电发，勿后时也”。强调了轻骑快速性，对于远袭的重要性。这是重装骑兵难以达到的优点。史书记载，为了达到较好的突袭效果，石勒是“以火宵行”，昼夜兼程。[35]这是没有马镫和高马鞍的战国秦汉骑兵难以做到的。

北魏时期，拓跋焘远袭陕北高原的大夏国，是又一次成功战例。大夏国赫连勃勃去世，国内大乱，拓跋焘率领“轻骑一万八千济河袭昌”。史书记载：“时冬至之日，昌方宴飨，王师奄到，上下惊扰。四驾次

于黑水，去城三十余里，昌乃出战。世祖驰往击之，昌退走入城，未及闭门，军士乘胜入其西宫，焚其西门。”第二年五月，拓跋焘率领大军讨伐赫连昌，“司徒长孙翰、廷尉长孙道生、宗正娥清三万骑为前锋，常山王素、太仆丘堆、将军元太毗步兵三万为后继，南阳王伏真、执金吾桓贷、将军姚黄眉步兵三万部攻城器械，将军贺多罗精骑三千为前候。”这样布置兵力显然不是轻骑偷袭的战术安排。渡过黄河之后，“舍辎重，以轻骑三万先行”。这就属于轻骑远袭的战术了。当时，“群臣咸谏”，反对轻骑急袭，认为统万城坚固，不是短期可以攻陷，“今轻军讨之，进不可克，退无所资，不若步军攻具一时俱往。”拓跋焘仔细分析了两种战术的优劣。他认为，大军前往，赫连昌必然不敢出城决战，闭门死守的话，将会使北魏军队陷于“食尽兵疲，外无所略”的境地。如果“以轻骑至其城下”，再以“羸师诱之”，只要赫连昌出城决战，北魏士兵“去家两千里，复有黄河之难”置于死地，必然勇敢，将大败赫连昌。战争的结果正如拓跋焘所料，“昌军大溃，不及入城，奔于上邽。”陕北名城统万轻易地被攻陷。[36]

北朝后期，东西魏、北周北齐对于长途远袭的战术有多次成功地运用。

高欢尤其是个中高手。北魏孝武帝元年，高欢讨伐尔朱兆，“扬声讨之，师出止者数四，兆意怠。神武揣其岁首当宴会，遣窦泰以精骑驰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军继之。二年正月，窦泰奄至尔朱兆庭。军人因宴休惰，忽见泰军，惊走，追破之于赤洪岭。”时隔不久，高欢又一次成功实施了突袭战术，“（天平）三年正月甲子，神武帅库狄干等万骑袭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缚稍为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费也头斛拔俄弥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张琼以镇守，迁其部落五千户以归”。从晋阳到陕北，一千多里的路程，四天就能赶到，又“缚稍为梯，夜入其城”，将突袭战术发挥到了极致。[37]

高欢的确是战术高手，而他的对手西魏宇文泰更是善于使用长途奔袭战术达到理想的战略目标。西魏立国艰难，关陇地区在北朝后期，经济落后，民风彪悍，要想站住脚是不容易的。幸运的是，侯景之乱带给南朝的动荡局势，很快被西魏利用。宇文泰派遣尉迟迥突袭四川，派于谨突袭江陵，都得手。这样长江上中游已被占据，于是西魏北周不但赢得了与南朝北齐鼎力的资本，而且拥有了战略优势。侯景之乱中，梁益州刺史萧纪带兵东下，与萧绎争夺帝位。萧绎向西魏请求援助，并请讨伐益州。这对困守关陇的宇文泰无疑是好消息。不过，要从长安远征成都谈何容易，所以“诸将多有异同”。只有尉迟迥坚决赞同，他认为，益州和关陇中间有山川险阻，不会防备，所以“宜以精甲锐骑，星夜袭之。平路则倍道兼行，险途则缓兵渐进，出其不意，

冲其腹心。蜀人既骇官军之临速，必望风不守矣。”其后的战争进程确如尉迟迥的分析。[38] 突袭江陵的战役中，宇文护是先锋，“昼夜兼行，乃遣裨将攻梁临边城镇，并拔之。并擒其候骑，进兵径至江陵城下。城中不意兵至，惶窘失图。护又遣骑两千断江津，收舟舰以待。大军之至，围而克之”[39] 。

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骑兵新战术

《六韬》大约成书于战国后期或者秦汉之际，要之，这是一部前马镫时代军事学术的代表作。《六韬》对于前马镫时代的骑兵战术有精辟总结，可以与上文所总结的魏晋南北朝骑兵战术进行比较，从而使得骑兵战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发展被凸显出来。《六韬·犬韬·均兵篇》概括了车兵和骑兵的战术功能：“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也。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在《六韬·犬韬》的《战车篇》和《战骑篇》，更加细致地总结了车兵和骑兵的战术原则。《战骑篇》对于骑兵战术是这样概括的：

敌人始至，行阵未定，前后不属，陷其前骑，击其左右，敌人必走；

敌人行阵，整齐坚固，士卒欲斗，吾骑翼而勿去，或驰而往，或驰而来，其疾如风，其暴如雷，白昼如昏，数更旌旗，变易衣服，其军可克；

敌人行阵不固，士卒不斗，薄其前后，猎其左右，翼而击之，敌人必惧；

敌人暮欲归舍，三军恐骇，翼其两旁，疾击其后，薄其垒口，无使得入，敌人必败；

敌人无险阻保固，深入长驱，绝其粮路，敌人必饥；

地平而易，四面见敌，车骑陷之，敌人必乱；

敌人奔走，士卒散乱，或翼其两旁，或掩其前后，其将可擒；

敌人暮返，其兵甚众，其阵必乱，令我骑十而为队，百而为屯，车五而聚，十而为群，多设旌旗，杂以强弩，或击其两旁，或绝其前后，敌将可虏。

对于这八大战术原则，还可以进行归纳。这段话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就是“翼”，加上“左右”、“前后”等词，强调了骑兵的攻击主要在敌

方的侧翼，而非正面。对于骑兵攻击敌军正面的危险性，《六韬》有充分地认识，“凡以骑陷敌，而不能破阵，敌人佯走，以车骑反击我后，此骑之败地也”。所以《六韬》的作者不赞成单纯以骑兵攻击敌军正面。《六韬》认为，“陷坚阵，要强敌”是车兵的战术功能。我们知道，从东汉末年开始，车兵基本上已经不再执行“陷坚阵，要强敌”的任务，车兵作为主战兵种不再见于历史记载。那么，是哪个兵种取代了车兵而导致车兵的消失呢？前文已经充分论证了，从十六国开始，重装骑兵和轻骑兵可以从正面给与敌军以毁灭性打击，并且进而发展出中央突破，分割敌军的战术。因此，可以说，骑兵的正面攻击和中央突破战术，是魏晋时期开始出现的新战术。

在《六韬》中提到，“遮走北”是车兵的责任，同时又认为骑兵也可以“踵败兵”。这个看起来有点混乱，追击败兵到底是以骑兵为主还是以车兵为主？事实上，《六韬》的作者认为，单纯以骑兵追击败兵是危险的，“追北踰险，长驱不止，敌人伏我两旁，又绝我后，此骑之围地也。”这是骑兵应该避免的“九败”之首。《六韬》认为，追击败兵，应该有车兵的配合。另外，《六韬》不太赞成“长驱不止”地追击敌军。[40]《六韬》的警示在魏晋之前，无疑是经验的积累，有其合理性。不过，根据上文的论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西晋后，长途奔袭而成功的战例层出不穷。长途奔袭，已经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证明为骑兵的标准战术之一。这又是骑兵战术的新发展。

小结：骑兵新战术的影响

新式骑兵的高效率，至少从两个方面影响了中古时期的作战模式。其一，以少胜多战例的大量出现；其二，相应的，战争的规模缩小了。

后赵永和年间，石虎去世，后赵大乱，石虎养孙冉闵屠杀胡羯，中原陷入了动荡。于时，“石琨及张举、王朗率众七万伐鄴，石闵（即冉闵）率骑千余，距之城北。闵执两刃矛，驰骑击之，皆应锋摧溃，斩级三千。琨等大败，遂归于冀州。”以一千多骑兵打败七万敌人，这个比例，这样高的作战效率，是战国秦汉时期所没有出现过的。前文提到，尔朱荣击败北镇反叛势力，也是以七千骑兵对四十万敌人。沙苑之战，西魏以一万骑兵击溃东魏二十五万军队。这些当然都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这样的战例一再地出现，说明了装备了马镫、高马鞍的骑兵将作战效率提高到怎样惊人的地步。

由于作战效能的提高，兵员的多少不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这样战争的规模相对来说是小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作战双方各出动十万以上兵力的情形，比较少见。这和战国、秦汉时期的战争规模相比是小多了。据《史记·王翦列传》，秦国准备攻打楚国之前曾经征

求老将王翦的意见，王翦认为“非六十万人不可”。年轻将领李信认为二十万人足够，结果被楚国打败。最后还是王翦率领六十万大军征服了楚国。在这之前的长平之战，秦国“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基本上是倾全国之力。楚汉之争的垓下之战，“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汉军的数量在三十万以上。项羽的军队也不是一直就是十万，鸿门宴的时候，项羽的军队有四十万之众。不过多年战争项羽被消耗的只剩下十万了。汉军的消耗也很大，“汉王数失军遁去”，有赖萧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又“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获得赵、燕、齐地军队的支持，才得以战胜项羽。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来战国、秦汉时期人力资源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即使是战略决战，双方动用的人力也不是非常庞大，西晋到隋，323年间发生战役约有539次，其中交战单方投入军队十万人以上的战役约有69次。平均每年发生1.7次战争，平均每47年才有一次规模在十万人以上战役。单方投入二十万人以上的战役，在323年间，只有14次。而且，十万人以上规模的战役，经常在某一朝代某一时期集中出现：发生在西晋的有10次，发生在北魏孝文帝时期有10次。西晋加上北魏孝文帝在位年数，共79年。79年间，发生20次大规模战役，平均约四年一次，远远大于西晋南北朝每47年一次大规模战役的平均数。这就更加说明了，在西晋南北朝时期，十万人以上的大规模战役，发生的频率是很低的。仔细分析69次大规模战役，甚至可以说，动用人力越多的一方，取胜的可能性就越小。西晋在和前赵的所有交战记录中，前赵军队很少超过十万，但是几乎每次都是人数更多的西晋失败。北魏孝文帝攻击南朝，每次动用的军队都在十万，乃至二十万以上，但是北魏只有一次胜利的记录。咸和三年，前赵刘曜和后赵石勒决战于洛阳，刘曜的军队是十余万，石勒的军队是“步卒六万，骑二万七千”。最后石勒胜利。前秦和前燕的战略决战是发生在山西的潞川之战。当时，前燕军队是四十万，前秦是六万。相差悬殊，但是前燕失利。淝水之战，前秦动员的军队是“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不过到达前线的只是梁成率领的五万军队和苻坚率领的“轻骑八千”。东晋方面是“水路七万”。其结果是，前秦大败。实际上，在战略决战的时候，双方的军队都没有超过十万。

西晋是马镫被用于骑乘的发轫期，西晋朝廷对于骑兵的作战规律还没有清醒的认识，从而每次战役都征调大规模军队，这是可以理解的。西晋之后，统治者如果动辄调动十万以上的大军，那么有理由怀疑这位统治者并没有深刻领会他的时代的军事规律。孝文帝之前的北魏，每次战役，投入的军队人数很少超过十万。北魏初期，拓跋珪灭后燕

之战，动用了将近四十万军队。但是，在每个进攻方向上，大概都是五万骑。因此，可以看出拓跋珪是经验相当丰富的将领。北魏前期，又一次动员四十万大军是北魏企图灭刘宋之战。虽然这次战役，北魏曾经打到长江边上，但是久攻盱眙不下，人马丧失半数。这场战役没有胜者。这就更加雄辩地说明了，在十六国北朝，军队的人数并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灵活运用骑兵战术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

[1] 《有关“拐子马”诸问题的考释》收于1985年人民出版社版增订本《岳飞传》附录。据作者《自序》，这篇文章应该早于1982年就写成了。

[2] 重装骑兵，杨泓定名为，甲骑具装。杨泓的文章有：《骑兵与甲骑具装》，《文物》1977年10期；《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文物》1984年9期；《关于〈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的一点更正》，《文物》1984年11期。

[3] 王援朝：《唐初甲骑具装衰落与轻骑兵兴起之原因》，《历史研究》1996年4期。

[4] 《唐初之骑兵——唐室之扫荡北方群雄与精骑之运用》，见于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唐长孺、吴宗国、梁太济、宋家钰、席元康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6—260页。这篇文章是用简单的文言撰写的，应该是汪篯1949年之前撰写的。

[5] 沿袭杨泓的研究方法，山西大学2007届刘斌硕士论文《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甲骑具装及甲骑具装俑研究》，主要采用考古学的方法对于甲骑具装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6] 《史记》卷七，第328页。

[7] 《三国志》卷五五，第1283页。

[8] 同上书，第1301页。

[9] 《三国志》卷一七，第519页。

[10] 《晋书》卷一〇三，第2469页。

[11] 《晋书》卷一〇七，第2796页。

[12] 《周书》卷二九，第494页。

[13] 《晋书》卷一一三，第2892页。

[14] 《宋书》卷七七，第1985页。

[15] 盛冬玲译注：《六韬译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4页。

[16] 《晋书》卷一二八，第3181页。

[17] 《魏书》卷九五，第2083页。

[18] 《魏书》卷五一，第1138页。

[19] 《隋书》卷三九，第1152页。

[20] 《魏书》卷四四，第1001页。

[21] 《晋书》卷一〇三，第2699页。

[22] 《南齐书》卷五七，第995页。

[23] 《魏书》卷二，第29—30页。

[24] 《魏书》卷四五，第1013页。

[25] 《周书》卷二，第23—24页。

[26] 《周书》卷一五，第240页。

[27] 《宋书》卷九七，第2397页。

[28] 《南齐书》卷五一，第873—874页。

[29]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第6022页。

[30] 《魏书》卷五一，第1135页。

[31] 《魏书》卷七四，第1649—1650页。

[32] 《北史》卷四九，第1798页。

[33] 《北齐书》卷二一，第294页。

[34] 《周书》卷三〇，第519页。

[35] 《晋书》卷一〇四，第2722页。

[36] 《魏书》卷九五，第2057页。

[37] 《北史》卷六，第217—225页。

[38] 《周书》卷二一，第350页。

[39] 《周书》卷一一，第166页。

[40] 《六韬译注》，第148、195页。

附录三 传世本《李密墓志铭》与出土《李密墓铭》的先后关系辨证

1969年，河南浚县城关公社罗庄西发现《李密墓铭》（下文省称为“《墓铭》”）一石。1986年任思义在《中原文物》发表了此《墓铭》的录文。1991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收录该《墓铭》的清晰图版。此后，《唐代墓志汇编续编》、《全唐文新编》都收录了此《墓铭》的录文。与此《墓铭》密切相关的还有一篇传世文献，即辑录于《文苑英华》和《全唐文》中的《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下文省称为“《墓志铭》”）。对于这两种墓志为何有五百多字的差异，整理者王兴亚、任思义有专门的讨论。他们认为：“其一，新发现的《李密墓铭》保留了魏征撰文的原貌。”“其二，文献里所辑的《墓志铭文》，是流传于世的铭文。与上述刻石之铭比较，可以看出它是修改以后的铭文。”[1] 在他们的录文及其文章发表22年之后，刘健明对他们的某些观点提出商榷，但是刘健明也认为《墓铭》是李密葬时魏徵所撰写的原文，传世的《墓志铭》为魏徵后来改写之作。[2] 对于王兴亚、任思义以及刘健明的观点，笔者本来是认可的，但是在反复研究这两种铭文之后却倾向于认为传世的《墓志铭》为魏徵原稿，入葬之《墓铭》是修改定稿。其原因辨证如下。

修改文章必定有其原因。在文章中，王兴亚、任思义和刘健明所给出的魏徵修改文章的理由并不相同。

王兴亚、任思义给出的理由是：“我们疑为这些改动，与唐朝的政治形势发展，秦王李世民取得帝位有关，也与魏徵本人在唐朝地位变化有关。魏徵在为李密撰墓志铭时，官秘书丞，地位不高。贞观二年，‘迁秘书丞，参与朝政’。后擢侍中，地位显赫。卒于贞观十七年。是年，《唐高祖实录》成书。由于唐朝政治形势和他本人地位的变化，使他将原文中与秦王有关部分做了改动，但又保留了李密想远游以避难而致祸的观点。”意思是说，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魏徵为了避嫌改动了墓志。关于李密叛逃前后李世民的地位作用，刘健明有个很好的梳理，他说：“可见李渊在初一允许李密出发，初二即委派李世民从后牵制李密。”根据刘健明的考订，传世文献《墓志铭》所记之“俄属元帅秦王经营廛洛，亦亲承密策，帅卒先行”符合事实，记

事精确；而出土《墓铭》所记之“总出六戎。与元帅秦王东讨洛邑”，记事较为模糊。二者文辞确实不同，但是从这两段文字很难看出改动前后的文字对李世民在李密被害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的叙写有质的区别，因此魏徵的确有修改以讨好李世民或者避嫌讳的必要。假使魏徵要避嫌就不应该出现“秦王”二字，因而以此作为论定传世本和出土本先后关系的依据似乎有点单薄。

刘健明认为传世文献为后改之文的理由是：“李密叛唐被杀，他（魏徵）为李密撰写墓志铭，实在是一件为难的工作。李密墓志撰于李密死后不久，当时天下未定，群雄仍在逐鹿之时，说李密不满唐政府的薄待，当然不妥；说唐政府另下诏令导致李密有反叛之心，又不能明言；直言李密叛唐被杀，亦对墓主李密不敬。及至天下平定，魏徵改写李密墓志铭时，更不便强调李密为何会有叛唐的行为。”据此原理，刘健明认为：“《墓铭》记李密在降唐时颇受重用，显然不如《墓志铭》可靠，正反映当时天下未定，唐政府薄待来降者对唐王室争夺天下会有负面影响，故《墓铭》要强调唐政府厚待李密；《墓志铭》撰于天下承平之世，不必再加强调。”刘健明以此来证明《墓志铭》是根据《墓铭》改写的。那么这里就有疑问：《墓志铭》是不是宣传品？如果不是，那么刘健明所担心的《墓志铭》会流传四方，以至于引起同时群雄疑忌的论证显然不妥。何况，李密被杀已经使群雄看到李唐政府的薄情寡义，难道一篇墓志可以使李唐的形象改观？这是不可能的。据笔者的理解，说李唐政府对李密如何之好，恰恰是魏徵说给李唐听的，而不是说给群雄听的，表明了徐世等李密旧部对于李唐的态度。如果说《墓志铭》的此段出于后来改写，也有令人难以置信之处。比如刘健明所引传世本《墓志铭》有这么几句话：“公威未振，主自为谋，盖当世旧部先附，多出其右，故吏后来，或居其上。怀渔阳之愤愤，耻从绛灌为伍。负其智勇，颇不自安。”[3] 这一段文字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李密降唐之后所受的冷遇及其矛盾不安的心态，显示出撰写者对于李唐政府有不满之情。如果这是魏徵后来改写之作，他是否有此胆量？笔者认为，受到李唐政府宠信的魏徵不会如此鲁莽（论证详下文）。刘健明又说，“李世民领兵从后出发，本有牵制李密的用意，魏徵不能明言遣派李世民出兵的用意，只得说二人同往东讨洛阳”。刘先生的意思是，魏徵在李密被杀后不能直言李世民曾经监视李密之事。那么，魏徵在贞观时代就敢于写明吗？或者有必要写明吗？根据以上分析，王兴亚、任思义、刘健明所认为的《墓志铭》为根据《墓铭》改写一说，其立论依据站不住脚。既然《墓志铭》不是后来修改稿，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墓志铭》是原稿，《墓铭》是写定稿。

判断一件文献的年代，其内容如果能与有确切年代依据的其他文献有

相印证之处，就可以以这种对应关系来确定这件文献的相对年代。很幸运的是，流传至今的李密传记竟然有四种之多，加上《资治通鉴》，可以与两种李密墓志印证的文献共有五种。仔细比较出土之《墓铭》，它和《隋书》之李密传以及《北史》之李密传可以相互印证的地方较多。《北史》隋代部分是根据《隋书》撰写的。笔者比勘了《隋书》与《北史》的李密传，发现《北史》李密传是《隋书》本传的缩写。所以，比较《隋书》李密传和《墓铭》相合的部分就可以了。《墓铭》和《隋书》相同的地方有三点：（1）不记李密的字；（2）不记李密的曾祖父李弼；（3）不记李密与杨素父子的交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三点上，传世的《墓志铭》与《隋书》不相同。

《隋书·李密传》还有一点和出土《墓铭》相近，就是对李密归降唐朝之后历史的隐讳。《隋书》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最为彻底，李密降唐后的历史不着一字。[4] 《北史》也是匆匆带过，写道，“寻奉使出关安抚，至熊州而叛逃，见杀”[5] 。可见在修史的贞观年间，对此事还是相当忌讳，因此无论是魏徵还是李延寿都不敢触犯。《墓铭》记载李密降唐后所受的待遇很好，是“礼埒维城，荣加恒典，参二王之后，侧周公之胤，入居九列，出总六戎”。传世的《墓志铭》记载完全相反，即如上文所引的，“公威未振，主自为谋，盖当世旧部先附，多出其右，故吏后来，或居其上。怀渔阳之愤愤，耻从绛灌为伍。负其智勇，颇不自安”。对于李密被杀的经过，《墓铭》没有实写，但是《墓志铭》就提到“短兵及接，修途已穷”，说明李密是被唐兵杀死。在赞语里面《墓铭》写作“陵阴迷路，尸乡殒身”用项羽和田横的典故，表达得很隐晦。《墓志铭》写作“熊耳迷路，新安殒身”是实写。[6] 这些事实说明，出土之《墓铭》对李密降唐以后的处理比较近似于《隋书》；传世之《墓志铭》对李密降唐以后的历史比较写实，与《隋书》的谨慎完全相反。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出土的《墓铭》对李密降唐以后的境遇，在表达方式上和《隋书》接近，而传世的《墓志铭》与《隋书》的处理分寸有相当大的差距。《墓铭》刻成于武德二年，《隋书》修成于贞观十年，二者相隔十七年，经历了两个帝王。这种情况说明《墓铭》和《隋书》所代表的对李密的评价是初唐政府的定论。假使魏徵在武德二年之后，贞观十四年之前，动过修改《墓铭》的念头，那么他敢于违逆李唐政府的意图，修改成传世的《墓志铭》这种表达吗？显然，这种可能性不存在。那么传世的《墓志铭》只能是出土的《墓铭》的原稿。

要论定传世的《墓志铭》是原稿，还有以下证据：

证据一，墓志铭原稿一般不可能确定葬期以及应该刻入的与墓主关系

密切的家属、亲友的姓名及其排名。这些都是家属或者主事者临时加入的内容。所以可以据此判断墓志铭文是否原稿。《墓志铭》有一段文字作："粤以武德二年某月日葬于黎阳山西南五里之平原，礼也。故吏徐世等或同婴世网"。[7] 同一段文字，《墓铭》作："粤以武德二年岁次乙卯二月庚子朔十六日乙卯葬于黎阳县之西南五里之平原。故吏上柱国使持节黎阳总管殷卫澶四州诸军事黎州刺史曹国公徐世绩、上柱国临河县开国公柳德义、上柱国阳武县开国公韦宝、上柱国闻喜县开国公杜才干等，或同婴世网。"[8] 两相比较，显然《墓铭》上年月日以及人物比《墓志铭》具体详密得多。可知《墓志铭》是原稿，《墓铭》是加入了具体的时间和人物的后来定稿。

证据二，原稿的有些用词欠妥，定稿有所改动。比如，《墓志铭》有一句话是："所恨并发唐代，不列元恺之功；俱为汉臣，独漏山河之誓"。[9] 《墓铭》改为，"并登尧世，不列元恺之功"[10] 。虽然"唐代"和"尧世"是同一意思，但是当时魏徵作为唐朝的臣子，用"唐代"就有点不雅，所以改为"尧世"。如果《墓志铭》是后出，那么将"尧世"改为"唐代"越改越糟，是不大可能的。

证据三，魏徵在写作原稿时，出于对故主的尊敬，墓志的主题是对李密的赞美，对李唐政府暗含不满。定稿对于李密的赞美有所减弱，对李唐政府的用词有所缓和。在描写李密战功时，《墓志铭》写作："世充甚昆阳之败，炀帝同望夷之祸，化及师歼于黎阳，建德稽颡于河朔。七国之地，四为我有；五都之所，三在域中。"[11] 这些虽然是实写，但是李渊起兵初期，曾以李密为盟主，这么写，容易引起李唐政府的不满。所以《墓铭》改为："隋将王世充帅江淮之劲勇，驰幽并之骑射，鼓之洛汭，只轮无返；宇文化及尽百越之敢死，穷三秦之骁锐，剪之河坝，匹马不归。"[12] 经过删改之后，李密被定性为群雄之一，盟主的身份被掩盖了。又比如，《墓志铭》有一句作，"时年三十有七。故吏上柱国黎阳总管曹国公徐世等收葬，有诏许焉"。《墓铭》作："春秋卅七。诏公礼葬焉。"据新旧《唐书》，李密的收葬的确是出于徐世的请求。《墓铭》为了给李唐政府以面子改为"诏公礼葬焉"，突出了李唐政府的主动地位。如果《墓志铭》是魏徵后来改写，显然不可能把李唐政府从主动改为被动，而且前后重复没有必要。

证据四，仓促之际，有些改写为求简练，显然不太妥当。传世本《墓志铭》比出土的《墓铭》多出五百多字。墓志容量有限，文字不宜过长，可以推测魏徵写好之后，经过他本人或者其他人的删削。从文章整体来看，删削还是比较成功的，删削后的文章更加凝练。以文学水准衡量《墓铭》要好于原稿。以此看来，传世本不可能是魏徵后来的

修改本。因为文章不可能越改越坏。另一方面，由于改写过程中过于强调简练，也有文意不太衔接的地方。比如，出土本“始开楚霸，终基汉皇”后面是“爵穷五等，位登九棘”[13]。“始开”二句还是讲李密未降唐之前的事迹，紧接就是唐朝对李密的待遇，文意比较突兀。其实，传世本作，“始开楚霸，终基汉王。群雄并起，莫恢王度，圣人既作，皇天乃顾。爰自东方，言尊西路。来拟窦融，宠逾英布。爵穷五等，位登九棘”[14]。传世本看起来是有点罗唆，但是文意是连贯的。假设传世之《墓志铭》是修改本，魏徵觉得《墓铭》文意不通，要修改的话，只需要加入“爰自东方，言尊西路”文意就已经贯通，不需要其他词语，其他加入反而罗唆。作为颇有文学才华的魏徵不会犯这种错误，所以说传世本不是后来修改本，反而是出土本是由传世本删改而来。

综上所述，可以推断，《墓志铭》的传世本是原稿，出土本《墓铭》是在传世本的基础上删改而成的。对于这个结论，笔者并不自信，作为一种推断提出，希望引起文史专家的注意，把这一问题彻底解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本书就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吧。

---

[1] 王兴亚、任思义：《李密墓铭的发现及其学术价值》，《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4期。

[2] 刘健明：《李密死事考析》，《出土文献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98年版。

[3] 《文苑英华》卷九四八，第4989页。

[4] 《隋书》卷七〇，第1624页。

[5] 《北史》卷六〇，第2137页。

[6] 《文苑英华》卷九四八，第4989、4990页。

[7] 《文苑英华》卷九四八，第4989页。

[8] 任思义：《〈李密墓志铭〉及其历史价值》，《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

[9] 《文苑英华》卷九四八，第4989页。

[10] 任思义：《〈李密墓志铭〉及其历史价值》，《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

[11] 《文苑英华》卷九四八，第4989页。

[12] 任思义：《〈李密墓志铭〉及其历史价值》，《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

[13] 任思义：《〈李密墓志铭〉及其历史价值》，《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

[14] 《文苑英华》卷九四八，第4990页。

附录四 从政治制度到政治文化

最近在书店看到了邓小南的新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虽然我不是宋史方向，还是迫切地购回快读。反复阅读，收获很大，感觉却很复杂。最深的感受是忽然领悟到，在北京大学，一个政治文化史的研究团队正在形成，而且这些学者都是从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转向政治文化的研究。这些现象对我触动很大，于是想到政治文化是不是史学研究的新方向？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是否会转型？政治制度史与政治文化史是什么关系？一时百感交集，于是找来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陈苏镇的《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以及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来研读，企图对以上问题有所解答。

一 从政治制度到政治文化

在我的印象中，三位学者在进行政治文化史的研究之前，都从事于政治制度史的研究。阎步克在硕士、博士阶段都是研究汉代的察举制度。陈苏镇在1989年前后发表了关于散号将军、散官、《西省考》等关于南北朝政治制度的论文。邓小南于1993年出版专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1997年出版《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这些专著和论文现在都是各个专业方向的经典之作了。

阎步克论述秦汉政治文化的著作《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发表于1996年。陈苏镇的《汉代政治与〈春秋〉学》出版于2001年。邓小南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出版于2006年。阎步克的著作最早，而且1998年陈苏镇发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力作——读〈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一文对于阎步克的政治文化研究发表过看法，可以肯定阎步克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政治文化的先声。[1] 我认为阎步克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现象后面，不仅仅是陈、邓二位的追随。这里面反映了一代学人共同的学术追求，也反映了政治制度史的局限和学者在政治制度研究中积累的问题，从而寻求新的解读的学术道路。

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人不难体会，各个断代的政治制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最大突破的学术方向之一，可以和经济史、历史地理相比毫不逊色甚或更为完善。这或许与学位制度有关。8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位制度，要求研究生在三年之内完成3万字（硕士）或15万字（博士）以上的学位论文。要完成3万字以上的论文，对于还在学术大门周围徘徊的学子其难度是相当大的。值得庆幸的是，历史学各个分支的难度还是有所不同。其中，政治史是最难的。因为要完全了解一个政治事件的过程就要花费大量的考证工夫，而要透析政治事件的内幕对于还很年轻没有经验的学子简直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相比于政治史的难以把握，文献学、历史地理、文化史以及政治制度这些专门史

具有更强的操作性。以政治制度为例，一般正史的《百官志》或者《职官志》、《通典》或者《会要》等典制体史书对于制度都有描述。这些描述比较简单，不能反映制度的流变和丰富的内涵。但是，正史、墓志等传记资料记录了担任某一官职的官员的事迹，透过这些事迹我们能了解到某一制度的流变及其丰富的内涵。制度史大体上的操作方式就是这样，还是容易掌握的。所以，对于初学者制度史是既能保证其顺利毕业又能受到完整学术训练的方向。由于这种原因，制度史的研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制度史的研究入手容易，但是其解释能力却有局限。长期浸淫于某个断代就会对这个王朝乃至中国历史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产生困惑，也就产生了怯疑的强烈的冲动。阎步克曾在一篇访谈中谈到他研究“士大夫政治”的初衷，他说：

士大夫政治应该是个“政治文化”问题。当然西方政治学中的“政治文化”，主要是指影响政治行为的一套态度、信仰和心理。而我则用以指处于政治和文化交界面上，或说兼有政治和文化意义的那些事象。这是为了适合这一情况：传统中国的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是高度整合的，二者经常密不可分。也正是为此，所谓“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其实是一个老话题，而不能说是一种新方法。我的这个兴趣，其实来自上世纪80年代社会对知识分子的一些讨论。“文革”时很多知识分子受迫害，留下了很多刻骨铭心的感受。后来就有很多人呼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过当时的某些议论，不能说没有传统的“尊贤”气息。

最初我也想从传统士人那里，去寻找问题的渊源。余英时先生对中国知识阶层有很精彩的论述。他比照近代“知识分子”，指出先秦士人，已具有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我也沿着这个思路向前走。在跟同学的讨论中，浮现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秦帝国的“文法吏”，算不算知识分子？自己随后去查阅了一些关于官僚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学著作，并开始考虑士人与文吏的关系问题。[2]

阎步克坦陈，他之所以研究“士大夫政治”出于20世纪80年代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作为熟悉秦汉史的专家，他自然从秦汉史着手。他思考的知识分子的问题，显然在制度史的解释框架之外，需要引入政治文化的新思路。在《汉代政治与〈春秋〉学·后记》中陈苏镇介绍了他写作本书的初衷。陈苏镇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思考“士族政治”问题时，尝试了政治文化的视角。在这之前，他以散官研究为学界称道。但是，“士族政治”显然是没有办法在政治制度的框架中思考的。邓小南多年以来一直在宋代政治制度、唐宋妇女研究方面为学界所知。但是，当她要研究这个宋代政治史的核心问题“祖宗家法”的时

候，显然政治制度的方法已经不复使用必须引入政治文化的研究思路。由陈、邓两位的学术道路来看，他们思考这些核心问题已经很久，但是他们着手研究却在最近几年，也就是在学术研究成熟的时期。

所以，不妨大胆推测，从制度史到政治文化史反映了学人从发轫到走向成熟的历程。

二 政治文化

什么是政治文化？本来西方学者就解释就不一致，到了三位中国历史学者手中竟然也有不同。阎步克的解释是：

士大夫政治应该是个“政治文化”问题。当然西方政治学中的“政治文化”，主要是指影响政治行为的一套态度、信仰和心理。而我则用以指处于政治和文化交界面上，或说兼有政治和文化意义的那些事象。这是为了适合这一情况：传统中国的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是高度整合的，二者经常密不可分。 [3]

邓小南的理解是：

作为政治体系观念形态的政治文化，反映着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政治倾向和心理。所谓“祖宗之法”，可以说正存在于政治与文化交汇的界面之上，体现着赵宋一代精英世界中流行的政治态度，并且由此而构成为当时的政治生态环境。 [4]

陈苏镇的理解，我们采用他本人所开设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课所使用的课件：

我们要探讨的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政治生活的软环境，以及这种软环境对实际政治生活的影响。具体内容将涉及政治史、思想史、制度史、风俗史等不同领域，特别是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这些都是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所用的材料和方法不太一样，所以人们常常把它们分开来进行研究。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结合起来，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特别是要对它们相互交叉的部分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会使我们看到一些在单纯的政治史、思想史、制度史研究中看不到或看不清的问题。

一种政治思想通常要在被人们普遍理解和接受从而形成某种政治文化之后，才能对实际政治生活产生深刻影响。所以政治文化是介于政治

思想和政治实践之间的中间环节。[5]

三 政治文化史的研究方法

不仅在政治文化的定义上，三位学者表述不同，就是在政治文化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三位学者也不太一致。陈苏镇在中国政治文化课件中是这样总结的。关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问题”，陈苏镇提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发展的特点：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核心问题，而这些核心问题往往就是各个时代的政治家和学者们所关心所研究的共同母题。德、道、义、理四个核心问题一环扣一环地相继出现，反映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发展是个不断深化的过程。”[6] 这四个核心问题，是陈苏镇总结了他和阎步克的研究成果概括出来的。但是事实上这个概括过于抽象，其指导意义令人怀疑。

再比如陈苏镇总结唐以后的政治文化的核心问题是：“儒家以礼学为基础，吸收了佛道义理之学的研究成果，使‘义’的研究和实践进一步深入到‘理’的层次。”[7] 不知道有多少研究唐以后历史的学者同意他的概括？就是在邓小南的《祖宗之法》的最新的研究之中，她也并没有涉及“义”和“理”。

所以，我认为目前政治文化的研究刚刚起步，积累的成果还很单薄，概括方法总结核心问题似乎过早。我们还是看看三位学者具体的研究方法吧。

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稿》体现了作者善于提炼问题的高超能力。正如上文所述，阎步克之所以写作《士大夫政治演生稿》是因为想到“文法吏”算不算知识分子的问题。而“文法吏”一直就是秦汉史研究比较忽视但却在秦汉史上很重要的职业群体。自然“文法吏”和大家所熟悉的儒生的区别是明显的。这里就体现出比较研究的优势，“文法吏”和儒生势力的消长就构成了“士大夫政治的演生”史。这只是个线索，期间不可避免的要谈到“礼治”和“法治”的关系；“文吏”与秦的关系；汉初的黄老学说；儒生作用日益突出中的汉政变迁，比如独尊儒术，比如王莽改制，等等。这些问题使得整部书既不像政治史又不像思想史，而呈现出政治文化史的面貌。这部书所讨论的范围涉及先秦到东汉上千年的历史，从学科上涉及文字学、政治史、思想史、儒学史、文献学等。所以阎步克所要处理的材料是相当惊人的。这就凸显了政治文化史的一个特点，因为要整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所以要处理的材料也就显得过于庞杂，要经常出入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进行判断。这对历史学家提出了新的要求。

如果说读阎步克的书有什么困惑的话，那就是两个方面。一是考证辩难繁复；一是二分的研究思路。

所谓“二分”的研究思路，熟悉阎步克论著的学人都有深刻印象。比如“职位”与“品位”、“乐师”与“史官”、“文吏”与“儒生”。是历史如此的巧合还是阎步克的思维定式，我觉得这是个有趣的现象。

陈苏镇和阎步克长期在一起学习工作，两个人互相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就政治文化史，我觉得陈苏镇受阎步克的影响较明显一些。即使相互影响着，读二人的论著感觉还是不一样。陈苏镇的论著贴历史更近或者历史味更浓。阎步克说理更多一些，道理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读者不容易触到历史的脉络。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阎步克是田余庆的学生，却更像祝总斌的风格；陈苏镇是祝总斌的学生但是论文读起来有田余庆的风味。陈苏镇在《汉代政治与〈春秋〉学·前言》中特别提到：“其中，我要特别提到的是，田余庆先生的《说张楚》和《论轮台诏》两篇论文，分别论述了汉朝的建立及其道路和汉武一朝的政策及其转变，在内容、思路和方法上都使笔者深受启发。本书前半部分可以说是对这两篇论文的基本观点加以补充和发展的结果。”[8]

在笔者看来，不仅是本书的前半部分，整部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贴紧历史来写，说理不离历史背景的探掘。比如，汉武以后，公羊、谷梁、左氏学派前后兴起。作者不仅指出这个历史现象，不仅深入阐释三家的学说，还把两者结合起来，使得历史的脉络一下子清晰起来。比如，以《左传》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为何兴起，前人主要从今古文的优劣着眼，这是对的。但是陈先生将汉室制礼作乐的迫切性和古文经学在礼乐文献掌握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邓小南在前言中花费大量的篇幅说到理论方法问题。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略加注意即可发现，在有关宋代研究的大量著述中，作者本人的预设常会或隐或现地表露出来。二元论的认识方式我们时时可以遇到：对于新政、变法等重大事件，全盘肯定或者全盘否定，评价特定群体政治倾向时，笼统的‘改革’或‘保守’；此外，诸如‘前进—倒退’，‘传统—现代’等等，迄今仍未完全摆脱贴标签式的简单化提法。当然，我们也颇感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对于‘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等范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仅注意其对立，亦注意其参错与衔接，出现了更为丰富切当的分析。”邓小南所指出的弊病是普遍的，近年来这些现象已经有所改观。学人们日益注意紧扣材料，从材料中得出结论。我倒是觉得“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等范畴的对立会形成新的思维定式。

对于“祖宗之法”的认识，邓小南有一段话，我认为比较重要：

近些年来，学界对于“政治文化”有不少讨论。作为政治体系观念形态的政治文化，反映着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政治倾向和心理。所谓“祖宗之法”，可以说正存在于政治与文化交汇的界面之上，体现着赵宋一代精英世界中流行的政治态度，并且由此而构成为当时的政治生态环境。

“祖宗之法”源于政治实践中的摸索省思，回应着现实政治的需求，但它所认定的内容又在很大程度上寄寓着宋代士大夫的自身理想，而并非全然是“祖宗”们政治行为、规矩原则的实际总结。作为经由统治集团不断阐发的一种观念，“祖宗之法”体现着士大夫群体基本的认识与共识，他们为塑造与维护“祖宗之法，曾经投入了相当的热忱——我们甚至可以说，对于“祖宗之法”的批评，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着这种“塑造”的过程。这种热忱、这种信念，深深帝根植于那个时代的传统之中，影响着当时的行为、制度乃至社会观念，并且就是在那些行为、制度与观念之中，体现出“祖宗之法”精神原则的存在。 [9]

从这个论述，可以把“祖宗之法”和阎、陈二位的“士大夫”政治联系起来，对这种宋代的“士大夫”政治我们自然比较期待。作者展示给我们的是“祖宗”们对于“祖宗之法”的决定性影响，士大夫对于“祖宗之法”的“热忱”与“信念”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论证。是史料不足还是帝王政治思想的束缚，我们不得而知。这种围绕帝王来写政治史而没有体现出士大夫与帝王的相互影响，对于政治史研究来说，不能不说有一点点的遗憾。

北京大学的三位学者在政治文化史方面作出的实绩，使我们看到一条新路。这是一条新路，然而并不好走。政治文化史的定义还存在争议，研究方法也不确定。这或许，需要更多的学有成就的、年轻的学者们去完善吧。希望看到学者们，从已经熟练掌握的研究模式中关注政治文化史，从而给历史研究带来新的活力。

---

[1] 陈苏镇：《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力作——读〈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2] 《勉为其难尽力而为——阎步克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2005年第3期。

[3]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4]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3、14页。

[5] http://www.hist.pku.edu.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73。

[6] 同上。

[7] 同上。

[8] 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9]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14页。

参考文献

史料及工具书：

（晋）陈寿著：《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北齐）魏收等撰：《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唐）李百药撰：《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点校本。

（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点校本。

（梁）沈约撰：《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梁）萧子显撰：《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点校本。

（唐）姚思廉撰：《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

（唐）姚思廉撰：《陈书》，中华书局1972年点校本。

（唐）魏徵等撰：《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

（唐）李延寿撰：《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唐）李延寿撰：《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

（宋）司马光等编著：《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

（后魏）杨衒之著：《洛阳伽蓝记》，周祖谟校释本，中华书局1963年版。

（后魏）郦道元撰：《水经注》，杨守敬、熊会贞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点校本。

（隋）颜之推著：《颜氏家训》，王利器集解本，中华书局1993年版。

（唐）温大雅撰：《大唐创业起居注》，李季平、李锡厚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梁）僧佑编：《弘明集》，《大正藏》本，台湾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版。

（唐）道宣编：《广弘明集》，《大正藏》本，台湾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版。

（唐）杜佑撰：《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

（清）严可均辑录：《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

（清）陆增祥撰：《八琼室金石补证》，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赵万里编：《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赵超编：《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罗新、叶炜编著：《新出土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版。

韩理洲等编著：《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

韩理洲等编著：《全北齐北周文补遗》，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

王其祎、周晓薇编著：《隋代墓志铭汇考》，线装书局2007年版。

贠安志编著：《中国北周珍贵文物》，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

张泽咸、朱大渭编：《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

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

王仲荦著：《北周六典》，中华书局1979年版。

王仲荦著：《北周地理志》，中华书局1980年版。

专著：

《六韬》，盛冬玲译注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隋）王通：《文中子》，浙江人民出版社影印《百子全书》1984年版。

（宋）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南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2004年版。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王树民校证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

（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2000年版。

（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

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

（清）沈垚：《北镇释》，收入《落颿楼文稿》，《丛书集成》1985重印本。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

陈寅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黄山书社1987年版。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

谷霁光：《府兵制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唐长孺：《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版。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缪钺：《读史存稿》，三联书店1963年版。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马长寿：《鲜卑与乌桓》，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版。

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版。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何兹全：《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何兹全：《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鹭江出版社2003年版。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2年版。

田余庆：《拓拔史探》，三联书店2003年版。

祝总斌：《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黄永年：《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版。

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2004年版。

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

陈琳国：《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中华书局2002年版。

张伟国：《关陇武将与周隋政权》，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牟发松：《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何德章：《拓跋鲜卑汉化进程研究》，1995年北京大学博士论文，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罗新：《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的民族形势与社会整合》，1995年北京大学博士论文，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王军：《孝文帝定族姓后北魏各阶层政治地位研究》，1997年北京大学博士论文，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河以北的边境豪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李万生：《侯景之乱与北朝政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李万生：《南北朝史拾遗》，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

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史语所专刊第四十五），台湾1963年版。

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2002年版。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2002年版。

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1979年版。

郑钦仁：《北魏官僚机构研究》，牧童出版社（台）1976年版。

吕春盛：《北齐政治史研究》，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文史丛刊之七十五1987年版。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

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版。

朱大渭主编：《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梁满仓：《汉唐间政治与文化探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刘驰：《六朝士族探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张金龙：《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甘肃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雷依群：《北周史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军事史》，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韩昇、刘建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

［日］宫崎市定：《宫崎市定说隋炀帝》，杨晓钟、孟简、魏海燕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韩昇：《隋文帝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仓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

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版。

陶贤都：《魏晋南北朝霸府与霸府政治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吕春盛：《关陇集团的权力结构演变——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稻乡出版社2002年版。

王怡辰：《东魏北齐的统治集团》，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

刘斌：《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甲骑具装及甲骑具装俑研究》，山西大学2007届硕士论文，导师王银田教授。

凌文超：《略论六世纪前中原骑兵的渊源及其演进》，湖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毕业论文，导师张灿辉教授。

论文：

朱师辙：《北魏北镇考辨》，《辅仁学志》第12卷第一二合期1943年。

彭体用：《从鲜汉统治阶级的逐步合流看北魏统治的强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宇文泰对于前朝历史经验的扬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6期。

李培栋：《北魏太和改制前胡汉形势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杨际平：《试论北魏太和后期的改革》，《北朝研究》1993年第4期。

金前文：《孝文帝关于“六辅”的设计与其身后政局的走向》，《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吕克勤：《评北魏孝文帝巩固宣武帝皇位的措施》，《临沂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4年第1期。

张金龙：《高肇专权与北魏宣武帝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兰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高蕴华：《北魏中衰原因初探》，《史学集刊》1991第3期。

夏鼐、王世民：《读史札记：论北魏兵士除六夷及胡化汉人之外似亦有汉人在内》，《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鲍桐：《北魏北疆几个历史地理问题的探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期。

刘汉东：《论北朝的吏治思想》，《许昌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

宿白：《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文物》1977年第11期。

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文物》1978年第7期。

张乃翥、韩玉玲：《北魏元邵墓出土文物的民族学研究》，《北朝研究》1992年第3期。

王延武：《北魏末的文化模式与尔朱荣的败亡》，《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1期。

孔毅：《北朝后期北镇鲜卑群体心态的演变》，《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东魏北齐的文士及其命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张国安：《试论北镇鲜卑的民族融合》，《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唐长孺、黄惠贤：《试论魏末北镇镇民暴动的性质》，《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北魏末期的山胡勑勒起义》，《武汉大学学报》1964年第4期；《二秦城民暴动的性质和特点》，《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唐长孺：《北魏南境诸州的城民》，收入《山居存稿》。

万绳楠：《魏末北镇暴动是阶级斗争还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史学月刊》1964年第9期；《从陈齐周三方关系的演变看隋的统一》，《安徽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

熊德基：《鲜卑汉化与北朝三姓的兴亡》，收入《六朝史考实》，中华书局2000年版。

许福谦：《东魏北齐胡汉之争新说》，《文史哲》1993年第3期。

周双林：《从京畿都督府看东魏北齐的民族关系》，《史学月刊》1987年第6期。

朱雷：《〈北齐书〉斛律羡传中所见北齐“私兵”制》，《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江中柱：《高欢高澄父子与东魏的汉化》，《福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何德章：《高乾兄弟的命运》，《高澄之死臆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6辑1998年；《北魏末帝位的异动与东西魏的政治走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8辑2001年；《北魏迁洛后鲜卑贵族的文士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0辑2003年。

陈群：《渤海高氏与东魏政治》，《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罗新本：《娄昭君评议》，《天府新论》1997年第5期。

庞骏：《北齐储君制度探论》，《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

严耀中：《北齐政治与尚书并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谷霁光：《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1期，1937年；《再论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厦门大学学报》第3集1944年；《三论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科学与教学》第1期1958年；《西魏北周时期统一与割据势力消涨的辨证关系》，《江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张维训：《简论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的租调问题》，《北朝研究》1990年上半年刊。

王大华：《论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之构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胡如雷：《北周政局的演变与杨坚的以隋代周》，《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2期。

丁巧林：《苏绰政治思想探源与评述》，《北朝研究》1990年下半年刊。

刘国石：《简论西魏北周改革—兼论孝文帝改制未尽之历史任务》，《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1949年以来西魏北周改革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11期。

靳生禾、谢鸿喜：《玉壁之战古战场考察报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期。

张先昌：《西魏〈六条诏书〉中的选官思想》，《晋阳学刊》2002年第2期。

曹道衡：《西魏北周时期的关陇学术与文化》，《文学遗产》2002年第3期。

陈金凤：《北周外交略论》，《北朝研究》1999年第1辑。

刘文锁：《〈安伽墓志〉与“关中本位政策”》，《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侯养民、穆渭生：《北周武帝孝陵三题》，《文博》2000年第6期。

杨廷福：《略论〈唐律〉的历史渊源》，收入《唐律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罗丰：《丝绸之路与北朝隋唐原州古墓》，《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

史睿：《北周隋唐初的士族政策与政治秩序的变迁》，《首都师大学报》1998年第3期。

朱维铮：《府兵制度化时期西魏北周社会的特殊矛盾及其解决》，《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

吕春盛：《论北镇势力在西魏政权中的扩张》，《大陆杂志》第90卷第3期；《宇文泰亲信集团与魏周革命》，《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

孙同勋：《北魏末年与北齐时代的胡汉冲突》，《思与言》第2卷第4期1964年11月。

萧璠：《东魏北齐内部的胡汉问题及其背景》，《食货月刊》第6卷第8期，1976年。

[日]直江直子：《北魏的镇人》，《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3期；《北魏的地方行政制度与镇人》，李凭译，《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日]川本芳昭：《从军制和婚姻看北魏高祖的汉化政策》，《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3年第1期。

[日]内田吟风：《北朝中鲜卑及诸北系贵族之地位》，杨联升译，《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221期，1937年1月22日。

[韩]朴汉济：《北魏洛阳社会与胡汉体制》，《中原文物》1998年第4期；《西魏北周的胡姓再行与胡汉体制》，《文史哲》1993年第3期；《西魏北周的赐姓与乡兵的府兵化》，《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北魏王权与胡汉体制》，《北朝研究》1993年第1期。

韩昇：《隋史考证九则》，《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胡如雷：《隋文帝杨坚的篡周阴谋与即位后的沉猜成性》，收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

赖红卫：《隋文帝性格研究》，《渝西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王兴亚、任思义：《李密墓铭的发现及其学术价值》，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4期。

刘健明：《李密死事考析》，《出土文献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98年版。

汪篯：《唐初之骑兵——唐室之扫荡北方群雄与精骑之运用》，见于唐长孺、吴宗国、梁太济、宋家钰、席元康编：《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邓广铭：《有关“拐子马”诸问题的考释》收于1985年人民出版社版增订本《岳飞传》附录。

杨泓：《骑兵与甲骑具装》，《文物》1977年10期；《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文物》1984年9期；《关于〈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的一点更正》，《文物》1984年11期。

王援朝：《唐初甲骑具装衰落与轻骑兵兴起之原因》，《历史研究》1996年4期。

阎步克：《勉为其难尽力而为——闫步克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2005年第3期。

陈苏镇：《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力作——读〈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后记

这部稿子，有这么几个方面要向读者交待。此书从最初的构思到现在成型，迁延达14年，中间还有三年多是从事唐史和唐代文献的学习（完全没有顾及北朝史），所以此书各章的行文风格有点差异，这次整理想统一，却发现很难统一。见于本书的古代纪年和古代地名，若非特别需要都未能给出公元纪年和当代地理坐标。在文献的使用方面，尽量引用最原始文献，但有些地方使用了《魏书》、《北齐书》、《周书》后补的内容而未用所从出的《北史》，主要是考虑到现代学者更习惯引用三史，而非《北史》。有时候，为了论证的方便引用了《资治通鉴》。这么多附录，也让人颇难为情，然都是正文的副产品，离之两伤，合之则双美，故予以保留。有些人名难以用简体字表达，故用了繁体。以上问题，笔者踌躇再三，终于以现在的面目问世，是否妥当，尚祈指正。

回顾学习历史的历程，首先要感谢五位老师：何兹全、黄永年、陈琳国、刘九生、贾二强。贾老师是我结识其他老师的媒介，再次向其表示感激。成绩如此，使我提到老师的时候，不禁汗颜。读书这么多年，受到陈寅恪、田余庆、毛汉光、谷川道雄、川胜义雄等先生影响最大，趁此机会，奉上后学的敬意。

感谢张艳云、吴洪琳、杨小慧、赵豪迈、张文华，若非五位师友在读博期间的资金支持，我将无缘于北朝历史，也就不会有本书的写作。感谢臧振教授、周晓薇教授、王其祎研究员多年的关爱。老友赵满海与我相互切磋已经十有六年，在我的学术视野的开拓方面，赵兄功不可没。感谢博士三年期间的同门与同学，尤其是安洵亨师兄、刘蓉师姐、孙玉敏和史耕山兄。王帅博士在复旦大学访学期间，亲自操作机器，为笔者复印材料，想起来就让人感动。感谢王立嘉先生、丁立平教授、谢乃和教授、贾云学长、贺金娥师妹等在文章发表上给予的支持。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和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在本书撰写过程中的支持。感谢罗莉编辑对这部书稿的赏识与高效率的工作。

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良好的工作氛围。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所资料室、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曾经或者多年以来所提供的服务。

感谢我的父母、兄嫂、妻子。他们很早就知道做学问不是好的谋生道路，但还是在各方面给予我全力支持。

最后，感谢我的学生。自2005年以来，我以各种形式，将本书内容给学生宣讲过，本书的不断完善就产生于讲课之中。我的表弟范鹏伟硕士，对我的研究和生活提供了多方面帮助，李艳涛弟为本书核对引文一过，一并表示感谢。

北镇势力与北朝政治文化




ISBN 978-7-5161-1561-9

定价:55.00元